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目錄

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卷

第一篇　總論

第一章　中國文學批評演變概述

有人說，中國的文學批評並無特殊可以論述之處，一些文論詩話以及詞話曲話之著，大都是些零星不成系統的材料，不是記述聞見近於史料，便是講論作法偏於修辭；否則講得虛無縹緲玄之又玄，令人不可捉摸。不錯！中國的文學批評確有這些現象。但是，若由歷史的觀點以言，則中國文學批評之演變蛻化，也自有其可以注意的地方。何以故？蓋文學批評所由形成之主要的關係，不外兩方面：一是文學的關係，即是對於文學之自覺；二是思想的關係，即是所以佐其批評的根據。由前者言，文學批評常與文學發生相互聯帶的關係。易言之，即文學批評的轉變，恆隨文學上的演變為轉移；而有時文學上的演化，又每因文學批評之影響而改變。因此，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講述，其效用最少足以解決中國文學史上問題的一部分。由後者言，文學批評又常與學術思想發生相互聯帶的關係；

因此，中國的文學批評即在陳陳相因的老生常談中也足以看出其社會思想的背景。這固然不同歐西的文學批評一樣，一時代有一時代所標榜的主義，而於各時代中假爲可有期劃的區分；然亦不能謂中國文學批評全沒有其思想上的根據。歷史上的幾個重要一些的文學批評家，即在其零星片段的文章中間也何嘗不可找出其中心的思想，看出其一貫的主張呢？這是中國文學批評史所以值得而且需要講述的地方。

假謂整個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總得劃分幾個時期。關於這個，只能就文學批評本身的演進，以爲分期的標準。至於各個派別的不同的主張，只能在分期中間各別述之，而不能有明顯的時代的區分。大抵由於中國的文學批評而言，籠統言之，可以分爲三個時期：一是文學觀念演進期，一是文學觀念復古期，一是文學批評完成期。自周秦以迄南北朝，爲文學觀念演進期。自隋唐以迄北宋，爲文學觀念復古期。南宋金元以後直至現代，庶幾成爲文學批評之完成期。簡言之，則文學觀念之演進與復古二時期，恰恰成爲文學批評分途發展的現象。前一時期的批評風氣偏於文，而後一時期則偏於質。前一時期重在形式，而後一時期則重在內容。所以這正是文學批評之分途發展期。至於以後，進爲文學批評之完成期，則一方面完成一種極端偏向的理論，一方面又能善於調劑融合種種不同的理論而推於一以集其大成。由質言，較以前爲精確爲完備；由量言，亦較以前爲豐富爲普遍。

第二章　文學觀念之演進與復古

本書上卷所講重在文學批評之分途發展期所以先一述文學觀念之演進與復古的情形。關於這些，我曾有一文——文學觀念與其含義之變遷載諸東方雜誌第二十五卷第一號。現在，將此文大意擇要而簡言之如左：

在文學觀念演進期中可以分爲三個階段：周秦爲一期，兩漢爲一期，魏晉南北朝又爲一期。

周秦時期所謂「文學」，兼有文章博學二義，文即是學，學不離文，這實是最廣義的文學觀念，也即是最初期的文學觀念。

至於兩漢，始進一步把「文」與「學」分別而言，把「文學」與「文章」分別而言了。——用單字則「文」與「學」不同，用連語則「文章」又與「文學」不同。故漢時所謂「文學」雖仍含有學術的意義，但所謂「文」或「文章」便專指詞章而言，頗與近人所稱「文學」之意義相近了。漢時有「文學」「文章」之分，實是文學觀念進程中承前啟後的一個重要關鍵。

迨至魏晉南北朝，於是較兩漢更進一步，別「文學」於其他學術之外，於是「文學」一名之含義，始與近人所用者相同。而且，即於同樣美而動人的文章中間，更有「文」「筆」之分：「筆」重在知，「文」重在情；「筆」重在應用，「文」重在美感；始與近人所云純文學雜文學之分，其意義亦相似。

文學觀念經了以上兩漢與魏晉南北朝兩個時期的演進，於是漸歸於明晰，可是不實時復爲逆流的進行，於是又經過隋唐與北宋兩個時期，一再復古，而文學觀念又與周秦時代沒有多大的分別。所以在復古期中也是經

過兩個階段的演進。

其在隋唐五代之時，因不滿意於創作界之淫靡浮濫，於是對於六朝文學根本上起了懷疑。其對於六朝文學之懷疑本是不錯，不過惜其不甚了解文學之本質，轉以形成復古的傾向而已。蓋由文學的外形以認識文學之面目，其事易；由文學的內質以辨別文學之本質，其事難。前一期重在外形方面，遞演遞進，所以成為文學觀念之演進期；這一期重在內質方面，於是覺得漫無標準，遂不得不以古昔聖賢之著作與思想為標準了。以古昔聖賢之著作與思想為標準，此所以愈變愈古而成文學觀念的復古期了。不過同樣的復古潮流中，而唐宋又各有其分界。唐人論文以古昔聖賢的著作為標準；宋人論文，以古昔聖賢的思想為標準。以著作為標準，所以雖主明道，而終偏於文；——所謂『上規姚姒渾渾亡涯』云云，正可看出唐人學文的態度。所以唐人說文以貫道，而不說文以載道。曰貫道，則是因文以見道，而道必藉文而始顯。文與道顯有輕重的區分，而文與道終究看作是兩個物事，所以雖亦重道而仍有意於文。這猶是文學觀念復古期中第一期的現象。

至於北宋，則變本加厲，主張文以載道，主張為道而作文，則便是以古昔聖賢的思想為標準了。曰「貫」，曰「載」，雖只是一個字的分別，而其意義實不盡相同。貫道是道必藉文而顯，載道是文須因道而成，輕重之間區別顯然。李漢序韓昌黎集云『文者貫道之器也，』此唐人之說；周敦頤通書云『文所以載道也，』此宋人之說。所以文學觀到了北宋，始把文學作為道學的附庸。

由於文以貫道的文學觀，於是造成了一輩古文家的文。古文家之論文，雖口口聲聲離不開一個「道」字，但在實際上只是把道字作幌子作招牌，至其所重視者還是在修辭的工夫。這不僅唐代古文家是如此，即宋代的古文家亦未嘗不如此；即此後由唐宋八家一脈相承的古文家亦未嘗不是如此。

由於文以載道的文學觀，於是造成了一輩道學家的文。在道學家之論文，便偏於重道而只以文作為工具，——所謂載道之具而已。古文家之論文，其誤在以筆為文；以筆為文，則六朝「文」「筆」之分淆矣。道學家之論文，其誤在以學為文；以學為文，則兩漢「文學」「文章」之分，「學」與「文」之分亦混淆。在前一再演進而歸於明畫者，至是復一再復古而歸於混淆。於是傳統的文學觀於以形成，而且亦始有其權威。

今綜括上文列為表式說明之如次：

文學觀念演進期

第一期（周秦）　第二期（兩漢）　第三期（魏晉南北朝）

文學（文章 博學）

文章（文）
文——近於純文學
筆——近於雜文學

文學（學）
儒——通其理
學——識其事

文學觀念復古期

第一期（隋唐五代）　第二期（北宋）

文 ←——→ 道
貫道說

道學（載道說）

第三章　文學觀念演進與復古之文學的原因

以前說過文學批評恆與文學有相互聯帶的關係，所以現在即由文學本身之演變以說明文學觀念之演變。

就文學本身之演進言：在周秦是文學文與學術文混合的時期，到兩漢是文學文與學術文分途的時期，而魏晉南北朝又是文學文發展的時期。周秦以前，文字之用未廣，以口耳治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所以詩歌固屬韻文，而學術文字也往往協比其音，錯綜其言，其修辭工夫亦無異於詩歌。學術之文與文學之文猶不顯著絕大的分別，所以所謂「文學」，便兼有「文章」與「博學」二義。至於兩漢，學術文則漸趨於散化，而文學文則漸趨於韻化或駢化。在當時最占文學史上重要的位置者即為辭賦。辭賦為體，由承前言則出於韻文，由啟後言則衍為駢文，最可看出當時文學文之韻化與駢化。所以因當時辭賦特別的發展，當然須有「文學」與「文章」的分別。更進而至魏晉南北朝，無論韻散文之含有文學性質者都有駢化的傾向。此韻散之駢化，好似僅僅是形式上的問題，實則即是時人論文所謂『義歸於翰藻』的標準。文學之所以能離開學術而顯明其獨特的性質者，其原因即在於此。文學作品既與一切學術文字異其面目，而發揮其特有的性質，則處此文勝的時代文學觀念之漸趨正確也是當然的現象了。

迨其弊也，物極必反，於是力矯文勝的弊病，而漸返於質。返質之道，在唐代則一變六朝對偶聲律之習而尚單

奇，術氣勢，於是文章之美不重在文字上的技巧，而重在合於語勢之自然。唐代古文所以不必「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而也未嘗不可「脣吻遒會情靈搖蕩」者，即由於此。這實是當時「有意爲文」（程顥語）的成功，以其成功，所以可以以筆爲文，以筆爲文，所以仍返到孔門詩文分途的見解，而不復需要文筆之分了。這是文學觀念復古期中第一期的情形。進至北宋，道學家之語錄體興，於是屏修辭之功，崇淺質之文，完全以語爲文，不僅合於語勢之自然了。顧炎武譏語錄之文，謂「夫子言性與天道可得而聞，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聞」（日知錄十九）錢大昕謂「語錄行則儒家有鄙倍之詞，有德而不必有言」（十駕齋養新錄十八）所以由極端尚質的語錄體言之，則道學家之論文，重道輕文，以文爲載道之工具，以文學爲道學之附庸，又安足怪！

第四章　文學觀念演進與復古之思想的原因

同時，文學批評又常與學術思想發生相互連帶的關係，所以學術思想風氣之轉移又常足以左右文學批評的主張。

茲先就文學觀念演進期的三階段言之。先秦顯學，僅儒道墨三家，而此三家中道家反文，墨家尙質，在文學批評史上都沒什麼關係；惟儒家以尙文之故，頗流露其一部分的文學觀，所以亦惟儒家思想爲最重要。不過因儒家偏尙實用之故，其文學觀不免有文道合一的傾向，僅足爲雜文學張目，不足爲純文學發展之助力，所以論周秦時

期的文學批評，只能在儒家思想中求之，而在儒家思想中所窺出的文學觀念，當然要與學術相混合了。兩漢時期儒家經學雖號爲極盛，而儒家思想却未見光大，所以儒家的文學觀亦不足完全支配當時的文學界。兩漢詞人如司馬相如揚雄張衡等，殆均沾染道家之臭味者；故因經生詞人之各異其趣向，而「文學」與「文章」亦顯生區別。至魏晉南北朝，論思想則道家之外益以釋家，論學術則兩漢經生所孜孜致力之訓詁章句諸學又皆中止，此實是儒家學術思想最爲銷沈的時期。因此文學方面亦儘可不爲傳統的衛道觀念所支配，而純文學的進行遂得以絕無阻礙，文學觀念亦得離開傳統思想而趨於正確。

進至隋唐，風氣一變：王通講學，而河汾傳洙泗之緒；二劉傳經，而唐疏亦足闡漢注之蘊；於是儒家之學術思想復見發皇。只可惜李唐一代，儒釋道三教並尊，終究不是儒學獨霸的時期，所以文之與道，猶能並重。及至北宋，陽儒陰釋的道學家起，於是以其陽儒，遂本於儒家重道輕藝的見解而益以偏執；以其陰釋，亦略近禪宗不立語言文字的宗旨而卑視文藝。這種思想既深入於人心，則文學觀念又安得不趨於極端的尚質而成爲極端的復古。我嘗以爲歷來中國一般人的文學觀，大率都本於孔子；至其本於孔子，而成爲傳統的文學觀者，則不是一般詩人的文學觀，而是文人的文學觀，不是駢文家的文學觀而是古文家的文學觀，抑且不是古文家的文學觀，而是道學家或道學家之功利派的文學觀。此意，我於舊作所謂傳統的文學觀一文中已申論之。（東方雜誌二十五卷二十四號）蓋這全是本於孔子文學觀中尚用一點以發揮者；所以發揮到極端，有時成爲尚質而不尚文了。

第五章　文學觀念之演變所及於文學批評之影響

文學觀念之所以逐漸演進，逐漸正確，其原因已如上述。我們且再看這種文學觀念的演進，與文學批評的發展有什麼關係。本來，對於文學觀念的認識既得逐漸正確而清楚，也即是文學批評本身的演進，因爲這本是文學批評中一個重要的中心的問題。所以文學觀念逐漸演進，逐漸正確，則文學批評的發展，也隨之而逐漸進行。

在周秦時期絕無專門討論某一種文章的著作，絕無整篇較有系統的批評；所有一些足稱爲某家的文學觀者，都不過是偶爾及之，有的或且泛指文化或文藝。所以我們於此，祇不過可以從此推測，略窺其對於文學的見解而已。

到了兩漢，纔有專門討論某種文體的言論，如揚雄之論賦是；纔有專門記載文藝作品的著錄，如漢書藝文志之詩賦略是。即此以觀，已較前期爲進一步了。

及至魏晉南北朝，於是有關於作家的品評，有關於文體的著述，但大都仍不免一鱗一爪不賅不全的弊病。迨劉勰文心雕龍出，體大思精，於是文學批評纔有一部空前的偉著，文學批評的基礎也自是成立。這實是文學觀念漸趨正確後的時代的產物。

所以我以爲文學觀念假使不經過唐代文人宋代儒家的復古主張，則文學批評的進行，正是一帆風順儘有

發展的機會。不過歷史上的事實總是進化的，無論復古潮流怎樣震盪一時，無論如何眷懷往古，取則前修，以成爲逆流的進行，而此逆流的進行，也未嘗不是進化歷程中應有的步驟。蓋在文學觀念演進期中所討論的問題，是以文學之外形爲中心；而在文學觀念復古期中所討論的問題，則又以文學之內質爲中心。此所以雖似復古而實際則不過移轉問題的中心而已。近人因反對此期文以載道的說法，遂且抹煞其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要亦未爲公允也。

不過，在演進期中雖重在文學之外形，而以對於文學有清楚的認識，所以有性質上的「文」「筆」之分。在復古期中雖重在文學內質之討論，而以輕視文學之特性，所以自唐以後又只有形式上的「詩」「文」的分別。由前者言，則言「文」可以賅詩；由後者言，則言「文」便不足以賅詩。此又所以演進期中的論「文」見解，較爲融通，而在復古期中則適成爲傳統的文學觀而已。此則復古的潮流所以又終究不免爲逆流的進行也。

第一篇　周秦

第一章　儒家

第一節　孔門之文學觀

第一目　關於「文學」諸名之意義

在周秦諸子的學說中本無所謂文學批評，但因其學術思想在後世頗有權威，故其及於文學批評者，也未嘗不有相當的影響；——尤其以素主尙文之儒家爲尤甚。蓋後人以崇奉儒學之故，遂亦宗其著述；以宗其著述奉爲文學模範之故，遂更聯帶信仰其文學觀念：於是這種文學觀遂成爲傳統的勢力而深入於人心。

不過諸子文學並非純文學，所以當時諸子之論及文學者，往往傾向於學術方面。這在素主尙用之儒家當然也不能免此。論語先進篇云：『文學子游子夏。』此處所謂「文學」，其義即廣漠無垠，蓋是一切書籍，一切學問，都包括在內者。揚雄法言吾子篇云：『子游子夏得其書矣。』邢昺論語疏云：『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曰「書」曰「博學」，則所謂「文學」云者，偏於學術可知。故邢氏所謂文章博學，並非分文學爲二科，實以孔門所謂「文學」，在後世可分爲文章博學二科者，在當時必兼此二義也。是則「文學」之稱，雖始於孔門，而其義與今人所稱

的文學不同。

不過孔門雖不曾分文章博學爲二科，而在「文學」總名之中，實亦分括文章博學二義。大抵時人稱名：就典籍之性質言，則分爲「詩」「書」二類；就文辭之體裁言，則別爲「詩」「文」二類。孔門所謂「詩」，即邢昺所謂「文章」一義；其所謂「文」或「書」，則邢昺所謂「博學」一義。而「文學」一名，又所以統攝此二種者。

我們必須明白這一點，然後知孔子論詩論文，顯有分別。其論「詩」則較合於文學之意義：如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論語陽貨）蓋言其有涵養性情之作用也；謂『不學詩無以言』（論語季氏）則又所謂『言之無文行而不遠』之旨也。其論「文」則多偏於學術的傾向。論語公冶長篇云：『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原來他因好學好問所以謂之文。學而篇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何晏集解引馬融說云：『文者古之遺文。』又述而篇云：『子以四教：文，行，忠，信』；邢昺疏亦云：『文謂先王之遺文。』二家均解「文」爲「遺文」，則可知所謂「文」者，實指典籍而言，凡書本以內所有的知識，都在「文」的範圍以內了。（註）

【註】禮記孔子閒居引孔子云：『志之所至，詩亦至焉。』史記滑稽列傳亦引孔子『書以道事，詩以達意』之語。這些話雖不盡可據，但頗足爲「詩」與「書」，或「文」之分別。蓋詩重在創，所以達自己之志意；文重在述，故必考古昔之遺文。

明此分別，纔可以論孔子之文學觀。昔人只見到孔子論「文」的一方面，遂以爲孔子之文學觀偏主於應用，於是主義理者倡爲『文以載道』之說，（周敦頤語）主經濟者倡爲『文須有益於天下』之論。（顧炎武語）至一般詩人又只見到孔子論「詩」的一方面，於是復以爲孔子論文本不這樣拘泥，其言詩亦有主無關係者。（見袁枚答沈大宗伯論詩書）實則皆見其一端而已。

因此，孔門之文學觀最重要者有兩點：一是尙文，一是尙用。惟其尙文，所以不同於墨家；惟其尙用，所以又不同於道家。這是孔子文學觀主要之點。此兩點雖似矛盾，而孔子卻能善爲調劑，絕不見其衝突。『中庸不可能也，』孔子思想卽是處處能恰到中庸的地步者。大抵其尙文的觀點本於他論「詩」的主張；尙用的觀點又本於他論「文」的主張；而同時論詩未嘗不主應用，論文也未嘗不主修飾，所以能折衷調劑恰到好處。後人論詩論文雖自謂淵源於孔子，實則都不過各執一說，互趨極端；所以對於尙文尙用二點亦覺其顯有衝突了。

孔子尙文之意，隨處流露。『郁郁乎文哉，吾從周，』這猶可說是對於文化的觀念，不足以定其對於文學的見解。但如禮記表記引孔子語，謂『情欲信，辭欲巧，』則其尙文之意固顯然可見了。袁枚論詩標舉性靈，不廢雕縟，似與所謂傳統的文學觀有別，但其隨園詩話中卻屢次稱引此語以爲其性靈說之護符。以他這樣純美論的文學批評家猶且引孔子之言以自重，亦可知孔子文學觀中本有尙文一義了。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亦引孔子語云『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此又孔子論『文』主於尙文之證。（註一）阮元以易

經文言爲出孔子所撰，固未必是：然其文言說謂：

> 爲文章者不務協音以成韻，修辭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也，非孔子之所謂文也。（研經室三集二）

則固非無所見者。（註二）

【註一】儒家貴文之旨，具見文心雕龍徵聖篇。其言云：「遠稱唐世，則煥乎爲盛；近褒周代，則郁哉可從：此政化貴文之徵也。鄭伯入陳，以文辭爲功；宋置折俎，以多文舉禮：此事蹟貴文之徵也。褒美子產，則云「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泛論君子，則云「情欲信而辭欲巧」：此修身貴文之徵也。」

【註二】文心雕龍徵聖篇亦云：「易稱「辨物正言，斷辭則備」；書云「辭尙體要，弗惟好異」。故知正言所以立辨，體要所以成辭。辭成無好異之尤，辨立有斷辭之義。雖精義曲隱，無傷其正言；微辭婉晦，不害其體要。體要與微辭偕通，正言共精義並用，聖人之文章亦可見也。顏闔以爲「仲尼飾羽而畫，徒事華辭」，雖欲訾聖，弗可得已。然則聖文之雅麗，固銜華而佩實者也。」

至其尙用之惜，則更爲明顯。孔子論「文」，本偏於學術的意義，其主應用固宜；乃其論「詩」，是指純文學言者，却亦依舊不離應用的主張。論語中引孔子論「詩」的地方很多，如：

> 不學詩，無以言。（季氏）
>
> 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陽貨）

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子路）

此數節中包括幾個意思：或以詩爲足助德性之涵養；或以之爲足資知識之廣博；或以助社會倫理之實施，或以助政治應對的辭令。這樣一講，於是雖以純文學的作品也不能離於政教的應用了。

這兩個觀念，尙文則宜超於實用，尙用則宜忽於文飾；所以似相衝突但他却能折衷調劑以成爲儒家的中庸思想。儒家思想中往往有許多相反而適以相成者，卽此亦其一例也。

孔門之文學觀既如上述：論其本身未嘗不有相當的價値；可是論其影響所及，則非惟不足助文學之發展，有時且足摧殘文學之生命。蓋孔門於尙文尙用二點，雖能調劑折衷，但後儒推闡，便不免偏於一端——尙用輕文，重道輕藝，而文學遂喪失其獨立性了。這個原因不外二端：(1.)由於後人之誤會。孔子論「文」本有學術的意義，所以主張尙用。後來字義既變，而一般人不加分別，猶用孔子論「文」之語以解釋後人所言之「文」，或且奉以爲文學觀的標準，所以遂多誤會了。(2.) 由於孔子之暗示。孔子雖主尙文，但只以之爲手段，並不以之爲目的，所以比較起來，他於尙用方面主之更力，則後人推波助瀾，偏於一端，固亦無怪其然了。這是孔門文學觀所以在文學批評史上不甚有良好影響的緣故。

第三目　孔門文學觀之影響

關於孔門文學觀之影響可分兩方面言之：一是道的觀念，一是神的觀念。道的觀念是從尙用的方面以發揮

者，蓋所以盡其用神的觀念則較重在討論文事又所以闡其文。茲分述於次：

孔門論文因重在道的關係，於是處處不離應用的觀念，不免有文道合一的傾向。論語憲問篇謂：『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這即是後世道學家重道輕文的主張。所以述而篇中『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數語，諸家解釋均闡發孔門重道輕藝之意。(註) 這種說法，決不能算是後人之傅會。觀於孔子論詩重在「無邪，」論修辭重在「達，」重在「立誠，」則知其主旨所在，固是偏重在質而所謂質，又須含有道德之意味者。

(註)何晏集解就其用字之差異言，於是謂『不足據依故曰遊。』文中子事君篇又就其排列之先後言，於是謂『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遊也。』無論從那方面言，似乎都有重道輕藝之意。

本於這種見解；所以影響所及，一般人對於文學家則總認為文人無行，以為一為文人便不足觀；至其對於文學作品則又以為是玩物喪志而無裨教化。蓋孔子固已說過『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重在行而不重在言，所以文人有言而無行，便不免為世所詬病了。又孔子論樂謂韶則盡美盡善，謂武則盡美而未盡善：以美善合一為標準，則文學作品尙美而不主於善，固亦宜其為世所廢棄了。此種極端的主張，蓋均出於孔子思想之暗示，而加以推闡而已。

至其神的觀念，則可於易與春秋中求之。其說似較為後起，但與孔子思想並非沒有關係，故亦附帶述之。大抵孔子之所謂「道，」只重在人事；其後雜以陰陽道家之言，始說得微妙一些，遂與道家相同，也有其「神」的觀念。

我嘗謂『中國之文學批評，不是論得太切實，講文以載道，便是講得太虛玄，論文之神味，前者是儒家思想之發揮，後者是道家思想之影響』（小說月報十九卷一號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之神氣說）實則儒家亦自有其「神」的觀念，不過講得切實一些，沒有道家那麼虛玄而已。

蓋儒道二家之所謂道，根本不同，故於所謂「神，」其意義也不是一樣。道家的形而上學是重在「無，」儒家的形而上學是重在「變。」重在「無，」所以覺得道的本體微妙玄通而深不可識；重在「變，」所以能『恆易以知險，恆簡以知阻，』所以能『彰往而察來，』『溫故而知新。』因這一點的不同，所以對於「名」的觀念也不同：道家尚無名，而儒家尚正名。尚無名，所以謂道體是『繩繩不可名，』而文字書籍全屬糟粕；因此，道家之所謂「神，」也是虛無縹緲的，不可捉摸的，不可言說的，不着邊際的。至於儒家，則於易論天道，於春秋論人事。春秋的正名與易經的易所以有關係，即由於「變。」易所以說明這個變，春秋所以防止這個變。易是說明宇宙現象的變，春秋是防止人事狀況的變。（註）這是儒家的形而上學之實際的應用。易繫辭傳云：『夫易，聖人之所以極深而研幾也。』——所謂「深，」所謂「幾，」都是將變而未顯之兆。所以又說：『幾者動之微，吉（凶）（據孔校增）之先見者也。』能明白這個「幾，」纔可以防微杜漸；所以儒家之所謂「神，」即不外於知幾。此易繫辭傳所以有『知幾其神乎』之語也。我們明此，纔知儒道兩家所言的「神，」其意義不同，其及於後世文學批評之影響亦大相逕庭。（可參閱拙著儒道二家論神與文學批評之關係，見燕京學報第四期。）

【註】易文言云：『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又韓非子外儲篇引子夏語云：『春秋之記臣殺君子殺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積，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早絕之。』可知易文言數語原指春秋時事說。

儒家之「神」的觀念，既如上述，於是可一言其與文學批評之關係，或其及於後世文學批評之影響。此可分「作」與「評」的兩方面言之。

其應用到「作」的方面者，只是切切實實修辭的問題。蓋儒家神的觀念之應用，即在於春秋的正名主義，故其影響到文學方面，即是基於他正名主義的修辭問題。（註一）正名主義應用於文學，即成爲修辭上所謂鍊字鍊句的法門。用字鍛鍊得其意義之內涵，恰如其分量，這便是正名字；此韓愈所謂『凡爲文辭宜略識字』（科斗書後記）者是也。用字鍛鍊得與所論述的身分恰恰相當，這便是正名分；此又昔人所謂『夫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尙書序）者是也。文心雕龍宗經篇云：『春秋辨理，一字見義，』此即正名主義在文學上的應用，而後世古文家之講義法，蓋即本是以推闡者。名正則言順，所以荀子正名一篇兼論正辭，正辭即是鍊句的工夫。今觀春秋僖公十六年文云『隕石於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公穀於此皆說明一則先石後五，一則先六後鷁之旨，雖不免過於穿鑿，（註二）但亦可爲春秋措辭無所苟之證。所以禮記經解篇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註一】荀子勸學篇云：『春秋之微也，』又儒效篇云：『春秋言是其微也。』微字，即正名之義。

【註二】顧炎武日知錄云：『此爾文之不得不爾，非史云「五石」而夫子改之「石五」；史云「鷁六」而夫子改之「六鷁」也。』

其在「辭」的方面所指出者，即是體會的方法。易繫辭傳引孔子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又云：『其旨遠，其辭文。』其意似亦求之言意之表，頗與道家意旨相近。但以其泥於知，偏於用，故不與莊子一樣，不取直接欣賞的態度，不帶一些神秘性。蓋孔子教人重在啟發，所謂舉一反三，所謂聞一知十，都是彰往察來，溫故知新的推理作用。是以儒家所謂『知幾其神，』是有待於經驗，有待於知識的。易繫辭傳云：『夫易，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蓋儒家之所謂「神，」即不過是近似觸類旁通法耳。道家論「神」無待於知，故成爲玄學的；儒家論神有待於知，故近於科學的。這是儒道兩家對於「神」的觀念之解釋與應用之大區別。

不過儒家之所謂體會，其方法有二種：一是在本文內體會的，一是在本文外體會的。在本文內體會者猶不離本文的原意，所以是近於科學的。其在本文外體會者，有時竟與原意絕無關係，所以又簡直是「非科學」的了。蓋本文內的體會較重在考據；本文外的體會，全出於附會。所以前者之失泥，後者之失鑿。

其在本文內體會者，更有二種方法：一是論世，一是知人。易繫辭傳云：『聖人之情見乎辭，』因爲情見乎辭，所以可以知人論世。繫辭傳又云：

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

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故其辭危。

此即是其論世的例證。論語陽貨篇云：『詩可以觀。』鄭玄曰：『觀風俗之盛衰，』即是此意。後來詩序蓋即本此法而濫用之者。繫辭傳又云：

　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這又是所謂知人的例證。春秋時人之賦詩觀志，亦大率用此方法的。

其在本文外體會者，即論語所云『詩可以興』（陽貨）及『興於詩』（泰伯）的意思。何晏論語集解引孔安國註『詩可以興』句云，『興，引譬連類。』這即是說「興」的方法。又引包咸注『興於詩』句云，『興，起也；言修身當先學詩。』這又是說「興」的作用。這種觸類旁通的方法，本是要施之實用的，所以他對其弟子的說詩，完全用這個方法。論語學而篇云：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可乎？』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八佾篇云：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類此諸例，竟只重在人事方面的啓發，全不管詩文的原意。此在教育方面，固未嘗不有相當的價值，而在文學方面

却未免近於穿鑿了。後來孟子說詩，往往妄加推測，荀子亦好引詩句以佐其論證，都是受其影響；至韓詩外傳而其穿鑿更不勝言矣。蓋此均由於孔子文學觀中尚用的觀念推而至極的結果。

第二節　孟子之知言養氣說

第一目　知言

孟子在文學批評上有兩項長處。這兩項長處，孟子也自知之而自言之。有一天公孫丑問孟子道：『敢問夫子惡乎長？』孟子說：『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這兩句確是我們論他的文學觀時所值得注意者。其知言一部分猶不外孔門的思想；至養氣一部分，則為他自得之處。不過由文學批評而言，則養氣之說及於後世文學批評之影響雖甚大，却不是他論文的見解。故現在論及他的文學批評時，似乎只宜注重在知言一項言之。

公孫丑再繼續問道：『何謂知言？』孟子云：

> 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公孫丑）

這與易繫辭傳所謂『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云云，同樣意思。蓋此也即是儒家神的觀念之應用。聽其言，讀其文，因以窺其心而知其人。這即是所謂由已知而推及未知；這即是所謂體會。他又說：

>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離婁）

他既說『眸子不能掩其惡』了，但是又要加一句『聽其言也；』因爲眸子只可見心之形，言卻可聞心之聲。由言以聞心聲，固然足以知其人了，但猶不過知時人之言，不足以知古人之言。欲知古人之言，他又提出兩個方法：一個是『以意逆志，』一個是「論世。」

以意逆志的方法，是由主觀的體會，直探到詩人的心志裏。告子篇中有一節論小弁與凱風二詩，正可爲他應用這種方法的例證。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何以言之？』曰：『怨。』曰：『固哉高叟之爲詩也。有人於此：越人關弓而射之，則己談笑而道之；無他，疏之也。其兄關弓而射之，則己垂涕泣而道之；無他，戚之也。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固矣夫高叟之爲詩也！』曰：『凱風何以不怨？』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小弁，親之過大者也。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親之過小而怨，是不可磯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這種論詩，入情入理，確是通達，確是不固。他在萬章篇中更說明其理云：

咸丘蒙曰：『舜之不臣堯，則吾既得聞命矣。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而舜既爲天子矣，敢問瞽瞍之非臣，如何？』曰：『是詩也，非是之謂也；勞於王事而不得養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獨賢勞也。」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如以辭而已矣！雲漢之詩曰：「周餘黎民，靡有孑遺，」信斯言也，是周無遺民也。』

這樣論詩，也深能探求詩人之情志，其言亦入情入理。他知道詩人當情感強烈之時，措辭不免有抑揚過甚的地方，類此之處，都不可泥於字面求之。照他這樣以意逆志用之得當，對於純文學的瞭解，確是更能深切而不流於固陋。可是他這種以意逆志全憑主觀的體會終究不是客觀研究的方法。所謂以意的意，本是漫無定準的，偶一不當，便不免穿鑿附會，成為過分的深求。孟子論詩所以時多亂斷的地方者以此。蓋他所謂以意逆志者，有時仍不免襲孔門的觸類旁通法也。沿襲孔門的觸類旁通法，所以雖主張「逆」，主張直契精微，但是終究只能做到意志之探索，而不能蘄其精神之感應。

至於論世的方法，萬章篇又云：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又尚論古之人。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

論世是知人的一個方法，也即是知言的一個方法。頌詩讀書不可不知人，欲知人不可不論世。他知道『文武興則民好善，幽厲興則民好暴，』他又知道『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均見告子）環境之支配是很有力量的。雖則他說『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盡心）但欲知其人之或受時代影響，或是反抗時代，總不可不論其世。論世而作者之個性乃益顯。

不過孟子提出這個方法雖很重要，而他對於這個方法之應用卻不免時多錯誤。顧頡剛先生的詩經的厄運與幸運一文言之已詳，可不復贅述了。（註

【注】見小說月報叢書，又古史辨第三冊，錄其文，易題爲詩經在春秋戰國間的地位。

第二目　養氣說

現在且再論其養氣一部分，於此可以看出他的思想及於後世文學批評之影響。孟子固自謂：『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者且看他的所謂浩然之氣是什麼？他說：

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公孫丑）

在當時孟子提出一個「氣」字，正與莊子提出一個「神」字一樣。在莊子孟子的本意，其所謂「神」與「氣」，本與文學批評無關；但後人論文，却偏偏要在這種不可捉摸的抽象名詞上去推敲，論文講到精微之處，總不外「神」與「氣」，所以現在亦必得把他闡說一下。

莊子之所謂「神」，是道家的修養之最後境界；孟子之所謂「氣」，是儒家的修養之最後境界。所以論「神」必得內志不紛，外欲盡蠲；論「氣」必得配義與道。其虛實之別，即「神」「氣」之分，因此後人把神與氣的觀念應用到文學批評上，也覺得論「神」則較爲虛玄，論「氣」則較爲切實。

孟子這個「氣」的觀念，雖非論文，但並非與文學批評絕無關係。因爲養氣之說，卽本於他的「知言」的觀念一轉變而來者。所謂知言云者，只是以知他人之言，固非自己對於立言之預備也。易言之，卽非自己對於文學上

的一種修養工夫也。明白了『詖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然則對於自己之言，其不欲有所蔽，有所陷，有所離，有所窮，蓋可知矣；其不欲爲詖辭，爲淫辭，爲邪辭，爲遁辭，又可知矣！然則將若何而後能不爲詖辭淫辭邪辭遁辭乎？將若何而後能使其言之無所蔽，無所陷，無所離，無所窮乎？於是進一步遂想到配義與道的養氣工夫。如能胸中養得一團浩然之氣，則自然至大至剛，自然不致流爲詖辭淫辭邪辭遁辭矣。孔子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即此意；不過孟子始拈出一個「氣」字耳。而且辭之詖淫邪遁，有時或是環境的關係，所謂：『幽厲興則民好暴』也，至養氣則完全是個人修養的關係，又所謂『若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也。所以知言是消極的，養氣是積極的；知言是對人的，養氣是對己的；一則因言以知心，一則養氣以立言。其分別之點，如此而已。我所以謂即一件事的兩方面者此也。這個關係，韓愈亦能明之；韓氏云：『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這不是說養氣即是立言的預備嗎？這個關係，蘇轍亦能明之；蘇氏云：『文者氣之所形，……………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弘博，稱其氣之小大。』（上樞密韓太尉書）這不是說孟子文章之美，即由於他養氣的工夫嗎？不過他們於孟子所云知言養氣二者之關係，不曾說得明暢而已！這決不是我要說孟子論氣與文學批評有關，纔這般附會者，因爲實有如此關係，所以後來文氣說得以本之發揮也。孟子因云：『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不得已而後言，此所以氣盛言宜，此所以稱其氣之小大也。

荀子非十二子篇之論子思孟子，稱其『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此語在後世之言道統說者，往往加以極大的攻擊，以爲孔子之道惟子思孟子爲得其傳，何以詆爲不知其統呢？實則我們若從文學批評一方面而言，無寧謂荀子爲得其正，而孟子爲不知其統。

此語怎講？蓋孟子所論主於詩，荀子所論主於文。主於詩，近「文章」一義，故受孔門「神」的觀念之影響爲多；主於文，近「博學」一義，故又以本於孔門「道」的觀念者爲多。孔門論詩論文本有區別，其影響所及亦本有「神」與「道」兩方面，孟荀不過各執其一端而已。孟荀雖各執其一端，但以荀主於文，而又出於孔門道的觀念，所以後來文道合一的文學觀，得有傳統的權威者，其關鍵皆在於荀子。何况荀子論文，雖偏於尙用而仍不廢尙文，與孔門文學觀尙文尙用二義正相符合。所以由道言則孟子爲得其統，由論文見解言則荀子爲得其正。人皆知漢儒之學出於荀子，宋儒之學出於孟子。實則從文學批評而言，則漢人解詩，其方法正出於孟子；宋儒論文，其宗旨又本於荀子。這種相反的現象，使非就詩與文之區別言之，便將不得其解矣。

荀子所論主於文，故所謂「文學，」其意義仍與孔門相近。大略篇云：

人之於文學也，猶玉之於琢磨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謂學問也。和之璧，井里之厥也，玉人琢之爲天子寶。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爲天下列士。

此言可與禮論篇所謂『性者本始材朴也，僞者文理隆盛也，』二語互相發明。蓋他對於文學的觀念，視同文理隆

盛的「僞」人不可以不被文學，即所謂『無僞則性不能自美』也。被文學，服禮義，則可以爲天下列士，故其所謂「文學」也仍是最廣義的文學觀念，而比較的偏於「道」的意味者。大抵荀子論文，把孔門尚文尚用兩觀念打成一片而較偏於用，故遂較偏於道耳。

荀子非相篇嘗言『君子必辯，』且稱聖人之辯爲『成文而類，』稱士君子之辯爲『文而致實，』又云：

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爲甚故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觀人以言，美於黼黻文章；聽人以言，樂於鐘鼓琴瑟。故君子之於言無厭。鄙夫反是，好其實不恤其文。

其所謂「鄙夫」何所指？楊倞注云：『但好其實而不知文飾，若墨子之屬也，』則荀子尚文之意固顯然可見。然一究其所以言『君子必辯』者，所以言『君子之於言無厭』者，不過爲『好言其所善』而已。其正名篇又云：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

『白其志義，』即所謂『好言其所善』的辯。後人所謂文以明道以貫道以載道者正是此語的絕妙註解。

文學的性質和作用既如此，所以他以爲：

凡議必將立隆正，然後可也。無隆正則是非不分，而辯訟不決。……故凡言議期命以聖王爲師。（正論）

這與後人論文主於徵聖者何以異？所以他又以爲：

聖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詩書禮樂之（道）（據劉台拱校增）歸是矣。

> 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儒效）

這又與後人論文主於宗經者何以異！所以他又以爲：

> 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少無法而流湎然，雖辯，小人也。故……辯說譬喻齊給便利而不順禮義謂之姦說。……聖人之所禁也。（非十二子）

非相篇亦云：『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這又與後人論文主於明道者何以異！所以我以爲傳統的文學觀，其根基即確定於荀子。

第二章　墨家之文學觀

墨家思想極端尙質，所以論文亦主應用。此雖有類於儒家之以善爲鵠，而實則不同。儒家主非功利的尙用；墨家主功利的尙用。尙用而非功利的，故與尙文思想不相衝突；尙用而爲功利的，則充其量非成爲極端的尙質不可。這是儒墨文學觀之異點。

因此，墨子書中所謂「文學」，其意義當然同於學術，而且他的爲文學之方法，亦更近於科學化。其非命上云：

> 言必立儀。言而毋儀，譬猶運鈞之上而言朝夕者也；是非利害之辨，不可得而明知也。

非命中也說：

凡出言談由文學之爲道也，則不可而不先立義（同儀）法。若言而無義，譬猶立朝夕於員鈞之上也，則雖有巧工，必不能得正焉。

這種言必立儀的說法，即爲後來荀子『凡議必將立隆正』之說所自出。這種要先立個「儀」或「隆正」以爲標準的大前提的，都是演繹法。不過他和荀子有些不同，因爲墨子的「儀」是三表法，而荀子僅得其一端而已。墨子因欲立儀，故以爲言必有三表。這三表是什麼？據非命上原文而復補以非命中一篇所言列之於下：

有本之者——於何本之？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天鬼之志。）（此據非命中補。）

有原之者——於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

有用之者——於何用之？發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

此節很重要。由於他的實用主義看來：所謂本之，是言其「用」之根據，亦即其言所以適於應用之已往的證據；所謂原之，是言其「用」之對象，亦即其言所以適於應用之現在的證據；所謂用之，是言其「用」之成績，又爲其言可以適於應用之未來的證據。

由其第一點言：所謂本之，是求所以適於應用之已往的證據。這種證據時過境遷，有時或不適於現代或更不適於將來，但在信而好古的儒家看來卻最合脾胃。故荀子取之以完成他『以聖王爲師』的演繹的方法，以完成他宗經明道徵聖的文學觀。是以他的『上本之於古者聖王之事』的方法，爲儒墨之所同，因爲這雖主尚用，猶不

很帶功利的色彩。

至所謂本之於天鬼之志，則在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家當然不取了；但在於宗教的墨學，却奉以爲立言的儀法。天志中云：

是故子之有天之辟人，無以異乎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也。今夫輪人操其規，將以量度天下之圜與不圜也，曰中吾規者謂之圜，不中吾規者謂之不圜；是以圜與不圜皆可得而知也。此其故何則？圜法明也。匠人亦操其矩，將以度量天下之方與不方也，曰中吾矩者謂之方，不中吾矩者謂之不方：是以方與不方皆可得而知之。此其故何則？方法明也。故子之有天之意也，上將以度天下之王公大人爲刑政也，下將以量天下之萬民爲文學出言談也。觀其行，順天之意，謂之善意行；反天之意，謂之不善意行。觀其言談，順天之意，謂之善言談；反天之意，謂之不善言談。

以天志作爲言談文學善不善之標準者，是宗教的墨學之方法。這種文學觀僅以善爲標準。墨子各篇大都出其弟子所記錄，所以互有異同。現在猶存非命中一篇中有「考之天鬼之志」之語，使吾人得以考知宗教的墨學之論證方法。——或者可說是宗教的墨學之文學觀。

由其第二點言，所謂原之，是要「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實者」，於是完全偏重在經驗，後來科學的墨學，即從此逐漸推闡，由附庸而爲大國者。於是始與原來宗教的墨學，指趣各異了。小取篇云「摹略萬物之然，論求羣言之比。」

這即是說，由於原察百姓耳目之實，更進一步以成爲歸納的論理而已。此所謂『以類取以類予』也。大取篇云：

夫辭以類行者也，立辭而不明於其類，則必困矣。

這便是科學的墨學「爲文學」之方法，這種求真的科學化的散文，如得漸次成立，至少可使一般人不認之爲文學的作品，而文學的性質也得因以明顯。

由其第三點言，所謂用之要『發以爲刑政，觀其中國家百姓人民之利』者，這本與前二點不同。前二點猶爲墨子論辨的方法論，此則爲其目的論也。所以前二點猶不過成爲學術的散文之二種論證法，此則可以見其尙用的文學觀。

墨子兼愛下云『用而不可，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儒家只以善爲應用之鵠的而已；墨家則以爲善的必須合於應用的，此即帶功利的眼光了。(註)墨家這樣主功利的用，所以對於儒家尙文之說是最反對的。韓非子外儲說中有一節論及墨家的文學觀云：

楚王謂田鳩曰：『墨子者，顯學也。其身體則可；其言多而不辯，何也？』曰：『昔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爲之飾裝，從文衣之媵七十人。至晉，晉人愛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爲木蘭之櫃，薰以桂椒，綴以珠玉，飾以玫瑰，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其用。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

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用，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

〔註〕墨子貴義篇耕柱篇並云：『子墨子曰：言足以遷（耕柱篇作複）行者，常之；不足以遷（耕柱篇作舉）行者，勿常。不足以遷（耕柱篇作舉）行而常之，是蕩口也。』胡適之先生哲學史大綱謂：『遷字和舉字同意，皆是升高進步之意。這兩章意思是說無論什麼理論，什麼學說，須要能改良人生的行爲，始可推尚；若不能增進人生的行爲，便不值得推尚了。』此說頗能發揮墨子尚用之旨。

這很可看出墨家尚用而不尚文的見解了。後來韓非對於文學之態度，即本於此。五蠹篇云：『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問辯篇云：『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而民以文學非之。』這是焚書坑儒的先聲，墨家猶未必有此態度。但如下述諸篇所云：

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顯學篇）

夫言行者，以功用爲之的彀者也。……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爲之的彀，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爲察，以博文爲辯。（問辯篇）

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

(五蠹篇)

綜其所言，則知其出於墨家功利的實用主義，固是無可疑的了。所以我以為墨子的三表法，荀子與宗教的墨學得其第一項，科學的墨學得其第二項，韓非得其第三項。所以我又以為墨家之文學觀，眞是極端尙質而尙用。

第三章　道家思想及於文學批評之影響

道家對於文學之態度便與儒墨異趣。他以為『道可道非常道，』所以要『行不言之教』了；他又以為『名可名非常名，』所以又以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了。不用立言，言也不求其美，所以由道家的態度言，視「文學」為贅疣，為陳迹，為糟粕。但若由道家思想及於文學批評之影響言，則轉足以間接幫助文學的發展。何以故？以其反為後世之文學批評提出幾個重要的觀念故。

其所提出的：一點是重在「自然，」又一點是重在「神。」蓋道家因於反對人為，所以崇尙自然。——淺言之則求其質樸，深言之則斬其神妙。老子云『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此雖不是論文，而後世論文者拈出華實厚薄諸字，實本於此。韓非子解此語云：『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隨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本此說以論文，蓋即極端主張自然美者。

老子所言暗示崇尙自然的意思，莊子則更進一步而提出一個「神」字。由文學或文學批評的觀點而言，自然的頂點本也即是神境；所以莊子論神，雖與文學批評無關而其精微處却與文藝的神祕性息息相通。蓋以「神」的觀念本是抽象的觀念，不可捉摸，難以言說，於是不得不利用寓言以藝事相喩。以藝事相喩，則論道而及於藝，而其妙解入微之處遂爲後人論文者之所宗了。此可分兩方面說明之：

其暗示在「作」的方面而指出一種境界者，即是「神化」的觀念。而這個觀念同時又是批評方面的問題，蓋不啻爲批評界立一個標準。莊子書中所舉許多例，大抵可作如是觀。其養生主篇述庖丁解牛云：

庖丁爲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解，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全是形容一種出神入化的妙境。下文再引庖丁自述語云：

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況大軱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閒，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閒，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

文惠君聽了這一節話，說道：『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現在吾亦爲之下一轉語云：『善哉吾讀此節而得

莊子之所謂文學批評焉；」或者說：「善哉吾讀此文而知莊子思想之影響所及，有關於文學批評者焉。」我們且看他天道篇又述輪扁語云：

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

此書自述其經歷之所得，要之均歸於神境。故知後人之以神化論詩文妙境，其意實自道家發之。不過莊子重在道，所以說「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所以說「得之於手而應於心。」而後人則重在技，所以又易其語云「技也而進乎道矣，」所以云「得之於心而應於手。」此則爲其不同之點而已。

至欲達到這種神化妙境，則就其所論而歸納之，其所須注意者不外三端：其一，這完全是天才和環境的關係，非盡人之所能爲者。此即呂梁丈夫自述其蹈水之道所謂：

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爲私焉，此吾所以蹈之也。（達生篇）

他再申言之云：

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各人個性都有一些偏嗜，各人天才也都有一些偏能，能得環境適合，足以盡其所長，自然容易發展了。這即是所謂「故，」所謂「性，」所謂「命。」

其二、這完全更是工夫的關係，即是所謂火候。火候不到，不會有爐火純青之象，也不會自然入妙，即不能到神化的境界。莊子於此意闡發亦極精，達生篇中更舉二例云：

>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
> 紀渻子爲王養鬬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

『用志不分，』工夫乃深；『望之似木雞，』工夫乃神。所謂『絢爛之後歸於平淡，』所謂『俯拾即是不取諸鄰，』皆是這種境界的詮釋。

其三、這完全更是感興的關係，又不是有了天才，加以學力，而可期之必得者。此即齊物論中所謂「天籟」之說。郭象解釋之云：

> 夫天籟者，豈復別有一物哉！即衆比竹之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

此意極是。蓋天籟即是適然相遭，莫知其然而然者。達生篇中有一節云：

梓慶削木爲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爲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爲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骨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

此節正可與天籟之說相發明。假使以莊注莊，則以天合天，便是天籟的絕妙注脚。

這種寓言，在莊子並以之論道，但若從文學批評的觀點而言，又何其能發揮文藝之精義呢！

至其暗示給批評家之方法者，即在鑒賞藝術也要取「神遇」的態度。這個和他的名學有關，因爲他的知識論立言高遠，富於神秘的色彩。他所重的知識是性知，是先天之知。這先天之知，是不用經驗，不以觸受想思知的。其人間世篇云：

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耳止於聽：（舊作「聽止於耳」今從俞樾校改）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怎樣是聽之以心？怎樣是聽之以氣？這好像是匪夷所思，好像不是常識所能領會的。聽以耳的是感覺，聽以心的是思慮，這我們都能明白。至於不聽以耳，不聽以心而聽以氣的性知，未免玄之又玄了。實則莊子所謂聽以氣云者，即

是直覺。蓋莊子之所欲探討而認識者，即莊子之所謂「道」。道是宇宙的本體而非宇宙的現象。明宇宙的現象須後天的經驗之知，故是常識所能辨別的；明宇宙的本體貴先天的性知，所以是超常識的。藝術的鑑賞與體會道體，有同樣的性質，所以應用這種見解以推到藝術方面，也當然重在神遇，不重在泥迹象以求之了。純文學的鑑賞，本宜別有會心，與作者之精神相合一，纔能得其神趣。莊子天地篇中也有這些意思。他說：

>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

這些話若用以鑑賞文藝，亦近於桐城派所謂「以聲求氣」的方法。神之又神，自能盡其妙的。他更設一例云：

>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邱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使知索之，使離朱索之，使喫詬索之，正如欣賞純文藝而用考據的態度與方法。近人主張研究詩經只讀白文，蓋即是使象罔求之之意。象罔求之而能有得者，即由於不爲成見所蔽，有時轉得直契精微也。

上文是就純文學的鑑賞而言，至對於雜文學的探討論旨，也應取神遇的態度。天道篇云：

>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

秋水篇亦云：

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郭象註云：『夫言意者有也，而所言所意者無也，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入乎無言無意之域而後至焉。』所謂言意之表，所謂無言無意之域，均不是故作玄妙之談。因為他所講的道，本是要離言說相與文字相的。但是離開了言說相文字相之後，如何能將道的本體昭示於人呢？所以作者不得不寄之於言，而讀者卻不可徒求之於言。我們且看老子所說的道，說得恍恍惚惚，加上許多不定的形容辭以強為之容，亦無非使人不要認真，不要拘泥而已。

以上是就文學批評的觀點以解釋莊子之「神」的觀念，可知這種思想應用到後世文學批評者是何等透澈而微妙（註）。

【註】莊子田子方篇云：『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臝。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中國一般文藝家大抵都帶些浪漫的氣息，或者與此亦有些關係吧！

第三篇　兩漢

第一章　由史籍中窺見漢人對於文學之認識

第一節　「文學」與「文章」「文辭」之區別

時至兩漢，文化漸進，一般人亦覺得文學作品確有異於其他文件之處，於是所用術語，遂與前期不同。用單字則有「文」與「學」之分，用連語則有「文章」與「文學」之分。以含有「博學」之意義者稱之爲「學」或「文學」；以美而動人的文辭稱之爲「文」或「文章」。如此區分，纔使文學與學術相分離。此觀於史記漢書中所用可以按而知之者。今觀史記所言「文學」，各條大都指學術言。如：

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孝武本紀）

上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同上）

勃不好文學。（絳侯周勃世家）

鼂錯以文學爲太常掌故。（鼂錯傳——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

萬石君名奮，……無文學，恭謹無與比；……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萬石君傳）

郎中令王臧以文學獲罪。（同上）

兒寬等推文學。（同上）

夫不喜文學。（灌夫傳）

上方鄉文學，招俊乂以廣儒墨。（公孫弘傳）

天子方招文學儒者。（汲黯列傳）

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儒林列傳）

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同上）

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爲天子三公。（同上）

郡國縣道邑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敎，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者。（同上）

能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故缺。（同上）

治禮，次治掌故（徐廣曰一云次治禮學掌故）以文學禮義爲官。（同上）

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同上）

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自序）

在此數節中可以看出文學與儒術的關係，也可以看出文學與掌故的關係；甚至以律令，軍法，章程，禮儀等爲文學，

則知其所謂文學云者，自廣義言之，是一切學術的意思；即就狹義言之，亦指儒術而言，固不得以詞章當之了。

至於不指學術而帶有詞章的意義者，則稱爲「文章」或「文辭。」如：

擇郡國吏木詘於文辭重厚長者，即召除爲丞相史。（曹相國世家）

太史公曰：……燕齊之事無足采者；然封立三王，天子恭讓，羣臣守義，文辭爛然，甚可觀也。是以附之世家，（三王世家）

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伯夷傳）

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屈原傳）

臣謹案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分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淺聞，不能究宣。（儒林列傳）

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爲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時天子方好文詞，見申公對，默然。（同上）

此處所謂「文章」或「文辭，」即與上文所述「文學」之義不同，觀其同在儒林傳一篇之中而嚴爲區分如此，則知此種分別固非出諸無意者。班氏漢書大率多本史記，其於「文學」「文章」之分亦與史記相同。如張湯傳云：『湯以武帝鄉文學，欲附事決獄，請以博士弟子治尚書春秋，補廷尉史。』而於公孫弘傳贊則云：『文章則司馬

遷相如，』又云：『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則知彼固猶仍史遷舊例也。(註)

【註】魏志劉劭傳：『夏侯惠薦劭曰，『文學之士嘉其推步詳密；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此處分用更顯。即劉劭人物志流業篇，亦稱『能屬文著述，是謂文章，司馬遷班固是也；能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是謂儒學，毛公貫公是也。』

至其用單字者，則本於孔門所謂「文學」一語而析言之：文是「文」，學是「學」，以文章之義稱「文」，以博學之義稱「學」。清代劉大惠文筆考云：

漢書賈生傳云：『以能誦詩書屬文聞於郡中；』終軍傳云：『以博辨能屬文聞於郡中；』司馬相如敍傳云：『文艷用寡，子虛烏有；』揚雄敍傳云：『淵哉若人，實好斯文；初擬相如，獻賦黃門。』至若董子工於對策，而敍傳但稱其屬書；馬遷長於敍事，而傳贊但稱其史才，皆不得攬能文之譽焉。蓋漢尚辭賦，所稱能文，必工於賦頌者也。藝文志先六經，次諸子，次詩賦，次兵書，次術數，次方技：六經謂之六藝，兵書術數方技亦子也。班氏序諸子曰：『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旨，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支與流裔。』據此，則西京以經與子爲藝，詩賦爲文矣。

然非獨西京爲然也。後漢書創立文苑傳，所列凡二十二人，類皆載其詩賦於傳中。蓋文至東京而彌盛。有舉力爲文章而他無可表見者，故特立此傳。必載詩賦者，於以見一時之習尚，而文苑非虛名也。其傳贊曰：『情志既動，篇辭爲貴。抽心呈貌，非雕非蔚。殊狀共體，同聲異氣。言觀麗則，永監辭費。』章懷注：『揚雄曰，詩人之

賦麗以則。』是文苑所由稱文，以其工詩賦可知矣。然又不特文苑爲然也。班固傳稱能屬文，而但載其兩都賦；崔駰傳稱善屬文，而但載其達旨及慰志賦。班之贊曰，『二班懷文』；崔之贊曰，『崔氏文宗。』由是言之，東京亦以詩賦爲文矣。(註)

(註)紹虞案惟王充論衡所謂「文」或「文章」仍指廣義言之。此是例外，蓋別有說。

然非特漢京爲然也。三國魏時文章尤麗。魏志王衛二劉傳傳評云：『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士並出，惟粲等六人最見名目。』今按諸傳中，或稱有文采，或稱以文章顯，或稱文詞壯麗，或稱著文賦，頗傳於世；而粲傳獨云，『善屬文，』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逸氣，(註) 然非粲匹也。蜀志郤正傳稱能屬文，而載其釋譏；吳志韋曜傳稱能屬文，而載其博奕論；華覈傳，評其文賦之才有過於曜，而傳載其草文。則三國時所謂文，亦以詞賦爲宗矣。(學海堂集卷七)

(註)案「逸氣」典論論文作「齊氣」，劉氏誤引。

此文可爲我說作證，故備錄之。我們試再從反面就其論學者觀之，如：

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史記儒林傳)

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同上)

董仲舒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同上)

> 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漢書韋賢傳贊）
>
> 仲舒下吏，夏侯囚執，眭孟誅戮，李尋流放，此學者之大戒也。（漢書眭兩夏侯京翼李傳贊）
>
> 古之儒者，博學虖六藝之文。六學者，王教之典籍，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也。……及至秦始皇兼天下，燔詩書殺術士，六學從此缺矣。（漢書儒林傳）
>
> 哀平間以儒學顯。（後漢書蔡茂傳）
>
> 父充持慶氏禮，……作章句辯難，於是遂有慶氏學。（後漢書曹褒傳）
>
> 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瓌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後漢書鄭玄傳）

類此之例甚多，不能備舉。則知西漢之以「文」「學」二字區別用之，其迹甚著；至於更爲明顯的例，如：

> 雄少而好學，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顧嘗好辭賦。……又怪屈原文過相如，至不容作離騷，自投江而死。悲其文，讀之未嘗不流涕也。（漢書揚雄傳）
>
> 博學多通，偏習五經，皆詁訓大義，不爲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揚雄辨析疑義。（後漢書桓譚傳）

此二節以「學」與「文」分別並言，更可看出其分用之迹，所以吾謂兩漢所用的術語，用單字則稱「文」與「學」，用連語則稱文爲「文章」或「文辭」，而稱學爲「文學」。

大抵學術用語，恆隨時代而變其含義，只須細細體會，猶可得其梗概。阮元知六朝有「文」「筆」之分，誠是一大發見；惜猶不知漢初已有「文學」「文章」之分，已有「學」與「文」之分。若明漢時有「文學」「文章」之分，「學」與「文」之分，則知六朝「文」「筆」之分，即從漢時所謂「文」「文章」一語再加以區分耳。若先不經此分途，則「文」「筆」之分亦斷不會躐等而至者。梁元帝云：『古之學者有二，今之學者有四。』（金樓子立言篇）惟其有「文學」「文章」之分，有「學」與「文」之分，所以爲二；否則「文學」一語，可以賅括盡之，則在古之學者，亦未見有二也。不過在此期雖有「文學」「文章」之分，而稱「學」爲「文學」，則猶與現在所稱「文學」之義不同。此所以爲文學觀念演進期中第二期的見解。

第二節　藝文志中之詩賦略

在史籍中所可窺見漢人對於文學之認識，除「文學」與「文章」之區分以外，厥爲漢書藝文志之有詩賦一略。藝文志本於劉歆所定的七略，以「詩賦略」與「六藝略」「諸子略」等分列，使文學類的創作和關於學術的書籍劃清鴻溝，這確是一個可以值得注意之點。他這種分法雖似乎不免仍重在形式上韻散的分別，但也因爲當時的文學作品只須就韻散別類，故覺得孔門分別詩文的觀念，猶足以適用的緣故。劉師培論文雜記云：

班志之敍藝文也，僅序詩賦爲五種，而未及雜文；誠以古人不立文名，偶有撰著，皆出入六經諸子之中，非六經諸子而外，別有古文一體也。如論說之體，近人列爲文體之一者也；然其體實出於儒家，書說之體，亦近人

列爲文體之一者也；然其體實出於縱橫家。推之奏議之體，漢志附列於六經；勅令之體，漢志附列於儒家。又如傳記箴銘，亦文章之一體，然據班志觀之，則傳體近於春秋，記體近於古禮，箴體附於儒家，銘體附於道家，是今人之所謂文者，皆探源於六經諸子者也。故古人不立文名，亦不立集名。若詩賦諸體，則爲古人有韻之文，源於古代之文言，故別於六藝九流之外。亦足證古人有韻之文，另爲一體，不與他體相雜矣。

此言頗得劉班著錄微恉。蓋當時既有「文學」「文章」之分，則別立詩賦一略，以著錄關於文章之著作，本亦至當。劉氏又謂：

漢書藝文志敍詩賦爲五種而賦則析爲四類。屈原以下二十家爲一類，陸賈以下二十一家爲一類，荀卿以下二十五家爲一類，客主賦以下十二家爲一類。而班志於區分之意，不注一詞。近代校讐家，亦鮮有討論及此者。自吾觀之，客主賦以下十二家，皆漢代之總集類也；餘則皆爲分集，而分集之賦，復分三類：有寫懷之賦，有騁詞之賦，有闡理之賦。寫懷之賦，屈原以下二十家是也；騁詞之賦，陸賈以下二十一家是也；闡理之賦，荀卿以下二十五家是也。寫懷之賦，其源出於詩經；騁詞之賦，其源出於縱橫家；闡理之賦，其源出於儒道兩家。觀班志之分析詩賦，可知詩歌之體與賦不同，而離騷則同於賦體。至文選析賦騷爲二，則與班志之義迥殊矣；故特正之。

此節說明漢志詩賦略分目之故，所言亦是。蓋漢志詩賦一略，在文學批評史上至少有下列的幾種影響：（一）文

學與學術的區分，（2）文學本身的分類，（3）文集的編定。後世目錄家有集部一類，蓋即本此。

第二章　經學家之論詩見解

兩漢的經學家，本是儒林傳中的人物，是當時所謂文學之士而不是文章之士，當然對於文學批評沒有關係；惟以詩三百篇亦列於六經之故，於是一般經生猶有一些關於詩學方面的議論。但經生之詩論，實在不免太拘泥或太穿鑿。即如匡衡這樣，當時人稱爲『無說詩，匡鼎來；匡語詩，解人頤』者，應當別有妙解了，而我們看他所上各疏中所引的詩句，亦完全同孟子一樣，把詩句牽引到王道上去，未見有什麼解頤的妙解。

大抵漢人說詩，都是沿襲以前的舊法，或是傳述以前的舊聞，並沒有什麼創見。即如詩大序一篇在文學批評史上較爲重要者，亦不過彙萃舊說略加整理而已。漢人稱大序爲子夏所作，宋儒甚有謂大序非孔子不能作者，皆由過於重視大序之故。實則大序中幾項重要之點，大率不外襲用周秦舊說。如：

一、明詩樂之關係——『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案此與樂記相同。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於物而動，故形於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鄭注云：『方猶文章也。』樂記又云：『情動於中，故形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荀子勸學篇云：『詩者中聲之所止也，』亦近此意。

二、明詩之起源——『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

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案此言『在心爲志，發言爲詩，』與虞書『詩言志』之意相同；言『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亦即虞書『歌永言』之意；不過說得更明暢，而於古代詩歌舞三者混合之迹，亦能明其關係而已。又樂記云：『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亦與大序此語相同。孔疏云：『按詩先云嗟嘆後云詠歌之，此先云長言之後云嗟嘆之，文先後不同者，何也？詩序是屬文之體，又略言之；此經委曲說歌之狀，其言備具。』是又樂記與大序可以相互印證之處。又漢初人論詩亦多申言志之說。如陸賈新語愼微篇云：『故隱之則爲道，布之則爲詩。（詩下原有「文」字，今從俞樾校删）在心爲志，出口爲辭。』又賈子新書道德說云：『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以自成也。故曰詩志此之志者也。』

三、明詩與時代之關係——『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案此與樂記文同。又云：『至於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此等歷史的批評，亦本於孔門論世之意，而推闡之。

四、明詩之功用——『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案此節亦與孔子所謂『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論語陽貨）諸語相同，完全以詩作爲人事上實際的應用。

五、明詩之體類——『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又云：『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案六義之說，舊時皆以三經三緯解之，惟章太炎六詩說始有異解，謂六義均爲辨別韵文之體；竊謂序文之論四始，只舉風雅頌三者，則舊時三經三緯之說，亦未可非。由三經言，說明詩之分類，是歸納的批評；由三緯言，建立文學上的原則，是推理的批評。大序中亦惟此意爲較値得注意，然而荀子儒效篇已有風雅頌之稱，則知亦出昔人舊說而已。

此外漢人說詩，都不外本於孟子的方法而更多流弊。毛傳於小弁一詩引孟子評『固哉高叟之爲詩』一節亦可爲他說詩方法本於孟子之證。他如韓詩外傳之多方附會，與說苑新序之引用詩句以作論證，也都是沿襲孟子之舊法者。

沿襲孟子以意逆志的方法，於是有詩序。詩序說明詩的本事，亦未嘗不是解釋的批評；不過詩意本較委曲，而解詩者又委曲求之，則這樣的以意逆志使不免發生絕大的危險。所以齊魯韓毛四家之說彼此互異，而此等批評便近於武斷，近於附會了。(註)

【註】小序定爲漢人所作。清程廷祚詩論云：『孔子設教洙泗之間，訓弟子以學詩之登降，及戰國孟子最深於詩，而其時詩亦無序，是故咸丘蒙執北山詩辭而以爲天子可以臣父，是北山無序也。高子以小弁爲小人之詩，是小弁無序也。』此論最爲扼要。

沿襲孟子論世知人的方法，於是有詩譜。詩譜說明詩的時地關係，本也是歷史的批評。鄭玄詩譜序云：『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以縱表示時代，以橫表示方域，這本是歷史的批評之重要方法，但因第一步詩的本事便有可疑之處，則此種方法亦不過為詩序之功臣而已。大抵漢人解詩之失只在泥於王道，所以對於孟子的兩個方法，皆不善於應用。

至如翼奉之治齊詩，以陰陽五行律曆之類解詩，如所謂『詩之為學，情性而已。五性不相害，六情更興廢，觀性以曆，觀情以律』云云，以及詩有五際之說，則更為穿鑿附會。由文學批評的觀點言之，可謂絕無價值了。

第三章　揚雄

第一節　揚雄之論賦

第一目　揚雄以前之賦論與其早年見解

兩漢文學以辭賦為主潮，所以也頗多論賦之語；尤其以揚雄所言，最足代表漢代賦論的兩方面。大抵漢人論賦不外兩點：一是站在文學的立場言者，一是站在儒學的方面言者；而揚雄一生之賦論卻兼有這兩方面。蓋揚雄之論賦，隨其一生興趣之轉移而有早年晚年的分別。法言吾子篇云：『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可知他早年是好作辭賦，至晚年則興趣一轉，始由文而傾向於學，遂以為壯夫不為了。因他這

種與趣之轉移，所以他對於文學批評的見解也有早年晚年的分別。

其在早年對於辭賦猶有興趣的時候，論賦亦偏於文學的立場。桓譚新論道賦篇引揚雄語云：『能讀千賦，則善賦。』西京雜記亦引此語。又西京雜記中另有一節云：

司馬長卿賦，時人皆稱典而麗，雖詩人之作不能加也。揚子雲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子雲學相如而弗逮，故雅服焉。（註）

〔註〕楊愼赤牘清裁引作揚雄答桓譚書。其辭云：『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耶？大諦能讀千賦則能爲之。諺云伏習象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張溥百三名家集本從之。

這些話與法言所載論賦之語絕不相同，當是他早年的見解。西京雜記一書，其本身雖不甚可靠，有的謂爲葛洪所撰，有的謂梁吳均所撰，不能信爲劉歆之著（註一）但如上述這些言語亦見於桓譚新論，則謂爲揚雄所言，或亦未必無據。這些話的重要即在應用「神」的觀念到文學批評上，即在很能說明作賦的工夫之甘苦。這實是値得注意的事。蓋其所謂『讀千首賦乃能作賦』云者，即是火候到時莫知其然而然的境界，是指學力言者。（註二）其所謂『神化所至』云云，即是莊子所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的意思，是偏重在天分言者。學力猶可勉強，天分則不可勉強了。所以對於司馬相如天分之高，當然要十分傾倒，而覺得似乎不是從人間來了。至於法言君子篇之論相如，稱爲『文麗用寡，』則又另用道德的觀念來批評。此是揚雄晚年的見解，固宜其有不滿的論調矣。

〔註一〕盧文弨新雕西京雜記緣起謂爲出於漢人所記無疑。其言云：『今此書之果出於劉歆，別無可考，即當以葛洪之言爲據。洪非不能自著書者，何必假名於歆！……若吳均者亦通人，其著書甚多，皆見於梁書本傳，知其亦必不屑托名於劉歆。』此亦足備一說。

〔註二〕宋高似孫緯略據漢志所錄賦數適千篇，因謂子雲所讀即此，似屬過泥；然揚雄之所以能賦則確是從學力中來。

因此問題，再想到西京雜記所載司馬相如答盛覽問賦之語，謂：

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此數語雖不能遽信爲相如所言，然其以文之形式爲迹，而以文之精微歸之於賦家之心，或是揚雄以前所已經拈出的問題。所以揚雄繼之再提出一個「神」字。揚雄稱相如賦非自人間來，即謂這個不可得而傳的賦家之心，出於天才，非盡人所可企及耳。舊時文學批評上的用字，總以愈抽象的愈能闡發文藝上的神祕性，所以「心」字猶落迹象，「神」字便較爲微玄。蓋心是賦家之所稟，神是賦家之所詣，一指才性，所以所謂『包括宇宙，總覽人物』者，是絕對不可得而傳；一則兼指工夫，所以似乎猶有可以用力的地方。揚雄言『能讀千賦則善賦』，這即是藝術上的神祕，所謂『巧者不過習者之門』。司馬相如所言的是不可得而傳的心，揚雄則進一步推究到不可得而傳的法。法言問神篇云：『或問神？曰：心。』又云：『昔者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李軌註云：『神道不遠，潛心則是。』心與神的關係，以此數語闡說得最清楚。潛心則自能漸漸達

到神化的境界了。換句說來，即是漸漸可使這個不可得而傳的賦家之心，也能以下力之久而得之於內了。所以還是一個莫知其所以然並且是不可得而傳的方法。

蓋在揚雄以前，武帝宣帝並皆提倡辭賦。觀漢書王褒傳謂：

上令褒與張子僑等並待詔數從褒等放獵所幸宮館輒為歌頌，第其高下，以差賜帛。議者多以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奕者乎！為之猶賢乎已。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辟如女工有綺縠，音樂有鄭衛，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說耳目；辭賦比之，尚有仁義風諭，鳥獸草木多聞之觀，賢於倡優博奕遠矣。

則知揚雄早年未能免俗，沈浸在辭賦中間，正亦不足怪了。

第二目　晚年見解與以後之賦論

後來揚雄的思想轉變了，所以謂司馬相如的賦為『文麗用寡』（法言吾子篇）為『勸而不止』（漢書揚雄傳）法言吾子篇中所載論賦之語，全是站在儒學的立場而對於辭賦有不滿的論調。如：

或曰『賦者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

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之蠹矣。』——李軌註『霧縠雖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

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靑，如其智！如其智！』——李軌註：『大智者達天命，審行廢，如玉如瑩，磨而不磷；今屈原放逐，感激爰變，雖有文彩，丹靑之倫耳。』

或問君子尙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尙。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李軌註：『貴事實，賤虛辭。事辭相稱乃合經典。足言，夸毗之辭；足容，戚施之面；言皆藻飾之僞，非篤實之眞。』

這幾節都是言辭賦的文過其質，都是自悔童子雕蟲篆刻以後的論調。漢書揚雄傳說：

『雄以爲賦者，將以風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閎侈鉅衍，競於使人不能加也。旣迺歸之於正，然覽者已過矣。往時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賦欲以風，帝反縹縹有陵雲之志。繇是言之，賦勸而不止，明矣。又頗似俳優淳于髡優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賢人君子詩賦之正也。於是輟不復爲。』

這一節正可看出他思想轉變的經過，與法言所云可相印證。追他『輟不復爲』以後，固莫怪以儒家的眼光來論賦，而議其非法度所存了。這種論調儼然是後世古文家攻擊駢文的口吻，所以我以爲揚雄的文學觀，是復古運動中之第一聲。

自是以後，漢人之論辭賦，大率不離於儒家的見地。即如班固漢書司馬相如傳贊所言：

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已戲乎？（註）

〔註〕史記司馬相如傳亦有是贊語與之同，惟文中稱引揚雄之語，則爲班作無疑。宋葉大慶考古質疑已辨之。

此似乎爲司馬相如辯護了，但其所由辯護之點，仍是重在足以諷諫，則依舊不外于儒家的見解。固宜其於藝文志詩賦略所言，如稱詩論志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云云，仍不能脫儒家實用的觀念了。甚且也引揚雄的話也以風諭爲準則，謂：

春秋之後，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於列國，學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後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雲，競爲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是以揚子悔之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則且與相如傳贊所云，自陷於矛盾而不自知了。後來蔡邕上封事云『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輕視辭賦，至於極點，正也從這種思想得來。

我們且再看當時班固王逸之論屈原。班固稱『其文弘博麗雅，爲辭賦宗。後世莫不斟酌其英華，則象其形容』（離騷序）王逸亦謂：『屈原之辭，誠博遠矣。自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造辭賦，莫不擬則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楚辭章句序）是則他們對於屈原的天才與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可謂同聲贊歎，互相一致的了。可是他們對於屈原之爲人，與其所以爲辭，則正有不同的見解。班固之論屈原，謂其：

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羣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多稱崑崙冥婚虙妃虛無之語，皆非法度之政，經義所載；謂之兼詩風雅，而與日月爭光過矣。（離騷序）

這是對於淮南王安離騷傳所云而加以譏彈者。其所由對於屈原爲人與其文之不滿意之處，皆本于儒家的見地，而衡以道德之制裁。至王逸楚辭章句敍則爲之辯護云：

昔伯夷叔齊讓國守分，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怨望哉？且詩人怨主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面命之，言提其耳』。諷諫之語，於斯爲切。然仲尼論之，以爲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爲露才揚己，怨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托五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厥初生民時爲姜嫄』也。『紉秋蘭以爲佩』，則『將翱將翔，佩玉瓊琚』也。『夕攬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鷖』，則『時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謨也。『登崑崙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註）

【註】其離騷經序亦謂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喻，可與此說參證。

我們試看他所持辯護的理由，原來也是本於儒家的見地。以當時賦家的文學觀，猶且處處不脫儒家的見解，亦可知儒家思想，是如何的深入人心，是如何有權威的足以支配一般人的文學批評了。論其關鍵所在，則揚雄之復古

思想，要亦不能沒有關係的。

第二節　揚雄之論文

揚雄晚年何以會有這種文學觀呢？蓋他一方面受儒家思想之影響，一方面又受道家思想之影響。因其以儒家思想爲根柢，故所得於道家者，僅僅是淺薄的浮面；而同時因其稟受道家之影響，故結果也失了儒家的尙文之旨。漢代儒家的文學觀，較之先秦儒家，實是一方面爲狹隘而一方面又爲雜糅。這二種關係，形成了揚雄的文學觀，也支配了後世的文學觀。

何以見其受儒家的影響呢？因爲他所懸的標準，是以儒家爲歸的。這種歸的，說得抽象些，是先王之法，說得具體些，即爲孔子。吾子篇云：

>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

又云：

> 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

要不淈法度，要合乎先王之法，這都是荀子立隆正的態度。再進一步，於是便以仲尼爲標準。吾子篇又云：

> 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要諸仲尼，說鈴也。

此則便是劉勰所謂「徵聖」的意思了。

至於怎樣以仲尼爲標準呢？則以仲尼之文在六經，所以他復主張宗經。法言中論及經的地方頗多。問神篇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譙乎？』寡見篇云：『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爲辯。說經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說志者莫辯乎詩，說理者莫辯乎春秋，捨斯，辯亦小矣。』他既言及經書之長，所以他以爲立言必宗於經。問神篇又云：

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

但是經終究是個形式，終究是空的，經的精神何在？仲尼之所以可爲標的者又何在？那就不得不進一步再說到原道。吾子篇云：

舍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舍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

離開經不能得道，離開孔子亦不能識道，對於聖人所言的道，一方面要能有所發明，一方面更要切實體會。問神篇云：

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

（李軌註「言必有中」）

書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灝灝乎其莫之

繫也。（李軌註：「有所發明，如日月所照，有所蕩除，如江河所滌。」）

孔子說：『書不盡言，言不盡意。』而他卻說：『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蓋孔子是指研究昔人的文辭而言，揚雄是指發揮自己的文辭而言。玩索昔人之文辭貴能求之於文字之表，所以慨其不盡；發揮自己的文辭，必須有所見到，所以貴其能達。既能有所見到，於是玩索之久，切實體會，自然發而為言，——為君子之言；反是者為小人之言。問神篇云：

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

惟其這樣切實體會而發之為言者，所以也能躬行實踐而見之於外。君子篇云：

『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李軌註：『弸，滿也；彪，文也。積行內滿，文辭外發。』

此等見解更且與宋代的道學家同一口吻。漢書稱他『非聖哲之書不好，』吾以為他太好聖哲之書，所以變作這樣復古的思想。因此，可知劉勰文心雕龍所載原道宗經徵聖諸篇，其意亦自揚雄發之。

何以見其又受道家的影響呢？此可於漢書王貢兩龔鮑傳見之。漢書謂：『蜀有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而授老子。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今猶有嚴遵道德指歸論六卷。』可知其學蓋出嚴君平，而君平又是兼易老以為學者。所以法言中對於諸子都有不滿意的言論，

但除偏重儒家的言論之外，對於老子却獨多想辭，而且頗多襲用他的語或意的地方。觀其所著太玄，形式則取諸周易，名稱則出於老子，大概這也是所謂君平之教吧！

不過揚雄所染的儒家臭味太深，復古思想太濃，所以他所受到道家的影響，適足使他的文學觀更為復古化而已。此可於其尚質的觀念見之。法言寡見篇云：「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這似乎猶是儒家尚文的意思。但是君子篇云：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與！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李軌註：「丹青初則炳然，久則渝變。聖人之書，久而益明。」

則其所以久而不渝者，又在質而不在文了。問道篇云：

或問天？曰：「吾於天見無為之為矣。」或問彫刻衆形者匪天與？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

這又是老子的自然主義了。淮南子說林訓云：「至味不慊，至言不文，至樂不笑，至音不叫。」又泰族訓云：「太羹之和，可食而不可嗜也；朱弦漏越，一唱而三歎，可聽而不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者也。」大抵儒道合糅的思想，其論文宗旨往往如此的。

揚雄既尚質素而斥淫辭，則其論文宗旨似應主於平易自然了；可是，他的著作必有待於後世之子雲，則又何

也？蓋他一方面泥於復古宗經的主張，於是好用古文奇字，於是模擬經典形式。他一方面又泥於老子『貴知我者希』一語。(註)於是也不免故作艱深而欲求知己於後世了。法言問神篇云：

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與？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郛。』

又云：

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

這是他所以要尙艱深之故。這種思想，完全由於泥古的關係。後來的復古運動，其意義大都不能外是：若不是重道輕文，尙質而斥淫辭；則便是拘泥形式，模古以作艱深。我們試看韓愈周敦頤朱熹等的主張，不是前一種的意思嗎？我們試看樊宗師李夢陽等的文辭，不又是後一種的面目嗎？於文學的性質不曾辨析得清楚，則無論重質重文都無是處。

〔註〕揚雄解難篇即引此語自解。

第四章　王充之文學觀

王充一生的學問本領，不出二途：其一，是受班彪的影響；其又一，是受桓譚的影響。由於受桓譚的影響，所以論

文主於眞。王充自評其論衡謂『可以一言蔽之曰疾虛妄。』（自紀篇）疾虛妄者，即是桓譚『辨照然否』的態度。(註) 本於這種態度以論文，當然偏主於質而無補於純文學之發展。其定賢篇云：

以敏於賦頌爲弘麗之文爲賢乎？則夫司馬長卿揚子雲是也。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辨然否之實。

【註】論衡超奇篇云：『君山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

至對作篇則說得更明暢：

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並失實，虛妄之言勝眞美也。故虛妄之語不黜，則華文不見息，華文放流，則實事不見用。故論衡者所以銓輕重之言，立眞僞之平，非苟調文飾辭爲奇偉之觀也。……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虛實之分。虛實之分定，而華僞之文滅；華僞之文滅，則純誠之化日以孳矣。

因於疾虛妄的緣故，甚至欲息滅華僞之文，則其論文宗旨之趨於極端，可想而知了。

由於受班彪的影響，所以論文又主於善。其佚文篇云『文豈徒調墨弄筆爲美麗之觀哉！載人之行，傳人之名也。』載人之行，傳人之名，這便是史家的態度了。班固漢書敍傳云：『故雖堯舜之盛，必有典謨之篇，然後揚名於後世，冠德於百王。』史家之對於文的觀念本是如此。所以佚文篇又繼言之云：

善人願載，思勉爲善；邪人惡載，力自禁裁。然則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

又云：

謚法所以章善，卽以著惡也。加一字之謚，人猶勸懲惡（案此句當有脫誤。非「勸」字下脫「善」字，卽衍「惡」字。）知之者莫不自免。況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言行畢載，文以千數，流傳於世，成爲丹靑，故可尊也。

此節亦可見其論文宗旨。蓋他一方面欲立眞僞之平，一方面又欲定善惡之實，所以吾謂王充思想出於桓譚班彪者此也。

大抵王充思想所以有價值之處，卽在反抗時代的潮流。西漢學術主於解經，而他却不囿於經生的見解，不闢爲煙瘴氣的陰陽五行之說。西漢文學又重在辭賦，而他又能不染賦家的習氣，不玩雕蟲篆刻的把戲。這種風氣的轉移，固不出於王充。自劉歆開東漢古文的先路，而經學之風氣一變；自揚雄自悔其少作，而文學之風氣又一變。則王充之思想見解，在東漢初似乎覺得異軍特起者，實則亦非無因而至的。他能看出西漢經學文學之弱點，和劉歆揚雄一樣，而他又能深受桓譚班彪的影響而融和二家之思想。故其成就，乃獨異於劉揚二氏。他不致如劉歆之僞造古籍，竄亂古籍；他也不致如揚雄之以艱深文淺陋，疲精勞神於被人覆瓿的事業。明白這些，乃可以論王充的文學觀。

他論文既主於「眞」與「善，」故其所論係指學術文言，於是對於「文學」諸名之含義，獨與當時不同。在

當時已有「文」與「學」之分，「文章」與「文學」之分，而在論衡中「文」及「文章」諸稱，大都須作最廣義解。佚文篇云：

五經六藝爲文，諸子傳書爲文，造論著說爲文，上書奏記爲文，文德之操爲文。

以此五種爲文，便不免混於學術了。又謂：

天憎秦，滅其文章。

此處所謂「文章」，亦不能以狹義的詞章之義解之。蓋學術用語之含義，有的隨時代而變異，有的因各家而相殊。論衡中所謂「文」及「文章」之義，固亦不妨與當時不同。（註）必明乎此，然後知王充論文，根本就不討論到純文學的方面。

【註】劉天惠文學考備舉漢人之言「文」者，獨未舉此例，似亦疏漏。

他並不是不重在文，不過他所謂「文」猶是孔門廣義的文，而不是漢人所謂詞章之文。書解篇云：

龍鱗有文，於蛇爲神；鳳羽五色，於鳥爲君；虎猛毛蚡蜦，龜知背負文；四者體不質，於物爲聖賢。且夫山無林則爲土山，地無毛則爲瀉土，人無文則爲樸人。土山無麋鹿，瀉土無五穀，人無文德不爲聖賢。……棘子成欲彌文，子貢譏之。謂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註）

【註】佚文篇云：「蹂蹈文錦於泥塗之中，聞見之者莫不痛心。知文錦之可惜，不知文人之當尊，不通類也。」其意亦同。

此節顯有重文輕質之意，倘使不明論衡所謂「文」的含義，不將疑此數節所云與其論文見解互相矛盾嗎？超奇篇云：『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周)之徒與？』(註)這種同於後世文統道統的見解，亦即由於以孔子之所謂「文」為其論文的標準而已。

〔註〕佚文篇亦云：『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文，傳在孔子，孔子為漢制文，傳在漢也。』

於是，王充論「文」的標準亦可得而言。自紀篇云：

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用者一章無補。如皆為用，則多者為上，少者為下。

此即荀子非相篇所謂『言而仁之中也，則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之意。蓋他所謂「文」既指廣義的文，則當然足以立真偽之平，或者定善惡之實。無論是立真偽之平，或是定善惡之實，要之能做到這一步，便是『為世用者。』『為世用者百篇無害』，所以謂文不足奇者，便成為「子成之徒」了。

哲人之文足以立真偽之平，史家之文又足以定善惡之實，所以他所謂文的標準即不外此二端：一種是重在抒發思想，一種是重在記載事實。佚文篇云：

立五文在世，(註)皆當賢也。造論著說之文，尤宜勞焉。何則？發胸中之思，論世俗之事，非徒諷古經讀古文也。論發胸臆，文成手中，非說經藝之人所能為也。

〔註〕五文已見前引。

此就文論，則以能造論著說者爲高。超奇篇云：

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

儒生過俗人，通人勝儒生，文人踰通人，鴻儒踰文人。

此就人言，則又以鴻儒爲超。何以故？「通覽者世間比有，著文者歷世希然。」（見超奇篇）鴻儒能得精思著文，連結篇章，所以也比一切的人爲超奇了。超奇篇又謂「說論之徒君山爲甲」，其所取於桓譚者以此，其所得於桓譚者也在此。

須頌篇云：

古之帝王建鴻德者，須鴻筆之人褒頌紀載，鴻德乃彰，萬世乃聞。問說書者欽明文思以下誰所言也？曰篇家也。篇家誰也？孔子也。然則孔子，鴻筆之人也。

書解篇又云：

著作者爲文儒，說經者爲世儒，……世儒當時雖尊，不遭文儒之書，其迹不傳。……世傳詩家魯申公，書家千乘歐陽公孫，不遭太史公，世人不聞。夫以業自顯，孰與須人乃顯！夫能紀百人，孰與廑能顯其名！

此又以能褒頌紀載以業自顯者爲高。蓋他視史家的紀載也同造論著說一樣。超奇篇云：「孔子得史記以作春秋，及其立義創意，褒貶賞誅，不復因史記者，眇思自出胸中也。」此正是孔子所謂「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

切著明』之意。或載空言以造論著說，或紀實事以勸善懲惡，其爲世用同；其爲妙思自出於胸中亦同。所以太史公亦謂『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了。其佚文篇稱班叔皮不爲恩撓，載鄉里人以爲惡戒。其所取於班彪者以此，其所得於班彪者亦在此。

他所重者是這種『論發胸臆』的文，是這種『褒頌紀載』的文，故其論文，重在內容而不重在形式，重在眞與善而不重在美。他蓋以爲論發胸臆的文，只須能立眞僞之示，足矣；他蓋以爲褒頌紀載的文，只須能定善惡之實，斯亦可矣。他亦並不是全不重在形式，全不重在美，蓋他以爲至多只須能得如何連結篇章，如何立義創意，以達其胸中之妙思，則行文之能事已盡，初不必更求華飾也。超奇篇云：『華與實俱成者也。無華生實物希有之。』這似乎猶是文實並茂的見解。但是他又云：

> 繁文之人，人之傑也。有根株於下，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有皮殼於外。文墨辭說，士之榮華皮殼也。實誠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外內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人之有文也，猶禽之有毛也。毛有五色，皆生於體。苟有文無實，是則五色之禽毛妄生也。

則所謂「文」也者，是實充於內的當然結果，並非徒事藻飾以使五色之禽毛妄生矣。故自紀篇云：

> 夫養實者不育華，調行者不飾辭。——豐草多華英，茂林多枯枝。爲文欲顯白其爲，安能令文而無譴毀！

他以爲行文不妨有譴毀，則不求純美之意固已顯然可見了。然則超奇篇所云華實俱成者又何說也？曰：王充以學

為文，故以實賅華。才高知深，則學充於中而文辭自美。（註）所謂有根株於下，則自然有榮葉於上；有實核於內，則自然有皮殼於外。此便是『意奮而筆縱。』蓋意奮則筆自縱也。由其文之將成時言，則是所謂『意奮而筆縱』；由其文之既成後言，則又所謂『文見而實露。』文只求所以露其實而已！此所以謂『為文欲顯白其為，』固不必『調辯弄筆為美麗之觀』也。因此，他即以「真」「善」為美。他蓋以為「真」的方面，能做到切理饜心的地步，自然也就美了；善的方面能做到入情入理的地步，自然也就美了。只要能得把某種心情圓滿表現出來，自然會使讀者愜心滿意，此即所謂以實賅華也。觀其佚文篇云：

玩揚子雲之篇，樂於居千石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韓非之書傳在秦庭，始皇歎曰，獨不得與此人同時。陸賈新語每奏一篇，高祖左右稱曰萬歲。夫嘆思其人與喜稱萬歲，豈可空為哉？誠見其美，懽氣發於內也。

這一些例都不是舉的純文學的文辭。純文學的文辭，其動人在於情，在於辭，而此則超於情與辭之外。金周德卿語王若虛云：『文章工於外而拙於內者，可以驚四筵而不可以適獨坐，可以取口稱而不可以得首肯。』（見滹南遺老集及金史文藝傳）韓非陸賈之書，其所由動人之點，即在於可以適獨坐而得首肯者。此所以真與善亦未嘗不是美也。

【註】佚文篇云：『孝武之時，詔百官對策，董仲舒文最善；王莽時使郎吏上奏，劉子駿章尤美。美善不空，才高知深之驗也。』易曰：「聖人之情

見乎辭。」文辭美惡足以觀才。」

明王充之文學觀，纔能衡量估定王充文論的價值，纔能指出其文論之優點與缺點。蓋他受桓譚的影響，於是以辨照然否爲宗旨，對於一切文辭均取疾虛妄的態度，而所論或不免於過偏。他又受班彪的影響，於是很能利用歷史的觀念以論文，而所言遂轉多精義。

其受桓譚影響而對於文學作品也取疾虛妄的態度者，莫偏於攻擊文人之好奇。藝增篇云：

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真，稱美過其善，進惡沒其罪。何則？俗人好奇，不奇，言不用也。故譽人不增其美，則聞者不快其意；毀人不益其惡，則聽者不愜於心。聞一增以爲十，見百益以爲千，使夫純樸之事，十剖百判；審然之語，千反萬畔。墨子哭於練絲，楊子哭於歧道，蓋傷失本，悲離其實也。

他復舉其例云：

詩曰：『維周黎民，靡有子遺。』是謂周宣王之時，遭大旱之災也。詩人傷旱之甚，民被其害，言無有子遺一人不愁痛者。夫旱甚則有之矣，言無子遺一人，增之也。（藝增篇）

儒書言楚養由基善射，射一楊葉，能百發百中之，是稱其巧於射也。夫言其時射一楊葉，中之可也，言其百發而百中，增之也。夫一楊葉，射而中之，中之一再，行敗穿不可復射矣。如就葉懸於樹而射之，雖不欲射葉，楊葉繁茂，自中之矣。（儒增篇）

類此之例全書甚多。他不知虛妄有二種，一種是思想上的虛妄，一種是文辭上的虛妄。文辭上的虛妄，實在不過是一種夸飾。所以思想上的虛妄，不妨取辨照然否的態度，而文辭上的夸飾，正不能以文害辭，以辭害志。他不明這種分別，由於重實而不主純美之故，竟把修辭學上的揚厲一格，也以為不合於理，謂為言過其實，斯則不免過甚了。

王受史家影響而用歷史的觀念以論文者，則頗與近人所謂文學革命的主張相合。蓋他這種主張本是反對當時雕蟲篆刻的賦家者，本是專論文學者，所以能較多精義了。

當時王充與揚雄均有反對辭賦的論調，但其所由反對之立腳點不同，故其主張各異，而其成就亦相殊。這一點的不同，即因王充是用歷史的觀念而揚雄則否。

王充以為文不僅是調墨弄筆為美麗之觀（見佚文篇）不徒是雕文飾辭苟為華葉之言（見超奇篇）這似乎與揚雄所謂「雕蟲篆刻壯夫不為」之意相合。但是揚雄於壯夫不為之後，卻做人家難知之太玄，王充則作「形露易觀」的論衡，此便大不相同了。揚雄再作解難一文說明太玄所以艱深的緣故。他以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他以為「聲之眇者不可同於眾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齊於庸人之聽。」所以他要用古文奇字，所以他要「以艱深文淺陋。」（蘇軾識揚雄語）這樣，雖破除了辭賦的淫靡，卻轉成為艱深的文詞。這正如後世樊宗師一流的古文家，雖無駢文之雕琢，反不免於晦澀的弊病。王充則不然。他以為「深覆典雅，指意難覩，唯賦頌耳，」（自紀篇）現在既不欲為辭賦之難曉，則當然

主張『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自紀篇）而不欲故作艱深了。揚雄不明斯義，於是所識的古文奇字，適足以爲其行文艱深的工具。此在歷史派的王充看來，正是反時代的笨伯。他說：

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古今言殊，四方談異也。當言事時，非務難知，使指隱閉也。後人不曉，世相離遠，此名曰語異，不名曰材鴻。（自紀篇）

一時代有一時代的語言文字，即一時代有一時代表現思想情緒的工具。不明乎此，而強用古人的文字，強學古人的文法，又如何而不爲文學上的骸骨。於是積極方面，更復主張以口語爲文詞，遂與近人所倡文學革命之說頗相接近了。自紀篇云：

夫文由語也或淺露分別，或深迂優雅，孰爲辯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滅遺，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爲猶當隱閉指意！

又云：

秦始皇讀韓非之書，歎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其文可曉，故其事可思。如深鴻優雅，須師乃學，投之於地，何歎之有！夫筆著者欲其易曉而難爲，不貴難知而易造；口論務解紛而可聽，不務深迂而難睹。

他本於這種主張，所以雖和揚雄一樣反對辭賦之藻飾，而揚雄成爲復古，王充都變爲革新。

又揚雄所作辭賦，大抵摹擬司馬相如。其後雖輟不復爲，而這種摹擬的習慣，却依然未改；於是做易而草太玄，

象論語而作法言，亦步亦趨，以成贋鼎，所以模得必思深詞苦，然後相肖了。王充則以為：

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文必有與合，然後稱善，是則代匠斲不傷手，然後稱工巧也。文士之務，各有所從，或調辭以巧文，或辯偽以實事；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美色不同面，皆佳於目；悲音不共聲，皆快於耳。酒醴異氣，飲之皆醉；百穀殊味，食之皆飽。謂文當前合，是謂舜眉當復八采，禹目當復重瞳。（自紀篇）

蓋他知道各人自有其個性，不用摹古，更不用相襲。其對作篇又云：

是故周道不弊，則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楊墨之學不亂仁義，則孟子之傳不造。韓國不小弱，法度不壞廢，則韓非之書不為。高祖不辨得天下，馬上之計未轉，則陸賈之語不奏。衆事不失實，凡論不壞亂，則桓譚之論不起。故夫聖賢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

蓋他又知道各人自有其環境，賢聖興文，亦各有其背景，所以更不能摹擬。這種主張，全本於歷史的觀念，所以王充文論，尤以受史家影響為獨多，而其受史家影響者為更有精彩也。

第四篇　魏晉南北朝

第一章　魏晉之文學批評

第一節　曹丕與曹植

迨至魏晉，始有專門論文之作，而且所論也有專重在純文學者，蓋已進至自覺的時期。魏晉論文之著，具見於文心雕龍序志一篇。其稱三國時論文者只有魏文述典，陳思序書，應瑒文論，並再加以批語云：『魏典密而不周，陳書辯而無當，應論華而疏略。』此外惟謂：『公幹亦汎議文意，往往間出。』其所謂魏文述典，即魏文帝的典論論文。陳思序書，即曹植與楊德祖書等文。而應瑒文論，現在只有一篇文質論，見嚴可均所輯全後漢文中；但是案其所云，只言文質之宜，似與文論無關。（註）至劉楨之說，惟論氣者猶見他書稱引，餘無可考。所以講到魏的文學批評，亦惟有曹丕曹植二人可述。

【註】應瑒文質論云：『不發易簡，道無致一；二政代序，有文有質。』當時諸家之撰文質論者，大率不外此意。

曹丕曹植對於文學究取怎樣的態度呢？曹丕的典論論文說：

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

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故西伯幽而演易，周旦顯而制禮，不以隱約而忽務，不以康樂而加思。

曹植與楊德祖書亦云：

> 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採史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

這都是儒家立名後世的意思。再看曹丕與吳質書所言：

> 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

要『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要『辭義典雅』纔足傳於後，這些儼然都是儒家之言。（註一）蓋丕植一方面在創作上沿襲古典文學的舊型，以開六朝淫靡之風氣；一方面在批評上不脫儒家傳統的論調，以致不能導創作入正軌，轉開後世文人主張文以明道或致用的先聲。（註二）

〔註一〕御覽五百九十五引典論論文云：「余觀賈誼過秦論，發周秦之得失，通古今之制義，洽以三代之風，潤以聖人之化，斯可謂作者

矣。」亦同此意。

【註二】楊修答臨淄侯牋云：「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比仲山周旦之儔，爲皆有愆耶！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鐘，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此書雖似駁曹植輕視辭賦的主張，但其論斷亦以儒家思想爲衡。

曹丕的典論論文爲文學批評之嚆矢。自是以後，始有專門論文的散篇文章。今按丕植所言，雖亦不外昔人的意思；如其謂「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即王充須頌書解諸篇之意；其論文體文氣二者，亦即相如賦迹賦心之說。但是他能融會貫通，加以廓充，而說來亦更覺透澈，此所以爲中國文學上之自覺時代也。

由迹的方面言，至是始爲文體之區分。典論論文云：

夫文本同而末異。蓋奏議宜雅，書論宜理，銘誄尚實，詩賦欲麗。

此數語簡要之點，在於看出文的本同而末異，看出各種體裁均有其特殊的作用與風格，更看出詩賦之欲麗，以見純文學自不可廢去修辭的技巧。

由心的方面言，於是再拈出「氣」字。典論論文云：

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於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又云：

徐幹時有齊氣。（註）

【註】胡侍眞珠船云：「魏文帝典論論文云，『徐幹時有齊氣。』李善註，『言齊俗文體舒緩，而徐幹亦有斯累。』按漢書地理志，齊詩，『子之旋兮。遭我乎峱之間兮，』又曰『竢我於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又云：『齊至今，其士舒緩闊達而足智。』朱博傳：『博遷瑯邪，齊部舒緩，博奮髯抵几曰，觀齊兒欲以為俗耶？』師古註：『齊州人志氣緩慢。』是則齊俗自來舒緩，故文體亦然。」

其與吳質書亦云：

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

這都是從氣的方面以論文者。論文言「氣，」實始於此。此數節中所言之「氣，」兼有兩種意義。所謂『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者，是指才氣而言；曰「齊氣」曰「逸氣」云者，又兼指語氣而言。蓄於內者為才性，宣諸文者為語勢，蓋本是一件事的兩方面，故亦不妨混而言之。文心雕龍風骨篇引劉楨語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此指才氣言者。又其定勢篇引劉楨語云：『文之體指貴強；（原作「文之體指實強弱」今從黃侃校改）使其辭已盡而勢有餘，天下一人耳，不可得也。』此又就語氣言者。所以劉勰稱『公幹所談頗亦兼氣，』而陸厥亦云：『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可知時人論氣，本混才氣語氣而為一。近人乃謂『曹丕論氣，實指才性言之，為後世陽剛陰柔說之所本，與唐宋人之以語勢為文氣者不同。』（陳鍾凡中國文學批評史）此則僅見其

一而未見其二了。

「迹」的方面體異而風格亦異；「心」的方面人異而才性亦異：所以對於文體上的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四科總結一句云：

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能備其體。

『能之者偏』『惟通才能備其體』這二者是他從文體文氣兩方面體會有得的結論，也即是他對於文學批評的基本觀念。其品評當代作家，即應用此觀念以爲其『能之者偏』的例證。他說：

今之文人：魯國孔融文舉，廣陵陳琳孔璋，山陽王粲仲宣，北海徐幹偉長，陳留阮瑀元瑜，汝南應瑒德璉，東平劉楨公幹。斯七子者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以自騁驥騄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以此相服，亦良難矣。……王粲長於辭賦；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出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圓扇橘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是。琳瑀之章表書記，今之儁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不勝詞，以至乎雜以嘲戲；及其所善，揚班儔也。(註)

(註)其與吳質書亦云：『偉長獨懷文抱質，……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

曹植與楊德祖書亦云

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者也。

這些話頗能說明作者的個性。個性不同，故於文的各體，能之者偏，而即於同一體製之中，也往往各自有其不同的氣韻。此則所謂『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者；所以有的有齊氣，有的體氣高妙，有的有逸氣了。這些雖近於抽象之語，但並非不可捉摸。大抵漢季臧否人物的風氣很盛，所以頗多清議式的評語，如『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等等而汝南月旦，尤爲一時美談。故劉劭得本之以成人物志，傅嘏鍾會得本之以論才性同異而在於丕植則不過應用此觀念以論文學而已。

因才異所以能偏，因「能之者偏」於是文有利病可摭，美惡可言，而品評以起。曹植與楊德祖書亦云：

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耶？』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

更因「能之者偏」，於是所生的批評遂亦各隨好尚漫無定準，而陷於文人相輕的陋習。曹植云：

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

曹丕亦云；

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傅毅之於班固，伯仲之間耳；而固小之，與弟超書曰，『武仲以能屬文，爲蘭臺令史，下筆不能自休。』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里語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見之患也。

但是能之者雖偏，而『惟通才能備其體，』所以他以爲文學上的批評，只有作家纔能勝任，也只有作家纔有此識見，有此資格，因爲他是深知此中之甘苦者。曹植云：

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劉季緖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掎摭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訾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

這種混批評與創作而爲一的見解，固然不很對。但是若明白上文所講，他們品評的標準，本重在修辭的技巧；明白他批評的基本觀念，『惟通才能備其體；』則此種必作者始可言利病的主張，實是當然的結論。陳鍾凡識其不知批評文學與文學之區別，蓋亦未爲篤論也。

更因『惟通才能備其體，』所以益覺通才之難能而可貴。曹植與吳季重書云：

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

這樣以希有爲貴，於是文學遂漸漸形成貴族的傾向。

第二節　陸機文賦

晉初文學首推二陸；即就文學批評言，二陸亦較爲重要。陸雲與兄平原書凡數十通，大率討論文事；不過以其過涉瑣碎，無關弘恉，故不贅述。今僅就陸機文賦言之。其文賦自序雖謂「隨手之變良難以辭逮，」似乎于文學之精微處未曾論及；但是他畢竟是「每觀才士之所作，竊有以得其用心，」者畢竟是「每自屬文尤見其情，」者，所以無論如何頗能道出作文之利害所由。劉勰文心雕龍之論文賦，雖謂其「巧而碎亂，」似有貶辭，但其碎亂之故，由於爲賦體所限，似不應以是爲病；至其精微之處，則固不得不以「巧」許之。(註)

【註】鍾嶸詩品序謂「陸機文賦通而無貶，」蓋亦以此本非品評性質，故不顯優劣也。

陸機自謂「普辭條與文律，良余膺之所服。」所以論文亦頗講及一些粗迹。如在積極方面，主張：

一、選辭　其目的要使「選義按部，考辭就班，抱景者咸叩，懷響者畢彈。」使不注重選辭，則其弊爲「或辭害而理比，或言順而義妨。」

二、謀篇　其方法「或因枝以振葉，或沿波而討源，或本隱以之顯，或求易而得難。」否則不能謀篇，其弊成爲「或仰逼於先條，或俯侵於後章」了。

三、擇體　其標準是「夸目者尙奢，愜心者貴當，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

四、定旨　其規律是『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雖衆辭之有條，必待茲而效績。』

其在消極方面則主張：

一、勿模襲　陸機雖近於古典派，但不過沿襲以前文人的技巧使之益進而已，他決不如明代前後七子之句剽字竊以爲古者。所以他又說『雖杼軸於予懷，怵他人之我先；苟傷廉而衍義，亦雖愛而必捐。』明白這一點則知六朝文人雖多屬於古典文學，而一二足以代表的名家，却都是善於新變者。此又陸機所謂『謝朝華於已披，啓夕秀於未振』也。

二、去疵累　有時得了一二佳句，固然足使累句增光，即他所謂『石韞玉而山輝，水懷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榮於集翠』者是。但是疵累過多有時也總不免『混妍蚩而成體，累良質而爲瑕』了。

這些都是所謂辭條文律。他再進一步論及爲文之難，不易到恰好的地步；重質而輕辭，則雖應而不和；重辭而遺情，則雖和而不悲；任情而無檢，則雖悲而不雅；約情而止禮，則既雅而不艷。此則成爲批評上的問題，不僅是修辭上的問題了。所以他又說：

若夫豐約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適變，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辭輕；或襲故而彌新，或沿濁而更清；或覽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後精；譬猶舞者赴節以投袂，歌者應絃而遣聲。是蓋輪扁所不得言，故亦非華說之所能精。

粗迹可以言而不可以泥。所以不可以泥之故，即由於要『因宜適變。』這個「因宜適變，」便是所謂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得之於心而應之於手，即作者亦不自知的，所以不可以言傳了。但此雖非華說之所能精，而陸機却頗能道出爲文之甘苦，頗能握住文學的要領。

第一項是天才，文學的天才，不是衆人所同具，即有此天才的人其等量又不可以相齊。固然衡量作者的天才不必如什麼八斗或幾斗的量法，但是創作之必賴於天才是無可疑的。他說：

彼瓊敷與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槖籥之罔窮，與天地乎並育。雖紛藹於此世，嗟不盈於予掬。患挈瓶之屢空，病昌言之難屬，故踸踔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

司馬相如之論賦心，謂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曹丕之論文氣，謂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這些都是說明才性之有特長，所以這猶不是陸機文賦的長處。

第二項是情感，這也是一般人所共知。詩序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班固所謂『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不過他再申說一些「感於物而動」的道理而已。他說：

遵四時以歎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心懍懍以懷霜，志眇眇而臨雲。……慨投篇而援筆，聊宜之乎斯文。

這些都是說明即景生情的實感。

第三項是想像。文學重要的生命有二，一是實感，一是想像力。要能從想像力中活躍出實感來，纔盡文學家的能事。文賦中間描寫想像力的方面卻頗有精彩。

其始也皆收視反聽，耽思傍訊；精騖八極，心遊萬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彌鮮，物昭晰而互進；傾羣言之瀝液，漱六藝之芳潤；浮天淵以安流，濯下泉而潛浸。於是沈辭怫悅，若遊魚銜鉤而出重淵之深；浮藻聯翩，若翰鳥纓繳而墜曾雲之峻。收百世之闕文，採千載之遺韻。謝朝華於已披，啟夕秀於未振。觀古今於須臾，撫四海於一瞬。

上天下地，往古來今，都在想像力所能及的範圍之內。『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如此才見得想像力的豐富瑰偉。

第四項是感興，不論何種藝術，待到他組成作品的時候，他所經歷的過程，總不能越過感興一個階級，而於文學為尤甚。所謂感興即是感情的一種興奮狀態。感興濃到不能自禁的時候便須發揮其天才，宣洩其情感，而運用其想像以成為作品。文人作文，詩人作詩，都在能擒住這一種感興而已。此意亦發自陸機，其所論亦頗精到。他說：

若夫應感之會，通塞之紀，來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滅，行猶響起。

感興方濃不能遏止其發露，感興不來不能勉強去醞釀。這一節形容感興的起滅，確是所謂『每自屬文，尤見其情，』才能深知此中之甘苦者。

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思風發於胸臆，言泉流於脣齒。紛威蕤以馺遝，唯毫素之所擬。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

這是說感興來的時候，醞釀成熟，故能提起銳筆，一呵而就，此所以『或率意而寡尤』。

及其六情底滯，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攬營魂以探賾，頓精爽於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乙乙其若抽。

這是說感興不來或感興已去的時候，即使欲勉強作文而時機未熟，不免徒勞無功，此所以『或竭情而多悔』。

在這方面是他較精微的方面，而想像與感興尤為他獨到的見解。(註)

【註】杜甫寄劉峽州伯華使君四十韻云：『雕刻初誰料，纖毫欲自矜。神融躡飛動，戰勝洗侵陵。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朱鶴齡注云：『雕刻初誰料』即文賦之『籠天地於形內，挫萬物於筆端』也。『纖毫欲自矜』即『考殿最於錙銖，定去留於毫芒』也。『神融躡飛動』即『精騖八極，心遊萬仞』也。『戰勝洗侵陵』即『方天機之駿利，夫何紛而不理』也。『妙取筌蹄棄，高宜百萬層』即『形不可逐，響難為係，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也。因劉使君以詩來寄而言詩道之難如此。』案朱注以杜詩與文賦參證，所解亦是。

至其在文學批評史上承前啟後的關係則為（1）文體的辨析，（2）駢偶的主張，（3）音律的問題，茲分言之於下：

自曹丕論文，創為四科之論，而桓範世要論亦有序作讚象銘誄諸篇，說明各體之旨。(註) 如序作篇云：

夫著作書論者，乃欲闡弘大道，述明聖教，推演事理，盡極情類，記是貶非，以為法式，當時可行，後世可修。……

而世俗之人不解作體，而務汎濫之言，不存有益之義，非也。故作者不尙其辭麗而貴其存道也，不好其巧辯而惡其傷義也。故夫小辯破道，狂簡之徒，斐然成文，皆聖人之所疾矣。

【註】世要論十二卷，隋志著錄入法家，早佚。此據羣書治要轉錄。羣書治要作政要論。

讚象篇云：

夫讚象之作，所以昭述勳德，思詠政惠，此蓋詩頌之末流矣。……若言不足紀，事不足述，虛而為盈，亡而為有，此聖人之所疾，庶幾之所恥也。

銘誄篇云：

夫渝世富貴，乘時要世，爵以賂至，官以賄成，……此乃繩墨之所加，流放之所棄；而門生故吏，合集財貨，刊石紀功，稱述勳德，高邈伊周，下陵管晏，遠追豹產，近踰黃邵，勢重者稱美，財富者文麗。後人相蹤，稱以為義。外若讚善，內為己發。上下相效，競以為榮。其流之弊，乃至於此。欺曜當時，疑誤後世，罪莫大焉。

綜其所言，亦大抵曹丕『書論宜理，銘誄尚實』之義。至陸機文賦遂益說明體裁之性質。其言云：

詩緣情而綺靡。——李善文選注（以下簡稱李）『詩以言志，故曰緣情；綺靡，精妙之言。』王闓運論詩文體法（以下簡稱王）『詩，承也，持也。承人心性而持之，以風上化下，使感於無形，動於自然。故貴以詞掩意，託物寄興，使吾志曲隱而自達，聞者激昂而欲赴。……非可快意騁詞，自仗其偏頗，以供世人之喜怒也。』

賦體物而瀏亮。——李云：『賦以陳事，故曰體物。瀏亮，清明之稱。』王云：『賦者詩之一體，即今謎也。……莊論不如隱言，故荀卿宋玉賦因作矣。漢代大盛，則有相如子雲之流以諷其君。太沖安仁發揮學識，用兼詩書，其文爛焉。要本隱以之顯，故托體於物而貴清明也。』

碑披文以相質。——李云：『碑以敘德，故文質相半。』王云：『碑始於廟，碑文則始墓道。以文述事，而不可以事爲主。相質者，飾質也。』

誄纏綿而悽愴。——李云：『誄以陳哀，故纏綿悽愴。』

銘博約而溫潤。——李云：『博約謂事博文約也。銘以題勒示後，故博約溫潤。』王云：『銘記一類也，言欲博，典欲約。』

箴頓挫而清壯。——李云：『箴以譏刺得失，故頓挫清壯。』王云：『箴貴聳聽，故當頓挫。』

頌優游以彬蔚。——李云：『頌以褒述功美，以辭爲主，故優遊彬蔚。』王云：『後世之頌，皆應酬贊人之文，故貴優遊，不可謂褻。——以上皆有韻之文。詩之末流，皆主華飾。』

論精微而朗暢。——李云：『論以評議臧否，以當爲宗，故精微朗暢。』王云：『是非不決，論以明之，故必探其精微，使朗然而曉。』

奏平徹而閑雅。——李云：『奏以陳情敘事，故平徹閑雅。』王云：『奏施君上，故必氣平理徹。』

說煒燁而譎誑。──李云「說以感動爲先，故煒燁譎誑。」王云：「說當同人之意，改已成之事，譎誑之使反於正，非倚詐也。」──以上皆無韵之文，單行直叙。」

此亦重在各種體製與風格之關係。與曹丕典論論文所云者同，而與後世劉勰司空圖諸人之論風格者相異。蓋他們只重在說明某種文體之標準的風格，以爲文體辨析之準則，所以不免偏於古典的傾向也。

至其駢偶的主張也與其作風有關。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評潘陸語稱爲「繁文綺合」。所以他的論文主張亦偏主妍麗。他說「其爲物也多姿，其爲體也屢遷，其會意也尙巧，其遣言也貴妍。」這種主張，實開元嘉文學的風氣，顏延年謝靈運等的作風都自此出。（註）

【註】謝榛四溟詩話云「陸機文賦曰：『詩緣情而綺靡，賦體物而瀏亮。』夫綺靡重六朝之弊，瀏亮非兩漢之體。」似以此爲陸機病，實則陸機所言本不泥於古說，正可據以看出其偏于妍麗的主張。

此外他所提出者猶有音律的問題。司馬相如之論賦迹雖云「一經一緯，一宮一商，」似乎已經明白音律的重要。迨至陸機始漸發揮斯義。他說：「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似乎後世所謂「韵」「和」的問題，陸機已啟其端。不過此時於音韵方面的辨析還不精，所以他的所謂音律是指自然的音調而言。他說：「塊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緯。」又云：「或寄辭於瘁音，徒靡言而弗華。」又云：「故踸踔於短垣，放庸音以足曲。」其評論文字都重在音節。則知沈約所謂「潘陸顏謝去之彌遠」者，不過指人工的音律言耳。所以這種主張也未嘗不是永明文

第二節　左思與皇甫謐

揚雄班固摯虞之論辭賦，皆以古義相繩，謂辭人之賦沒其風諭之義。至左思則又一變其論調，謂後人之賦近於虛誇失實。其三都賦序云：

蓋詩有六義焉，其二曰賦。揚雄曰：『詩人之賦麗以則。』班固曰：『賦者古詩之流也。』先王采焉，以觀土風。見『綠竹猗猗』，則知衞地淇澳之產；見『在其版屋』，則知秦野西戎之宅：故能居然而辨八方。然相如賦上林而引『盧橘夏熟』；揚雄賦甘泉而陳『玉樹青葱』；班固賦西都而歎以出比目，張衡賦西京而述以遊海若：假稱珍怪，以爲潤色。若斯之類，匪啻于茲。考之果木則生非其壤，校之神物則出非其所。於辭則易爲藻飾，於義則虛而無徵。且夫玉卮無當，雖寶非用；侈言無驗，雖麗非經。而論者莫不詆訐其研精，作者大氐舉爲憲章，積習生常，有自來矣。余既思摹二京而賦三都；其山川城邑則稽之地圖；其鳥獸草木則驗之方志；風謠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長者，莫非其舊。

左思作賦求真的主張，其合不合自是另一問題。王觀國學林三都賦序條已爲相如諸人辯護，謂「盧橘夏熟」云云，正所以見上林之富麗，四海之嘉木珍果莫不移植其中；玉樹亦非指天產，本不限於地域；「以出比目」所以極言武帝之所致，雖魚鳥之飛潛亦有不召而致者；「以遊海若」蓋言武帝好神仙，治太液池，有蓬萊方丈瀛洲壺梁

象海中神仙之宅，龜魚之屬以俟神人，是則左思所列舉以爲疵病者，固未必盡當。不過他既有此主張，則在文學批評史上也有値得研究者。大抵這種思想的形成，不外二端：其一，是受賦家之影響。賦家者流，章學誠本以爲彙諸子之餘風，異於後世辭章之士。其校讐通義云：『假設問對，莊列寓言之遺也；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排比諧隱，韓非儲說之屬也；徵才聚事，呂覽類輯之義也。雖其文逐聲韻，旨存比興，而深探本源，實能自成一子之學，與夫專門之書初無差別。』此說亦自有一部分的理由，由於辭賦本身之欲自成一子之學，則對於『侈言無驗雖麗非經』的，當然不能滿意了。其二，是受批評家的影響。王充的文學批評，即本於他疾虛妄的態度而建立的，所以對於辭賦之揚厲過甚，藻飾失實，往往加以駁詰。此與左思這種主張也有很大的關係。我們須知辭賦雖欲自成一子之學，但其『虛張異類託有於無』，則自司馬相如以來久已如此了。（注）所以這種思想，非受批評界的指示，則在作家自身不容易覺悟的。

【注】皇甫謐三都賦序亦云：『若夫土有常產，俗有舊風，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而長卿之儔，過以非方之物，寄以中域，虛張異類，託有於無。祖構之士，雷同影附，流宕忘返，非一時也。』

左思的論賦因較偏於徵實，所以他定詩賦的界說云：

發言爲詩者，詠其所志也；升高能賦者，頌其所見也。美物者貴依其本，讚事者宜本其實。匪本匪實，覽者奚信。

（三都賦序）

他這樣定詩賦的區別，似乎有些不甚妥當，若欲使其賦成爲一子之學則可，若欲其文學批評也取疾虛妄的態度則可。如果此意不足以範圍賦的全體，則因於升高能賦一語而必求其賦之覈實，未免太偏極端了。何則，蓋所謂發言爲詩者，不過言其情之自內生者而已；所謂升高能賦者，不過言其情之自外起者而已；未必詩可違虛而賦必核實也。所以這種主張不如皇甫謐的三都賦序說得較爲圓通一些。他說：

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註）

【註】案世說文學篇註引左思別傳謂皇甫謐序出思自爲，欲重其文，故假時人名姓云云。竊以爲此說非是。嚴可均全晉文已辨之矣。不過皇甫此序爲左氏作，故其論賦主張，亦或受左思啓發耳。

此說較得賦的要領。因爲賦是美麗之文，所以末流所及，便以極端尚美而漸離於善：——昔之將以紐之王教，本乎勸戒者，至是而沒其諷諭之義焉；再進一步而漸遠於眞：——昔之感物造端，材知深美者，至是而亦並務恢張，博誕空類焉。謂賦的末流之漸離於本初則可，必謂這種離善違眞者爲賦之失，則未嘗。晉文苑傳稱其『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邛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遇得一句，即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祕書郎。』這種求眞的態度本亦無可非難。但在賦的立腳點而言，則實是至是而作風一變，並不是至是而作風返之於古。

第四節　總集之結撰者

第一目　摯虞文章流別論

至摯虞遂承曹丕陸機之遺風，（註一）一方面撰集古今文章，類聚區分以定其體製；一方面於定其體製之外衆論其得失。其所撰著考諸各家著錄，名稱卷數，均不盡同。晉書本傳稱其『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今文章，類聚區分，爲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爲之論，辭理愜當，爲世所重』隋志簿錄類『文章志四卷』，總集類稱『文章流別集四十一卷；（註云『梁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文章流別志論二卷』。新舊唐志目錄類有『文章志四卷』，總集類有『文章流別集三十卷』，與晉書同。（註二）通志目錄類有『文章志四卷』，總集類有『文章流別集六十卷，文章流別志論二卷』。而焦竑國史經籍志雜家類又稱『文章流別集十二卷，文章流別志論二卷』。今其書早佚，究竟卷帙多寡，已不可得知。大抵其所撰著，本有三種性質：文章志的性質同於序目，觀三國志陳思王傳注後漢書桓譚傳注文選長笛賦注諸書所引可證。（註三）所以隋志新舊唐志及通志著錄均以列入史部目錄一類。文章流別集的性質，原是總集，故卷數爲獨多。隋志云：『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衆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擿孔翠，芟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爲條貫，合而編之，謂爲流別』。則此書之爲分類總集至爲明顯；此即晉書所謂『類聚區分』者也。（註四）文章流別論則爲敍論性質。由文學批評言，惟此較爲重要，是又晉書所謂『各爲之論，辭理愜當』者是也。此三種性質雖別，原本一書，第以卷帙繁多之故，傳鈔者分合不一，於是名稱卷

數均不相同。或僅錄其序目，則成為文章志。此當在流別集卷首，故可別錄為書。考隋志目錄類有荀勖文章家集敘十卷，與摯虞文章志沈約宋世文章志同著錄。勖較摯虞稍前，則摯著或本於此。或輯錄其所論，則成為文章流別論。此當分在流別集各卷中間，而錄者別為選輯成卷者。考隋志註謂『梁六十卷，志二卷，論二卷。』則知此輯出之本，且在阮孝緒七錄以前。今原輯本早已散佚。焦竑國史經籍志雖有文章流別志論二卷，然張溥摯太僕集中所錄已是就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廣文選諸書輯錄而成者，則其散佚可知。焦著所載多不可據，不能據此以為明代仍有完本。嗣是蹤輯者有嚴可均張鵬一二家。嚴輯刊入全晉文中；張輯刊入關隴叢書中。均就張溥所輯以資校補。至許印芳詩法萃編所錄，即據張輯，無所校補。現就諸家所輯諸條案其內容，皆為流別論，而諸家猶循舊稱名為流別志論似亦未當。

〔註一〕摯虞與陸機雖同時而稍後。且陸機文賦成於入洛以前，杜甫詩：『陸機二十作文賦，』可證。

〔註二〕玉海五十四惟引此數家之說無所折衷。

〔註三〕三國志陳思王傳注引云：『劉修著詩賦頌六篇。』後漢書桓麟傳注引云：『麟文見在者十八篇，有碑九首，誄七首，說一首，[illegible]諸相郭府君書一首。』文選長笛賦注引云：『劉玄字伯康，明帝時官至中大夫，作簧賦。』世說新語注引云：『崔烈字威考，高陽安平人，駰之孫，瑗之兄子也。靈帝時官至司徒太尉，封陽平亭侯。』又『潘勗字元茂，陳留中牟人，少有逸才，獻帝時為尚書郎，遷東海相，未發，[illegible]，病卒。』案其體例，蓋與後世詩人徵略詩人小傳諸書相類。

【註四】劉師培蒐集文章志材料方法：『文學史者，所以考歷代文學之變遷也。古代之書，莫備於晉之摯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別。志者，以人為綱者也。流別者，以文體為綱者也。』——（國故第三期）

今就此僅存的數則中以論其文學批評的思想，大抵可窺出兩點：（1）可以看出他選輯的宗旨，（2）可以看出他選輯的方法。由選輯的宗旨言，他是本於儒家的見地的，其總論文章之含義云：

文章者所以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者也。（全晉文七十七）

此完全從文的作用而言，故其論各種文體亦謂『王澤流而詩作，成功臻而頌興，德勳立而銘著，嘉美終而誄集，說史陳辭，官箴王闕』以為各種文體均由應用而起。又其論賦家之四弊云：

古詩之賦，以情義為主，以事類為佐；今之賦以事形為本，以義正為助。情義為主，則言省而文有例矣；事形為本，則言富而辭無常矣。文之煩省，辭之險易，蓋由於此。夫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悖：此四過者，所以背大體而害政教。是以司馬遷割相如之浮說，揚雄疾「辭人之賦麗以淫」也。（全晉文七十七）

此意亦略同於班固——本儒家的見地貶賦家的淫辭，因此可知他選輯的宗旨未必專尚麗辭了。由選輯的方法言，他又看出文體是因時而異其性質。姑舉一節為例：

頌之所美者，聖王之德也。則以為律呂，或以頌形，或以頌聲。其細也，甚非古頌之意。昔班固為安豐侯頌，史岑

爲出師頌，和熹鄧后頌，與魯頌體意相類，而文辭之異，古今之變也。揚雄趙充國頌，頌而似雅。傅毅顯宗頌，文與周頌相似，而雜以風雅之意。若馬融廣成上林之屬，純爲今賦之體，而謂之頌，失之遠矣。（全晉文七十七）摯虞誠詩數下極言論文拘形貌之弊，不知摯虞早已言之。據此一節則知其邏輯的方法，所謂類聚區分者，又未必泥於形式的方面了。

第二目　李充翰林論

與摯虞文章流別論相近者，在東晉更有李充（註一）的翰林論。翰林論二卷（註二）也早散佚。（註三）其詳不可得知。但據各家論述及著錄考之，要亦與流別集一樣有二種性質。其一，是邏輯性質的總集。通志藝文略既於文史類著錄之，而復見其目於總集類。竊疑此書本可兩屬，所以七錄稱有五十四卷（見隋書經籍志注）而晉書文苑傳序亦有『翰林總其菁華』之語。其又一則是『論爲文體要』之語，（見中興書目）此劉勰所譏爲『淺而寡要』者是也。（註四）大抵其爲總集者原名翰林，而評論者則稱翰林論，亦猶文章流別集之別成爲文章流別論，而後人亦多混而稱之也。

〔註一〕宋史藝文志「充」或誤作「允」，註云「一作元，或作克。」

〔註二〕玉海六十二引中興書目稱凡二十八篇。

〔註三〕焦竑國史經籍志於子部雜家類集部詩文評類並著錄，但也當與摯虞文章流別集同例，並非當時尚有傳本。以在明代各家藏

書目中均無之，則其散佚可知。其散佚之時當在宋以後，崇文總目及遂初堂書目之文史類均著錄之，惟遂初目無卷數耳。宋秘書省續編到四庫闕書目入史類故事門，不入集類文史門，注云「闕」。

【注四】見文心雕龍序志篇。玉海六十二引作『博而寡要』，竊以爲劉氏所下評語，於魏文陳思諸家均是優劣互見，當以「淺」爲近是。

至翰林論與文章流別論不同者，一則於談文體之外兼及評論，一則僅就文體言耳。蓋摯虞由目錄以試輯總集，而李充則由總集以試加評論。摯虞所編重在類聚區分，故其書名流別而所論亦止及文體；李充所編重在菁華，故其書名翰林，而所論遂多評騭作家。此爲二書體例之別。故各家著錄均以流別爲總集之始，而翰林爲文史之始。中國舊時之文學批評除詩話文談之外，各家選集往往各存微旨，此所以總集與文史亦互有關係也。

今就嚴可均全晉文（五十三）所輯諸條考之，大都是於每體中擇其尤佳者，略加評論以爲標準。如

或問曰：『何如斯可謂之文？』答曰：『孔文舉之書，陸士衡之議，斯可謂成文矣。』（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五百八十五）

容象圖而讚立，宜使辭簡而義正。孔融之讚楊公，亦其義也。（御覽五百八十八）

表宜以遠大爲本，不以華藻爲先。若曹子建之表，可謂成文矣。諸葛亮之表劉主，裴公之辭侍中，羊公之讓開府，可謂德音矣。（御覽五百九十四）

駁不以華藻爲先。世以傅長虞每奏駁事，爲邦之司直矣。（御覽五百九十四）

研覈名理而論難生焉。論貴于允理，不求支離。若嵇康之論，文矣。（御覽五百九十五）

有駁辨政而議奏出；宜以遠大爲本。陸機議脊斷，亦名其美矣。（御覽五百九十五）

盟檄發於師旅，相如喻蜀父老，可謂德音矣。（御覽五百九十七）

此外如鍾嶸詩品潘岳條稱『翰林歎其翩翩然，如翔禽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縠。』（亦見初學記二十一御覽五百八十九，嚴輯引之。）王懋野客叢談百一詩條亦引其『應休璉作五言詩百數十篇，有詩人之旨。』（注）則文類一人之作而加以評論者，惟均嫌簡略，此劉勰所以譏其寡要歟?

〔註〕見野客叢談卷十一、此爲嚴輯所未錄者。又御覽五九三引翰林論『誠諾施於弱違』一語，亦嚴輯所未收。

第五節　反時代潮流的批評家

第一目　虞溥諸人

在兩晉思想崇老莊，文辭尚駢麗的時代，而猶有少數崇奉儒家思想，近於儒家的文學觀者，則爲虞溥裴頠諸家。當時裴頠因時尚清談，作崇有論闢虛無之妄，以爲『形器之故有徵，空無之義難檢，辯巧之文可悅，似象之言足惑。』（全晉文三十三）而范寧之罪王何論亦稱其『飾華言以翳實，騁繁文以惑世。』（全晉文一二十五）這些雖就思想言，但也可略窺其文學觀念，蓋與荀子之攻擊飾奇辭文姦言，正是同樣的例。

至虞溥爲鄱陽內史時所作的厲學篇，爲其誥訓學徒的話。如：

> 學之染人，甚於丹靑。丹靑吾見其久而渝矣，未見久學而渝者也。夫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孝弟忠信是也。君子內正其心，外修其行，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文質彬彬，然後爲德。

(見晉書本傳，全晉文七十九作獎訓學徒詔)。

他主張先修質後學文，這全是儒家思想，所以他講及文事，也以爲離不開學。他說：

> 若乃含章舒藻，揮翰流離，稱述世務，探賾究奇，使揚班韜筆，仲舒結舌，亦惟才所居，固無常人也。然積一勺以成江河，累微塵以崇峻極，匪志匪勤，理無由濟也。(同上)

他如傅玄謂『詩之雅頌，書之典謨，文質足以相副，翫之若近，尋之若遠，陳之若肆，研之若隱，浩浩乎其文章之淵府也。』(北堂書鈔九十五御覽五百九十九又六百八引傅子)也有宗經的意思。晉書稱『傅咸風格峻整，……好屬文論，雖綺麗不足，而言成規鑒。潁川庾純常歎曰，長虞之文近乎詩人之作矣。』作風如此，固宜其衡文標準仍折衷於儒家了。這些均和當時一般的文學批評不同，因爲他不承認文學的獨立性，可知傳統思想猶有一部分的存在。

第二目　葛洪

虞溥與葛洪在當時文勝的時期，都是反時代潮流的批評家。葛洪抱朴子尚博篇云：

咸實愛詩賦淺近之細文，忽薄深美富博之子書，以磋切之至言爲騃拙，以虛華之小辨爲研巧，眞僞顚倒，玉石混淆，同廣樂於桑間，鈞龍章於卉服。悠悠皆然，可嘆可慨者也。（注）

〔注〕抱朴子百家篇亦有此語，文辭稍異。

他這種尊子書忽文藝的主張，確乎也是很背時的。即專就純文學而言，如辭義篇云：

古詩刺過失，故有益而貴；今詩純虛譽，故有損而賤。

此亦完全以應用爲標準，似乎與虞溥諸人一樣，但其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則葛洪却遠勝於虞溥。此有二因：

其一，所謂尊子書忽文藝云者，不過就此二者比較言之耳。在此二者之中，也許葛洪因於個人才性之有所偏畸，或因於傳統思想之未能盡除，或因於反對流俗之過於重文而輕實，於是覺其『悠悠皆然，可歎可慨。』實則葛洪對於文學的觀念，絕不和虞溥一樣。虞溥以爲『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葛洪則以爲文章並非德行之餘事。他在尚博篇中討論文章與德行的問題，他以爲文章與德行並無本末先後之分。

文章之與德行，猶十尺之與一丈；謂之餘事，未之前聞。夫上天之所以垂象，唐虞之所以爲稱，大人虎炳，君子豹蔚，昌旦定聖謚於一字，仲尼從周之郁，莫非文也。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文之所在，雖賤猶貴，犬羊之鞹，未得比焉。

即分本末，亦不足以爲輕重的標準。所以他再說：

且夫本不必皆珍，末不必悉薄。譬若錦繡之因素地，珠玉之居蚌石，雲雨生於膚寸，江河始於咫尺，爾則文章雖爲德行之弟，未可呼爲餘事也。

他本於這種觀點，所以並不輕視文章。——非惟不輕視文章，並且喜歡討論文章。他因爲——

德行爲有事，優劣易見；文章微妙，其體難識。夫易見者粗也，難見者精也。夫唯粗焉，故銓衡有定焉；夫唯精焉，故品藻難一焉。吾故捨易見之粗，而論難識之精，不亦可乎？（尚博篇）

此所以他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應當較虞溥諸人重要得多。可是他畢竟偏於雜文學方面。觀其自序謂：『洪年二十餘，乃計作細碎小文，妨棄功日，未若立一家之言，乃草創子書。』則其興趣所在也可以窺知了。故他所謂『文章微妙其體難識，』所謂『品藻難一，』云者，未嘗不兼指內容的思想而言。所以他又說：

筌可以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以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尚博篇及文行篇）

則他雖似重文而並不承認文學的獨立性了。故彼之異於虞溥者，不過不主先德行而後文學而已。其所以重視文學者，蓋指雜文學言，固非貴虛華之詩賦也。

其二，能明文學進化的觀念。此則同於王充而遠勝於虞溥者。其鈞世篇云：

古書之多隱，未必昔人故欲難曉；或世異語變，或方言不同，經荒歷亂，埋藏積久，簡編朽絕，亡失者多；或雜續殘缺，或脫去章句；是以難知，似若至深耳。且夫尚書者，政事之集也；然未若近代之優文詔策軍書奏議之清

富贍麗。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濊博富。然則古之子書，能勝今之作者，何也？守株之徒，嘍嘍所翫，有耳無目，何肯謂爾！其於古人所作爲神，今世所著爲淺，貴遠賤近，有自來矣。故新劍以詐刻加價，弊方以僞題見寶。是以古書雖質樸，而俗儒謂之墮於天也；今文雖金玉，而常人同之於瓦礫也。若夫俱論宮室，而奚斯路寢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遊獵，而叔畋盧鈴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並美祭祀，而淸廟雲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近者夏侯湛潘安仁並作補亡詩白華由庚南陔華黍之屬，諸碩儒高才之賞文者，咸以古詩三百，未有足以偶二賢之所作也。

這種論調明白文學之進化，明白品評文學不可貴古賤今，這實是重要的地方。此意雖亦同於王充之文不必合於古的論調，但他謂今文勝古文的緣故，由於古樸今麗，則完全是受時代的關係。如鈞世篇所云：

且夫古者事事醇素，今則莫不彫飾，時移世改，理自然也。至於罽錦麗而且堅，未可謂之減於蓑衣；輜軿妍而又牢，未可謂之不及椎車也。書猶言也，若言以易曉爲辯，則書何故以難知爲好哉？若舟車之代步涉，文墨之改結繩，諸後作而善於前事，其功業相次千萬者，不可復縷舉也。世人皆知快於曩矣，何以獨文章不及古耶？

此種論調，較之王充思想，便修正得多，圓融得多了。可知時代的關係終究是不可蔑視的。所以葛洪雖極推崇王充，稱爲冠倫大才，（註）而辭意精詣：

屬筆之家亦各有病：其深者則患乎譬煩言冗，申誡廣喻，欲棄而惜，不覺成煩也。其淺者則患乎妍而無據，證援不給，皮膚鮮澤，而骨鯁迴弱也。

〔註〕見喻蔽篇。又北堂書鈔一百，御覽五百九十九引抱朴子佚文，亦稱謝堯卿說王充以為一代英偉。

此雖不是批評王充的論衡，而論衡的文辭確不免有深處失之煩的地方，所以王葛兩家雖並推崇論著之散文，而抱朴子的文辭却遠勝於論衡。觀意林書鈔御覽諸書所引抱朴子佚文，頗多推崇陸機陸雲之處，〔註〕亦可知其論文微指之所在矣。

〔註〕抱朴子佚文：「嵇君道曰，每讀二陸之文，未嘗不廢書而歎，恐其卷盡也。陸平十篇，誠為快書。其辭之富者，雖覃思不可損也；其理之約者，雖鴻筆不可益也。觀此二人，豈徒儒雅之士，文章之人也。」（意林，書鈔一百，御覽六百二）「陸平原作子書未成，吾門生有在陸君軍中，常在左右，說陸君臨亡，曰，窮通時也，遭遇命也。古人貴立言以為不朽，吾所作子書未成，以此為恨耳。余謂仲長統作昌言未竟而亡，後繆襲撰次之，桓譚新論未備而終，班固為其成琴道。今才士何不贊成陸公子書。」（御覽六百二）「抱朴子曰，秦時不覺無鼻之醜，陽翟憎無癭之人，陸君深疾文士放蕩流遁，遂往不為虛誕之言，非不能也。陸君之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吾生之不別陸文，猶侏儒測海，非所長也。卻後數百年，若有幹跡，如二陸猶比肩也，不謂疏矣。」（意林，書鈔一百，御覽五百五十九）

第二章　南朝之文學批評

第一節　南朝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

南朝——宋齊梁陳——核計其年代雖不過二百年光景，但在文學史上—尤其在文學批評史上卻占有重要的地位。其所以重要的原因，由於（1）所討論的問題，空前啓後，不囿於傳統的思想，而能範圍後來的作者，指導後來的批評家。如文筆之區分，如音律之發明等等，都是值得大書特書的。（2）至是纔有文學批評的專著，如鍾嶸詩品劉勰文心雕龍等書—均得流傳至今。而文心雕龍尤爲重要的著作，原始的表末，推粗以及精，敷陳詳覈，條理密察，卽傳至現代猶自成爲空前的偉著。（3）此期的批評家能應用種種批評的方法，如文體的分類及說明，則歸納的批評也；文選序之以沈思翰藻爲文，文心雕龍之原道宗經諸篇則推理的批評也；四聲八病之說，則判斷的批評也；論詩而溯流別，以及文心時序諸篇，則歷史的批評也；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之分作家爲三體，文心體性篇之分八體，則又比較的批評也。他如道德的批評，審美的批評，考證的批評，及賞鑑的批評等亦隨處有之，雖不必出主入奴，互成派別，而各種批評的方式殆無不具備。（4）此期的批評家纔眞是純粹的批評家，不同曹丕曹植一樣以創作家兼之，所以所論的不僅潤飾改定的問題，而重在建立文學上的原理和原則。又不同王充葛洪一樣以學者兼之，所以所論的不偏重在雜文學的方面，而很能認識文學的性質。更不同摯虞李充一樣以選家的態度爲之，所以更是純粹的批評而不必附麗於總集。有此四因，所以南朝的文學批評，實較以前各期尤爲重要。

南朝的文學批評，如此重要，而昔人每忽略視之，則以此期的創作界在文學史上是極端偏於駢儷的時期。而

此期的文學批評亦不免較重在形式方面——如音律與采藻等等的問題均爲此期批評界所集中討論的。因此，此期作家的作風，既遭後世古文家或道學家的攻擊反對，則此期較重在形式方面的文學批評，當然也易於遭人輕視了。不過我們須知：(1)因駢儷之重在藻飾，故其作風當然較偏於藝術方面而與道分離；因此，反容易使一般人認清了文學的性質，辨識了文學的道路。由這一點言，覺得後世文人之論文，反多不曾認識清楚者。(2)即在當代的批評家也有許多反對極端文勝以爲匡時之針砭者，不過因當時作家之靡然從風，積重難返，所以一時似乎不生什麼影響而已。實則此種主張有許多早已爲後世古文家種下根苗，而古文家猶一切不加理會，自矜獨革之功，這覺得更是不應該的。

至於此期文學批評之所以突飛猛進，能在歷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者，其由於推本昔人文學批評的見解而加以闡發，固是一個原因；但此猶不甚重要，其較重要者，即出於時勢之要求。蓋文學的創作界在此期既臻於極盛，則同時批評界亦當然爲均等的發展。我們試看金樓子立言篇所云：「諸子興於戰國，文集盛於二漢，至家家有製，人人有集。其美者足以敍情志，敦風俗，其弊者祇以煩簡牘，疲後生。往者既積，來者未已。翹足志學，白首不徧，或昔之所重今反輕，今之所重古之所賤。嗟我後生博達之士，有能品藻異同，删整蕪穢，使卷無瑕玷，覽無遺功，可謂學矣。」則當時文壇對於文學批評要求之迫切亦可想而知了。唐劉子玄史通自敍云：「詞人屬文，其體非一。譬甘辛殊味，丹素異彩。後來祖述，識昧圓通，家有詆訶，人相掎摭，故劉勰文心生焉。」由於文集既多，於是對於作品個別之批評，

頗爲需要，更由於對作品個別之批評既起，于是進一步對於文學之根本原理，遂極需加以討論。這是此期文學批評所以較爲發達的主要原因。

第二節　關於文評之論著

第一目　佚書及未成之著

南朝關於文評之論著，其量的方面之多，可於其佚書及未成之著見之。今考時人之著，其偏於載錄紀事者，有

續文章志　二卷。宋傅亮撰。佚。隋志及新舊唐志均著錄。世說新語註引其語。

晉江左文章志　二卷。（隋書經籍志作三卷）宋明帝撰。佚。隋志新唐志通志略及玉海均著錄。世說新語註引其語。

文章錄（一作文章敍，一作文章敍錄。見世說新語註）　無卷數。宋邱淵之撰。佚。見玉海五十四。世說新語註引其語。

別集錄（一作新集錄。見世說註）　不知卷數。宋邱淵之撰。佚。見玉海五十四。世說新語註引其語。

江左文章錄序　不知卷數。齊丘靈鞠撰。佚。見玉海五十四。案南齊書本傳云：「丘靈鞠著江左文章錄序，起太興，訖元熙。」

宋世文章志　二卷。梁沈約撰。佚。隋志新唐志通志均著錄。

文士傳（新唐志作文林傳）　五十卷。張騭撰。（隋志作張隱）佚。隋志唐志及玉海均著錄。案張騭時代無考，

據崇文目稱是書終謝靈運，而鍾嶸詩品亦有『張騭文士逢士即書……曾無品題』之語，則當在靈運以後，鍾嶸以前也。

右書體例，大率本於摯虞文章志，均重在作者傳略者。其論文體者有：

文章始　一卷。梁任昉撰。原佚。今本稱文章緣起，疑爲張績所補，而宋人易稱者。有蘇圖本，夷門本，學海本，漢魏叢書本，心齋十種本，一瓻偶存本，硯北偶鈔本，詩觸叢書本，詩函樓瑣刻本，邵武徐氏叢書本，龍溪精舍本，文學津梁本。有明陳懋仁註，清方熊補註。又陳懋仁有續文章緣起一卷。

續文章始　一卷。陳姚察撰。佚。隋志及新舊唐志均著錄。

其無可考者有：

翰林　宋僧惠休撰。未見著錄。案皎然詩式中序云：『早歲曾見惠休翰林』云云，不知其所據。疑此是僞書。

鴻寶　宋王微撰。未見著錄。案鍾嶸詩品云：『王微鴻寶密而無裁……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

詩例錄　新舊唐志作二卷。通志及國史經籍志作三卷。宋顏竣撰。佚。

文苑　一卷。梁沈約撰。佚。宋四庫闕書目著錄文史類。

品藻　梁沈約撰。佚。未見著錄。案皎然詩式中序謂『早歲曾見沈約品藻，惠休翰林，庾信詩箴』云云，不知其所據，疑是後出僞書。

詩箴　陳庾信撰。佚。見前品藻條。

其有論著而書名不可知者，如

張眎　案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云：『張眎摘句褒貶，』似爲後世句圖之始

顏延之　案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云：『顏延圖寫情興，』而鍾嶸詩品亦云『顏延論文精而難曉。』今考顏延之庭誥多論文之語，不知即指此否？

有未及完成者，如：

知音論　齊王融撰。案鍾嶸詩品云：『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造知音論未就。』

當世詩品　齊劉繪撰。案鍾嶸詩品序云：『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慾，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

更有疑出昔人著錄之誤者，如：

文議　三十卷。齊顧歡撰。佚。見光緒杭州府志藝文志詩文評類。案南齊書本傳云：『世祖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隋志集三十卷，見太尉王儉集下註。則文議應爲顧歡之集，杭州志錄入詩文評類，不知何據。

詩格　一卷。梁沈約撰。佚。見宋四庫闕書目別集類。同治湖州府志藝文略同。案新唐志及通志均有元兢宋約詩格一卷，宋約疑卽沈約之誤。考文鏡祕府論所引元兢說多言聲病之處，則是書或原名沈約詩格，係出元兢所撰，故宋四庫闕書目以入別集類而不入文史類。湖州府志卽定爲沈約所撰，恐未必然也。

第二目　詩品與文心雕龍

南朝關於文評之論著，其質的方面之精，又可於其流傳之著見之。其單篇論文，如蕭統文選序，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等不計外；就其成書者言之，其代表者當推詩品與文心雕龍。

詩品（舊作詩評，見梁書本傳及隋書宋各志，）三卷。（宋志作一卷，今亦有一卷本，）梁鍾嶸撰。存。案是書晦於宋以前而顯於明以後。故唐宋類書除吟窗雜錄節引數語外，餘如藝文類聚，初學記，北堂書鈔，太平御覽，事類賦註等書均未見稱引，而明清叢書中則屢見採輯。今就見於各叢書者錄之，有稗史集傳本，說郛本，夷門廣牘本，格致叢書本，天都閣藏書本，顧氏文房小說本，四十家小說本，續百川學海本，漢魏叢書各本，津逮祕書本，龍威祕書本，歷代詩話本，學津討原本，詩法萃編本，擇是居叢書本，詩觸叢書本，談藝珠叢本，玉雞苗館叢書本，對雨樓叢書本，諸子百家精華本，四部備要本，螢雪軒叢書本。尚有一瓻筆存本，係鈔本。

文心雕龍　十卷。梁劉勰撰。存。有元至正，明弘治，嘉靖，萬曆各本，皆缺隱秀一篇，別有錢允治據宋本補正本，然不可信。其見叢書中者有鍾惺合刻五家言本，兩京遺編本，漢魏叢書各種本，崇文書局彙刻本，三十三種叢書本，

四部叢刊本文詩法萃編中所收爲選輯本。

此二書爲文學批評中最早的傳書，故研究之者頗不乏人。其關於詩品者有：

詩品講疏　近代黃侃撰。未成書。范文瀾文心雕龍講疏中每稱引之。

詩品疏釋　近代張陳卿撰。見其所撰詩品研究緒論中，當亦爲其屬稿未竟之作。

鍾嶸詩品之研究　近代張陳卿撰。民國十五年北京文化學社出版。

詩品註　近代陳延傑撰。上海開明書店出版。

詩品釋　近代許文玉撰。此爲許氏中國詩歌史研究叢刊之一。北京大學出版部發行。

詩品箋　近代古直撰。隅樓叢書本。

詩品平議　近代陳衍撰。

其關於文心雕龍者有：

文心雕龍註　十卷。宋辛處信撰。佚。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及宋志均著錄。

批點文心雕龍　十卷。明楊愼撰。明萬曆刊本。案康熙三[illegible]陽錢武林[illegible]坊[illegible]翻刻本，兼刻明張墉洪吉臣二家合註。

注釋文心雕龍　十卷。明梅慶生撰。未見。

文心雕龍輯注　十卷。清黃叔琳撰，有乾隆六年姚氏刻本，翻刻本四部備要本。

文心雕龍輯注評　清紀昀撰。有思賢精舍刊本，道光中廣州朱墨套本光緒乙未學庫山房刊本。

文心雕龍輯注　十卷。清張松孫撰。有乾隆刊本，未見。

文心雕龍考證　見四庫全書考證中。

文心雕龍輯注考證　同右。

文心雕龍補注　清金甡撰。未見。見光緒杭州府志藝文志詩文評類。案此書疑即出黃叔琳本。考崑圃年譜謂其書再校訂於錢塘孝廉金甡，或金氏於黃氏輯注外別有所增補歟？

文心雕龍補注　十卷。近代李詳撰。龍溪精舍叢書本。案李氏舊有文心雕龍黃注補正，載國粹學報五卷八號至七卷五號。

文心雕龍札記　近代黃侃著。北平文化學社鉛印本。

文心雕龍講疏　十卷。近代范文瀾著。新懋印書局鉛印本。案范著近易稱文心雕龍注，由文化學社出版。

至近人所著各種單篇論文研究詩品及文心二書者亦甚多，茲不備載。即此也可知二書影響之大了。

此二書之所以重要，即因足以代表當時批評家之二派。當時人所需要於批評者，不外二種作用：一，是文學作品的指導者；又一，是文學批評的指導者。文學作品日多，則需要批評以指導，纔可使覽無遺功。文學批評日滋，則也

需要更健全的批評以主持，纔可使準的有依。所以前者是爲文學的批評，後者是爲文學批評的批評。前者較偏於賞鑑的批評，後者常傾向於歸納的和推理的批評。而詩品與文心雕龍，恰恰可以代表這兩方面。

鍾嶸詩品序云：

嶸觀王公搢紳之士，每博論之餘，何嘗不以詩爲口實，隨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澠並泛，朱紫相奪，喧議競起，準的無依。

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亦云：

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

原來他們批評的標準，只因於文學作品之粗製濫造，日益增多，欲使品藻優作，汰除劣製而已。品藻優作，汰除劣製，當然也不能隨各人的嗜欲而異其商榷，所以也得提高賞鑑的標準，纔不致成爲純粹主觀的意見。這種批評，當然是爲文學的批評。

這種批評有時取評選的態度，有時取品第的態度，至於間或取比較的批評，如分別作者之屬於某國某派，或取歷史的批評，推論作者之生平及時代環境與其著作之關係，皆不過所以助其說明而已。

其取評選的態度者，有於某種體裁中選某幾人之作以爲代表者，如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云：

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騖。桂林湘水，平

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摛蔡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陽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晳發蒙，滑稽之流，亦可奇瑋。

文心雕龍之論文體，恆評其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亦猶此意。其於一家之中選某幾篇以爲代表者，如鍾嶸詩品敍云：

陳思贈弟，仲宣七哀，公幹思友，阮籍詠懷，子卿雙鳧，叔夜「雙鸞」，茂先寒夕，平叔夜單，安仁倦暑，景陽苦雨，靈運鄴中，士衡擬古，越石感亂，景純詠僊，王微風月，謝客山泉，叔源離宴，鮑照戍邊，太沖詠史，顏延入洛，陶公詠貧之製，惠連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者也。

其於一篇之中只選某幾句以爲評論者，則蕭子顯所謂「張眎擿句褒貶」者，庶幾近之。是又後世句圖之濫觴已！

其取品第的態度者，如鍾嶸詩品即本班固九品論人之法以衡詩，分爲上中下三品，兼據利病；此亦當時所需要。後世如詩壇點將錄等亦多本之。許文玉詩品釋序云：

迨夫典午失馭，海內分崩，南北區號，歷久爲梗，宋書索虜，魏書島夷，肆其譏詞，互相醜詆。至若出使專對，行人之選，尤必誇其才地，祗宰談論，抑揚盡致，以與鄰國爭勝衡長焉。是爲關於政治之批評。又因其時異族雜處，

種類混淆，衣冠之族輒自標異門閥積習，無可移易。以士庶之別而爲貴賤之分，矜己斥人，所爭尤嚴。是則起於風俗之批評。夫競爭正統，擯斥僭號，矜尚門第，區別流品；既悉爲當時政治風俗習見之例，則其他之文化學術，有不蒙其影響者乎？歷覽藝林，前世文士，頗矜作品，鮮事論評；及曹丕褒貶當世文人，肆爲之辭，於是摛筆論文，多以甄別得失爲己任。在梁一代，蕭子顯秉其史論之識以繩文學；劉勰更逞其雕龍之辨，以評衆製；庾肩吾則載書法之上，而品之有九；鍾嶸亦錄五言之詩家而次之爲三。衡鑒之作，於斯稱最矣。

此以文學批評爲受當時政治風俗之影響，自具卓識。但我以爲猶有數點須分別言之，則其義始明。(1)漢魏間的批評風氣重在論才性而不重在矜門第；東晉南朝間的批評風氣，重在嚴流品而不重在伸清議。這種批評風氣的影響到文學方面，在前者可以曹丕典論論文爲代表；在後者可以鍾嶸詩品爲代表。典論所謂『氣之清濁有體，』所謂『齊氣，』所謂『逸氣，』所謂『能之者偏，』都是就才性方面說的；即其褒貶當世文人，亦不過佐其『能之者偏』的例證而已。至於鍾嶸詩品則所謂辨彰清濁，掎摭病利，便專重在褒貶方面而非衡量才性了。(2)即就文學上的批評而言，易言之，即就其專重在褒貶者而言，則鍾嶸與曹氏丕植亦互異其趣。曹丕云：『文人相輕自古而然。……夫人善於自見，而文非一體，鮮能備善。是以各以所長相輕所短。』曹植云：『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一個說作者之難備衆體，一個說批評之絕無標準，蓋他們之所謂批評本不過爲作文之佐助，故以爲『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

淵之利乃可以議於斷割。』至於才不能逮於作者的，便不應詆訶文章，掎摭利病了。至於旣經通才批評以後，便也應按其指示，應時改定。此皆是爲作文而批評，所以應得自知其病而不應相輕所短。明得此意，則知丕植以後，鍾嶸以前之文學批評風氣，大率如此。鍾嶸云：『陸機文賦，通而無貶；李充翰林，疏而不切；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摯虞文志，詳而博贍，頗曰知言。觀斯數家，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至於謝客集詩，逢詩輒取；張騭文士，逢文卽書，諸英志錄，並義在文，曾無品第。』其指斥諸家之失，在『不顯優劣，』在『曾無品題，』則知其自己著書之宗旨正在顯優劣，有品第了。所以我以爲齊梁以前政治風俗上之批評雖盛，而文學上之批評猶未盛；政治風俗上之批評重在於門第，而文學上之批評猶不顯優劣。直至梁時，始會合此二種批評風氣而爲一，於是才有不必以作者自任的批評家，而在於詆訶文章，掎摭利病之後，也不必有『有不善者應時改定』的效用。鍾嶸云：『近彭城劉士章，俊賞之士，疾其淆亂，欲爲當世詩品，口陳標榜，其文未遂。』蓋卽得此種風氣之先者。鍾氏不過繼之而有成耳。

待到批評家的批評太雜，於是想在批評界中立一正確的標準。這正與前者因作者之作品太多而欲在創作界中作一公正的審定一樣。蓋賞鑑的批評其弊有二，卽上文所謂偏於主觀與流爲散漫。劉勰以前一般的批評家大率都不免此弊。

劉勰於知音一篇極言得眞賞之難，或『鑒照明洞而貴古賤今，』或『才實鴻懿而崇己抑人，』或『學不

逐文而僞迷眞，」都是爲賞鑑之累。何况賞鑑的批評，又多溺於偏見，好惡任意，漫無標準呢？他說：

> 夫篇章雜沓，質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圓該。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藉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會己則嗟諷，異我則沮棄，各執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知音篇）

此爲當時批評界缺點之一；所以他想於漫無標準中指出個標準。他先承認批評的可能。知音篇說：

> 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世遠莫見其面，覘文輒見其心。豈成篇之足深？患識照之自淺耳。夫志在山水，琴表其情；况形諸筆端，理將焉匿！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則形無不分，心敏則理無不達。

於是他再提出六觀的方法：

> 是以將閱文情，先標六觀：一觀位體，二觀置辭，三觀通變，四觀奇正，五觀事義，六觀宮商，斯術旣形，則優劣見矣。

這樣，便由賞鑑的批評轉而爲判斷的批評了。

又劉氏以前論文之說，卽非賞鑑的批評，大率亦均不免陷於局部的弊病。文心雕龍序志篇歷舉時人論文之作，都加以批評，而總括一句謂『並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眞的，這亦是當時批評界缺點之一。所以他的

所作是：

若乃論文敘筆，則囿別區分；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上篇以上，綱領明矣。至於剖情析采，籠圈條貫，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崇替於時序，褒貶於才略，怊悵於知音，耿介於程器，長懷序志，以馭羣篇。下篇以下，毛目顯矣。……夫銓敘一文爲易，彌綸羣言爲難。雖復輕采毛髮，深極骨髓，或有曲意密源，似近而遠；辭所不載，亦不勝數矣。及其品評成文，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與異，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務折衷。案轡文雅之場，環絡藻繪之府，亦幾乎備矣。（序志篇）

他一方面要「彌綸羣言」，使局部而散漫者得有綱領；一方面又要「擘肌分理」，使漫無標準者得以折衷。所以他是當時文論之集大成者。文心雕龍之所以成爲條理綿密的文學批評之偉著者以此。南史本傳稱『劉勰博通經論，爲文長於佛理，』或者他的著作所以能如此精密有系統者，也出深受佛學影響之故吧！

第三節　時人對於文學之認識

第一目　形文與聲文

文心雕龍情采篇云：『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五色雜而成黼黻，五音比而成韶夏，五情（疑作性）發而爲辭章，神理之數也。』此處所謂形文聲文，是就廣義言者。若就狹

義言之，則形文是詞藻修飾的問題，聲文又是音律調諧的問題，要之這二者都是文的外形的問題，而不是內質的問題。易言之，是文的問題，而不是質的問題。當此駢文流行的時代，其作風之重視詞藻與音律本是當然的事情，所以批評家的論文標準，每多以詞藻音律爲前提，至少也須文質調劑得中，決不如後世之重質輕文的。蕭統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云：

> 夫文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逮耳。

這正是一種折衷的論調。文心情采篇云：

> 聖賢書辭，總稱文章，非采而何！夫水性虛而淪漪結，木體實而花萼振，文附質也；虎豹無文則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資丹漆，質待文也。

又云：

> 孝經垂典，喪言不文，故知君子常言，未嘗質也；老子疾僞，故稱『美言不信，』而五千精妙，則非棄美矣。

他如徵聖篇謂：『志足而言文，情信而辭巧，迺含章之玉牒，秉文之金科。』序志篇謂：『古來文章以雕縟成體。』都是質不廢文的論調。所以開端原道一篇即言：

> 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彫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至於林籟結響，調如竽瑟；泉石激韻，和若球鍠。故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

形立則章成，聲發則文生』這二語正說明形文聲文的重要。文心有麗辭一篇以講形文，有聲律一篇以講聲文，正與梁元帝金樓子論文以『綺縠紛披，宮徵靡曼』爲文的條件同一意思。綺縠紛披，即形文之謂；宮徵靡曼，即聲文之謂。所以梁簡文帝對於時人之學謝靈運裴子野者深致不滿。其答湘東王書云：

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

吐言天拔，出於自然的，猶須加以修飾之功，纔不致成爲糟粕。至於了無篇什之美者，當然更不宜慕了。所以他下文卽憤慨地說：

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覈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

他對於質陋之不滿意如此。也可知當時文壇批評的風氣了。蕭統文選序云：

若夫椎輪爲大輅之始，大輅寧有椎輪之質？增冰爲積水所成，積水曾微增冰之凜。何哉？蓋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

此說雖本於葛洪之古朴今麗說，但亦極爲重要。他很能說明文學史上所以由質趨文之故，他亦很能說明文學批評史上所以對於文學觀念逐漸重視藻飾之故。明得此意，纔知簡文帝與湘東王書所以對於『吟咏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的文體要稱爲『儒鈍異常』了。

這是時人一般的見解，故其品評作家或作品亦每以此爲判斷的標準。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之評建安文學謂『以情緯文，以文被質。』稱潘陸之作爲『縟旨星稠，繁文綺合。』而評屈宋賈馬謂『英辭潤金石，』論顏謝之作爲『體裁明密。』至於『寄言上德託意玄珠』之作，則稱爲『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了。當時詩品之論東晉談玄之詩亦謂『理過其辭，淡乎寡味，』『詩皆平典似道德論，』有『建安風力盡矣』之歎。文心雕龍明詩篇譏其『辭趣一揆，』時序篇又譏其『困談餘氣。』可知風會所趨，即在劉鍾二氏，其論調見解，亦往往有雖以立異者。因知昔人病鍾嶸列陶潛於中品，列曹操於下品而議其品第未允；又文心雕龍詔策一篇謂『文景以前詔體浮新，武帝崇儒選言弘奧，策封三王，文同訓典，』近人亦每有譏其未當者。實則都由當時品評的標準如此，固非可以後世之好尚議昔人之失當也。

第二目　情文

昔人之論南朝文學者，每議其淫靡而遠於情性，實則由當時一般的作風而言，或不免多犯此病。若由當時一般的批評主張而言，則外形內質同樣重視；或且因欲矯正一時風尚之故，轉有較重於內質的傾向。於此，可知南朝

批評家之深切明瞭文學之含義與性質。

不過所謂「情文」也應有一些區別：熱情騰湧而噴薄出之以流露於文字間者，當時的批評家往往稱之為性情或性靈。這是文學內質的要素之一——情感。情感亦疊而較重意志或經過想像的作用，以委婉抒寫於文字間者，當時的批評界又每稱之為意旨或沈思。這也是文學內質的要素之一——思想。（注）前者主於論性靈，後者主於論意思，二者的性質本不盡同，所以現在不如以情與意分別言之。文心雕龍體性篇云：『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隱以至顯，因內而符外者也。』曰情，曰理，即就內質而分二方面言者。又文心附會篇云：『必以情志為神明，事義為骨髓，辭采為肌膚，宮商為聲氣，然後品藻玄黃，摛振金玉，獻可替否，以裁厥中，斯綴思之恆數也。』辭采宮商是外形的兩方面；情志事義，則是內質的兩方面。

（注）想像亦文學內質的要素之一，不過昔人多混於思想言之。

其主於論性靈者，如梁元帝金樓子以『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且謂『文者惟須情靈搖蕩。』鍾嶸詩品序亦言『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形諸舞詠。』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亦云『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而劉勰之論情性則更為明白。情采篇云：

> 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於情性。故情者文之經，辭者理之緯。經正而後緯成，理定而後辭暢。此立文之本源也。昔詩人篇什，為情而造文；辭人賦頌，為文而造情。何以明其然？蓋風雅

之興，志思蓄憤，而吟詠情性，以諷其上，此爲情而造文也。諸子之徒，心非鬱陶，苟馳夸飾，鬻聲釣世，此爲文而造情也。故爲情者要約而寫眞，爲文者淫麗而煩濫。而後之作者，採濫忽眞，遠棄風雅，近師辭賦。故體情之製日疏，逐文之篇愈盛。故有志深軒冕而汎詠皐壤，心纏幾務而虛述人外；眞宰弗存，翩其反矣。……是以衣錦褧衣，惡文太章；賁象窮白，貴乎反本。

這眞是爲當時人痛下針砭了。所以後人病六朝詩文爲多肉少骨者，實則在當時的批評家亦未嘗不知之而言之。卽如文心雕龍在其他各篇也屢申爲情而造文之旨。如定勢篇云：

夫情致異區，文變殊術，莫不因情立體，卽體成勢也。

章句篇云：

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畛相異而衢路交通矣。

物色篇云：

情以物遷，辭以情發。……是以詩人感物，聯類不窮，流連萬象之際，沈吟視聽之區；寫氣圖貌，旣隨物以宛轉；屬采附聲，亦與心而徘徊。

爲情造文，則章句妥貼，體勢自然，而體物亦自能造極。此是時人論文又所以較重自然之故。

其主於論意思者，如昭明太子之選文標準，以事出於沈思者爲主，而范曄與甥姪書之論文尤極重在意。

> 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韵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

抽其芬芳指詞藻言，振其金石指音律言，必以內質爲主而後始及於外形，其輕重之意顯然可見了。鍾嶸詩品序亦論運意之難云：

> 若專用比興，患在意深，意深則詞躓。若但用賦體，則患在意浮，意浮則文散，嬉成流移，文無止泊，有蕪漫之累矣。

這些又均主意思言者。不過就意思言者，偏於運思，則如文心附會篇所謂「衆理雖繁而無倒置之乖，羣言雖多而無棼絲之亂」者，只成爲修辭上的問題，與文學批評無關。若再論到思想之是否正確，則往往成爲道德的批評，而爲後來復古運動的先聲了。這當於後節論之。

第三目　風格

合形文聲文情文三者而文之形式以立。由文之形式言，語其廣義而說得抽象一些便是風格，語其狹義而說得具體一些，便是體製。

文心雕龍體性篇云：

若總其歸塗，則數窮八體：一曰典雅，二曰遠奧，三曰精約，四曰顯附，五曰繁縟，六曰壯麗，七曰新奇，八曰輕靡。典雅者，鎔式經誥，方軌儒門者也。遠奧者，馥采典文，經理玄宗者也。精約者，覈字省句，剖析毫釐者也。顯附者，辭直義暢，切理厭心者也。繁縟者，博喻釀采，煒燁枝派者也。壯麗者，高論宏裁，卓爍異彩者也。新奇者，擯古競今，危側趣詭者也。輕靡者，浮文弱植，縹緲附俗者也。故雅與奇反，奧與顯殊，繁與約舛，壯與輕乖，文辭根葉，苑囿其中矣。

這是區分風格之始，為後世司空圖詩品所宗。這種體性上的分類本不外二種關係。（1）是由於情文的關係，這卻是作者才性的問題。體性篇云：

賈生俊發，故文潔而體清。長卿傲誕，故理侈而辭溢。子雲沈寂，故志隱而味深。子政簡易，故趣昭而事博。孟堅雅懿，故裁密而思靡。平子淹通，故慮周而藻密。仲宣躁銳，故穎出而才果。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嗣宗俶儻，故響逸而調遠。叔夜儁俠，故興高而采烈。安仁輕敏，故鋒發而韻流。士衡矜重，故情繁而辭隱。觸類以推，表裏必符。豈非自然之恆資，才氣之大略哉！

（2）是由於形文聲文的關係，這又是文章體勢的問題。文心定勢篇云：

勢者乘利而為制也。如機發矢直，澗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圓者規體，其勢也自轉；方者矩形，其勢也自安。文章

> 體勢，如斯而已。是以模經爲式者，自入典雅之懿；效騷命篇者，必歸艷逸之華；綜意淺切者，類乏醞藉；斷辭辨約者，率乖繁縟。譬激水不漪，槁木無陰，自然之勢也。

至混合作者才性與文章體勢而未易分別指出者，則劉勰文心所指出的「神」與「氣」二字是。劉勰論「神」與「思」，並言故多指與到神來之神，與後世之言神化妙境者不盡同。此蓋遠出莊子，而近受文賦的影響。神思篇云：

> 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關鍵將塞，則神有遯心。是以陶鈞文思，貴在虛靜；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致以懌辭。然後使玄解之宰，尋聲律而定墨；獨照之匠，闚意象而運斤。

其言與養氣篇所言相近。養氣篇云：

> 率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此性情之數也。……故淳言以比澆辭，文質懸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中寫鬱滯，故宜從容率情，優柔適會。若銷鑠精膽，蹙迫和氣，秉牘以驅齡，灑翰以伐性；豈聖賢之素心，會文之直理哉！且夫思有利鈍，時有通塞。沐則心覆，且或反常；神之方昏，再三愈黷。是以吐納文藝，務在節宣；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捨，勿使壅滯。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筆以卷懷。逍遙以針勞，談笑以藥勸，常弄閑於才鋒，賈餘於文勇。

蓋此節所言的「氣」，是指氣機之流暢言。由人言，是氣旺神酣之時；由文言，是機神洋溢之境。故神昏則氣便不暢，而謂氣亦正所以養神。至於神旺氣暢之時，搦管作文，佳思絡繹，奔赴筆下，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止，則便是所謂神化的境界了。神思篇云：

> 至於思表纖旨，文外曲致，言所不追，筆固知止，至精而後闡其妙，至變而後通其數，伊摯不能言鼎，輪扁不能語斤，其微矣乎！

此便是入於化境，非言語所得形容者。

至其言「氣」，除養氣一篇，其義與「神」相近外，大率亦本於曹丕所言而益為闡發。體性篇云：

> 才有庸儁，氣有剛柔。……辭理庸儁，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寧或改其氣！

此則本於曹丕清濁之說而易言之者。蓋曹丕混言才氣，故可以清濁稱之；劉氏則以才與氣析言之，故以庸儁稱才，而以剛柔稱氣。此亦後人研析愈精之處。後來桐城派論文好以陽剛陰柔為言，其義雖出於易，要亦未嘗不受劉氏此言之影響也。風骨篇云：

> 若豐藻克贍，風骨不飛，則振采失鮮，負聲無力。是以綴慮裁篇，務盈守氣，剛健既實，輝光乃新。

又云：

> 若瘠義肥辭，繁雜失統，則無骨之徵也。思不環周，索莫乏氣，則無風之驗也。昔潘勖錫魏，思摹經典，羣才韜筆，

乃其骨髓峻也。相如賦仙，氣號凌雲，蔚爲辭宗，乃其風力遒也。能鑒斯要，可以定文。茲術或違，無務繁采。故魏文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論孔融則云『體氣高妙，』論徐幹則云『時有齊氣，』論劉楨則云『有逸氣，』公幹亦云：『孔氏卓卓，信含異氣，筆墨之性，殆不可勝。』並重氣之旨也。

此則又專就氣勢之表現於作品者言之，後來唐宋文人之以語勢論氣者宗之。蓋由人言則是氣質的問題，由文言則是氣勢的問題，二者也正是互有關係的。我嘗謂駢文家好言音律與藻飾，散文家好言文氣，各有偏勝亦各有流弊。而劉氏所言：

夫翬翟備色而翾翥百步，肌豐而力沉也；鷹隼乏采而翰飛戾天，骨勁而氣猛也。文章才力有似於此。若風骨乏采，則鷙集翰林，采乏風骨，則雉竄文囿，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筆之鳴鳳也。

則重在二者之互濟。此節於駢文家之流弊與古文家之論文主張，亦已微露其端倪。蓋當時一般批評家所持之折衷論調，殆無不爲由駢入散之樞紐者。

第四目　體製

對於文學作品再進爲具體一些的認識，於是便成爲當時文章體製分類的問題了。文章體製之分類，一方面須重在形式之歧異，一方面又須顧到性質之相同，歸納的與分析的方法宜同時並用，本不容易求其完善無疵。所以後人對於時人文體之分類每多訾議，似乎也有些過當的。大抵時人對於文體的分類，也自有其迫切的需要。我

們試看後漢書諸傳所載，如馮衍傳謂：『所著賦，誄，銘，說，問交，德誥，慎情，書記說，自序，官錄，說策五十篇。』崔駰傳謂『所著詩，賦，銘，頌，書，記，表，七依，婚禮結言，達旨，酒警合二十一篇。』蔡邕傳於舉其著述之後，更謂『所著詩，賦，碑，誄，銘，讚，連珠，弔，箴，論議，獨斷，勸學，釋誨，敘樂，女訓，篆勢，祝文，章表，書記凡百四篇傳於世。』備舉諸目，其繁瑣爲何如！後世於此種雜著，舉以納諸文集之中，則因其形體而定其體製，正亦極需要用這種歸納的方法者。

不過時人對於文體的研究，雖重在類的歸納，而同時又注意到分析的細密。我們只看曹丕僅分四科，陸機便別爲多體，摯虞流別則分目益繁，其對於文體之分目，已有愈析愈細之趨勢。故至此期如蕭統文選劉勰文心雕龍之論文體，其區目乃更爲詳密。此蓋由於總集欲網羅衆體，不得不詳爲分析以備列其目；亦正如書之典謨訓誥之類，以形式之微異而各別其名稱也。摯虞之撰文章流別集，晉書稱其『類聚區分』。所謂類聚云者，歸納的方法也；區分云者，分析的方法也。是故，我們對於時人文體之分類，只能說是篳路藍縷，在歸納方面不能如後世之精嘗，在分析方面亦難如後世之詳備而已。必欲尋垢索瘢而譏議之，不免苛刻一些。

時人分類之最爲後世所詬病者，莫過於蕭統之文選。文選別文體爲三十九種，其目爲：「賦」「詩」「騷」「七」「詔」「册」「令」「教」「文」（策問）「表」「上書」「啓」「彈事」「牋」「奏記」「書」「移」「檄」「對問」「設論」「辭」「序」「頌」「贊」「符命」「史論」「史述贊」「論」「連珠」「箴」「銘」「誄」「哀文」「哀策」「碑文」「墓誌」「行狀」「弔文」「祭文」諸稱。章學誠詩

敍下論之云：

賦先於詩，騷別於賦。賦有問答發端，誤爲賦序，前人之議文選，猶其顯然者也。若夫封禪美新典引，皆頌也。稱符命以頌功德，而別類其體爲符命，則王子淵以聖主得賢臣而頌嘉會，亦當別其體爲主臣矣。班固次韻，乃漢書之自序也。其云述高帝紀第一，述陳項傳第一者，所以自序撰書之本意，史遷有作於先，故已退居於述爾。今於史論之外，別出一體爲史述贊，則遷書自序，所謂作五帝紀第一，作伯夷傳第一者，又當別出一體爲史作贊矣。漢武詔策賢良，即策問也。今以出於帝制，遂於策問之外，別名曰詔，然則制策之對，當離諸策而別名爲表矣。賈誼過秦，蓋賈子之篇目也。因陸機辨亡之論，規仿過秦，遂援左思『著論準過秦』之說，而標體爲論矣。魏文典論，蓋猶桓子新論，王充論衡之以論名書耳；論文，其篇目也。今與六代辨亡諸篇同次於論，然則昭明自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其例不收諸子篇次者，豈以有取斯文，即可裁篇題論而改子爲集乎？七林之文，皆設問也。今以枚生發問有七，而遂標爲七，則九歌九章九辯，亦可標爲九乎。難蜀父老，亦設問也。今以篇題爲難，而別爲難體，則客難當與同編，而解嘲當別爲嘲體，賓戲當別爲戲體矣。文選者，辭章之圭臬，集部之準繩，而淆亂蕪穢，不可殫詰。

此文攻擊蕭選之分體，誠無完膚。但文體流變，錯綜變化，本極複雜，巧立名目，固非所宜，概仍舊稱，亦有未當。蕭選論體，誠不免失之過碎，但較之以前陸機摯虞諸家，實爲詳審，也未嘗不是文學批評史上的一種進步。曹丕云：『夫文

本同而末異，』今欲論文章之體製，固不得不重在末而求其異也。

至於文心雕龍之論文章體製便更較精審。大抵是書上編自辨騷以下，均為論述文體之作。就其所言，蓋別文體為下列諸種：

騷

詩（四言　五言　三六雜言　離合　回文　聯句　共韻）

樂府（鼓吹　鐃歌　挽歌）

賦

頌・贊

祝・盟（詛呪　詰咎　祭文　哀策）

銘・箴（碣）

誄・碑

哀・弔

雜文（對問　七發　連珠　典　誥　誓　覽　略　篇　章　曲　操　弄　引　吟　諷　謠　詠）

諧・隱（謎語）

——以上文——

史傳（策　紀　傳　書　表　志　略　錄）

諸子

論・說（議　說　傳　注　贊　評　序　引）

詔・策（命　誥　誓　令　制　策書　制書　詔書　戒敕　教）

檄・移（誓　露布　文移　武移）

封禪

章・表（上書　章　奏　表　議）

奏・啓（彈事　封事）

議對（駁議　對策　射策）

書・記（表奏　奏書　奏記　奏牋　譜　籍　簿　錄　方術　占　式　律　令　法　制　符　契　券　疏　關　刺　解　牒　狀　列　辭　諺）

——以上筆——

蓋劉氏分析文章體製，其大旨有三：(1)以文筆分類。劉師培中古文學史云『即雕龍篇次言之，由第六迄第十五：以明詩，樂府，詮賦，頌贊，祝盟，銘箴，誄碑，哀弔，雜文，諧隱諸篇相次，是均有韻之文也；由第十六迄於第二十五，以史傳，諸子，論說，詔策，檄移，封禪，章表，奏啟，議對，書記諸篇相次，是均無韻之筆也。此非雕龍隱區文筆二體之驗乎？』案此言亦有一部分的理由，劉勰論文固不主張文筆的分別，(說詳後)但其篇次却是隱區韻散二體的。(2)以性質別體，如頌讚，祝盟，銘箴，誄碑，哀弔，諧隱，論說，詔策，檄移，章表，奏啟，議對，書記諸篇均以其性質之相近者合而論之。(3)無可分者則別為一類。如有韻之文則於對問，七發，連珠等等舉以納入雜文一類，無韻之筆如譜，籍，簿，錄，方術，占，式等等又舉以附於書記一類。大綱細目，羅羅清疏，關於文體之辨析，蓋已大體確定其基礎矣。

劉氏文心為論文之著，與蕭統文選之僅為總集者有別，故於辨析文體之外，更復加以闡說。(註)今就其諸篇所論，則其闡說之點，大率亦不外數端：(1)關於各體之釋義，如『詩者持也』(明詩)『賦者鋪也』(詮賦)『銘者名也』(銘箴)『頌者容也』(頌讚)『誄者累也，碑者埤也』(誄碑)之類均是以聲訓者。又如『樂府者聲依永，律和聲也。』(樂府)『箴者，所以攻疾防患，喻箴石也。』(銘箴)『啟者開也，高宗云，啟乃心沃朕心，取其義也。』(奏啟)凡此之類，又是以義解者。(2)論述各體之體制，如論頌則謂『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頌讚)論誄則謂『傳體而頌文，榮始而哀終。』(誄碑)論箴銘則謂『箴誦於官，銘題於器，名目雖異，而警戒實同。箴全禦過，故文資確切；銘兼褒讚，故體貴弘潤。』(銘箴)凡斯諸端，皆就其

體製而嚴爲之辨者。(3)論述各體之源流。此則各篇皆然，而頌讚一篇所言更爲詳備，他不僅推到頌之原始，謂出於『帝嚳之興咸墨爲頌，』并且再論及野誦之變體，再論及橘頌之覃及細物，以明其流變。至於下文再說『班傅之北征西巡，變爲序引，馬融之廣成上林（疑作東巡）雅而似賦，』則且就頌之混於他體者言之。(4)評述各體之代表作家及代表作品。此在各篇中亦往往見之，如哀弔篇云：『至於蘇愼（疑作順）張升，並述哀文，雖發其情華，而未極心實。建安哀辭，惟偉長差善，行女一篇，時有惻怛。及潘岳繼作，實鍾其美。觀其慮善辭變，情洞悲苦，敍事如傳，結言摹詩，促節四言，鮮有緩句，故能義直而文婉，體舊而趣新，金鹿澤蘭，莫之或繼也。』此四項中前(1)(2)項同於陸機文賦而疏解較詳，第(3)項同於摯虞流別，而論述較備，第(4)項又略同魏文典論李充翰林而評斷較允。所以即就文體之研究而言，文心雕龍亦集以前之大成矣。

〔註〕蕭統文選序亦有關於文體釋義之語，如稱頌『所以游揚德業，褒讚成功』是。有論述文體體製之語，如『論則析理精微，銘則序事清潤』是。有論述文體源流之語，如論詩四言五言之區，三字九言各體之興，是。有評述各體作家之語，如論賦則謂『荀宋表之於前，賈馬繼之於末，述邑居則有憑虛亡是之作，戒畋遊則有長楊羽獵之制』是。

第五目　文筆之區別

明了上述各節時人對於文學之認識，則知時人本於兩漢所謂「文章」或「文辭」一語，而有文筆或辭筆之分，也是當然的情形了。清代梁光釗文筆考謂：

沈思翰藻之謂文，紀事直達之謂筆。其說昉於六朝，流衍於唐，而實則本於古。孔子贊易有文言；其爲言也，比偶而有韻，錯雜而成章，燦然有文，故文之。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其爲書也，以紀事爲褒貶，振筆直書，故筆之。文筆之分當自此始。（學海堂集卷七）

此說近於附會，未敢苟同。謂爲偶然的巧合則可，若謂孔子或孔子時對於文筆二字已有如六朝人這樣區分的觀念，恐未必然。

「文」「筆」區分最早當始於晉時，今案晉書所載，如

文筆議論有集行於世。（蔡謨傳）

以文筆著稱。（習鑿齒傳）

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志，岳因取次比，便稱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樂廣傳）

其文筆數十篇行於世。（文苑張翰傳）

所著文筆十五卷傳於世。（文苑曹毗傳）

桓溫重其文筆，專綜書記。（文苑袁弘傳）

晉書雖出唐人所纂，但此等處或即仍於晉人著述亦未可知。不過晉人雖有文筆之稱而於其區分之點仍不曾明

言。晉書文苑成公綏傳，謂『所著詩賦雜筆十餘卷行於世。』以詩賦雜筆對舉，似乎也以詩賦爲文，似乎也與前舉各條之稱文筆者同例。至宋時顏延之論其子之各得父風，謂『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宋書顏竣傳）則於文筆始分別言之。而范曄獄中與甥姪書亦云：

> 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

則且於對舉之外，更復述其異點。文心雕龍總術篇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此均是以有韻無韻爲別，由形式體製之異，以爲文筆區分之點者。

至如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所云：

> 古人之學者有二，今人之學者有四。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文。今之儒，博窮子史，但能識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謂之學。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而學者率多不便屬辭，守其章句，遲於通變，質於心用。學者不能定禮樂之是非，辯經教之宗旨，徒能揚榷前言，抵掌多識，然而挹源知流，亦足可貴。筆，退則非謂成篇，進則不云取義，神其巧惠，筆端而已。至如文者，維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蕩。

此以通經而明其理者謂之儒，博窮子史而但識其事者謂之學，情靈搖蕩流連哀思者謂之文，不便爲詩善爲章奏之流謂之筆。（註）這樣區分纔着眼在性質上之差異，較之范曄實是更進一步了。

【註】金樓子又云：「任彥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

大抵時人對於文筆之分，本有這二重意義，所以當時於「文筆」之外，更有「辭筆」「詩筆」之稱。詩筆之分似乎只能就文章體製言，而辭筆之稱則又似可兼就文學性質言。南史孔珪傳云：「與江淹對掌辭筆；」陳書岑之敬傳云：「博涉文史，雅有辭筆；」此言辭筆之例。梁書劉潛傳云：「三筆六詩；」南史沈約傳云：「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任昉傳云：「時謂任筆沈詩；」而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亦謂：「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復稱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爲文章冠冕，述作楷模；此言詩筆之例。旣稱詩筆，則只是有韻無韻的分別，而與文學性質無關。至於所謂辭筆，則顧名思義，其含義似可較詩筆爲廣。蓋「文」「辭」二字其義相近，說文云：「辭，說也」（據廣韻引）說者釋也，故得引申爲篇章之義。（註一）又說文云：「詞，意內而言外也。」——所謂意內而言外者，謂意不可見，以言形容其意也。形容其意，則或擧譬妙喩以達之，或鋪采摛文以飾之，故詞章詞藻諸字本當作「詞」。而秦漢以來「詞」「辭」二字混用不別，故「辭」字遂亦兼有藻飾之義。所以由「辭」之引申義言，則與「文」之稱文章者同；由「辭」之假借義言，則又與「文」之訓錯畫爲近。是知六朝所謂「辭筆」云者，正與「文筆」字異義同。（註二）所以言「詩筆」，則與時人文筆說中之第一義同，即專就文章體製言者；言「辭筆」，則又與時人文筆說中之第二義同，蓋又兼就文學性質言者。

【註一】劉師培論文雜記云：「近世以來，正名之義久湮，由是於古今人之著作，合記事析理抒情三體，咸目爲古文辭。不知辭字本義訓爲

獄訟。……凡古籍書辭文辭諸字，古字莫不作嗣，特秦漢以降誤詞爲辭耳。』說似過泥。

【註二】阮福文筆對云：『按辭亦文類。周易繫辭，漢儒皆謂繫辭爲卦爻辭，至今從之。……其謂之繫辭者，繫屬也；繫辭，即屬辭，猶世所稱屬文爲屬。然則辭與文同乎？曰否。孟子曰：「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辭；」趙岐注云：「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是文者，音韻鏗鏘，藻采振發之稱；辭特其句之近於文，而異乎直言者耳。』說亦未是。

是故以文筆對舉，則雖不忽視文章體製之異點，而更重在文學性質之分別；其意義與近人所謂純文學雜文學之分爲近。以詩筆對舉，則只是文章體製之差異，其意義又與普通所謂韻文散文者爲近。由文學性質言，純文學與雜文學均爲文學中的一種，故時人以「文學」爲其共名，而「文」與「筆」爲其別名。金樓子言『今之學者有四，』而文與筆即爲此四學中之二種，蓋此二種即是文學之分名也。由文章體製言，則韵文散文均爲文章之一體，故又以「文」爲其共名，而「詩」與「筆」爲其別名。（註）文心雕龍云：『夫文以足言，理兼詩書；』（總術篇）范文瀾講疏謂：『文字之用本所以代表言語，有韵之言語爲詩，無韵之言語爲書，筆之於紙，皆謂之文；』所解極是。據是，可知由文學性質言，或由文章體製言，其意義各不相同如此。

【註】王瑤辨文筆說謂：『文筆之名總言則別，散言則筆亦稱文，』較阮元諸人爲近是。

蓋六朝文筆之分，實源於兩漢文學文章之分。漢時以文學稱學，以文章稱文。此正是金樓子立言篇所謂：『古之學者有二，』金樓子云：『夫子門徒轉相師受，通聖人之經者謂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長卿之徒，止於辭賦，則謂之

文」可知彼所謂「古之學者」云者，正指漢時而言。至後來有通經而明其理者，有博窮子史而但識其事者，則於「學」或「文學」一名中間復析而爲二了；有吟咏風謠流連哀思者，有不使爲詩善爲章奏者，則復於「文」或「文章」一名中間也析而爲二了。此又金樓子所謂『今之學者有四。』所以漢人所謂「文學，」既可以指通其理者，（如以儒術爲文學是。）又可以指識其事者；（如以掌故爲文學是。）而其所謂「文章，」也可以指詔書律令，（史記儒林傳『詔書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際，通古今之義，文章爾雅，訓辭深厚。』）也可以指辭賦。（漢書公孫弘傳贊『劉向王褒以文章顯。』）故知所謂沈思翰藻與紀事直達者，在漢時初無分別。觀漢書公孫弘傳又云『文章則司馬遷相如，』以遷與相如並稱爲能文章，則其無文筆之分可知。（註一）所以六朝文筆之分，不過由於時人對於文學之認識，遂從漢人文章一語再加區分而已。（註二）

〔註一〕劉天惠文筆考謂『馬遷長於敍事，而傳贊但稱其史才，不得混能文之譽。』此說亦未確。

〔註二〕北史李昶傳『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此亦「文章」一稱足該「文」「筆」之證。

然而六朝對於文學觀念認識之清楚，猶不止此。當時不僅於文章一語，分出文與筆而爲二，而且更能（1）離文學於學術之外，使之不復兼「博學」一義；（2）合文學與文章爲一，使之轉近於「文章」一義。

離文學於學術之外，故「文學」一名之含義，至是始與近人所用者相合。觀宋文帝之立四學，命雷次宗立儒

學，何尙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玄立文學，其後明帝立總明館亦分儒道文史陰陽爲五部，可知當時文學實能獨成一科，而不復視爲學術之總稱了。

合文學與文章爲一，故不復有兩漢所謂「文學」「文章」之分。蓋在當時以「文學」爲文章之事，而以「文章」爲文學的作品。北史李昶傳云『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此所謂文章之事即指文學。梁書簡文帝紀云：『引納文學之士，賞接無倦，恆討論篇籍，繼以文章；』此所謂文章，即指文學的作品。

文學既能獨成一科，故就於文學之性質言，自當區爲文筆二種。稽諸當時史籍，其稱「文學」一名殆無不可兼指此二種者。所以當時不僅「文」得稱爲文學，即「筆」也得稱爲文學。魏書祖瑩傳云『瑩以文學見重，而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北周書蘇亮傳云『亮博學好屬文，善章奏，河內常景謂人曰秦中文學可以抗山東者，將此人乎？』是均筆稱文學之證。不僅能文者稱文學之士，即擅筆者也得稱文學之士。梁書文學劉苞傳稱：『高祖即位，引後進文學之士，吳郡陸倕張率並以文藻見知，』而陸倕則以筆馳譽者。據是可知「文」與「筆」都是「文學」之分名。

文章既指文學之作品，而當時文集即所以彙萃此作品者。因此，文集中自得包含詩筆二體。此所以蕭統文選，兼輯詩筆，而劉勰文心亦總論韵散。南史沈約傳稱：『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筆，』而梁書沈約傳却謂：『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同樣句例，而一稱筆，一稱文章，蓋亦以文可賅筆，故得稱筆爲文章耳。陸游老學庵筆

記謂『南朝詞人謂文爲筆，』其致誤之由，蓋即以此。阮元諸人知其誤，而獨不舉梁書是條爲例，豈亦由不得其解，故避而不舉歟！（註）

〔註〕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云：『文章詩筆乃是佳事，』於詩筆對舉之外再冠以文章二字，蓋亦混共名別名而並言之耳。

明文學爲文與筆之共名，則知文苑傳中之人物即所謂文學之士，不妨兼擬文與筆。梁書鮑泉傳『兼有文筆，』周書劉璠傳『兼善文筆，』是其例也。（註）明「文」或「文章」爲詩與筆之共名，則知文集中之所薈萃即所謂文章著述，又不妨兼賅詩與筆。北史蕭圓肅傳云：『撰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亦其例也。

〔註〕侯康惠氏後漢書補註跋謂『六朝以有韻爲文，無韻爲筆，兩漢文章惟詔策奏議無韻，其密爾自娛者則皆有韻。文苑諸子不與漢廷大事，故文多筆少，蔚宗因以文苑名篇，後人沿其稱而微昧其義矣。』此亦曲說。

這是時人對於「文」「筆」區分的意義，（註一）最可看出時人對於文學之認識。抑時人不僅分別文筆之意義，並且於文筆之外更有「言」或「語」一名，以見筆與直言也有分別。此則昔人每混而言之，故阮元阮福劉天惠諸人皆以直言爲筆。（註二）實則考時人所用，筆之與言，正不相同。文心雕龍總術篇引顏延年說云：『筆之爲體，言之文也：經典則言而非筆，傳記則筆而非言。』此節定筆與言之分別，正極分明。蓋此就筆與「言」言，並非就筆與「文」言。筆雖不同於「文」，但以有雜文學的性質，所以爲「言之文」。至於經典，則時人本習以文學視之，（註三）所以爲「言」而非「筆」。世說新語云『王長史宿構精理，并撰其才藻，往與支（道林）語。……敘致作數百語，

自謂是名理奇藻；又云：支道林通莊子漁父篇作七百許語，敍致精麗，才藻奇拔；」（並見文學篇）其所謂「語」亦「言」也。蓋當時「筆」與「言」「語」自有區別。觀晉書樂廣傳可知。樂廣傳云：

廣善清言而不長於筆。將讓尹，請潘岳爲表。岳曰：『當得君意。』廣乃作二百句語述己之旨。岳因取次比，便稱名筆。時人咸云：『若廣不假岳之筆，岳不取廣之旨，無以成斯美也。』

是又爲當時史籍之以「筆」與「言」對舉之例。所謂「因取次比」，則所以文其言耳。這正是顏延年所謂『筆之爲體言之文也』之最適宜的佐證。所以「文」「筆」均是文學的「文」之分名，而「言」與「語」則便不同了。時人對於文學的性質，辨析到如此，眞是值得注意的一件事。

〔註一〕阮元諸人之解文筆，以偶語韻體者爲文，以直言散行者爲筆。其說未安，曾於拙著文筆與詩筆一文中辨之。載燕大國文學會出版學潮期刊第二期。

〔註二〕阮元文韻說云：『今人所便單行之語，極其奧折奔放者乃古之筆，用古之女也。』阮福文筆對云：『筆從聿；聿述也。故直言無文采者爲筆。史記春秋筆則筆，是筆爲據事而書之證。』劉天惠文筆考云：『凡茲稱筆，皆爲直言敍述之辭。』

〔註三〕惟劉勰論文主宗經徵聖，而顏之推亦有文出五經之說，爲稍異耳。或以爲經典如詩，正爲有韻之文，不知顏氏所言，亦只就其大概言之，非可泥求。

對於文學的性質既如此辨析得清楚，所以更有連帶而起的集部的著錄，也有一述的必要。章學誠文史通義

文集總序云：

荀勗中經有四部，詩賦圖讚與汲冢之書歸丁部，王儉七志以詩賦爲文翰志而介於諸子軍書之間，則集部之漸日開，而尚未居然列專目也。至阮孝緒撰七錄，惟技術佛道分三類，而經典記傳子兵文集之四錄，已全爲唐人經史子集之權輿。是集部著錄實昉於蕭梁，而古學源流至此爲一變。

其謂集部著錄，始於蕭梁，甚是。不過他謂『古學源流至此爲一變，』似有無限慨惜之意，則不盡然。蓋此時文學與學術既已分離，章氏由學術言故稱至此一變；我人若以文學爲立脚點而言，則此變正是演進的變，決不至如章氏一樣有江河日下之歎也。大抵自楚以後始有專工於文之人；自西漢以後，始有專載詩賦之略；自東漢以後，始有專列文苑之傳；自晉以後始有裒萃選輯之集；自南朝以後而集部始別爲著錄。逐漸演進而文學之性質始亦逐漸明顯。我們須知後世文集所以變得與學術淆亂者，乃後世文筆不分之故，乃後世文學與學術不分之故，固不得以是詬病此時之集部也。

第四節　沈約與音律說

第一目　人工的音律之制定

在此時期所提出的問題，有值得注意者，即爲（1）音律說，可以沈約爲代表；（2）歷史的觀念，可以鍾嶸爲代表；（3）文與道的問題；可以劉勰爲代表。茲依次論之：

中國文字之特質，是單音與孤立，本極適合於音律的講究，所以當時的文壇，既能利用文字孤立的特質，以成爲駢儷，當然也要進一步再利用單音的性質，以諧其「韵」「和」了。

大抵最初的音律，都是指自然的音律。在詩樂未分之時，其音律即存在樂的中間；在詩樂既分之後，其音律只能存在辭的中間，文辭中間音調的和諧，昔人非不知之。司馬相如所謂『一宮一商，』陸機所謂『音聲之迭代，』皆已洩其秘了，不過他們只能說明其然而不能言其所以然，所以至多只能說明自然的音調，而不足以制定人工的音律。迨到文字音韵的方面，有魏李登的聲類，晉呂靜的韻集之後，於是中國文字單音的特質，遂因以顯明，而足以供文學上的應用了。

宋范曄與甥姪書中有一節云：

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會了此處，從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爲空談。

這種話便較司馬相如與陸機爲切實得多。所以王融論音律謂惟范曄謝莊差能識之。（說見鍾嶸詩品序）雖則他所謂從根本中會了的實證，不曾明白說出，但他確是想把自然的音調制爲人工的音律。

至於齊梁之間，反切之應用既廣，而雙聲叠韵之辨別遂嚴，聲韵之著作既多，而平上去入之分析以定。於是遂有所謂「永明體」應運以生了。南史陸厥傳謂：

永明時，盛爲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瑯琊王融以氣類相推轂。汝南周顒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將平上去入四聲，以此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五字之中音韻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註）

〔註〕唐封演聞見記亦云：「周顒好爲體語，因此切字皆有紐有平上去入之異。永明中，沈約文辭精拔，盛解音律，遂撰四聲譜。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大行。

所以所謂「永明體」云者，不過是人工的音律之應用於文辭而已。當時人本這種人工的音律以撰製文辭，亦本於這種人工的音律以批評文辭。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

自茲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

又云：

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霸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胸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

或議其蕪音累氣，或稱其音律調韻，都是以音律爲中心而批評者。所以音律之說實至永明間而始定。

第二目　所謂四聲八病

「永明體」的領袖自當首推沈約。梁書沈約傳稱『約撰四聲譜，以爲在昔詞人，累千載而不寤，而獨得胸衿，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又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論亦謂『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所以人工的音律實創始於沈約。今欲推究當時音律說的主張即可就沈約所言考之。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

> 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

根據此說，可知他音律說的原理，是在於『宮羽相變，低昂舛節。』這『宮羽相變低昂舛節』的主張，固不能算是他的獨得之秘。陸機文賦早已說過：『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若說得再早一些，則如黃侃所謂：

> 爲文須論聲律，其說始於魏晉之際，而遺文粲然可見者，惟士衡文賦數言。……細審其旨，蓋謂文章音節，須令諧調。本之詩傳『情發於聲，聲成文爲音』之說，稽之左氏『琴瑟專壹誰能聽之』之言，故非士衡所創獲也。（文心雕龍札記）

但是本於這個『宮羽相變，低昂舛節』的原則，而規定種種的條件，以爲遵守之定律者，則實肇端於沈約。這些條件是什麼？在沈約說是「聲」「病」，照劉勰說是「韻」「和」。四聲即是「韻」的問題。劉勰所謂『同聲相應謂之韻』也。怎樣使之同聲相應呢？此即永明體的條件所謂『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者是。四聲之辨，雖始於周顒，而四聲之制韻，至沈約而始定。八病即是「和」的問題。此又劉勰所謂『異音相從謂之和』

者。怎樣又是異音相從呢？則又永明體的條件所謂『五字之中音韵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者是矣。宮商之論雖亦發自王融，（見鍾嶸詩品）而八病之規定則亦至沈約而始行。所以齊梁之聲律實肇自沈約，而劉勰和之。叶韵取其同聲相應，擣聲取其異音相從，能如是纔盡音律之能事。所以沈約說：

作五言詩者善用四聲，則諷詠而流靡；能達八體，則陸離而花潔。（答北魏甄琛書日本僧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引。）

我們須知昔人行文未嘗不知叶韵之同聲相應，但析韵細密，而以四聲定韵不可增減，則始於永明。我們又須知昔人行文也未嘗不知一宮一商之異音相從，但區分「平頭」「上尾」「蜂腰」「鶴膝」「大韵」「小韵」「旁紐」「正紐」八病而歸於『五字之中音韵悉異，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之原則中則亦始於永明。所以人工的音律說，在沈約誠可謂獨得之秘，在當時也可謂空前之論。

不過韵的關係昔人猶多知之，和的問題實自此時始起。所以劉勰文心雕龍聲律篇謂：

韵氣一定，故餘聲易遣；和體抑揚，故遺響難契。屬筆易巧，選和至難；綴文難精，而作韵甚易。

亦可知「和」的問題素不講究，所以『選和至難』了。而且韵氣一定，所以雖以四聲制韵而猶易遵循；和體抑揚其條件至多，所以更覺得是遺響難契了。沈約所謂『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韵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云云，完全是指「和」的問題。「永明體」的條件重在「聲」「病」二者，而彼所論

矧，獨偏於「病」的方面，亦可知作韻之易而選和之難了。

選和既難，所以對於所謂八病云者，在當時已不必絕對的避忌。南史陸厥傳所舉亦只「平頭」「上尾」「蠭腰」「鶴膝」四種，正以以下四種——「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已可不必盡避耳。（註一）馮班鈍吟雜錄云：「沈侯云，『一篇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詳此則八病俱去，亦不在曲折分其名目也。」此言極是。所以我以爲昔人之詮釋八病，其弊有二：其一則講得太泥。自日人遍照金剛之文鏡秘府論以及李淑之詩苑類格，僞託梅聖俞之續金針詩格，下逮魏慶之詩人玉屑，王世貞藝苑卮言等等，其弊均在求之過詳，所以楊愼已議其拘滯，馮班且闢其謬妄。大抵此等說法均受後來律詩的影響。後人舉律詩體裁以附會聲病，所以不厭其求詳耳。清代吳鎮所著八病說則專用以繩律者。「鄙薔齋說」無論如何講得細密，要與「永明體」之聲律不盡相同。（註二）

〔註一〕文鏡秘府論亦謂「此四病但須知之，不必須避。」

〔註二〕吳氏所著，本梅聖俞續金針詩格而加以考訂。其自序云：「東陽八病初亦論古詩耳。今專以繩律，使之聲調和諧，詎不妙哉！」書載松花庵全集中。

其又一則講得太易。如周春杜詩雙聲疊韻譜中解釋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云：「案宮羽相變者，指母而言，即雙聲也。低昂互節者，指韻而言，即四聲也。若前有浮聲者，謂前有雙聲疊韻也；則後須切響者，謂下句再有雙聲疊韻

以配之也。一簡之內音韻盡殊者，謂雙聲疊韻對偶變換也。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者，謂平上去入四聲調諧也。後人不知，轉謂宜避雙聲疊韻之說。夫雙聲疊韻乃天籟所必有，何可避哉！』此以雙聲疊韻講「和」的問題，稍涉牽強。蓋詩中之用雙聲疊韻，說得早些則三百篇與楚辭固已有之，說得後些則杜甫近體律詩中亦屢屢用之，何足以見「永明體」聲律之特徵。至如當時王融諸人之撰雙聲疊韻詩，則屬一時游戲，正與後世皮日休陸龜蒙諸人所作同例。所以還知之宜避雙聲疊韻，正是當時「永明體」應有的條件。周氏謂『夫雙聲疊韻乃天籟所必有，何可避哉！』殊不知「永明體」之考究聲律，對於雙聲疊韻的連語，固不必避，但除掉連語以外，則凡同聲同韻者，正以避去爲宜。此則所謂『音韻盡殊』也。

大抵「永明體」之所謂八病，可分爲四組言之。平頭上尾是一組，蠭腰鶴膝是一組，大韻小韻是一組，旁紐正紐又是一組。平頭上尾是同四聲之病，蠭腰鶴膝是同清濁之病。大韻小韻是同韻之病。旁紐正紐是同紐之病。茲分別言之於下：

一、平頭上尾　文鏡秘府論解平頭云：『上句第一二兩字是平聲，則下句第六七兩字不得復用平聲。餘三聲皆爾，不可不避。三聲者，謂上去入也。』又云：『平頭：第一句上字，第二句上字，第一句第二字，第二句第二字不得同聲。詩失者：『今日良宴會，懽樂難具陳。』蓋謂「今」「懽」皆平聲，「日」「樂」皆入聲也。又云：『上句第一字與下句第一字同平聲不爲病，同上去入聲一字即病。』其解上尾云：『五言詩中第五字不得與第十

字同聲。惟連韻者非病。』案此解良是。後來律詩，大率循此規律。惟有不可不知者，「永明體」之聲律，與「律體」之核之於粘綴之間者畢竟不同。故由「平頭」言，不必完全遵守。考沈約詩如行園云：『寒瓜方臥隴，秋菰亦滿陂。』宿東園云：『陳王鬬雞道，安仁採樵路。』上下兩句句首二字均屬平聲，則是第一說不必遵也。又如其庭雨應詔詩云：『出空事可圖，入庭倍難賦。』「出」「入」並爲入聲，「空」「庭」並爲平聲，則是第二說亦不必遵也。又如其八關齋詩『得理未易期，失路方知險。』遊金華山詩云：『若蒙羽駕迎，得奉金書召。』「得」「失」「若」「得」並爲入聲，則是第三說又不必遵也。由「上尾」言，其律較嚴。此即沈約所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故齊梁以來鮮有犯者。但是也與律體不同。鄭漢勛五韻論解『兩句之內角徵不同』二句云：『猶言兩句住句之字一平一仄耳。』此就律體言則然。永明體則不爾也，永明體避「上尾」之病於兩句住句之字不必平仄相間，也有以上去入三聲相間者。如沈約宿東園詩中『東郊豈異昔，聊可閑余步』；『槿籬疏復密，荊扉新且故。』諸句皆然。要之平頭上尾，在避同聲之病；爲後來沈宋研順聲勢，調協平側之所本。所以後人猶多遵守，而益加細密。此史通雜說所以謂『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平頭上尾，尤忌於時』也。

三、蠭腰鶴膝　文鏡秘府論之解「蠭腰」云：『五言詩一句之中，第二字不得與第五字同聲；言兩頭粗，中央細，如蠭腰也。』解鶴膝云：『五言詩第五字不得與第十五字同聲；言兩頭細，中央粗，似鶴膝也。』案此說之非，劉大白螢詩新話八病正誤條業已辨之。今考沈約詩，如出重闈和傅昭云：『魯連揚一策，陳平出六奇。』「平」

「奇」皆平聲。三日侍林光殿曲水宴應制云：『將御遺風軫，遠侍瑤臺會；』「侍」「會」皆去聲。則知所謂蠭腰，未必指此也。又如其和劉雍州繪博山香爐詩『巖閒有佚女，垂袂似含風；翠鳥飛若未已，虎視鬱餘雄。』「女」「已」並屬上聲。少年新婚爲之詠云：『託意眉閒黛，申心口上朱；莫爭三春價，坐喪千金軀。』「黛」「價」並屬去聲。則知所謂鶴膝，亦未必指此也。李天生之論杜甫詩律謂其於一三五七句用仄字，上去入三聲必隔別用之，莫有疊出者。（見朱彝尊寄查德尹編修書）此似有類於文鏡祕府論之所謂「鶴膝，」實則此亦只是杜老詩律之細，固非所以論「永明體」之聲律也。不過劉大白雖指出此說之誤，而以爲「蠭腰」是指第三字與第八字同聲的病，「鶴膝」是指第四字與第九字同聲的病，則臆測無據；蓋其病仍在泥於律體的規則以解「永明體」之聲律耳。蔡寬夫詩話云：『所謂蜂腰鶴膝者，蓋又出於雙聲之變。若五字首尾皆濁音，而中一字清，即爲蜂腰；首尾皆清音，而中一字濁，即爲鶴膝。』此說未知其所本，然其以字之清濁解蠭腰鶴膝，竊以爲與當時聲律之論，最爲近是。顧自來論八病者罕見稱引，（註）則以泥於後世等韵家之所謂清濁，於是對於蔡說不得其解耳。須知蔡氏之所謂清濁，即沈約之所謂輕重，劉勰之所謂飛沈，而後世之所謂平側。平側之分本亦由於同紐的關係。所以蔡氏謂『蓋又出於雙聲之變。』仇兆鰲杜詩詳註亦宗蔡說，並舉例云：『今案張衡詩「邂逅承際會；」是以濁夾清，爲蜂腰也。如傅玄詩「徽音冠青雲；」是以清夾濁，爲鶴膝也。』此說極當。蓋最能申蔡說者。文心雕龍聲律篇云：『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疊即韵與紐的問題，飛沈則清

與濁的關係。以濁夾清則是蠭腰，其病在「沈」，所謂「沈則響發而斷」也。以清夾濁則為鶴膝，其病又在「飛」，所謂「飛則聲颺不還」也。沈約云『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即指不犯「平頭」「上尾」「蠭腰」「鶴膝」四病而言，而於「蠭腰」「鶴膝」二病為尤甚。蓋此即從『宮羽相變，低昂舛節』的原則得來。若使清多濁少，或濁多清少，則所謂『琴瑟專一，誰能聽之』。此所以為聲律之病也。聲之清濁本極易知，所以說得容易一些，則鍾嶸所謂『蜂腰鶴膝閭里已具』也。說得難些，則又沈約所謂『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也。（見答陸厥書）明蠭腰鶴膝因於清濁平側的關係，則知後來律詩所以粘綴於平側之間者，蓋即以此了。

【註】馮班鈍吟雜錄引之而未闡說，惟仇兆鰲舉例明之。

三、大韻小韻　文鏡秘府論解「大韻」云：『五言詩若以「新」為韻，上九字中更不得安「人」「津」「鄰」「身」「陳」等字。』解「小韻」云『除韻以外而有迭相犯者。』紹虞案此二病，沈約諸人雖避之不嚴，（註）然確為永明體聲病之一。蓋即劉勰所謂『疊韻雜句而必睽』也。周春杜詩雙聲疊韻譜解此語云：『雙聲隔字而每舛者，雙聲必連二字，若上下隔斷，即非正雙聲；疊韻雜句而必睽者，疊韻亦必連二字，若雜於句中，即非正疊韻。雙疊得宜，斯陰陽調和。』其言殊有語病。蓋永明體之聲律並不主張用雙聲疊韻。沈約云：『五字之中音韻悉異』，所謂音韻悉異者，以鄒漢勛五韻論所言為最妙。鄒氏謂：『音目同紐，韻謂同類。言五字詩一句之

中，非正用重言連語，不得復用同韻同音之字。犯之卽爲病。』此解極是。蓋劉勰所謂雙聲疊韻卽是指同紐同韻之字，並非指雙聲疊韻之連語。文鏡秘府論云：『若故爲疊韻兩字一處，於理得通，如「飄颻」「窈窕」「徘徊」「周流」之等，不是病限。若相隔越，卽不得耳。』所以永明體之聲律，其對於雙聲疊韻之連語，不過謂不足爲病，並非謂當於此求和也。

【註】如沈約和竟陵王抄書詩『張騫宮遺槩，名山多逸詞，』「遺」「詞」是犯大韻。庾肩吾詩：『中池所以綠，待我泛紅光。』「中」「紅」是犯小韻。

四、旁紐正紐　馮班鈍吟雜錄之解「旁紐」云：『郭忠恕佩觿云：「雕序之爲敦序，則又依乎旁紐。」按徵音四字，端透定泥，敦字屬元韻端母，雕字蕭韻端母，則是旁紐者雙聲字也。』其解「正紐」云：『九經字樣云：「紐以四聲；」是正紐者，四聲相紐，東董凍督是也。』此說亦是。（註）文鏡秘府論之解旁紐，亦謂爲隔字雙聲，其解正紐亦謂『凡四聲爲一紐。』蓋此亦是「永明體」聲病之一；卽劉勰所謂『雙聲隔字而每舛』也。不過大韻小韻旁紐正紐四者，卽在「永明體，」亦非必嚴避耳。

【註】周春杜詩雙聲疊韻譜駁馮氏說，非是。

明「永明體」之所謂聲病，然後知後世律詩之格律平側，卽自此出。不僅如此，卽在文的方面，如唐文之漸成四六，亦未嘗不與此有關。文鏡秘府論之論諸病，不單限於詩的方面，也且舉賦頌銘誄以及各種雜筆爲例，可知聲病之

說，實是駢文家所遵守的音律。劉勰云：

凡聲有飛沈，響有雙疊。雙聲隔字而每舛，疊韻雜句而必睽；沈則響發而斷，飛則聲颺不還，並轆轤交往，逆鱗相比，迂其際會，則往蹇來連。其爲疾病，亦文家之吃也。（聲律）

蓋駢文家的音律說，與散文家的文氣說，實是同樣的性質。散文家利用其氣勢之灝瀚流利，所以不致「吃」；駢文家使不注重音律的諧和，如何而不爲文家之吃呢！劉勰又云：

聲畫妍蚩，寄在吟詠，吟詠滋味，流於字句，字句氣力，窮於和韻。（聲律）

可知駢文家的音律說，亦所以調其吟詠的氣勢而已。

第三目　音律說之反響

音律說既起，同時有討論和反對二種主張。其討論者因沈約說：

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宋書謝靈運傳論）

他稱昔人爲此秘未覩，所以陸厥與之書云：

范詹事自序：『性別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尙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

大旨欲宮商（南齊書作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則揣情謬於玄黃，擿句著（南齊書著作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韻（南齊書作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帖之談，操末續顚之說，興玄黃於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苟此秘未覩，茲論爲何所指邪？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屆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獨誣其一了一合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今古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整，詠史無虧於東主；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於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

者乃可言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南史陸厥傳）

案陸厥所言不外數端：(1)古人文辭既有會合音律之處卽古人未嘗不明音律。(2)昔人亦有論及音律之處，不得云此秘未覩。(3)昔人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故不重在音律的考究。(4)一人之文思且有遲速工拙，則於音律當然不免有或合或不合之處。實則陸厥所云，是指自然的音調；沈約所云是指人工的音律；根本卽不是同一事物。陸厥云：『魏文屬論深以淸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所謂淸濁，所謂體勢，均指氣言。淸濁屬於才氣，體勢關於語氣。才氣所流露者爲情調，語氣之抑揚者爲音調。這些均無規律可定，所以是自然的。沈約云：『五色相宜，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此則就樂律言。蓋他由於樂的音節，以求文章的音節，此劉勰所謂由外聽以求內聽，所以爲人工的音律了。阮元文韻說云：『休文所矜爲剏獲者，謂漢魏之音韻乃暗合於無心；休文之音韻乃多出於意匠也。』（硏經室續集三）此言極是。惟其爲自然的音調，所以以人工的音律衡之便不免有或合或不合之處；縱有會合，亦不得謂爲明瞭人工的音律；而且縱有論及音律之處，亦只能明其然而不能羅舉其條例。(註)

〔註〕文心雕龍聲律篇云：『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摛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絃，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聽難爲聰也。故外聽之易，弦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蓋外聽指樂言，有客觀的標準，所以較易；內聽指文言，是自然的音調，所以不免或合或不合。迨到人工的音律制定以後，則也有客觀標準，便易於遵守了。

至於謂昔人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則固已自己供出，音律說並非昔人注重的問題了。必明這一點，以窺沈約

的答書，然後不致如近人所謂『勇於自信遂致目無古人』了。（見陳鍾凡中國文學批評史）沈約的答書云：

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以累萬之繁，配五聲之約，高下低昂，非思力所舉，（全梁文「舉」作「學」）又非止若斯而已。（全梁文而已下有也字）十字之文，顚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於此者乎？靈均以來，未經用之於懷抱，固無從得其髣髴矣。若斯之妙，而聖人不尙，何邪？此蓋曲折聲韻之巧，無當於訓義；非聖哲立言之所急也。是以子雲譬之雕蟲篆刻，云「壯夫不爲」。自古詞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故鄙意所謂『此秘未覩』者也。以此而推，則知前世文士便未悟此處。若以文章之音韻，同弦管之聲曲，則美惡妍蚩，不得頓相乖反；譬猶子野操曲，安得忽有闡緩失調之聲？以洛神比陳思他賦，有似異手之作。故知天機啓則律呂自調，六情滯則音律頓舛也。士衡雖云『煥若溜錦，』寧有溜色江波，其中復有一片是衛文之服！此則陸生之言即復不盡者矣。韻與不韻，復有精麤、輪扁不能言之，老夫亦不盡辨。（全梁文「言」下無「之」字「辨」下有「此」字。）

此即完全重在人工的音律立論，所以謂自古詞人雖知五音之異而所昧實多。我們須知人工的音律雖即從自然的音調蛻變而來，但決不能混爲一談。這是學術上進化的階段不可不辨的。（註）

【註】小學家如錢大昕之以聲韻的研究不起於六朝，亦是偏見。

至其反對音律論者，則在當時梁武帝已不好四聲；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終

不遵用。（見梁書沈約傳）不過這還不是一種明顯的反對的主張；惟鍾嶸詩品始有反對聲病之論。嶸之言曰：

> 昔曹劉殆文章之聖，陸謝爲體二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嘗試言之古曰詩頌皆被之金竹，故非調五音無以諧會。若『置酒高堂上』『明月照高樓』爲韵之首。故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韵入歌唱。此重音韵之義也，與世之言宮商異矣。今既不被管絃，亦何取於聲律邪？齊有王元長者，嘗謂余云：『宮商與二儀俱生，自古詞人不知之；唯顏憲子乃云律呂音調，而其實大謬。唯見范曄謝莊頗識之耳。』嘗欲造知音論，未就。王元長創其首，謝朓沈約揚其波，三賢或貴公子孫，幼有文辯，於是士流景慕，務爲精密，襞積細微，專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眞美。余謂文製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利，口吻調利，斯爲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具。

他所反對的理由不外二端：（1）不被管絃，又何取聲律！（2）文多拘忌傷眞美。實則此二點均偏而不全，他只知其一而未知其二；詩既不被管絃，則當然與音樂脫離關係；因其與樂分離之故，於是有的確是比較的可以無取於聲律者，古詩是也；有的却因是而一變樂的音調以爲詩的音律者，近體詩是也。這二種都可成爲詩之一體，難分輕重，何得必以聲律爲非邪？至於因於音律之束縛而傷其眞美，則惟淺才庸音，始不免此病耳。若使美女艷妝而復嫻於禮節，豈不更增其美邪？所以因音律之束縛而傷其眞美者，固屬難免；因音律之考究而增其眞美者，亦未嘗沒有。我並非忽視文藝上的自然美而重視人工美，不過我們對於沈約鍾嶸，實無所用其左右袒；而且就於中國文字的

特性而言，覺得文學史上和文學批評史上要經過這麼一個階段，爲不可免之事實耳。紀昀謂『齊梁文格卑靡，惟此學獨有千古』（見文心雕龍聲律篇評）這猶是較爲公平的論調。

梁書庾肩吾傳云：『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韵，彌尙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梁簡文帝蕭綱）與湘東王書論之曰：『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爲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似乎正中鍾嶸所論之病；但潮流所趨，莫之能遏，固非演進至完成近體詩律不會停止。且所謂浮疏闡緩云者，其弊尙不僅專在音律方面。音律與自然有時亦適以相成，非必主自然者定斥音律也。文心雕龍聲律篇云：『夫吃文爲患，生於好詭，逐新趣異，故喉脣糺紛，將欲解結，務在剛斷；左礙而尋右，末滯而討前，則聲轉於吻，玲玲如振玉；辭靡於耳，纍纍如貫珠矣。』蓋言亦惟自然，始能使聲律奏其美也。

明音律之應用於文辭，爲不可免之事實；然後知所謂「永明體」雖未獲遽定於當時，終得推行於後世。故至梁陳之間始以四聲制韵不可增減了；（註一）至初唐之世，始更回忌聲病，約句準篇，以定爲近體詩格了。（註二）趨向如此，正在急轉直下之秋，固非一二持反對論者所可得而阻止也。

〔註一〕顧炎武音論云：『今考江左之文，自梁天監以前多以去入二聲通用，以後則若有界限，絕不相通。是知四聲之論，起於永明，而定於梁陳之間也。』

〔註二〕新唐書文苑傳『魏建安後迄江左，詩律屢變。至沈約庾信以音韻相婉附，屬對精密。及宋之問沈佺期又加靡麗，回忌聲病，約句準

篇，如錦繡成文，學者宗之，號爲沈宋。」

第九節　鍾嶸與歷史的批評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條之論詩品云：

詩品之於論詩，視文心雕龍之於論文，皆專門名家，勒爲成書之初祖也。文心體大而慮周，詩品思深而意遠。蓋文心籠罩羣言，而詩品深從六藝溯流別也。論詩論文而知溯流別，則可以探源經籍，而進窺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矣。此意非後世詩話家流所能喻也。

他這樣恭維詩品，固然是就於史家的立場而言，但詩品之能溯流別，在當時的文學批評上，確也有值得注意的地方。

在初期的文學批評，本不免與文學史相混。即如當時論文諸作，鍾嶸的詩品序可作爲五言詩的演變史觀，沈約的宋書謝靈運傳論可作爲漢魏六朝的文學史觀，而文心雕龍時序一篇更是規模粗具的文學史了。混文學史與文學批評而爲一，固是不很妥當，但正因着眼在文風之流變，於是（1）文學進化的觀念，（2）文學流別的窺測，（3）文學與歷史的關係，——這些問題，都成爲當時重要的問題了。

文學進化的觀念自王充葛洪以來，已屢言之，而在此期爲尤甚。梁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云：

習玩爲理，事久則瀆。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

永異。江左風味，盛道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不盡除；謝混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

「若無新變不能代雄，」這實是文學進化論重要的觀點。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亦深斥當時模擬的古典文學之非。其言云：

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遺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

這也是當時趨向新變的主張。所以梁書庾肩吾傳稱：『齊永明中，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南史徐摛傳稱『摛屬文好爲新變，不拘舊體。』前一個新變成爲「永明體，」後一個新變成爲「宮體。」後人每謂六朝文學傾向古典，殊不知他們不過襲用古典文學的技巧，至其文學之作風，固無時不在新變演進中也。鍾嶸詩品序云：

夫四言，文約意廣，取效風騷，便可多得。每苦文繁而意少，故世罕習焉。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故云會於流俗。豈不以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爲詳切者耶？

他以五言爲勝於四言，便是文學進化的見解，與李白所謂『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見本事詩引）云云的復古論調，便大相懸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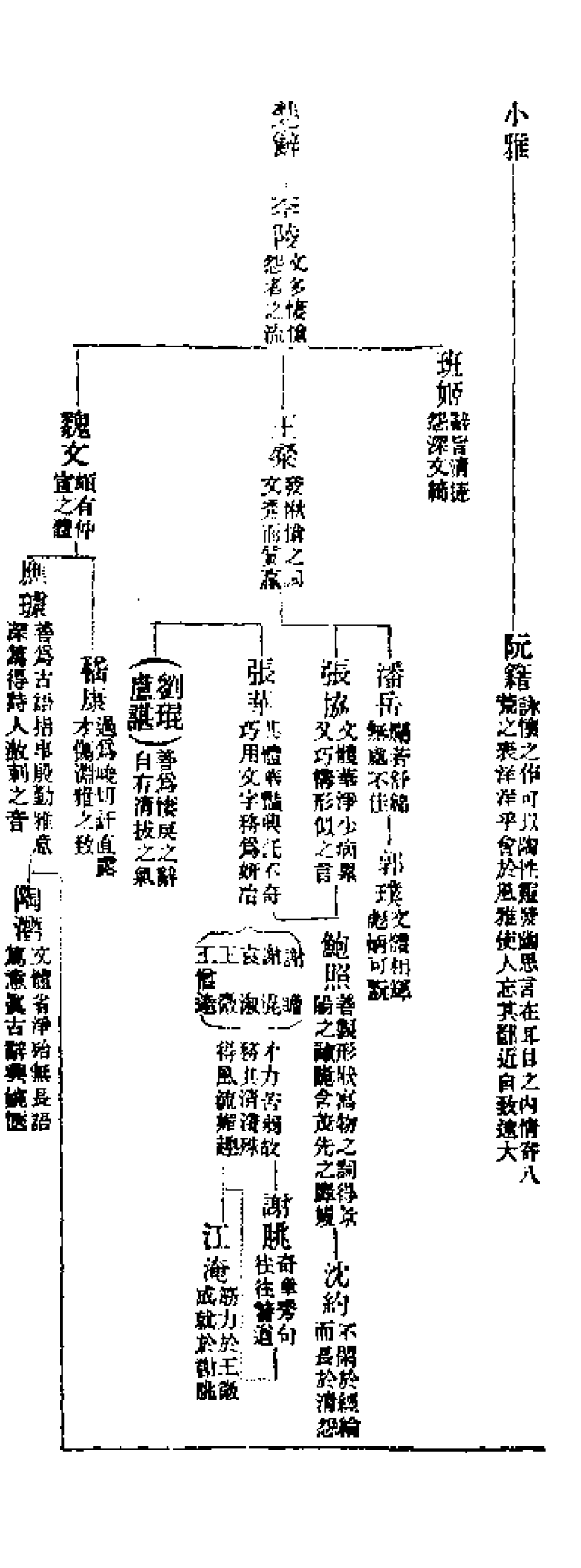
【註】文心明詩篇云：『若夫四言正體，則雅潤爲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語亦公允。

至於文學流別的窺測，以鍾嶸詩品論之最詳。其論各家之作，往往謂其源出某人或某體。此說在現在看來似不免多附會可議之處，但他品評各人並不是一一必欲強指其源流，則其所指出者或亦未必無據也。今據詩品所言，列爲一表，以明其源流之關係。

詩品派別表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 國風
  - 古詩（驚心動魄　一字千金）
    - 劉楨（仗氣愛奇　動多振絕）
      - 左思（文典以怨　頗爲精切）
  - 曹植（情兼雅怨　體被文質）
    - 陸機（才高詞贍　舉體華美）
      - 顏延之（尚巧似，體裁綺密，情喻淵深）
        - 謝超宗　邱靈鞠　劉祥　檀超　鍾憲　顏則　顧則心（得士大夫之雅致）
    - 謝靈運（雜有景陽之體，故尚巧似，而逸蕩過之，頗以繁富爲累）



（說明）（1）未明言其源出於某而某言其關係者用虛線表之（2）數人合敘者用括弧別之（3）顯然可考者用～～號別之（4）各人時代悉依原書編列（5）間錄評語以證源流之說

論文學作品而這樣泥於家數講求流派，本不免求合附會之處。所以葉夢得石林詩話即譏其陶潛出於應璩之非。但詩品之論應璩稱其『善為古語』，論陶潛稱其『篤意眞古』，則其所以系陶潛於應璩者或即在此。當時

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亦云：

今之文章，作者雖衆，總而爲論，略有三體：一則啟心閑繹，據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疎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艷，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衞，斯鮑照之遺烈也。

此綜論同時作家，猶且各說其源流的關係，可知此亦當時文學批評的一種方法。

至其論文學與歷史的關係者，則文心時序一篇言之甚詳。他說：

時運交移，質文代變，古今情理，如可言乎？……故知歌謠文理，與世推移，風動於上，而波震於下。

所以是篇所舉種種例證，都是時序篇贊所謂『質文沿時』一語的注脚。在劉氏之先，謝靈運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序其品評文人卽重在際遇方面。其評王粲云：『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評陳琳云：『袁本初書記之士，故述喪亂事多。』評徐幹云：『少無宦情，有箕潁之心，故仕世多素辭。』評劉楨云：『卓犖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評應瑒云：『汝潁之士，流離世故，頗有飄薄之歎。』評阮瑀云：『管書記之任，故有優渥之言。』評曹

植云：『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遊，然頗有憂生之嗟。』此雖並不重在說明其歷史的關係，然已很能着眼於文學與環境的影響。故知劉氏所言，不過據此以推到論世的方面耳。

第六節　劉勰與復古思想的萌芽

以前說過，南朝的文學批評，有許多主張已爲後世古文家種下根苗。這是不可不注意的事。所以我們須知以後的復古運動，不必至唐代而情形始顯，且亦不必至北朝而風氣始轉。其關捩所在，也卽在南朝的批評界。

大抵南朝的批評界，因當時文體之極端偏於藻飾，音律或數典隸事，也頗想矯正其弊。其消極的主張，不過欲阻止這狂瀾，對於當時的文體加一種修正。其積極的主張，充其量足以根本推翻此期的文學。所謂復古運動的萌芽，以後者爲尤甚。

消極的主張，可以鍾嶸爲代表。其反對音律之論已見前述。至其反對數典隸事的傾向，更可見其崇尙自然之旨。如云：

> 夫屬詞比事，乃爲通談。若乃經國文符，應資博古；撰德表奏，宜窮往烈。至於吟詠情性，亦何貴用事！『思君如流水，』旣是卽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淸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觀古今勝語，多非補假，皆由直尋。顏延謝莊，尤爲繁密，於時化之。故太明泰始中，文章殆同書鈔。近任昉王元長等，辭不貴奇，競須新事。爾來作者，寖以成俗。遂乃句無虛語，語無虛字，拘攣補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

人，詞既失高則宜加事義。雖謝天才，且表學問，亦一理乎？

詩品中評顏延之云『喜用古事彌見拘束』；評任昉云：『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皆本於這種見解。但他於潘岳陸機皆列上品，則於咀嚼英華，厭飫膏澤者，也未嘗不以爲文章之淵泉。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云：『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亦云：『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這文學上的自然論，實是當時文學的對症妙藥。其反對更甚者則有梁裴子野雕蟲論。

古者四始六藝，總而爲詩，既形四方之風，且章君子之志。勸美懲惡，王化本焉。後之作者，思存枝葉，繁華蘊藻，用以自通。若悱惻芳芬，楚騷爲之祖；靡漫容與，相如和其音。由是隨聲逐影之傳，棄指歸而無執。賦詩歌頌，百帙五車。蔡邕等之俳優，揚雄悔爲童子。聖人不作，雅鄭誰分？其五言爲詩家，則蘇李自出，曹劉偉其風力，潘陸固其枝柯。爰及江左，稱彼顏謝。箴繡鞶帨，無取廟堂。宋初迄於元嘉，多爲經史；大明之代，實好斯文。高才逸韻，頗謝前哲，波流相向，滋有篤焉。自是閭閻年少，貴遊總角，罔不擯落六藝，吟咏情性，學者以博依爲急務，謂章句爲專魯，淫文破典，斐爾爲功。無被于管絃，非止乎禮義。深心主卉木，遠致極風雲。其興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隱而不深，討其宗途，亦有宋之遺風也。若季子聆音，則非興國；鯉也趨室，必有不敢。荀卿有言：『亂代之徵，文章匿而采』，豈近之乎？（全梁文五十三）

梁書本傳謂『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制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

之。」則知他不僅是批評的主張如此，即其作風也是如此，直是反駢的健將了。甚怪簡文帝以其「了無篇什之美」，而肆詆之矣。

積極的主張則重在內質方面，或主於學以尙眞，或主於道以尙善。無論偏主那一端，總不免爲雜文學——筆——張目；所以唐人遂以筆爲文了。蓋儒家思想的傳統觀念本深入於人心，即在這駢文盛行的時代，也依舊有他的潛勢力存在。

辨別文筆最爲清楚的梁元帝，其文學批評應當偏主於文了。但其金樓子立言篇云：

潘安仁清綺若是，而評者止稱情切，故知爲文之難也。

曹子建陸士衡皆文士也。觀其辭致側密，事語堅明，意匠有序，遺言無失，雖不以儒者命家，此亦悉通其義也。

偏觀文士略盡知之。

至於謝元暉始見貧小，然而天才命世，過足以補尤。任彥升甲部闕如，才長筆翰，善緝流略，遂有龍門之名，斯亦一時之盛。

其攻擊當時之文士，亦以不通儒學之故。立言篇又云：

夫今之俗，搢紳稚齒，閭巷小生，學以浮動爲貴，用百家則多尙輕側，涉經記則不通大旨，苟取成章，貴在悅目。龍骨豕足，隨時之義；牛頭馬髀，強相附會，事等張君之弧，徒觀外澤；亦如南陽之里，難就窮檢矣。

又云：

夫翠飾羽而體分，象美牙而身喪，蚌懷珠而致剖，蘭含香而遭焚，膏以明而自煎，桂以蠹而成疾，並求福而得禍。衣錦尙褧，惡其文之著也。

這種論調又完全是反時代的思想了。

即在以沈思翰藻爲標準而定文選的蕭統，其認識文學應當最爲深切了，然於陶淵明集序稱其「白璧微瑕，惟在閑情一賦」則又完全是道德的批評且不知美人香草的寄託了。

作文心雕龍的劉勰，其於文學批評可謂深有見地了。但他是曾夢執丹漆之禮器，而欲敷讚聖旨的，所以他的論文是以爲「不述先哲之誥，無益後生之慮，」於是不自覺地始終囿於傳統的文學觀了。原道篇云：「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徵聖篇云：「是以子政論文，必徵於聖，稚圭勸學，必宗於經。」宗經篇云：「故文能宗經，體有六義：一則情深而不詭，二則風淸而不雜，三則事信而不誕，四則義直而不回，五則體約而不蕪，六則文麗而不淫。」這些話都是十足的儒家文學觀。故其序志篇云：

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原，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尙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

劉勰何以會有這種復古思想呢？原來這也從當時批評界之歷史的文學觀得來的。時人論文，主張新變。劉氏也是如此。其通變篇云：

> 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名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名理有常，體必資於故實；通變無方，數必酌於新聲。故能騁無窮之路，飲不竭之源。然綆短者銜渴，足疲者輟塗，非文理之數盡，乃通變之術疏耳。

他也很能說明新變之理。但是他的結論，則與時人不同。他說：

> 是以九代詠歌，志合文則。黃歌斷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廣於黃世；虞歌卿雲，則文於唐時。夏歌雕墻，縟於虞代；商周篇什，麗於夏年。至於序志述時，其揆一也。暨楚之騷文，矩式周人；漢之賦頌，影寫楚世；魏之策制，顧慕漢風；晉之辭章，瞻望魏采。推而論之，則黃唐淳而質，虞夏質而辨，商周麗而雅，楚漢侈而艷，魏晉淺而綺，宋初訛而新。從質及訛，彌近彌澹。何則？競今疏古，風昧氣衰也。（通變篇）

所以他再說明通變之法謂：

> 今才穎之士，刻意學文，多略漢篇，師範宋集。雖古今備閱，然近附而遠疏矣。夫青生於藍，絳生於蒨，雖踰本色不能復化。桓君山云『予見新進麗文，美而無採，及見劉揚言辭，常輒有得。』此其驗也。故練青濯絳，必歸藍蒨。矯訛翻淺，還宗經誥，斯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檃括乎雅俗之際，可與言通變矣。（通變篇）

則完全由新變而變爲復古了。蓋歷史事實恆成爲循環式的進化，所以新變的結果往往成爲復古，而復古的主張反能成爲革新因此知道唐人主張古詩古文而都能有所成就者，蓋即以此。

第三章　北朝之文學批評

第一節　北朝文學批評之風氣

唐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云：

> 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勝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也。若能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

在於當時創作界的作風如此，在於當時批評界的主張也是如此。江左則重視音律，偏主藻飾；河朔則言尚質樸，體歸典制。又其儒林傳序云：

> 大抵南北所爲章句，好尚互有不同。……南人約簡，得其英華；北學深蕪，窮其枝葉。考其終始，要其會歸，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在於當時學術界的風氣如此，在於當時文學批評界的思想也是如此。南人則深能認識文學之性質，北人則不免

泥於文學之面貌；一個得其英華，一個不過得些枝葉。

南北文學與其文學批評，何以會如此不同呢？則以（1）地域上的關係，邢劭蕭仁祖集序云：『自漢逮晉，情賞猶自不諧；江北江南，意製本應相詭。』則南北好尚之雅有異同，固是不足怪的。後來在政治方面是北力南漸，於是文學之作風與文學批評的思想遂均不免受政治勢力之影響，而北優南絀。這在唐代的古文運動，最可看出其關係。（2）習俗上的關係。南人務新，北人篤古，所以北學每存兩漢之餘風，南人則深受魏晉之影響。此不僅文學如此，卽就經學或書法言，莫不皆然。承兩漢餘風者大率質樸；受魏晉影響者大率輕浮。此又南北作風與批評所由不同之故。（3）政治社會上的關係。南朝半壁江山，尙能偏安，而北朝則時多戰事，不遑寧處，所以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云：『既而中州板蕩，戎狄交侵，僭僞相屬，生靈塗炭，故文章黜焉。其能潛思於戰爭之間，揮翰於鋒鏑之下，亦有時而間出矣。……然皆迫於倉卒，牽於戰陣，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於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

所以北朝之文學批評，（1）不會如南朝之發達。（註一）其可以看出北朝批評之主張者，倒不在文學批評而在文學作品。周書蘇綽傳云：『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太祖欲革其弊，因魏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作大誥奏行之。』（註二）這是一節文學史上的史料，卻正可看出當時文學批評轉移的風氣。（2）不會如南朝之純藝術的傾向。魏書溫子昇傳稱『楊遵彥作文德論，以爲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昇彬彬有德素。』則知顏之推『自古文人多陷輕薄』之論，也自是北人習見的論調。卽當王褒庾信入周以後，後

生莫仰，咸相愛戴，與蘇綽等倡言復古者互成派別以相排詆；而最後結果，也只成爲聊以折衷調和的文質論。此種爭論，今均不傳；所可知者，惟周書柳虯傳謂『時人論文體者有今古之異。虯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云云。則在此寥寥數語中也可窺出其論旨之大概了。

【註一】北朝無關於文學批評之著作。魏書邢臧傳稱其『撰古來文章幷敍作者氏族號曰文譜未就病卒』，亦非純粹批評之書。

【註二】趙翼廿二史劄記後周詔誥用尚書體條備舉其例。

第二節　顏之推

北朝文學，當推由南入北之王褒庾信；北朝文學批評，也當推由南入北之顏之推。顏氏所著，有顏氏家訓，其文學觀念，全在文章一篇中。論其大旨，頗與劉勰文心雕龍所言爲近。如論文章之起原云：

夫文章者原出五經，詔命策檄，生於書者也；序述論議，生於易者也；歌詠賦誦，生於詩者也；祭祀哀誄，生於禮者也；書奏箴銘，生於春秋者也。

此與文心雕龍宗經篇所云『論說辭序，則易統其首；詔策章奏，則書發其源；賦頌歌讚，則詩立其本；銘誄箴祝，則禮總其端；紀傳移檄，則春秋爲根』正相類似。其論文章之作用云：

朝廷憲章，軍旅誓誥，敷顯仁義，發明功德，牧民建國，不可暫無。（一本作施用多途）至於陶冶性靈，從容風諫，入其滋味，亦樂事也。

此又與文心原道篇所云『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者相同。其論文章之要素云：

凡爲文章猶乘騏驥，雖有逸氣，當以銜策制之，勿使流亂軌躅，放意塡坑岸也。文章當以理致爲心腎，氣調爲筋骨，事義爲皮膚，華麗爲冠冕。

這又與文心附會篇所謂『必以情志爲神明，事義爲骨髓，辭采爲肌膚，宮商爲聲氣』者相類。這些論調，都近於爲雜文學張目，故其論文人之修養，乃以陷於輕薄爲戒。

自古文人多陷輕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體貌容冶，見遇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王褒過章僮約；揚雄德敗美新；李陵降辱夷虜；劉歆反覆莽世；傅毅黨附權門；班固盜竊父史；趙元叔抗竦過度；馮敬通浮華擯壓；馬季長佞媚獲誚；蔡伯喈同惡受誅；吳質詆忤鄉里；曹植悖慢犯法；杜篤乞假無厭；路粹隘狹已甚；陳琳實號麤疏；繁欽性無檢格；劉楨屈强輸作；王粲率躁見嫌；孔融誕傲致殞；楊修丁廙扇動取斃；阮籍無禮敗俗；嵇康凌物凶終；傅玄忿鬬免官；孫楚矜誇凌上；陸機犯順履險；潘岳乾沒取危；顏延年負氣摧黜；謝靈運空疏亂紀；王元長凶賊自貽；謝玄暉侮慢見及。凡此諸人，皆其翹秀者，不能悉紀，大較如此。至於帝王，亦或未免。自昔天子而有才華者，唯漢武、魏太祖、文帝、明帝、宋孝武帝，皆負世議，非懿德之君也。自子游、子夏、荀況、孟軻、枚乘、賈誼、蘇武、張衡、左思之儔，有盛名而免過患者，時復聞之，但其損敗居多爾。每嘗思之，原其所積，文章之體，標舉興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於持操，果於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事愜

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志凌千載，自吟自賞，不覺更有旁人。加以砂礫所傷，慘於矛戟；諷刺之禍，速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

此種意思，也從文心雕龍程器一篇得來。程器篇中歷舉文士之疵，殆與此節相同；不過程器篇謂『人稟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則猶是較爲公允的論調耳。以其如此，所以顏氏的文學觀，也多偏於折衷，而成爲復古思想的萌芽。如云：

今世相承，趨末棄本，率多浮豔。辭與理競，辭勝而理伏；事與才爭，事繁而才損。放逸者流宕而忘歸，穿鑿者補綴而不足。時俗如此，安能獨違？但務去泰去甚爾！必有盛才重譽，改革體裁者，實吾所希。

古人之文，宏材逸氣，體度風格，去今實遠；但緝綴疎朴，未爲密緻爾！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宜以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並須兩存，不可偏棄也。

這種兩存的主張，實是此時風氣轉移中應有的論調。這種主張，在後世文體的改變上猶沒有多大影響。因爲他以爲今之辭調也可保存的，所以充其量只成爲典正的風格（註）而不會變駢儷的體製。至於詩，則融合古之製裁與今之辭調，正是極適宜的改革方法。且看他所舉較具體的例：

沈隱侯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讀誦，三也。』邢子才常曰：『沈侯文章用事，不使人覺，若胸臆語也。深以此服之。』祖孝徵亦嘗謂吾曰：『沈詩云「崖傾護石髓」，此豈似用事耶？』

蘭陵蕭慤，梁室上黃侯之子，工於篇什。嘗有秋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未之賞也。吾愛其蕭散，宛然在目。潁川荀仲舉，瑯琊諸葛漢亦以爲爾；而盧思道之徒雅所不愜。

這不是已開唐風了嗎？南朝的劉勰以原道的主張而開唐代文壇的風氣；北朝的顏之推以不廢音律的緣故，而樹唐代詩壇的先聲：這都是值得注意的事。

〔註〕文章篇云：『吾家世文章甚爲典正，不從流俗。梁孝元在潘邸時撰西府新文紀，無篇見錄者，亦以不偶於世，無鄭衛音故也。』

第五篇　隋唐五代

第一章　復古運動的醞釀時期

第一節　李諤與王通

在隋唐五代三百多年的中間，由一般作家的作風而言，可以別為三個時期：前一個時期——隋及初唐——約占一百多年，是作風將變，明而未融的時候；蓋以積重難返，故猶不免承襲梁陳之餘音。中一個時期——舊時所謂盛唐及中唐——也占一百多年，是作風丕變，登峯造極的時候；此時詩文，纔奏摧陷廓清之功，纔變以前駢儷的面目，與浮艷的作風。後一個時期——晚唐及五代——也占一百多年，又是駢儷餘波，回瀾振轉的時候。所以若自古文的立腳點而言，則此期的文學史殆成弧形的進展。

至就此三百多年的批評主張而言，也可以復古運動為中心而分成上述的三個時期，不過在前一時期是醞釀時代，中一時期是高潮時代，後一時期是銷沈時代而已。蓋中國的文學批評，恒隨作風為轉移，評者與作者往往不能分別，所以批評界的論調，同時每成為作家的主張。

六朝以後駢儷的作風之轉移，在隋及初唐已然；所以文壇的復古思想，在隋及初唐也已微露其端倪。今考隋

時如李諤王通諸人所言，已啟唐代復古論調之先聲。李諤力攻駢體之失，王通復標明道之旨，消極的或積極的方面，破壞的或建設的方面，均足為唐代古文家的根據。

李諤在隋文帝時以當時文體輕薄，流宕忘反，上書曰：

> 臣聞古賢哲王之化人也，必變其視聽，防其嗜慾，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為訓人之本，詩書禮易為道義之門，故能家復孝慈，人知禮讓，正俗調風，莫大於此。其有上書獻賦，制誄鐫銘，皆以褒德序賢，明勳證理，苟非懲勸，義不徒然。降及後代，風教漸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彫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文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詠，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韵之奇，爭一字之功：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據茲擢士，祿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游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說，不復關心，何嘗入耳！以傲誕為清虛，以緣情為勳績，指儒素為古拙，用詞賦為君子。故文筆日繁，其政日亂，良由棄大聖之規模，構無用以為用也。

李諤此書固似近於希承帝旨。當開皇四年，文帝卽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其時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文表華艷，付所司治罪。李諤所云蓋卽本此意旨而發，所以表中也引此事。（註）但其論調重儒教而輕文藝，尚實用而賤華飾，則唐人所論固不出此範圍也。

【註】唐薛登天授中上疏謂『文帝納李諤之策，由是下制禁斷文筆浮詞，其年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以表不典實得罪，於是風俗改勵，政化大行，』殊爲顚倒事實。

即文體也古典是式了。

李諤所論固啓唐代古文家的先聲了。但其文體依舊不脫駢儷的餘習。王通則更進一步，實行其論文的主張，

王通，隋書無傳，惟附見於新舊唐書王質王勃王績各傳，稱爲『隋末大儒號文中子』而已。其著述之傳於今者有中說十卷。但核以事實又多相牴牾，於是有疑其非出文中子所撰者，有且疑文中子並無其人者。實則隋書雖不爲王通立傳，而唐人言之鑿鑿，不可謂實無其人。（註一）至於中說是否出彼所撰，固成問題，但如洪邁容齋隨筆因杜淹所撰文中子世家事實多牴牾，遂疑中說爲宋代阮逸所作，則亦不免斷得太勇。蓋中說中所載事實雖不免牴牾，而在唐時已有此書則無可疑。（註二）至多只能如焦竑所謂：『阮逸不無增損於其間』，（註三）若遽定爲宋人之著則未免錯誤。不過中說雖爲唐時之書，而因其事實之牴牾，實不能謂全出於王通所撰定；於是或稱爲杜淹所撰，（註四）或稱爲其子福郊福畤等所依托，（註五）或稱爲王勃所僞造，（註六）要之都不過一種揣測之辭，沒有堅强的左證，未易作肯定的論斷。竊以爲王通之續六經撰中說，明見於新唐書王績傳，則其爲人已有妄誕之嫌；其父殺人其子或且行劫，則其子弟之習爲夸詐，又何足怪。大抵其書原出王通所撰，（註七）蓋中說之擬論語，亦與其續古尚書等同例，並爲贗古之作；不過王氏原書或未指實人名，而其子如福郊福畤輩，其門人如薛收姚義輩，或欲

張侈其門戶，或欲藉此以自衒，遂不免妄加人名或增飾事實，而不知其轉陷於譎誑耳。而且，即退一步言謂中說非出王通所撰，不足見其思想，則其書至遲也不能在王勃以後，無論如何，也足見此醞釀時期一部分人的文學見解。所以現在姑仍舊說以中說爲王通所撰，藉以窺見時人之文學觀。

【註一】明焦竑筆乘卷二云：『宋咸作駁中說謂文中子乃後人所假託，實無其人，則幾於瞽說矣。王績有負苓者傳，陳叔達有答王績書曰：「賢兄文中子恐後之筆削陷於繁碎，宏綱正典暗而不宣，乃興元經以定眞統，」陸龜蒙送豆盧處士序亦曰：「昔文中子生於隋代，知聖人之道不行，歸河汾間修先君之業。」後司空圖皮日休俱有文中子碑，五子皆唐人，言之鑿鑿如此，或獨臆斷其無，可乎？』又其續筆乘卷三謂：「楊炯集中有王子安集序亦言：『文中子居龍門，裁成大典，以贊孔門，勃思崇祖德，光宣奧義，』」亦王通實有其人之證。又宋釋契嵩鐔津文集十三書文中子傳後力言文中子之事可信，亦足備一說。

【註二】此則宋葉大慶考古質疑亦已辨之。其言云：『大慶謂容齋之所辨詆，是矣。嘗觀杜淹所撰世家，年世既已抵牾，且疏略自異，豈止如容齋所疑乎？……然容齋遂并疑中說爲阮逸所作，大慶則未敢以爲然也。何者？逸乃我宋仁宗朝人，唐書藝文志已有王通中說，皮日休有文中子碑，亦言序述六經敷爲中說，李薛房杜皆其門人，而劉禹錫作王華卿墓銘序載其家世行事甚詳，云門多偉人，則與其書所言合矣。司空圖又謂文中子致聖人之用，房衞數公皆爲其徒，恢文武之道，以躋貞觀治平之盛。至於李翱讀文中子且以其書唯之太公家教；劉蕡讀文中子又以六籍奴婢譏之，是雖當世儒者好惡不同，推尊之或過，毀損之失眞，要知自唐已有此書，決非阮逸所作明矣。』

【註三】焦竑筆乘卷二云：『宋龔鼎臣嘗得唐本中說於齊州李冠家，蓋中說之行久矣。阮同父類次文中子云，「中說舉其端二字以冠篇，

篇各有序，惟阮逸本有之。」又阮龔二本時有異同，如阮本曰，「戢子犨鈞於灄石，爾朱榮擁勒天下，故君子不貴得位。」龔本則曰「戢子犨鈞於灄石，民到于今稱之；爾朱榮控勒天下，民無得而稱焉。」龔本曰出而不聖，隱而不復用之則成，舍之則全。阮本則因龔簡而意略之，曰吾與爾有矣。豈逸不無增損於其間，以啟後世之疑耶？」紹虞案此說亦見宋張淏雲谷雜記，惟張氏只言爲後人所附益，不曾定爲阮逸耳。又李覯直講李先生文集二十九讀文中子一文謂：「文中子教授河汾間，迹未著顯，沒後門人欲尊寵之，故扳太宗時公卿以欺後世耳。豐其辭之淮乃滋群以求媚。」其說亦是。

【註四】元白珽湛淵靜語卷一云：「文中子中說，杜淹所撰，中間多有疎謬處，所以啓或者之疑歟。然王氏子弟如王凝輩時，不無傳會於其間，以張侈其門戶。且如王道篇云：「李德林請見子與之言，歸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門人皆沾衣。」又禮樂篇云：安平公問政，即德林也。余按史李德林卒於開皇之十年，時文中子甫七歲，爾未有門人，德林何自而請見問政，門人何自而聞琴流涕，此亦疎謬之一端。不但唐開國佐命功臣皆其弟子也。」紹虞案此說即本葉大慶考古質疑所言，但葉氏不言爲杜氏所撰耳。

【註五】四庫總目提要「所謂文中子者，實有其人；所謂中說者，其子福郊福畤等纂述遺言，虛相夸飾，亦實有其書。第當有唐開國之初，明君碩輔不可以盡名動。又陸德明孔穎達賈公彥諸人，老師宿儒布列館閣，亦不可以空談惑。故其人其書皆不著於當時，而當時亦無斥其妄者。至中唐以後漸遠無徵，乃稍稍得售其欺耳。」

【註六】章炳麟檢論案唐篇云：「中說時有猥言，其長夸詐則甚矣。案其言長安見李德林與擊鼓蕩，及杜淹所爲世家，稱通問禮關朗，其年

嶷皆不逮，而房玄齡杜淹陳叔達皆兵通，不得爲其弟子。唐書稱通仕至蜀郡司戶書佐，疑其言獻策者亦妄也。跡此誹欺之文，世或以爲福郊福畤增之。案通弟績敍以通比仲尼，子姓顯其唐廟宜然。然其年世尚近，不可顚倒，而勃去通稍遠矣。生既不識李房杜陳之輩，比長，故老漸凋，得以妄造其事。唐書稱通書起漢魏盡晉，作者百二十篇，續古尚書，有錄無書者十篇，勃補完缺逸定著二十五篇，由今驗之，中說與文中子世家皆勃所潤飾也。」

【註七】晁氏讀書志卷三王勃集序條：「楊炯集二十卷，今不傳，僅存詩數十篇耳。近畫風復訪遺文，合爲十卷，有王子安集序，中云文中子之居龍門也，睹隋室之將散，知吾道之未行，循歎鳳之遠圖，宗獲麟之遺制，裁成大典，以贊孔門。討論漢魏，迄於晉代，刪其詔命，爲百篇以續書；甄正樂府，取其雅奧，爲三百篇以續詩；又自晉太熙元年至隋開皇九年平陳之歲，褒貶行事，述元經以法春秋。門人薛收竊慕，同爲之傳，未就而歿。君思崇祖德，光宣奧義，續薛氏之遺傳，製詩書之眾序，包舉藝文，克融前烈，詩書之序，並冠於篇，元經之傳，未終其業，命不我與，有涯先謝。又註周易，窮乎晉卦。又編次論語，各以類分，窮源造極，爲之詁訓。又注黃帝八十一難，撰合論十篇見行於代。此亦可爲文中子非僞書一證。」

中說中首先對於南朝文學施一個攻擊。其事君篇云：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照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

他惟對於顏延之王儉任昉三人謂『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因此他對於當時文學下個總批評：

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

約以達，由於重文之本；繁以塞，由於逐文之末。其論文然；其論詩的標準亦然。天地篇云：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各有端序，音若壎篪，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

此等見解，吾以為如王勃這樣的文人未必如此拘執，所以未必為王勃所依托。事君篇又云：

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

其重道輕藝之意顯然可見。所以文以載道之旨，實以王通首發其端。王道篇云：

子在長安，……李德林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言文而不言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注）

【注】案德林卒於開皇十年，時通甫七歲，固未有門人，此亦事實之疏誤者。

又天地篇云：

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其後韓愈送陳秀才彤序，謂「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蓋卽本此。

第二節　唐初史家

隋末王通論文重道，開後世道學家之先聲。唐初史家，其論文雖無此極端，然也頗不滿意六朝的作風，所以又開古史家之先聲。史家固不重在論文，但以其所修諸史均有文苑傳或文學傳，而於此諸傳之先每有一篇序，於此諸傳之後又或爲之論，所以正可於其序或論之中窺見史家的論文見解。(註)

【註】李百藥北齊書有文苑傳序，房喬等晉書有文苑傳序文苑傳論，魏徵等隋書有文學傳序，姚思廉梁書陳書均有文學傳序，令狐德棻周書雖無文苑傳而王褒庾信傳論中頗多論文之語。惟李延壽南北史雖均有文學傳而其序論大都剿襲人既，如南史文學傳序同陳書而其論又襲自梁書，北史文苑傳序同隋書及周書。

今考當時一般史家之論文，大率爲一種折衷的論調。由南與北的文學言，則欲其「掇彼清音，簡茲累句，」如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所謂：

暨永明天監之際，太和天保之間，洛陽江左，文雅尤盛。彼此好尚，雅有異同。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其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深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其南北詞人得

失之大較也。若能擬彼清音，簡茲累句，各去所短，合其兩長，則文質彬彬，盡美盡善矣。

由古與今的文學言，則又欲其「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如令狐德棻周書王褒庾信傳論所言：

原夫文章之作，本乎情性，覃思則變化無方，形言則條流遂廣。雖詩賦與奏議異軫，銘誄與書論殊塗，而撮其指要，舉其大抵，莫若以氣爲主，以文傳意。考其殿最，定其區域，摭六經百氏之英華，探屈宋卿雲之祕奧。其調也尚遠，其旨也在深，其理也貴當，其辭也欲巧。然後瑩金璧，播芝蘭，文質因其宜，繁約適其變，權衡輕重，斟酌古今，和而能壯，麗而能典，煥乎若五色之成章，紛乎猶八音之繁會。夫然，則魏文所謂通才，足以備體矣；士衡所謂難能，足以逮意矣。

此即顏之推所謂『古之製裁爲本，今之辭調爲末』的意思。蓋在一種風氣將轉的時候，本易有此種論調的。何況史家衡古論今，對於文學之源流得失，無不瞭然，則欲其各去所短而合其兩長，固更不足怪了。明此，然後知史家論文雖不免泛評當時作者（如晉書文苑傳的序和論）或泛述一代歷史（如北史文苑傳序）與文學批評似乎無多關係，然而總觀各家所論，亦有數點足以特別提出，可藉以窺知文學批評上之思想與文學史上之作風，其所由轉移之故者。

其評論當時的文學，則對於南朝以來之作，每有一種不滿意的論調。如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云：

子山之文發源於宋末，盛行於梁季。其體以淫放爲本，其詞以輕險爲宗。故能誇目侈於紅紫，蕩心逾於鄭衛。

昔揚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北齊書文苑傳序云：

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惉懘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

又隋書文學傳序云：

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啟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北史文苑傳序同）

此種論調也足為提倡古文古詩者張目。大抵當時諸史惟北齊書與南朝無關，梁陳二書與南史，則又為體例所限，勢不能譏議其失，（注）故猶無貶辭，至於北朝諸史則對南朝文學當然可為嚴正的批評了。所以我謂當時史家對於南朝文學都有不滿意之論。

〔注〕然魏徵梁書帝紀論猶且稱：『太宗聰叡過人，神采秀發，多聞博達，富贍詞藻；然文豔用寡，華而不實，體窮淫麗，義罕疏通，哀思之音，遂移風俗，以此而貞萬國，異乎周誦漢莊矣。』

南朝文學之缺點既如上述，於是或推論文學之源，或進究文學之本。其論文源者則歸本於聖典，遂不期然而然的使文學觀復返於復古。今略撫數節以見一斑。

夫文以化成，惟聖之高義；行而不遠，前史之格言。……移風俗於王化，崇孝敬於人倫；經緯乾坤，彌綸中外。故

知文之時義大哉遠矣。（晉書文苑傳序）

經禮樂而緯國家，通古今而述美惡，非文莫可也。是以君臨天下者，莫不敦悅其義，縉紳之學咸貴尚其道。古往今來未之能易。（梁書文學傳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子曰：『煥乎其有文章也。』自楚漢以降，辭人世出，洛汭江左其流彌暢：莫不思侔造化，明並日月，大則憲章典謨禪贊王道，小則文理清正申紓性靈。至於經禮樂，綜人倫，通古今，述美惡，莫尚乎此。（陳書文學傳序又南史文學傳序略同）

夫文學者，蓋人倫之所基歟？是以君子異乎衆庶。昔仲尼之論四科，始乎德行，終於文學，斯則聖人亦所貴也。（陳書文學傳論）

兩儀定位，日月揚輝，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若乃墳索所記，莫得而云，典謨以降，遺風可述。是以曲阜多才多藝鑒二代以正其本，闕里性與天道修六經以維其末。故能範圍天地，綱紀人倫，窮神知化，稱首於千古，經邦緯俗，藏用於百代。至矣哉斯固聖人之述作也。逮乎兩周道喪，七十義乖，淹中稷下，八儒三墨，辯博之論蜂起；漆園黍谷，名法兵農，宏放之詞霧集。雖雅誥奧義，或未盡善，考其所長，蓋賢達之源流也。（周書王褒庾信傳論又北史文苑傳序略同）。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傳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遠。』故堯

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然則文之爲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敎於下，下所以達情志於上。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範；次則風謠歌頌，匡主和民。或離讒放逐之臣，塗窮後門之士，道轗軻而未遇，志鬱抑而不伸，憤激委約之中，飛文魏闕之下，奮迅泥滓，自致青雲，振沈溺於一朝，流風聲於千載，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隋書文學傳序）

窮其源而以聖賢之述作爲依歸，究其用而以裨贊王道綱紀人倫爲標準。此雖不是古文家的論調，而古文家的論調實本於此。實則史家有此議論，沿流溯源，尙不爲謬；文家有此主張，古典是式，便成爲復古了。

其論文本者，則歸之於情而欲復返於雅正。如舊唐書文苑傳論云：

夫賞好生於情，剛柔本於性。情之所適，發乎詠歎，而感召無象，風律殊製。

寥寥數語，已很能說明情性與文學之關係。至李百藥北齊書文苑傳序則言之更精。

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逖聽三古，彌綸百代，制禮作樂，騰實飛聲，若或言之不文，豈能行之遠也。子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大聖踵武，邈將千載，其間英賢卓犖，不可勝紀，咸宜韜筆寢牘，未可言文，斯固才難，不其然也。

至夫游夏以文詞擅美，顏回則庶幾將聖，屈宋所以後塵，雲卿未能輟簡，於是辭人才子，波駭雲屬，振鵷鸞之羽儀，縱雕龍之符采，人謂得玄珠於赤水，策奔電於崑丘，開四照於春華，成萬寶於秋實。

然文之所起，情發於中。人有六情，稟五常之秀；情感六氣，順四時之序。其有帝資懸解，天縱多能，摛翰獻於生知，問珪璋於先覺。譬雲之自成五色，猶儀鳳之冥會八音，斯固感英靈以特達，非勞心所能致也。縱其情思底滯，關鍵不通，但服膺無怠，鑽仰斯切，馳騖勝流，周旋益友，強學廣其文見，專心屏於涉求，畫績飾以丹青，彫琢成其器用，是以學而知之，猶足賢乎已也。謂石爲獸，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解牛，砉然游刃，習之久也。自非渾沌無可鑿之姿，窮寄懷不移之情，安有至精久習而不成功者焉。

此文頗似文賦，亦能闡說文本於情之關係。不過他所謂情，重在歸於雅正，而不可偏於哀思。故李氏於其文苑傳贊又云：『乃眷淫靡，永言麗則，雅以正邦，哀以亡國。』

窮文之源則以古爲式，此卽令狐德棻所謂：『摭六經百氏之精華，探屈宋卿雲之祕奧』者；究文之本則以情爲主，此又李延壽所謂：『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者。史家深知當時南朝文學之失，而欲捄其弊補其偏，所以每成爲折衷的論調，而這種論調正爲後來復古的文人與詩人之所本。蓋因窮文之源而論文每主於徵用，自成後來文人之主張了；因究文之本而論文又歸於崇雅，則又成後來詩人之主張了。人每知陳子昂李白之力復古詩，韓愈之力復古文，而不知風氣之開，卽在初唐史家固已然矣。

第三節　劉知幾之史通

史家修史，史論家則論史。修史者不重在論文，故不易見其論文見解；論史者則以文史關係之密，論史多關於

論文，故又頗可窺出其論文的見解。在昔文史不分之時，史家好似文學家，而史論家則好似文學批評家。唐代史論家的著作，其較重要者只有劉知幾的史通。(註一)劉氏史通商榷史篇，摽挖文詞，其所論頗爲重要。不過以文史雖屬同源而畢竟異途。(註二)所以史通所論，非惟與文心雕龍不同，卽與當時史家亦異其旨趣。史通是本於史學的觀點，以論史籍的文詞；文心雕龍是本於文學的觀點，以論文學的作品。所以也可說，史通所論是史學家的文學觀；而文心雕龍所言則是文學家的文學觀。

【註一】唐代史評之著，惟劉知幾史通獨傳。知幾次子餗有史例三卷，見新唐志，今不傳。又柳璨有史通析微十卷，新唐志作柳氏釋史；直齋書錄解題謂其譏評劉氏之失，今亦不傳。此外尚有裴傑史漢異義（通志「義」作「議」）三卷，田弘正客沂公史例十卷，均見新唐志文史類；又吳武陵十三代史駁議十二卷，見宋志文史類，似均不甚有關論文。

【註二】史通覈才篇云：『文之與史，較然異轍。故以張衡之文而不閑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傳，其爲式也，羅含謝客宛爲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工複語，盧思道雅好麗詞；江總猖獗以成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又雜說下云：『史云史云，文飾云乎哉！』蓋他因於文史分途，故不欲以文人撰史，更不欲史之偏於文飾。

明史通所論只指史籍的文詞，則知其論文所以不偏主藻飾而同時又不偏主質樸之故。如雜說下云：

『自梁室云季，雕蟲道長，「平頭」「上尾」，尤忌於時；對語儷辭，盛行於俗。始自江外，被於洛中，而史之載

言，亦同於此。假有辨如酈生，吃若周昌，子羽修飾而言，仲由率爾而對，莫不拘以文禁，一概而書；必求實錄，多見其妄矣。

此言史文敘述之不能偏於雕飾而失實。又論贊篇以爲後世流宕忘返，「大抵皆華多於實，理少於文，鼓其雄辭，誇其儷事。」而對於當代以詞人而兼史家者爲更致不滿。他說：

「大唐修晉書，作者皆當代詞人，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飾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者矣。」

則又言史傳論贊之不宜徒尚儷辭，此皆不欲以文人撰史之意。然如敘事篇云：

夫飾言者爲文，編文者爲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境，以詞令爲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爲主。況乎列以章句，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

則其不偏尚質樸之意又極明顯。這種主張似相矛盾，實則本於史學的見解看來固絕不衝突。何者？史本是「筆」的一種，筆雖不同於文而亦不可廢飾。論史事宜求其翔實，論史文須期其永久。所以敘事篇又說：

夫史之稱美者以敘事爲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

這種文質折衷的論調，似乎與當時史家之論文學相同，然而亦有差異之處。蓋史家之論文學，有時本於文學的立

揚；而史論家之論史籍，則全本於史學的觀點。所以史家如李百藥北齊書所言，足爲後來詩人復古之根據；而劉氏之論則適以混筆爲文，只能助離文學張目而已。此所以史通論文又全爲史學家之文學觀也。

明史通論文全是史學家之文學觀，則其論文主旨始可得而言。大抵史學家之論文總無主純美論者。一方面求其信實此王充所謂『極筆墨之力定善惡之實也。』一方面又求其應用，此又王充所謂『文人之筆勸善懲惡也。』（並見論衡佚文篇）此本是史家論文之宗旨，劉氏亦不能外是。

由其求信實者言，故重在眞。言語須求其眞，事實須求其眞，是非也須求其眞。言語篇謂記當世口語宜從實而書，（註一）此求言語之眞。敍事篇論假託古詞翻易新語之非，（註二）此求事實之眞。浮詞篇又謂抑揚不使過實，（註三）此又求是非之眞。其論頗與王充論衡相同，而與劉勰文心雕龍微異。論衡謂經傳之文賢聖之語，後世不曉，是由語異，不關材鴻；（見自紀篇）正與史通所謂不應法書今語，勇效昔言者同旨。而文心雕龍練字篇謂『爾雅倉頡異體相資，如左右肩股；該舊而知新，亦可以屬文』便不全重今語了。論衡謂『必謀慮有合，文辭相襲，是則五帝不異事，三王不殊業也』，（見自紀篇）此也近史通所譏述事必比於古之意。而文心雕龍事類篇乃云『明理引乎成辭，徵義舉乎人事，乃聖賢之鴻謨，經籍之通矩，』則又不廢古典了。論衡謂『世俗所患，患言事增其實，著文垂辭，辭出溢其眞，』（見藝增篇）此亦史通所謂『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之意。而文心雕龍夸飾篇乃云：『文辭所被，夸飾恆存，』則固不貶浮詞了，（註四）史學家與文學家之論文其不同乃如此。

〔註一〕史通言語篇云：『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國；足以驗世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評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飾僞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眞僞由是相亂。…………夫天地長久，風俗無恆，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而作者皆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

〔註二〕史通敘事篇云：『昔文章旣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媲賢愚，草木以方男女，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代，其體稍殊，或擬人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衞。而作者猶謂帝家爲王室，公輔爲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誓。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新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夫持彼往事，用爲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

〔註三〕史通浮詞篇云：『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持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揚，此乃得失禀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愼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

〔註四〕文心練字篇雖謂『今一字詭異，則羣句震驚』，而夸飾篇亦謂：『飾窮其要，則心聲鋒起，夸過其理，則名實兩乖。』均去甚去泰之意，與史家論旨自別。

由其求應用者言，故又重在善。其史官建置篇云：

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賊臣書，其記事載言也則如彼，其勸善懲惡也又如此。由斯而言，則史之爲用，其利甚博，乃人生之急務，爲國家之要道。有國家者其可缺之哉！

其曲筆篇又云：

蓋史之爲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

這些都與論衡論文重在勸懲者相同。所以記事必擇其有關係者，若採及諸讖，引及小說，則其事無微，其辭猥雜了。載言亦必擇其足以資勸懲者，若徒撫浮詞，僅採虛飾，則無裨勸獎，有長奸詐了。其書事篇云：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勳，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

其載言篇則云：

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爲主。是以虞帝思理，夏后失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讜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喩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勸獎，有

長於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

此雖只論史例，而同時很可窺出其論文宗旨。至少，可以說這是史家的文學觀。

劉氏本於史家的文學觀以論史籍的文詞，故偏重在「筆」的方面，當然不主純美，而與古文家之論調爲近。今案史通所言就其關於文事之討論，而爲古文家樹之先聲者，有兩個較重要的問題。卽是（1）繁簡的問題，（2）模擬的問題。

駢儷之體出於詞賦，體尙鋪排，故宜於煩；散行之體出於歷史，體尙剪裁，故宜於簡。所以古文家與史家均有敍事尙簡的主張。史通敍事篇云：

夫國史之美者以敍事爲功，爲敍事之功者，以簡要爲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尙書，發蹤所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遠，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之內恆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群輕折軸，況於章句不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

又云：

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片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晦之道也。

他要損之又損，以至『華逝而實存，滓去而藩在，』這都與古文家尚簡之說相同。古文家自歐陽修尹洙等後，直至清代「桐城派」大率都主於簡，其意實自劉氏發之。

又史家之與古文家更有一相同之點，即是均重在則古。模擬篇云：『夫述者相效，自古而然。……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何以貽厥後來。』正與古文家之師古同旨。劉氏因此更論模擬之體云：

> 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世之述者，銳志矜奇，喜編次古文，撰敍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畫之寫眞，鎔鑄之象物，以此而似也。其所以爲似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若斯而已。……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効三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模，經文意深而難擬。旣難易有別，故得失有殊。蓋貌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尙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眞史，此子張所以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喩也。

最後他復謂『擬古而不類乃難之極者。』這正與後來古文家所謂『含英咀華』者相同。韓愈答劉正夫書謂爲文宜師古聖賢人，而申之以師其意不師其辭。正是劉氏所謂取其『道術相會義理玄同』之意。韓愈送高閑上人序論學張旭之草書，謂『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此即所謂貌同心異，爲模擬之下之說。劉氏於此篇自謂『自子長以還，似皆未覩斯義。』蓋亦以史家不肯下文辭的工夫，而論史者又不從文學方面論之也。

第二章　復古運動的高潮時期

第一節　詩國的復古說

第一目　陳子昂與李白

在齊梁文學的流風餘韻未盡捐棄之時，而於詩國首先豎革命的旗幟，以復古爲號召者，厥爲陳子昂。韓愈詩所謂『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薦士詩）者是也。其上薛令文章啓云：

某聞鴻鐘在聽，不足論擊缶之音；太牢斯烹，安可薦藜羹之味。然則文章薄技，固棄於高賢；刀筆小能，不容於先達。豈非古人君子以爲道德之薄哉！某實鄙能，未窺作者，斐然狂簡，雖有勞人之歌；悵爾詠懷，曾無阮籍之思。徒恨跡荒淫麗，名陷俳優，長爲童子之群，無望壯夫之列。

其視文學爲小能薄技，似乎視之甚卑，幾有薄詩不爲之意。但他却未必眞的不爲，他不過欲挽這過度尚文的詩風返之於質朴耳。欲返之於質朴，所以提出「興寄」二字，以爲詩的眞生命。其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敍云：

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漢魏風骨，晉宋莫傳，然而文獻有可徵者。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以耿耿也。

子昂不僅批評上的主張如此，其所作感遇詩三十八章，亦能一變徐庾餘風，倡爲平淡清雅之音。所以盧藏用陳子

昂集序稱爲『道喪五百歲而得陳君。』

子昂以後繼之以倡同樣的論調者，即爲李白。李白自謂：『梁陳以來，艷薄斯極，將復古道，非我而誰！』（孟棨本事詩引）其自任以詩國復古之重如此。其古風之首章云：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眞。群才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亦以復元古之清眞自任。其古風之三十五章又云：

醜女來效顰，還家驚四鄰。壽陵失初步，笑殺邯鄲人。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眞。棘刺造沐猴，三年費精神。功成無所用，楚楚且華身。大雅思文王，頌聲久崩淪。安得郢中質，一揮成風斤。

其不滿意於摹擬古人拘束聲律之意可以想見。蓋亦上文『綺麗不足珍』之意。太白爲人，本偏於浪漫的氣分，故其論詩亦崇尚自然，厭棄格律，近於浪漫的主張。他欲以浪漫的作風變更古典的作風，本極正當，李白之所以能成爲唐代偉大詩人者在此；唐詩之所以能成功而不朽者亦在此。只可惜他因古詩之自然而高倡復古則未免有昧於文學進化之意義，試看他謂：『興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本事詩引）則可知不免爲復古一念所誤了。

只須糾正這一個誤點，則李白的復古主張，依舊是詩國的革新主張。他因爲欲變更一時之風尚，所以覺得曲高和寡，其古風之二十一章云：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爲傳。試爲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歎息空淒然。

這竟是後來韓愈小慙則小好，大慙則大好的論調了。

第二目　杜甫

杜甫與李白並爲唐代偉大之詩人；但以他二人的作風不同，故於批評的主張亦異其趣。李白是一味主張復古，而卑視齊梁的，故其詩亦以古體爲多，近體爲少。杜甫則不然；『他是熟精文選理』（宗武生日）的他是『晚節漸於詩律細』（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的。所以他對於六朝文學並不卑視；他說：

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今人嗤點流傳賦，不覺前賢畏後生。（戲爲六絕句）

陶冶性靈存底物，新詩改罷自長吟。孰知二謝將能事，頗學陰何苦用心。（解悶）

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遊。（江上値水如海勢聊短述）

他對於初唐詩人亦不攻擊；如云：

王楊盧駱當時體，輕薄爲文哂未休。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戲爲六絕句）

縱使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龍文虎脊皆君馭，歷塊過都見爾曹。（同上）

即他批評同時的詩人，亦每以六朝人物爲比擬。如他稱李白云：『淸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與李十二白同尋范十隱居）稱鄭審李之芳云：『鄭李光時論，文章並我先，陰何尙淸省，沈宋欻連翩。（秋日夔府奉寄一百韻）稱張九齡云：『綺麗玄暉擁，箋誄任昉騁。』（八哀）稱畢曜云：『流傳江鮑體。』（贈畢四曜）稱孟浩然云：『賦詩何必多，往往凌鮑謝。』（遣興）稱岑參云：『謝朓每篇堪諷誦。』（寄岑嘉州）稱薛據云：『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所以我以爲李白的主張是反齊梁的；杜甫的主張，是沿襲齊梁而加以變化的。李白仗其天才，絕足奔放，所以能易古典的作風爲浪漫的作風。杜甫加以學力，包羅萬象，所以能善用齊梁的藻麗而無其浮靡。前者是對於齊梁作風的反抗，幾欲並其藝術美的優點而亦廢棄之者。（註）後者是對於齊梁作風之演進，發揮其藝術美的優點，而補救其過度使用之缺陷者。前者廢棄其修辭的技巧，而能自成一家的作風，所以顯其才；後者不妨師法齊梁，而能不落於齊梁，所以顯其學；顯其才者，其詩猶有古法；顯其學者，其詩轉成創格。我們若從這一點以爲詩仙詩聖的解釋，庶不致陷於空洞而渺茫。

〔註〕此不過就李白批評的論調而言之耳。實則歷史上的事實斷不容如此。李白儘管反抗齊梁，未嘗不受齊梁修辭的影響，所以杜甫謂『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正與杜甫之『頗學陰何苦用心』者相同。

是故由作品言，則杜甫是對於齊梁的作風而修正之者。修正的方法即在采用陳李批評上的復古主張，以兼有漢魏晉宋諸體之長。由批評言，則杜甫是對於陳子昂李白的復古說而修正之者。修正的方法，即在采用齊梁以

後創作上的藝術美，而集其大成。杜甫在文學史上之重要在此；杜甫在文學批評史上之重要亦在此。我們若本於這一點以爲李杜優劣論，也覺得比元稹爲切實一些。

何以見其如此呢？我們卽就其論詩之句，亦可窺出此意。他不廢齊梁的音律，他深知詩與音律的關係之重要。他於夜聽許十一誦詩一首中云：

誦詩渾游衍，四座皆辟易。應手看捶鉤，淸心聽鳴鏑。精微穿溟涬，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若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剪剔？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闃。

於誦詩時要能表現出精微飛動之聲，則作者之於音律，又焉得而不考究呢？所以他要『新詩改罷自長吟』（解悶）了。所以他要『賦詩新句穩，不覺自長吟』（長吟）了。所以他要『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溼絃』（秋日夔府詠懷寄鄭審李之芳）了。所以他要『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塡溝壑』（醉時歌）了。所以他要『遣辭必中律』（橋陵詩三十韻）了。所以他稱岑參者在於『謝朓每篇堪諷誦』；而他所自許者也在於『晚節漸於詩律細』了。

他亦不廢南朝的藻飾。他與高適詩云：『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寄高三十五書記）宋魏泰臨漢隱居詩話引其語，卽謂：『造句之法亦貴峻潔不凡。』可知他就不和李白一樣，以爲『雕蟲喪天眞』的。他曾說過：『淸詞麗句必爲鄰，』（戲爲六絕句）所以也就不和李白一樣以爲『綺麗不足珍』了。他因爲『爲人性僻耽佳句，

語不驚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以致來李白的「飯顆山頭」之誚。這雖未必真是事實，但於此可見他們二人不同之處。

然則他重視音律與藻飾，是否即局於南朝的境界呢？則又不然。他所以能不局於齊梁者，即因他也有復古的傾向。其詠懷古跡詩云：『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其解悶詩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其稱鄭虔云：『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醉時歌）稱高適云：『方駕曹劉不啻過，』（奉寄高適）『文章曹植波瀾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亦未嘗不原本屈宋，推尊漢魏，不過他對於所謂「當時體」亦不輕視而已。其戲為六絕句之六云：

未及前賢更勿疑，遞相祖述復先誰。別裁偽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

錢謙益讀杜二箋釋之云：『今人之未及前賢，無怪其然也。以其遞相祖述，沿流失源，而不知誰為之先也。騷雅有真騷雅，漢魏有真漢魏，等而下之，至於齊梁唐初，靡不有真面目焉。舍是則皆偽體也。別者，區別之謂；裁者，裁而去之也。果能別裁偽體，則近於風雅矣。自風雅以下，至於庾信四子，孰非我師。雖欲為嗤點輕薄之流，其可得乎？故曰轉益多師是汝師。』此說亦能發揮杜老意思。杜甫所謂「轉益多師」，即對於屈宋漢魏齊梁初唐並在可師之列，所以一方面能不為復古說所限，一方面也能不落於齊梁；而這一種的轉益多師，卻正是文學上的進化論。（註二）且看他說：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作者皆殊列，名聲豈浪垂。騷人嗟不見，漢道盛於斯，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後賢兼舊制，歷代各清規。（偶題）

『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爲，』這很能說明文學上的進化。文學上無論那一種體裁，方其初無不偏於自然美的，迨其終，又無不趨於藝術美的。本此說以論文學上的綺麗，便不致如李白這樣一筆抹殺，定爲「不足珍」了。作風之趨於綺麗，本是文學演進上自然的趨勢。只要能得「轉益多師，」便不必對於此種作風加以攻擊，而自能『後賢兼舊制』了。只要能得這樣的「轉益多師，」則所謂「兼舊制」云者，便不是擬古的摹襲的，而自有其個性之流露：此所謂『作者皆殊列』也。同時亦自有其時代性的表現，又所謂『歷代各清規』也。若不是這樣而泛言復古，則杜甫所謂『竊攀屈宋宜方駕，恐與齊梁作後塵，』（戲爲六絕句）而已。錢謙益釋此二語云：『於古人則愛之，於今人則不敢薄，期於清詞麗句，必與古人爲鄰則可耳。今人目長足短，自謂竊攀屈宋，而轉作齊梁之後塵，不亦傷乎？』蓋齊梁文學亦從屈宋演進而來，若泛言學古則與齊梁同宗屈宋，其流爲齊梁之後塵，固亦意中事也。（注二）

【註一】元稹杜工部墓銘云：『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於晉魏，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穠莫備。至於子美，所謂上薄風雅，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矣。』

【註二】郭知達九家集註杜詩引趙注謂：『公所以必退遜屈宋者，惟恐不超越齊梁而翻與之作後塵。蓋齊梁體格輕靡，公所不取也。』此說於成見，未能眞通杜氏論詩宗旨，故有此誤。

這種折衷今古而歸於『轉益多師，』歸於『後賢兼舊制』的主張，實是杜老的詩學標準。我曾於所撰杜甫戲為六絕句集解發其義云：

今人以愛古人之故，嗤點庾信之賦，譏哂四子之文，矯正一時風氣，其意原不可薄。但建安以來清詞麗句，自有不廢江河者在；並非侈言宗古，便可卑視齊梁也。大抵時人論詩，自陳子昂始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李白繼之，亦言：『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於是後生從風，發為狂言，附遠譏近，是古非今，故少陵作此箴之耳。然又恐後生輩隨人腳跟，本無主見，誤會少陵之意，以為古不足慕，故其下語極有分寸。且又正告之曰，所謂清詞麗句云者，只宜如初寫黃庭恰到好處。屈宋之文驚采絕豔，足以衣被詞人，故欲攀與方駕，固不欲其如塗塗附，愈趨愈下，以作齊梁後塵也。「竊攀」二語正是並行之句，一以示其蘄向所在，一以明其鑑戒之旨。積極消極二者兼顧，於是所謂『清詞麗句必為鄰』者，其義始可得而尋。（以前諸家之解此詩者惟吳見思發此義。）昭明文選序云：『踵其事而增華，變其本而加厲，物既有之，文亦宜然。』文學之趨於雕縟，本亦必然之勢。此正少陵所謂『前輩飛騰入。餘波綺麗為』者。（見偶題）顏氏家訓文章篇云：『今世音律諧靡，章句偶對，諱避精詳，賢於往昔多矣。』文學之偏於雕縟，亦非可一筆抹殺，謂為不足珍者。此又少陵所謂『熟精文選理』之意。（見宗武生日）則知前數章之不貶庾信四子，意蓋在是。顏之推又云：『古之製裁為本，今之辭調為末，並須兩存，不可偏廢。』文章道弊，誠宜以古作矯之。此亦正是少陵「親

風雅」之旨。則知此章之不欲爲齊梁後塵，意又在是。故其論庾信四子則極言其才力之不可及，而以鯨魚碧海爲極詣。其論古人則又言非不可愛，但須以清詞麗句爲標的。一於清新中看出其老成，一於老成中兼取其清新，雙管齊下，而少陵論詩之旨於是大明，此則所謂別裁僞體也。（解不薄今人愛古人一首）

夫後生之未及前賢，固勿容疑矣；然遞相祖述，果將以誰爲先乎？元稹杜工部墓銘謂：『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此正說明當時風氣。則所謂『遞相祖述復先誰』云者，正是當時急待解決之問題。而少陵則正告之曰，亦惟有別裁僞體以親風雅，而多師爲師而已。僞體云者，不眞之謂。其沿流失源甘作齊梁後塵者，固不免於僞；即放言高論，不能虛心以集益者，亦何莫非僞體乎。『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各執一端，兩無是處；於是指示正鵠，而以「轉益多師」爲宗旨。少陵至是，蓋已將其論詩主恉和盤托出無餘蘊矣。元稹之論杜詩稱其『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昔人之所獨專，』亦正說明少陵詩學。蓋其所以集大成者在是，而其所敎導後生者亦即此旨也。少陵詩云：『搖落深知宋玉悲，風流儒雅亦吾師。』又云，『李陵蘇武是吾師，孟子論文更不疑；』以及『讀書破萬卷，』『熟精文選理』諸語，蓋均多師之謂。豈若附古非今之流，放言高論，轉以自限者哉！（解未及前賢更勿疑一首）

所以我說杜甫的論詩主旨與陳李不同。非惟不同，並且是對於陳李之浮泛的復古論調，而加以修正者。這是杜老

所詔示於人的學詩標準。

本此標準，再可一論杜甫之詩的造詣。易言之，也卽是杜甫所詔示於人的作詩的標準。關於這個，杜甫也是二者兼顧，雙管齊下的。楊愼丹鉛總錄之論杜甫『庾信文章老更成』一絕，謂：

庾信之詩爲梁之冠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淸新」，又曰「老成。」綺豔淸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淸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淸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爲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淸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強作老成態度，而綺豔淸新槪未之有。若子山者，可謂兼之矣。不然，則子美何以服之如此。

我嘗謂：『此說入妙，頗得子美論詩之旨。』今亦錄一節我的解釋於下：

杜老詩風，卽在能兼淸新老成二者，故其推尊庾信，亦卽在此。杜之稱嚴武云：『詩淸立意新，』（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稱孟浩然云：『淸詩句句盡堪傳，』（解悶十二首）此淸新之說。至其敬贈鄭諫議詩所謂『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者，則又老成之義。是亦子美論詩兼主淸新老成二者之證。此卽求之六絕句中亦可得其解。淸新之意，所謂『淸詞麗句必爲鄰』也；老成之說，又所謂『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也。蓋淸新老成二者相反而適以相成。而其所以相成，所以能兼之之故，要又在『不薄今人愛古人』一語。（此說又須活看，與下文解不同。）不薄今人，則齊梁以來悉在可師之列；愛古人則漢魏以上更爲淵

源所自。師齊梁所以取其清新；親風雅又所以法其老成。蕭子顯云『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南齊書文學傳論）此齊梁間詩之所以趨於清新。陳子昂云『竊思古人，常恐逶迤頹靡，風雅不作，』（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敍）此唐詩之所以返於老成。此所以清新而又老成的境界，正須從『不薄今人愛古人』中來也。不明此意，則杜氏論詩宗旨不得而知，而此六絕句亦無從獲解。（解庾信文章老更成一首）

所以我以爲杜甫對於詩之極詣，又在折衷藝術與自然，以使歸於「神，」歸於「老成。」昭代叢書中所錄楊繩武詩文四則有云：

少陵詩：『或看翡翠蘭苕上，未掣鯨魚碧海中。』元遺山詩：『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薔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嗚呼！此古人所以必嚴文章流別也。大抵文章之道，未論妍媸，先別高下。果其根柢盤深，氣骨厚重，筆力堅剛，雖間有未醇，無傷大雅。若骨少而肉多，詞豐而意弱，力量既薄，根柢亦浮，縱完好可觀，不登上乘。然或欲避平鈍，轉入離奇，牛鬼蛇神，獐頭鼠目，則又在所必禁。少陵又云『波瀾獨老成，』昌黎亦云：『妥帖力排奡，』波瀾而必於老成，排奡而必於妥帖，則知不老成不足爲波瀾，不妥帖亦不足爲排奡矣。

此言亦妙。我嘗謂：『楊慎能於清新老成二語看出關係，楊繩武又能於翡翠蘭苕鯨魚碧海二語看出關係，杜老有知當心許此二楊爲知己。』或不爲厚誣古人的。

這個關係，可即於其論「神」「氣」者明之。「神」「氣」全重在自然，假使偏重在雕琢，則六情底滯，靈機不暢，此李白所謂『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眞』者是也；假使專工在藻飾，則堆砌塗澤，最易流於繁音累氣，此又李白所以謂『自從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者也。因此，似乎李白論詩若拈出「神」「氣」二字便更爲恰當一些。而孰知有不盡然者。蓋文學之自然妙境，雖是很神祕的一個抽象的境界，而這種境界有所由入之途焉：其一則仗其天才，依其興會，才高則絕足奔放，無所拘繫，興到則筆酣墨舞，揮灑自如：此一途也。其又一則專重學力，偏於苦思，學到則爐火純靑，自有搖筆即來之樂，思苦則一旦豁然，遽入禪宗頓悟之境：此又一途也。李白走了前一條路，杜甫則走後一條路者。必明這一點，然後纔知杜甫論詩所以拈出神與氣二字；然後纔知杜甫所以偉大的地方，與唐詩所以成功的緣故。

於是，且一言杜甫之所謂「神」。杜甫論詩，很重神化的境界。其獨酌成詩云：『詩成覺有神，』寄薛三郎中據云：『乃知蓋代手，才力老益神，』又寄張十二山人彪詩亦云：『詩興不無神，』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又云：『文章有神交有道。』即其論及其他美術者，如論書亦謂：『書貴瘦硬方通神，』（李潮八分小篆歌）論畫亦謂：『將軍盡善蓋有神。』（丹靑引）可知他於一切藝術無不以神境爲極詣矣。不過他的所謂神境，是從苦思力學得來者，所以說：『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奉贈韋左丞文）蓋其下筆如有神的境界，即從讀書破萬卷的工夫中來，所以是切實；而一方面於讀書破萬卷之後復繼以下筆如有神，則亦返於自然，不致爲已成的典型所束縛了。『行

神如空，』杜氏庶幾近之。

又杜甫論詩亦頗重在骨氣。其稱庾信爲『凌雲健筆意縱橫，』（戲爲六絕句）稱賈至爲『雄筆映千古，』（送唐誡因寄禮部賈侍郎）稱元結爲『詞氣浩縱橫。』（同元使君舂陵行）又其醉歌行贈從姪勤亦云：『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橫掃千人軍。』所以他論詩也很重在氣勢。且看他戲爲六絕句詩中於『或看翡翠蘭苕上』之後，必繼以『未掣鯨魚碧海中』一語，亦可見其微意之所在矣。錢謙益讀杜二箋釋之云：『蘭苕翡翠，指當時研揣聲病，尋摘章句之徒；鯨魚碧海，則所謂渾涵汪洋，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者也。亦退之所謂橫空盤硬，妥帖排奡，垠崖崩豁，乾坤雷硠者也。』我以爲這數語極得杜老之旨。杜甫因於這樣，所以纔能上承齊梁而不落於齊梁。『行氣如虹，』杜氏亦庶幾近之。不過他行氣如虹的境界，亦自妥帖排奡中得來，所以說『毫髮無遺憾，波瀾獨老成。』（敬贈鄭諫議）於毫髮無遺憾後繼以波瀾獨老成之語，則知不僅是細膩的工夫；於波瀾獨老成前，加以毫髮無遺憾之語，則知又不獨是粗獷的氣象了。所以我以爲能從天才方面充分發展，儘有文藝的自然美而不流於淺率者，則千古詩人中當推李白；其從學力方面充分發展，儘有文藝上的藝術美而不害雕琢者，則千古詩人中又當推杜甫。過此則爲病矣。在於同時而使自然美與藝術美都能盡量發展都能相互融合以到恰好的地步，是誠不得不謂爲文學史上的奇蹟也。而這種文學史上的奇蹟，却即可以其論詩的見解說明之。

第三目　就於皎然之所著

李杜而外在當時批評界上較有重要的地位者則爲皎然。皎然所著，據昔人著錄有「詩式」「詩評」「詩議」「中序」諸稱，如：

崇文總目文史類　晝公詩式五卷。

新唐書藝文志文史類　晝公詩式五卷，詩評三卷。（僧皎然）

宋四庫闕書目別集類　僧皎然詩評一卷。（葉德輝云陳錄文史類「評」作「議」）

通志藝文略詩評類　晝公詩式五卷。僧皎然詩評三卷。

宋史藝文志文史類　僧皎然詩式五卷，又詩評一卷。

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　詩式五卷，詩議一卷，唐僧皎然撰，以十九字括詩之體。（文獻通考經籍考文史類同）

澹生堂書目詩文評類詩式門　僧皎然詩議一卷，中序一卷，詩式二卷，僧清畫，（案「畫」當作「晝」）詩法統宗本。

絳雲樓書目文史類　皎然詩式（陳景雲注五卷，又詩議一卷）

因此，顧龍振詩學指南中所錄皎然之著，即分評論，詩式，詩議三種。又據昔人稱引如日人遍照金剛文鏡祕府論所引有皎公詩議，馮惟訥詩紀別集所引書亦有詩議詩評之別。似乎以上四種各自爲書。然據十萬卷樓叢書所輯五

卷本詩式，與顧龍振詩學指南所錄詩議詩評詩式兩相校對：則詩議所載爲五卷本詩式所無；詩評所載大半在五卷本詩式中，蓋出後人割裂爲之者。至中序則本爲卷中一篇序文，不能別出成書。考中序云：『吾將深入杼峯與松雲爲侶，所著詩式及諸文筆併寢而不紀。……至五年夏五月會前御史中丞李公洪自河北負譴，遇恩，再移爲湖州長史。……他日言及詩式，……因命門人檢出草本。……公欣然，因請與生相與編錄，有不當者公乃點而竄之。……勒成五卷』云云。則知今世所傳詩式一卷本，蓋在中序以前，係皎然原稿，未經李氏點竄者。中序以下則爲皎然續編之稿，而經李吳二氏編錄點竄者。陳振孫所謂『以十九字括詩之體』者，蓋卽指此。

四庫總目於皎然詩式斥而不收，惟於存目著錄之，且謂其『參差可疑』。蓋由當時未見五卷足本之故。考錢謙益絳雲樓書目有詩式，陳景雲注云五卷，錢曾也是園書目及述古堂書目亦均五卷，則是五卷本尙有存者，特四庫開館時未見之耳。皕宋樓藏書志有舊抄本詩式五卷，出盧文弨舊藏，且錄盧氏跋云：『此書世有鐫本，俱不全。今乃得此五卷完備者，從兩漢及唐詩人名篇麗句摘而錄之，差以五格，括以十九體，此所以謂之式也。若世間本則虛張其目而已。豈知其用意之所在乎？』

至於詩評，雖有數則爲五卷本詩式所無，然大部分均在其中，則當是後人擇其衡量昔人著作或論述作法之語，別行輯出者。詩議，在唐代已有是書，觀文鏡祕府論（卷三）所論八對，謂出皎然詩議，校以顧龍振詩學指南本詩議所載正相符合。此條爲今傳各本詩式所無。大率詩議所論，又較重在方法方面，蓋同於當時詩格詩例之著。至

直齋書錄解題所謂『以十九字括詩之體』，則混詩式言之。獨惟訥詩紀別集，所引詩議又多同於詩評。或詩議原亦詩式中之一部分，皎然所著早經後人竄亂，故即五卷足本中亦難覩其全耶？

又四庫存目提要謂：『皎然與顏眞卿同時，乃天寶大歷間人，而所引諸詩舉以爲例者，有賀知章、李白、王昌齡相去甚近，亦不應遽與古人竝推，疑原書散佚而好事者摭拾補之也。』此言亦未盡然。考詩式卷五小序云：『時在吳興西山，殊少詩集，古今敏手不無闕遺，俟乎博求，續更編次。』則知其編撰宗旨本不遺同時作者。其後王玄撰擬皎然十九字所舉之例亦多錄同時之人，蓋即仍皎然舊例也。

大抵皎然論詩宗旨意取折衷，其論詩有四不，二要，二廢，四離，六至諸條：

氣高而不怒，怒則失於風流；力勁而不露，露則傷於斤斧；情多而不暗，暗則蹶於拙鈍；才贍而不疏，疏則損於筋脈。（詩有四不）

要力全而不苦澀，要氣足而不怒張。（詩有二要）

雖欲廢巧尙直，而思致不得置；雖欲廢詞尙意，而典麗不得遺。（詩有二廢）

雖期道情而離深僻，雖用經史而離書生，雖尙高逸而離迂遠，雖欲飛動而離輕浮。（詩有四離）

至險而不僻，至奇而不差，至麗而自然，至苦而無跡，至近而意遠，至放而不迂。（詩有六至）（注）

【注】顧龍振詩學指南本作七至有『至難而狀易』一句。

類此諸語，大率都欲使自然工力恰到好處。故詩評云：

> 或曰，詩不要苦思，苦思則喪於天眞。此眞不然。固當繹慮於險中，采奇於象外，狀飛動之趣，寫冥奧之思。夫希世之珍必出驪龍之頷，況通幽名變之文哉！但貴成章以後，有其易貌，若不思而得也。（據文鏡祕府論論文意條校增）

又詩式卷一論取境云：

> 取境之時，須至難至險，始見奇句；成篇之後，觀其風貌，有似等閑，不思而得，此高手也。

此即皎然論詩標準。此即詩式序中所謂「放意須險，定句須難，雖取由我衷而得若神表」的意思。所以他一方面對於齊梁以來靡麗之風頗加攻擊。如詩議云：「律家之流，拘而多忌，失於自然，吾常所病。」又詩評云：「齊梁之後，正聲寖微，人不逮古。」至如詩式之論四聲，謂「沈休文酷裁八病，碎用四聲，故風雅殆盡。後人才子，天機不高，爲沈生弊法所媚，懵然隨流，溺而不返。」論用事謂詩人不必以徵古爲用事，「凡禽魚草木人物名數萬象之中義類同者盡入比興。」其有「語似用事義非用事者，蓋由作者不欲委曲傷乎天眞。」（均見卷一）則知其於儷語聲律初非重視。許印芳詩式跋謂：「六朝以來詩人爭尚用事，然或不善驅使，往往意爲詞掩，又守四聲八病之說，動多拘忌，眞意淺失，其陋劣者抄襲名篇，攘奪佳句，貽譏盜竊，罔知愧恥，晝乃著詩式論列用事不用事之優劣，指示拘守聲病之流弊，又著偸語偸意偸勢三例，以偸語爲鈍賊，垂戒來學，可云痛切。」蓋即專就此方面言者。

但是皎然在另一方面却也不廢儷語與聲律，如詩評云：

或曰，今人所以不及古者病於儷詞。予曰不然。先正詩人時有儷詞；「雲從龍，風從虎，」非儷耶？「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非儷耶？但古人後於語，先於意。意因成語，語不使意。偶對則對，偶散則散。若力爲之則見斤斧之跡。故有對不失渾成，縱散不關造作，此古手也。（據文鏡秘府論校增）

又詩式云：

作者措意雖有聲律，不妨作用。如壺公瓢中，自有天地日月，時時拋鍼擲線，似斷而復續。此爲詩中之僊，拘忌之徒，非所企及矣。（卷一明作用條）

此皆不廢儷偶聲律之論。他這種折衷調和的主張，正由他的論詩主旨得來。他以爲：

作者須知復變之道；反古曰復，不滯曰變。若惟復不變，則陷於相似之格，其狀如駑驥同廐，非造父不能辨，能知復變之手，亦詩人之造父也。以此相似一類置於古集之中，能使弱手視之眩目何異！宋人死鼠爲玉璞，豈知周客嚧嘲而笑哉！又復變二門，復忌太過，詩人呼爲膏肓之疾，安可治也！如釋氏頓教，學者有沈性之失，殊不知性起之法，萬象皆眞。夫變若造微，不忌太過，苟不失正，亦何咎哉！如陳子昂復多而變少，沈宋復少而變多，今代作者，不能盡舉。吾始知復變之道，豈惟文章乎！在儒爲權，在文爲變，在道爲方便。後輩若乏天機，强効復古，反令思擾神沮。何則？夫不工劍術，而欲彈撫干將大阿之鋏，必有傷手之患，宜其誡之哉！

所以他雖有反對齊梁聲律的論調，而不同於陳李之復古，轉近於杜甫之集大成。其與杜甫不同者，不過比較更重在「神韻」。詩式序云『至如天眞挺拔之句，與造化爭衡，可以意冥，難以言狀，非作者不能知也。』所以他的詩論雖取折衷而較近於詩佛之詩論。我嘗以爲司空圖之論詩，爲王維一派之詩論，今若證以皎然所言，則往往有足爲司空圖之先聲者。

其一，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專論詩之風格；而皎然詩式所謂以十九字括詩之體者，亦是就風格而言，如云：

風韻朗暢曰高，體格閑放曰逸，放詞正直曰貞，臨危不變曰忠，持操不改曰節，立性不改曰志，風情耿介曰氣，緣境不盡曰情，氣多含蓄曰思，詞溫而正曰德，檢束防閑曰誡，性情疏野曰閑，心迹曠誕曰達，傷甚曰悲，詞理悽切曰怨，立言盤泊曰意，體裁勁健曰力，意中之靜曰靜，意中之遠曰遠。

此外詩式中「四不」「四深」「二要」「二廢」「四離」「六迷」「六至」「七德」等條，亦大抵就風格言。卽其論高手述作謂『如登荊巫，覩三湘鄢郢山川之盛，縈回盤礴，千變萬態，』亦善爲形似之語，頗與表聖詩品相類。

其二，司空圖論詩重在味外之旨，頗近後來以禪喩詩的嚴羽的論調；而皎然論詩卽開以禪論詩之旨。如詩式云：

康樂公早歲能文，性穎神徹，及通內典，心地更精，故所作詩發皆造極，得非空王之道助耶？……康樂爲文眞

於情性，尙於作用，不顧辭彩，而風流自然。彼清景當中，天地秋色，詩之量也；雕雲從風，舒卷萬狀，詩之變也。不然，何以得其格高，其氣正，其體貞，其貌古，其詞深，其才婉，其德容，其調逸，其聲諧哉！（卷一文章宗旨）

兩重意以上皆文外之旨，若遇高手如康樂公，覽而察之，但見情性，不覩文字，蓋詣道之極也。（卷一重意詩例）

是均為以禪論詩之始。唐代佛學盛極一時，禪宗尤多妙諦，惜時人於禪理詩理鮮有能溝而通之者。皎然所言亦不過微啓其端耳。

第四目　白居易與元稹

李杜而後，詩壇作風分為兩派：尙自然者趨於平易，以元白為之魁；重藝術者偏於奇警，以韓孟為之魁。蓋此時已不是唐詩的極盛時期，自然美與藝術美不得不偏勝，不復能像李杜這樣使二者相濟，恰到好處了。尙奇警者猶沿當時的風氣，故沒有什麼論詩的主張；尙平易者，欲矯當時之作風，故論詩之旨遂有可得而述者。中國的文學批評，本多為文學作風轉變之理論，所以承風氣者多論作法，而變風氣者則多論原理。韓愈論文頗多獨見，而論詩罕見妙諦，即由一變風氣而一承風氣故也。

胡適之先生的白話文學史謂：『元和長慶的時代，眞是中國文學史一個很光榮燦爛的時代。這時代的幾個領袖文人，都受了杜甫的感動，都下了決心要創造一種新文學。』由文學的方面說，的確是如此。若就文學批評的

方面說，則這時代的幾個領袖文人都受了陳子昂和李白的感動，都下了決心要完成他們復古的文學主張。且看白居易與元九書論作文大旨云：

> 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經首之。就六經言，詩又首之。何者？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聲，莫深乎義。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上自賢聖，下至愚騃，微及豚魚，幽及鬼神，群分而氣同，形異而情一；未有聲入而不應，情交而不感者。聖人知其然，因其言，經之以六義；緣其聲，緯之以五音。音有韻，義有類。韻協則言順，言順則聲易入。類舉則情見，情見則感易交。於是乎孕大含深，貫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氣泰，憂樂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為大柄，決此以為大寶也。（白氏長慶集二十八）

他論詩因崇尚自然而偏於質，還不要緊，至於論到質而謂『莫先乎情，莫深乎義，』便不免稍偏了。謂詩根於情本是不錯，但因以義為「實」之故，於是所謂情者亦不過如詩序所云『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說而已。必欲以止乎禮義之標準以衡詩，則詩國之疆域狹矣，且看他說：

> 故聞「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則知虞道昌矣；聞五子洛汭之歌，則知夏政荒矣。言者無罪，聞者足誡，言者聞者莫不兩盡其心焉。
>
> 洎周衰秦興，采詩官廢，上不以詩補察時政，下不以歌洩導人情。用（一作乃）至於諂成之風動，救失之道缺，于時

六義始刓矣。

國風變爲騷辭，五言始於蘇李。詩騷皆不遇者，各繫其志發而爲文，故河梁之句止於傷別，澤畔之吟歸於怨思，彷徨抑鬱，不暇及他耳。然去詩未遠，梗概尚存，故興離別則引雙鳧一鴈爲喻，諷君子小人則引香草惡鳥爲比，雖義類不具，猶得風人之什二三焉。于時六義始缺矣。

晉宋已還，得者蓋寡。以康樂之奧博，多溺於山水；以淵明之高古，偏放於田園。江鮑之流，又狹於此。如梁鴻五噫之倫者，百無一二。于時六義寖微矣。

陵夷至於梁陳間，率不過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噫！風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豈捨之乎？顧所用何如耳！設如『北風其涼』假風以刺威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華』感花以諷兄弟，『采采芣苢』美草以樂有子也。皆興發於此而義歸於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則『餘霞散成綺，澄江淨如練』，『歸花先委露，別葉乍辭風』之什，麗則麗矣，吾不知其所諷焉。故僕所謂嘲風雪，弄花草而已。于時六義盡去矣。

唐興二百年，其間詩人不可勝數。所可舉者陳子昂有感遇詩二十首，鮑防有感興詩十五篇。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風雅比興，十無一焉。杜詩最多，可傳者千餘首，至於貫穿古今，覼縷格律，盡工盡善，又過於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關吏蘆子關花門之章，『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之句，亦不過三四十首。杜尚如此，況不逮杜者乎！（與元九書）

這纔是詩國十足復古的論調。陳李復古不過復到漢魏的風骨；元白復古纔要復到三百篇之六義。愈轉而愈上，除了後世道學家外，異可謂是詩國極端的復古論了。然而李白主張復古而作風實是清新俊逸，白居易主張復古而作風更爲平易近俗：由文學言則爲進化，由批評言則爲復古，這種相反的現象，或者以當時復古的思潮正濃，所以文人主張文以貫道，而詩人也要主張詩以述義了。

讀者於此，或將不免懷疑，以爲文學與批評頗有關係，何以就文學言則是進化，是革新；由批評言則成退化成復古呢？此二者之交互的影響極爲密切，何以會有這種矛盾的現象呢？實則不必疑也。社會上一切文物的進化，大都是循環式的進化，波浪式的進化。作家之受批評界之影響，固也；但是批評界的復古說儘管高唱入雲，而歷史上的事實，終究是進化的。所以作家雖受復古說的影響，而無論如何終不會恢復古來的面目，維持古來的作風。非惟如此，作家因這種影響，反足以變更當時的作風，反因復古而進化。這是所謂循環式的進化。但是他不是如循環然的周而復始的，後人的復古決不仍是以前的古而是後人的古，所謂後波逐前波，後波的起伏同於前波的起伏，而後波決不便是前波，這是所謂波浪式的進化。由於這樣則何疑於他們文學與批評之矛盾呢？所以可以說他們下了決心要創造一種新文學，也可以說他們下了決心要完成復古的文學主張。

現在且再舉數端以證明之。其一，白居易因欲保持六義四始之風，於是悟到一個原理，卽是：

『文章合爲時而著，歌詩合爲事而作。』（與元九書）

這個原理，是上文復古思想的結論。其新樂府自序云：

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覈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於樂章歌曲也。總而言之，爲君爲臣爲民爲物爲事而作，不爲文而作也。（白氏長慶集三）

所以他的讀張籍古樂府云：『爲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白氏長慶集一）其寄唐生詩云：『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願得天子知。』（同上）這些話都所以實行他們復返六義的文學主張。但是爲時而著，則時不一矣；爲事而作，而事又非一矣。他既以詩是以情爲根的，則所以引起情的時與事既異，其作風體格當然亦不能强合了。從這種復古說所推得的原理，而結果却因歷史的變遷，不得不逼著向進化的道上走。且看他所處的時爲何如？他所遭的事又何如呢？他說：

凡聞僕賀雨詩，衆口籍籍以爲非宜矣。聞僕哭孔戡詩，衆面脈脈盡不悅矣。聞秦中吟則權豪貴近者，相目而變色矣。聞登樂遊園寄足下詩則執政柄者扼腕矣。聞宿紫閣村詩則握軍要者切齒矣。大率如此，不可徧舉。不相與者號爲沽譽，號爲詆訐，號爲訕謗；苟相與者，則如牛僧孺之誡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我爲非也。其不我非者，舉世不過三兩人。有鄧魴者，見僕詩而喜，無何，魴死。有唐衢者，見僕詩而泣，未幾而衢死。其餘則足下；足下又十年來困躓若此。嗚呼！豈六藝四始之風，天將破壞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聞於上耶？不然，何有志於詩者，不利若此之甚也。（與元九書）

他所處的時，他所遭的事，盡是一些下人病苦的材料，於是本此原理，遂一變「嘲風月弄花草」的文學而爲「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的文學。這所以批評論調儘管復古而創作自然成爲進化了。我們且看元稹的敍詩寄樂天書：

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閫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衆，橫相賊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色（邑？）將某能遏亂，亂衆寧附，願爲帥。名爲衆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自爲旨意，有羅列兒孩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几閣，甚者礙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爲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里計。其餘奴婢貨財生生之備稱是。朝廷大臣以謹慎不言爲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隳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闥中小碎須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于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示，吟翫激烈，即日爲寄思玄子詩二十首。……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

揚巨源友善；日課爲詩，性復僻，懶人事；常有閑暇，閑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篇矣。習慣性靈，遂成病蔽。……

……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閑處，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懶於他欲，全盛之氣，注射語言，雜揉精粗，遂成多大。（元氏長慶集三十）

這又是從時代環境的一方面說明他們作諷諭詩的緣故。從元稹所論，可看出他們決心創造新文學的意思；從白居易所論，又可看出他們決心完成復古主張的意思。白居易說：

僕常痛詩道崩壞，忽忽憤發，或食輟哺，夜輟寢，不量才力，欲扶起之。（與元九書）

道與陳子昂所謂『僕嘗暇時觀齊梁間詩，采麗競繁，而興寄都絕，每以永歎！』云云又有什麼分別！事每有相反而適以相成者；所以批評上的復古說，未必非文學上的進化現象也。

其二，元白的作風因主平易而尚質。白居易策林（六十八）云：

臣又聞，稂莠秕稗，生於穀，反害穀者也；淫辭麗藻，生於文，反傷文者也。故農者耘稂莠，簸秕稗，所以養穀也；王者刪淫辭，削麗藻，所以養文也。

伏惟陛下詔主文之司，諭「養文」之旨，俾辭賦合炯戒諷諭者，雖質雖野，採而奬之；碑誄有虛美媿辭者，雖華雖麗，禁而絕之。若然，則爲文者必當尚質抑淫，著誠去僞，小疵小弊，蕩然無遺矣。

此亦申尚質著誠之旨。不過所謂質有二端：一是情，卽他所謂「根情」；一是義，卽他所謂「述義」。根情者是他的

所謂諷諭詩，以情爲主而義附之，蓋是爲時而著爲事而作的。述義者是他的所謂閑適詩，以義爲主而情附之，蓋又是臥病閑居吟玩性情之作。白居易與元九書中論之云：

古人云：『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僕雖不肖，常師此語。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時。時之來也，爲雲龍，爲風鵬，勃然突然陳力以出。時之不來也，爲霧豹，爲冥鴻，寂兮寥兮，奉身而退。進退出處，何往而不自得哉！故僕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爲道，言而發明之則爲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故覽僕詩者，知僕之道也。

覽詩何以能知其道呢？這也可於白居易序洛詩中見之。他說：

在洛，凡五周歲，作詩四百三十二首。除喪明哭子十數篇外，其他皆寄懷於酒，或取意於琴，閑適有餘，酣樂不暇；苦詞無一字，憂歎無一聲，豈牽强所能致耶？蓋亦發中而形外耳。斯樂也，實本之於省分知足，濟之以家給身閑，文之以觴咏弦歌，飾之以山水風月，此而不適，何往而適哉？茲又以重吾樂也。（白氏長慶集六十一）

惟能有所自得，所以不致爲一己的憤憂怨傷之作，而於其詩中可以看出他的人格，可以看出他的道義。這種作風或者是受唐釋寒山拾得之流的影響；這種思想，或者是受韓柳文以明道的影響。論到詩，雖不能以此說盡詩的全體，以此爲唯一的標準，但這種標準却也在詩國闢了一個新境界。後來邵雍的擊壤集即近此種作風者。

其三，白居易因詩序『發乎情止乎禮義』之語，而謂根情實義；又因詩序『發言爲詩』及『情發於聲』諸

語而謂昔言華辭。以此，亦欲復返於詩樂合一的情形。於是稱他的美刺興比，因事立題諸作，謂之新樂府；而元稹亦以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爲樂諷，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爲新題樂府。這實在也是文學上的進化。元稹樂府古題序云：

> 自風雅至於樂府，莫非諷興當時之事，以貽後世之人，沿襲古題，唱和重複，於文或有短長，於義咸爲贅賸。尙不如寓意古題，刺美見事，猶有詩人引古以諷之義焉。曹劉沈鮑之徒時得如此，亦復稀少。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郎事名篇，無復倚傍。余少時與友人白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爲當，遂不復擬賦古題。（元氏長慶集二十三）

於此可知儘管受復古說的影響，亦自會在創作方面闢出新境界的。白居易策林（六十）云：

> 太學生徒誦詩書之文，而不知詩書之旨；太常工祝執禮樂之器，而不識禮樂之情。遺其旨則作忠興孝之義不彰；失其情則合敬同愛之誠不著。所謂去本而從末，棄精而好粗。

他欲人知詩書之旨，識禮樂之情，能得如此則詩樂爲一，而詩樂之作用以彰。這種見解，正是後來道學家所竭力主張的。

第二節 文壇的復古說

第一目 文與文化

我嘗讀文心雕龍原道一篇，而推求其所謂「道」是什麼！一時殊不易了解其意義。何以故？因為他說：

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傍及萬品，動植皆文。龍鳳以藻繪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雲霞雕色，有踰畫工之妙；草木賁華，無待錦匠之奇：夫豈外飾，蓋自然耳。

又說：

人文之元，肇自「太極」，幽贊神明，易象惟先。庖犧畫其始，仲尼翼其終，而乾坤兩位，獨制文言。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若乃河圖孕乎八卦，洛書韞乎九疇，玉版金鏤之實，丹文綠牒之華，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爰自風姓，暨於孔氏，玄聖創典，素王述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研神理而設教；取象乎河洛，問數乎蓍龜，觀天文以極變，察人文以成化。然後能經緯區宇，彌綸彝憲，發揮事業，彪炳辭義，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

則是此篇所言在闡「原於道之旨」，並不是申文以載道之意；故其所謂道，當然指的自然之道，而不限於儒家之道。黃侃文心雕龍札記說得好：

物理無窮，非言不顯，非文不傳。故所傳之道，即萬物之情也。人倫之傳，無小無大，靡不並包。（范文瀾文心雕龍講疏引）

又云：

序志篇云：『文心之作也本乎道。』案彥和之意，以文章本由自然而生，故篇中數言自然。一則曰，『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再則曰，『夫豈外飾，蓋自然耳。』三則曰，『誰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尋繹其旨，甚爲平易。蓋人有思心，卽有言語；旣有言語，卽有文章。言語以表思心，文章以代言語；惟聖爲能盡文之妙。所謂道者如此而已。此與後世言「文以載道，」截然不同。詳淮南王書有原道篇，高誘註曰：『原本也；本道根眞，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韓非子解老篇曰：『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理者成物之文也；道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故曰道理之者也。……聖人得之以成文章。』莊子天下篇曰：『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案莊韓之言道，猶言萬物之所由然，文章之成亦由自然。故韓子又言『聖人得之以成文章。』韓子之言，正彥和所祖也。道者玄名也，非著名也；玄名故通於萬里，而莊子且言道在矢溺。今曰『文以載道，』則未知所載者，卽此萬物之所由然乎，抑別有所謂一家之道乎？如前之說，本文章之公理，無庸標揭以自殊于人；如後之說，則亦道其所道而已，文章之事，不如此狹隘也。夫堪輿之內，號物之數曰萬。其條理紛紜，雖人鬢蠶絲，猶將不足方物，今置一理以爲道，而曰文非此不可作；非獨昧於語言之本，其亦膠滯而罕通矣。察其表則爲誣言，察其裏初無勝義，使文章之事，愈痟愈削，寖成爲一種枯槁之形；而世之爲文者，亦不復研究學術，研尋眞知，而惟此竊言之尚。然則階之厲者，非「文以載道」之說，而又誰乎？通儒顧寧人生平篤信文以載道之言，至不可爲李二曲之母作誌，斯則矯枉之過，而非通方之談。方

來君子，庶無憒焉。

他這一節話關文以載道之說殊為痛快。說明原道一篇重在論自然之道也殊的當。然如文心宗經篇云：

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恆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參物序，制人紀，洞性靈之奧區，極文章之骨髓也。……自夫子刪述，而大寶咸耀；……義既極乎性情，辭亦匠於文理，故能開學養正，昭明有融。

又序志篇云：

夫文心者，言為文之用心也。……予生七齡，乃夢彩雲若錦，則攀而採之；齒在踰立，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隨仲尼而南行。旦而寤，乃怡然而喜。大哉聖人之難見哉！乃小子之垂夢歟？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注經；而馬鄭諸儒，宏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五禮資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煥，軍國所以昭明。詳其本源，莫非經典。而去聖久遠，文體解散；辭人愛奇，言貴浮詭，飾羽尚畫，文繡鞶帨，離本彌甚，將遂訛濫。蓋周書論辭，貴乎體要；尼父陳訓，惡乎異端。辭訓之異，宜體於要。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

則是劉氏論文之旨明在宗經徵聖，而欲敷讚其旨，似乎所言之道，也未嘗不可以儒家一家之道解之。是則雖謂文以載道之說，原於文心原道一篇，要亦未可厚非。因此，文心雕龍之所謂「道，」究指自然之道乎？抑僅就儒家言之乎；這個問題，似乎不易解答，但是可於唐人的文論中看出其關係。蓋劉勰之所謂「道，」祇指自然之道，祇指萬物

之情，然「作者曰聖，」聖文固原於道，——所原的固是自然之道。而「徵聖立言，」則後人之文亦正所以明其道或載其道罷了；所明的或所載的便成爲儒家之道了。所以唐人論文，最初便以文化爲文；以文化爲文，則所明者即自然之道也。其後乃以爲文主教化；以文主教化，雖也以文化爲文，而已偏於儒家的意旨了。最後始揭文以明道之旨，於是所論之道，只成爲儒家之道，所以要排異端，所以要闢佛老了。

今考韓柳以前一般人之論文章，大率以文化爲言。即在韓柳同時或稍後之人，其並不言文以明道而也足爲韓柳之羽翼者，其論文主旨也大率如此。所以唐人論文恆以天文人文爲比。此在初唐史家已是如此。如周書王褒庾信傳論云：『兩儀定位，日月揚輝，天文彰矣；八卦以陳，書契有作，人文詳矣。』隋書文學傳序云：『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堯曰則天，表文明之稱，周云盛德，著煥乎之美。』北齊書文苑傳序云：『夫玄象著明，以察時變，天文也；聖達立言，化成天下，人文也。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其在文乎。』史家論文以不滿於南朝文學之故，所以重人文而不重詞章。唐人文論，卻正喜在此點闡發，所以漸漸形成復古的風氣了。茲錄數篇主張較明顯者於後。

大矣哉文之時義也！有天文焉，察時以觀其變；有人文焉，立言以重其範。歷年滋久，遞爲文質，應運以發其明，因人以通其粹。（楊炯王勃集序）辰象文於天，山川文於地，肖形最靈，經緯教化，鼓天下之動，通萬物之宜，而人才作焉，三才備焉。命代大君子所以序九功，正五事，精義入神，英華發外，著之話言，施之憲章，文明之盛

與天地準。（權德輿贊皇文獻公李栖筠文集序）

傳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數成而文見矣。始自天地，終於草木，不能無文也，而況於人乎？且夫日月星辰天之文也；邱陵川瀆地之文也；羽毛彪炳，鳥獸之文也；華葉彩錯，草木之文也。天無文，四時不行矣；地無文，九州不別矣；鳥獸草木之無文，則混然而無名，而人不能用之矣；人無文則禮無以辨其數，樂無以成其章，有國者無以行其刑政，立言者無以存其勸誡。文之時用大矣哉。在人，賢者得其大者，禮樂刑政勸誡是也；不肖者得其細者，或附會小說以立異端，或雕斵成言以裨對句，或志近物而玩童心，或順庸聲以諧俚耳。其甚者則矯誣盛德，汙蠛風教，爲蟲爲蠹，爲妖爲孽。噫！文之弊有至是者，可無痛乎？（李舟獨孤常州集序）

夫大者天道，其次人文。在昔聖王以之經緯百度，臣下以之弼成五教；德又下衰，則怨刺形於歌詠，諷議彰乎史冊。故道德仁義，非文不明；禮樂刑政，非文不立。文之興廢，視世之治亂；文之高下，視才之厚薄。唐興，接前代澆醨之後，承文章顛墜之運，王風下扇，舊俗頓易，不及百年，文體反正。洎公（獨孤及）爲之，則又操道德爲根本，總禮義爲冠帶，以易之精義，詩之雅訓，春秋之褒貶，屬之於詞；故其文寬而簡，直而婉，辯而不華，博厚而高明。論人無虛美，比事爲實錄。天下凜然，復覩兩漢之遺風。（梁肅常州刺史獨孤君集後序）

如右諸說，與文心雕龍所謂『文之爲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云云有何分別。所以以天文人文而爲言者，其所謂

文當然要合於道，而所謂「道」，當然可以不限於儒家之道，而也未嘗不可僅限於儒家之道。如權德輿中嶽宗玄先生吳尊師集序云：

> 道之於物，無不由也，無不貫也，而况本於玄覽，發爲至言。言而蘊道，猶三辰之麗天，百嘉之麗地，平夷章大，恬淡溫粹，飄飄然軼八紘而泝三古，與造物者爲徒。其不至者，遺言則華，涉理則泥，雖辯麗可嘉，采真之士不與也。（權載之文集三十三）

此所謂「言而蘊道」即是指道家之道言者。至如尙衡文道元龜云：

> 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德。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緯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之爲道，斯亦遠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乎？
>
> 夫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闔，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焉。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爲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爲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爲下等，其思全。其思也，可以綱紀物義也，可以勸衆德也，可以經化。化人之作，其惟君子乎？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爲之質，後乎言，言爲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質文相半，斯乃化成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諷，志必有所之，詞寡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抒情，屬詞以及物，及物勝則詞麗，抒情逸則氣高。高者求清，麗者求婉，恥乎質，

貴乎情，而忘其志，斯乃頹靡之道焉。

古人之貴有文者，將以飾行表德，見情著事，杼軸乎天人之際，達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奧。苟失其道無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著；志士也文成而德喪；然今之代其多詞士乎？代由尙乎文者。以斯文而欲軌物範衆，經邦敘政，其難致乎化成。悲夫！敢著元龜，庶觀文章之道得喪之際，悔吝之所由者也。

此以君子之文爲標的，以德全者爲上，便偏主於質，同於宋代道學家的論調了。後此諸人，如呂溫之人文化成論（呂和叔文集十）如顧況之文論（全唐文五百二十九）大率皆發揮此旨，而更偏極端。茲錄其文於後：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能諷其言，蓋有之矣；未有明其義者也。嘗試論之：夫一二相生，大鈞造物，百化交錯，六氣節宣，或陰闔而陽開，或天經而地紀，有聖作則，實爲人文。若乃夫以剛克，妻以柔立，父慈而教，子孝而箴，此室家之文也。君以仁使臣，臣以義事君，予違汝弼，獻可替否，此則朝廷之文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九流異趣，百揆同歸，此則官司之文也。寬則人慢，糾之以猛；猛則人殘，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此刑政之文也。樂勝則流，過之以禮；禮勝則離，和之以樂；與時消息，因俗變通，此教化之文也。文者蓋言錯綜庶績，藻繪人情，如成文焉，以致其理。然則人文化成之義，其在茲乎？而近代諂諛之臣，特以時君不能則象乾坤，祖述堯舜，作化成天下之文，乃以旂裳冕服，章句翰墨，爲人文也。遂使君人者浩然忘本，沛然自得，盛威儀以求至理，坐吟詠而待太平，流蕩因循，敗而未悟，不其痛歟？必以旂常冕服爲人文，則秦漢魏晉聲明文物，禮縟五帝，

儀繁三王，可曰『煥乎其有文章』矣。何衰亂之多也！必以章句翰墨爲人文，則陳後主隋煬帝雍容倚靡，洋溢簡編，可曰『文思安安』矣。何滅亡之速也，蹙之以名義，研之以情實，旣如彼；校之以今古，質之以成敗，又如此。傳不云乎？『經緯天地曰文。』禮不云乎？『文王以文理。』則文之時義其大矣哉！焉可以名數末流，雕蟲小技，厠雜其間也。（呂溫人文化成論）

周語之略曰，孝敬忠信，仁義智勇教惠讓皆文也。天有六氣，地有五行，此十一者經緯天地，叶和神人，名之爲文。其質行也文顯行，行顯文，文行相兩，謂之君子之文。爲雖爲書，上古云，『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堯之爲君，『聰明文思』；『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文王之代，草木鳥獸，皆樂文王之沼曰靈沼，文王之臺曰靈臺，廣芮不讓文王，入文王里，所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班白不提挈，自相謂曰，吾黨之小子，不可治於君子之庭，詩人美之云，『文王斷虞芮之訟。』晉文與楚子戰而霸，謚曰文公。夫以伏羲之文造書契；黃帝之文垂衣裳；重華之文除四凶，舉八元；周公之文布法於象魏；夫子之文木鐸徇路；此其所以理文也。伊尹之文，放太甲，霍光之文廢昌邑，呂倘之文殺華士，穰苴之文斬莊賈，毛遂之文定楚從，藺相如之文奪趙璧，西門豹之文引漳水沈女巫。建安正始，洛下鄴中，吟咏風月，此其所以亂文也。夫以文求士，十致八九，理亂由之，君臣則之。堯舜禹湯有文，桀紂幽厲無文。太顚閎夭有文，飛廉惡來無文。昔霍去病辭第，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於國如此，不得謂之無文。范蔚宗著後漢書，其妻不勝珠翠，其母唯薪樵一廚。於家如此，不得謂之有文。且夫日月麗乎

天，草木麗乎地，風雅亦麗於人。是故不可廢。廢文則廢天，莫可法也。廢天則廢地，莫可理也。廢地則廢人，莫可象也。郁郁乎文哉！法天理地象人者也。周易贊乾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贊坤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唯大者配乾，至者配坤，幽者贊鬼神，明者贊禮樂，不失於正，謂之爲文。（顧況文論）

論人文而輕視名數末流，雕蟲小技，猶可言也。論文而至以孝敬忠信仁義智勇等爲文，甚且以霍去病非無文，范曄宗非有文，則不免太偏於廣義的人文方面了。所以劉勰原道，雖也根於人文立論，而較重自然，不局於儒家之旨。而唐人之論人文，則漸漸狹其範圍，成爲儒家的論旨。此所以由原道說可以漸漸成爲載道說也。紀昀批文心雕龍原道篇云：『文以載道，明其當然；文原於道，明其本然。』實則明其本然者，指聖作而言，明其當然者指後人徵聖之作而言。義界大小蓋由於此，所以同樣的論「自然，」唐人所論也較劉氏的意義爲狹。這於獨孤郁辯文一篇中可以見之。辯文云：

或曰，『文所以指陳是非，有以多爲貴也。其要在乎彩飾其字，而愼其所爲體也。』又曰，『文章乃一藝耳。』是皆不知上流之文，而文之所由作也。夫天之文位乎上，地之文位乎下，人之文位乎中。不可得而增損者，自然之文也。故伏羲作八卦以象天地，窮極終始，萬化無有差忒，故易與天地準。此聖人之文至也。但合其德而三才之道盡，後聖有作，不能使之爲五或七而九；迴曲折者，是其文之至也。文字既生，治亂既形，仲尼作春秋以繩萬世，而襃貶在一字，是亦文之至者乎？然則易卦之一畫，春秋之一字，豈所謂崇飾之道，而尙多之意邪？

夫文者，考言之具也。可以革，則不足以畢天地矣。故聖人嘗使將來無得以筆削，果可以包舉其義，雖一毫一字其可已矣。病不能然，而曰必以彩飾之能，援引之富，爲作文之秘訣，是何言之末歟？夫天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日月星辰不可踰。地豈有意於文彩耶？而山川丘陵不可加。八卦春秋豈有意於文彩耶？而極與天地侔。其何故得以不可越？自然也。夫自然者，不得不然之謂也。不得不然，又何體之煩邪？……是故在心曰志，宣於口曰言，垂於書曰文，其實一也。若聖與賢則其書文皆教化之至言也，徒見其纖靡而無根者，多紿曰文與藝，嗚呼！（全唐文六八三）

論文而至以伏羲八卦孔子春秋爲例證，眞太不知昭明所謂「踵事增華」之理。這樣主張自然，便太偏於質，也成爲後世道學家的論調。所以我以爲自有南朝劉勰之自然說，至唐代遂以成爲古文家的文，自有唐代獨孤郁諸人之自然說，至宋代遂以成爲道學家的文。影響固屬不同，淵源則出於一。蓋劉勰之自然說，雖不限於儒家，而儒家之論旨也正可範圍在內的。唐人所言不過本此推闡而更着眼在儒家思想以發揮耳。

唐人既以文化爲文，於是論文恆及於政事。蓋不能在道的方面有所闡發，則當然論文主用，近於政治家之論文了。崔元翰與常州獨孤使君書云：

天之文，以日月星辰；地之文，以百穀草木。生於天地而肖天地，聖賢又得其靈和粹美，故皆含章垂文，用能裁成庶物，化成天下，而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時雍，其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而唐堯虞舜禹湯文武之代，

則憲章法度禮樂存焉；皋陶伯益伊傅周召之倫，則誥命謨訓歌頌傳焉；其後衛武召穆吉甫仍叔成作之詩，並列於雅。孔聖無大位，由修春秋，述詩易，反諸正而寄之治，而素臣邱明，游夏之徒，又述而贊之。推是而言，為天子大臣，明王道，斷國論，不通乎文學者，則陋矣。士君子立於世，升於朝，而不繇乎文行者，則僻矣。然患後世之文，放蕩於浮虛，舛馳於怪迂，其道遂隱。謂宜得明哲之師長，表正其根源，然後教化淳矣。（全唐文五二三）

其論文主旨以為「治平之主必以文德致時雍，承輔之臣亦以文事助王政，」離開用便不足以言文。而權德輿博陵崔君文集序亦謂：

易賁之象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故闕里之四教，門人之四科，未有遺文者。荀況孟軻修道著書，本於仁義，經術之枝派也。迨夫騷人怨思之作，游士縱橫之論，剸削捭闔，文憲陵夷。至漢廷賈誼劉向班固揚雄司馬遷相如之儔，鬱然復興，有古風烈。然則文之用也，橫三才之中，經紀萬事，章明彝類，不可已也。殷之說命，周之命君陳君牙，楚射父之訓辭，鄭東里之潤色，天子諸侯告命之文也。張老之輪奐，史克之駉駜，吉甫之清風，伯喈之無愧，賢士大夫頌述之文也。至若夫子紀延陵墓，叔向寓子產書，董仲舒射策言天人相與之際，阮元瑜書記翩翩之任，觸類滋多，非文不彰。後之人力不足者詞或侈靡，理或底伏，文之難能也如是。（補闕之文集二十三）

此亦重在「用」的觀點以論其文，可知其文的內容正與其論旨相符。又如李華尚書崔孝公集序云：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樂繫乎時。本乎作者六經之志也。繫乎時者，樂文武而哀幽厲也。立身揚名，有國有家化民成俗，安危存亡，於是乎觀之。宣于志者曰言，飾而成之曰文，有德之文信，無德之文詐。皋陶之歌，史克之頌，信也。子朝之告，宰嚭之詞，詐也；而士君子恥之。夫子之文章，偃商傳焉；偃商沒而孔伋孟軻作，蓋六經之遺也。屈平宋玉哀而傷，靡而不遠，六經之道遯矣。論及後世，力足者不能知之，知之者力或不足，則文義寖以微矣。文顧行，行顧文，此其與於古歟。

此以本乎作者哀樂繫時爲言，而獨孤及趙郡李華中集序亦謂：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爲用，亦猶涉川者假舟楫而後濟。自典謨缺，雅頌寢，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後比興。其風流蕩而不返，乃至有飾其詞而遺其意者，則潤色愈工，其實愈喪。及其大壞也，儷偶章句，使枝對葉比，以八病四聲爲梏拲，守之如奉法令，聞皋陶史克之作，則呻然笑之。天下雷同，風馳雲趨，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猶木蘭爲舟，翠羽爲楫，翫之於陸而無涉川之用。痛乎流俗之惑人也久矣。帝唐以文德敷乂于下，民被王風，俗稍丕變，至則天太后時陳子昂以雅易鄭，學者寖而嚮方。天寶中公與蘭陵蕭茂挺、長樂賈幼幾，勃焉復起，用三代文章，律度當世。公之作本乎王道，大抵以五經爲泉源，抒情性以託諷，然後有歌詠。美教化，獻箴諫，然後有賦頌。懸權衡以辯天下公是非，然後有論議。至若記敘編錄銘鼎刻石之作，必採其行事，以正褒貶，非夫子之旨不書。故風雅之指歸，刑政之根本，忠孝之大倫，皆見於詞。然後中古

之風復形於今。（毘陵集十三）

此文亦正申李氏『本乎作者哀樂繫時』之旨。崔李二氏，其自己論文之旨，與人之所以序其文者，皆重在政化的方面，亦可知其論文主旨之偏重於用了。稍後梁肅論文，闡說此意便更爲明晰。如云：

文章之道與政通矣。世教之汙崇，人心之薄厚，與立言立事者邪正臧否，皆在焉。故登高能賦，可以觀者，可與圖事；誦詩三百，可以將命，可與專對。（秘書監包府君集序）

予嘗論古者聰明睿智之君，忠肅恭懿之臣，敘六府三事同八風七律，莫不言之成文，歌之成聲。然後浹於人心，人心安以樂，播於風俗，風俗厚以順。其有不由此者，爲理則隳，在音則煩。隳之弊也悖；悖一作 煩之甚也亂。（李泌文集序）

文之作，上所以發揚道德，正性命之紀；次所以裁成典禮，厚人倫之義；又其次所以昭顯義類，立天下之中。三代之後，其流派別。炎漢制度，以霸王道雜之，故其文亦二：賈生馬遷劉向班固，其文博厚，出於王風者也；枚叔相如揚雄張衡，其文雄富，出於霸塗者也。（左補闕李翰前集序）（注）

【注】並見全唐文五百十八卷

因此，可知柳冕論文主於教化，正是此種思想的關係了。

第二目　柳冕

柳冕字敬叔，貞元中官御史中丞福州刺史充福建觀察使。全唐文五百二十七卷錄其文。其時代略較韓愈爲前，文學觀亦頗同於韓愈，誠是古文家論文之先聲。尤其重要的，是他以教化論文的主張。因爲此種主張是他以前以文化論文，與他以後以道論文的樞紐。由文學批評史上的地位言，實在有特別提出的必要。

大抵柳氏論文是徹頭徹尾的實用主義。其所謂用的標準是什麼？便是教化。他以爲文章宜本於教化，他說：

故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則是一技耳。——語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文章，技藝之流也；故夫子末之。是以四楊荀陳，以德行經術名震海內，門生受業，皆一時英俊，而文章之士不得在游夏之籍。非夫兩漢近古猶有三代之風乎？惜也繫王風而不本於王化！（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

昔堯舜歿，雅頌作；雅頌寢，夫子作。未有不因於教化爲文章以成國風。（荅荊南裴尚書論文書）

文章本於教化，形於治亂，繫於國風。故在君子之心爲志，形君子之言爲文，論君子之道爲教。易云：『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君子之文也。自屈宋已降爲文者本於哀艷，務於恢誕，亡於比興，失古義矣。雖揚馬形似，曹劉骨氣，潘陸藻麗，文多用寡，則是一技，君子不爲也。（與徐給事論文書）

且今之文章與古之文章立意異矣。何則？古之作者因治亂而感哀樂，因哀樂而爲詠歌，因詠歌而成比興。故大雅作則王道盛矣，小雅作則王道缺矣，雅變風則王道衰矣，詩不作則王澤竭矣。至於屈宋，哀而以思，流而

以教化爲標準，所以攻擊今文而推崇古文。其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云：

不返，皆亡國之音也。至於西漢，揚馬已降，置其盛明之代，而習亡國之音，所失豈不大哉！然而武帝聞子虛之賦，歎曰：『嗟乎朕不得與此人同時。』故武帝好神仙，相如為大人賦以諷，上讀之，飄飄然有陵雲之志。子雲非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子雲知之不能行之。於是風雅之文變為形似，比興之體變為飛動，禮義之情變為物色，詩之六義盡矣！何則？屈宋唱之，兩漢扇之，魏晉江左隨波而不返矣。

這種論調宛然是後來白居易詩的復古說之口吻。其與徐給事論文書云：

昔武帝好神仙，而相如為大人賦以諷。帝覽之，飄然有凌雲之氣。故揚雄病之曰：『諷則諷矣，吾恐不免於勸也。』蓋文有餘而質不足則流，才有餘而雅不足則蕩，流蕩不返，使人有淫麗之心，此文之病也。雄雖知之，不能行之，行之者惟荀孟賈生董仲舒而已！

這種論調又同於韓愈的主張。所以這種提倡古文的論調，便是韓柳的先聲。

以教化為標準，所以創為文道合一的主張。其答荊南裴尚書論文書云：

君子之儒學而為道，言而為經，行而為教，聲而為律，和而為音，如日月麗乎天無不照也，如草木麗乎地無不章也，如聖人麗乎文無不明也。故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謂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謂也。言而不能文，君子恥之。及王澤竭而詩不作，騷人起而淫麗興，文與教分而為二；以揚馬之才則不知教化，以荀陳之道則不知文章。以孔門之教評之，非君子之儒也。夫君子之儒，必有其道，有其道必有其文。道不及文則德勝，

文不及道則氣衰，文多道寡，斯爲藝矣。

其答徐州張尙書論文武書云：

夫文章者本於敎化，發於情性。本於敎化，堯舜之道也；發於情性，聖人之言也。自成康沒，頌聲寢，騷人作，淫麗興。文與敎分而爲二。不足者强而爲文，則不知君子之道；知君子之道者，則恥爲文。文而知道，二者兼難；兼之者大君子之事。上之，堯舜周孔也；次之，游夏荀孟也；下之，賈生董仲舒也。夫日月之麗，仰之愈明，金石之音，聽之彌清。故聖人感之而文章生焉，敎化成焉。哀樂形焉。逮德下衰，文章敎化，掃地盡矣。嘻！聖人之道，猶聖人之文也。學其道不知其文，君子恥之。學其文不知其敎，君子亦恥之。

又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云：

門人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卽聖人之道可企而及之者，文也。不可企而及之者，性也。蓋言敎化發乎性情，繫乎國風者謂之道。故君子之文必有其道。道有深淺，故文有崇替；時有好尙，故俗有雅鄭。雅之與鄭，出乎心而成風。昔游夏之文，日月之麗也；然而列於四科之末，藝成而下也。苟文不足，則人無取焉。故言而不能文，非君子之儒也；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也。

這種論調又同於韓愈的主張；形式方面以古文爲依歸，實質方面以儒道爲依歸。所以我說在批評方面，柳冕實開

韓柳之先聲。

然而一般講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的，大都重視韓愈而忽於柳冕，則又何歟？其最重要的一點，或由於柳冕的文不逮韓愈。這一點柳冕亦自知之，而屢言之。他說：

> 小子志雖復古，力不足也；言雖近道，辭則不文，雖欲拯其將墜，末由也已。（答荆南裴尚書論文書）

> 老夫雖知之不能文之，縱文之不能至之，況已衰矣，安能鼓作者之氣，盡先王之教。（與滑州盧大夫論文書）

> 僕自下車為外事所感，感而應之，為文，不覺成卷，意雖復古，而不逮古，則不足以議古人之文。（與徐給事論文書）

有心無力，這是他不及韓愈的地方。韓文流傳既盛，則其論文的思想當然易為人所注意，而柳冕便不免為人所忽視了。但我以為這猶不是較重要的關係。其較重要者，乃在其論文見解之不盡相同。

蓋柳冕之所謂「文章」，混詩與文而言之。韓愈之所謂「文」，則專就非韻非駢的散體言之。因這一點的不同，所以柳冕論文重在諷諭，而以為要根於教化。韓愈便不是如此。他專就與詩文分途之文言，所以可以明道，所以可以不必兼及政事。待到韓柳的古文運動成功以後，只有詩文之分而無文筆之分，所以柳冕之混詩與文而言之者，也不易為人所注意了。

我們試看韓愈論文其重要之點，即在提出兩個問題：一是「道」的問題，一是「氣」的問題。柳冕於此，不是

不注意到。他也曾言「道，」也曾言「氣，」但是說來總不免較韓愈更偏一些。則以混詩與文而言之，所以只能以教化為標準，而以教化為標準，則便容易偏到極端的實用主義，於是反成為政治家的論文主張了。

柳冕與權德輿書論當時制舉之弊云：

> 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理道；明經以墨義考試，不本儒意；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故吏道之理天下，天下奔競而無廉恥者，以教之者末也。

又云：

> 明六經之義，合先王之道，君子之儒；教之本也。明六經之注，與六經之疏，小人之儒；教之末也，今者先章句之學，後君子之儒，以求清識之士，不亦難乎！

這種思想且開宋代道學家的先聲了，所以他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又說：

> 相公如變其文，卽先變其俗。文章風俗其弊一也，變之之術，在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也。伏惟尊經術，卑文士。經術尊則教化美，教化美則文章盛，文章盛則王道興，此二者在聖君行之而已。

這樣的文學復古論，要從文化復古着手，誠然是根本的解決了。所以他的主張，是徹頭徹尾的教化主義，他以為「尊經術則教化美，」尊經術卽是教化的方法，而教化之所由能美卽在於「教其心，使人日用而不自知。」易以現代的用語，卽是所謂改造環境；環境改造，則作者之性情亦得而變矣。他又以為「教化美則文章盛，」教化既美

則變易其心，即所謂『君子之儒必有其道』也。教化美而文章盛，又所稱『有其道必有其文』也。他又以為『文章盛則王道興』，蓋『文而不知道亦非君子之儒。』所以文章既盛，則王道自興。待到王道能興，則文章之作用始顯，而同時便收到教化的效果。此所以慨然地說『文章風俗其弊一也』，此所以以為『如變其文即先變其俗』也。茲復將上文所述列為圖式如左：

教化(風俗)　心 —— 文 —— 道 —— 教化(王道)

(環境)　(個性)　(作品)　(內容)　(作用)

我常以為古文家之論文，比較只重在「文」的問題，道學家之論文，則兼顧到「心」與「道」的問題，政治家之論文，總於「心」與「道」之外更須兼顧到教化的問題。所以徹頭徹尾的教化主義，便成為政治家的論文主張了。韓愈論道，僅足為道學家張目，柳冕論道，適成為政治家文論的先聲。這又是他們不同之點。而且，柳冕所論雖亦言之成理，但是可惜昧於社會進化的情形。他以為只須在聖君行之足矣。聖君行之則移風易俗，猶反掌耳；變文章，振文雅，亦猶反掌耳。他又說：『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荀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詞，房杜雖明不能變齊梁之弊，是則風俗好尚繫在時王，不在人臣明矣。』（謝杜相公論房杜二相書）則完全是宋儒所謂人主正心誠意則國治而天下平的主張，未免把社會事情看得太簡單，太容易了。——這是就論道的方面言者。

又他既不重齊梁的音律，則當然重在文氣。所以他說：

夫善爲文者，發而爲聲，鼓而爲氣。直則氣雄，精則氣生，使五彩並用而氣行於其中。故虎豹之文，蔚而騰光，氣也。日月之文，麗而成章，精也。精與氣，天地感而變化生焉，聖人感而仁義行焉。不善爲文者反此，故變風變雅作矣。六藝之不興，敎化之不明，此文之弊也。噫！文之無窮，而人之才有限，苟力不足者，强而爲文則蹶，强而爲氣，則竭，强而爲智，則拙。故言之彌多，而去之彌遠。（答衢州鄭使君論文書）

可是，因他重在敎化，於是所謂氣也者，遂不限於文章的氣勢，而含有志氣風氣的意味了。其答楊中丞論文書云：

來書論文章養才之道，增作者之氣，推而行之，可以復聖人之敎，見天地之心，甚善。嗟乎！天地養才而萬物生焉；聖人養才而文章生焉；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故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天下之氣生，則君子之風盛。古者陳詩以觀民風：君子之風，仁義是也；小人之風，邪佞是也。風生於文，文生於質。天地之性也；止於經，聖人之道也；感於心，哀樂之音也。故觀乎志而知國風。逮德下衰，風雅不作，形似艷麗之文興，而雅頌比興之義廢。艷麗而工，君子恥之。此文之病也，

嗟乎！天下之才少久矣，文章之氣衰甚矣，風俗之不養才病矣，才少而氣衰使然也。故當世君子，學其道，習其弊，不知其病也。所以其才日盡，其氣益衰，其敎不興，故其人日野。如病者之氣，從壯得衰，從衰得老，從老得死，沈綿而去，終身不悟，非良醫孰能知之。

他以爲「風俗養才而志氣生焉，」他以爲『才多而養之可以鼓天下之氣。』故其所謂「氣，」一方面是志氣，一

方面是風氣。這樣的文氣論亦誠可謂從根本解決了。然而，亦適以成爲政治家的論文主張而已。——這又是就論氣的方面言者。

第三目　韓愈

李漢昌黎先生集序稱韓愈在文壇上革新的功烈，謂『先生於文，摧陷廓清之功，比於武事，可謂雄偉不常者矣。』不錯，他在當時，具有雄偉不常的力量，具有摧陷廓清的功績。這個關係，由於他縱橫恣肆的文章者半，由於他明確有力量的文學批評者亦半。

韓愈伯夷頌極稱他的『特立獨行，』極稱他的『不顧人之是非，……信道篤而自知明，』極稱他的『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所以他說『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這一點精神卽是韓愈所特具的精神。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以爲『此乃退之生平制行作文宗旨，此自況之文也。』這話誠不錯。明白韓愈這一點特性，然後知道他的文學批評所以能有摧陷廓清的力量者正在此。其與馮宿論文書云：

>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爲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卽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卽必以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俟知者知耳。

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我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桓譚亦以爲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爲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韓昌黎集十七）

這種勇於自信的態度，實是韓愈的長處。李漢說：『時人始爲驚，中而笑且排，先生心益堅；其終，人亦翕然而隨以定。』他始終抱定他文學批評的主張以作爲文章，這是他所以能奏摧陷廓淸之功之一個原因。

正因他的特立獨行，勇於自信，所以他又能在舉世耻相師的風氣之下，毅然地以師自任，毅然地以文爲敎。以文爲敎，卽無形中爲他的文學批評作劇烈的宣傳，當然有摧陷廓淸的力量了。唐以前無以文爲敎者，以文爲敎自韓愈始。蓋韓愈以前所謂以文爲敎者，不過『童子之師授之書而習其句讀者』而已。授之書而習其句讀，則是所謂章句師耳。柳宗元答嚴厚輿論師道書云：『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所以韓愈之以文爲敎，正是欲『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事者。這樣的以文爲敎，始有文學的——同時亦兼有道學的——意味，而不限於章句訓詁的講解了。

韓愈師說云：『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所傳何道，所授何業，與所解何惑，須知道正是韓愈以文爲敎的內容。曾國藩求闕齋讀書錄解此最爲精愜。他說：『傳道謂修己治人之道，授業謂古人六藝之業，

解惑謂解此二者之惑。韓公一生學道好文，二者兼營，故往往並言之。末幅云『聞道有先後，術業有專攻，』仍作雙修。』可知韓氏之教不外傳道授業，二者而已。實則傳道是後世道學家的事，授業則正是當時古文家的事。所以韓愈於此二者雖是並重，而比較言之，則韓愈於道的方面所窺尙淺，於文的方面所得實深。故韓門弟子與其謂之學道，不如謂爲學文。李翺之文出於韓愈，而李翺之思想卻不盡出於韓愈，易言之，卽其文同於韓愈而其所謂學所謂道則不盡同於韓愈；復性一書決不能與原道原性諸作等量齊觀，則所謂韓氏之教亦不外文而已。韓愈答劉正夫書謂『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可知他便是欲以文昌聖人之道者。蓋中國舊時學術，始終逃不出六藝經典的範圍：漢人通其訓詁章句，於是有所謂漢學；宋人明其義理，於是有所謂宋學。在唐人則不過重在文辭方面——學其文章——以爲漢宋學術之過渡之樞紐而已。研究之對象仍一，不過方法有不同，方面有不同而已。劉勰云：『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敷讚聖旨，莫若註經，而馬鄭諸儒弘之已精，就有深解，未足立家。唯文章之用，實經典枝條，………於是搦筆和墨乃始論文。』（文心雕龍序志篇）則知唐人之於經典，重在文章，亦自然之趨勢然也。由這樣講，所以吾謂以文爲教自韓愈始。漢人訓詁之學是以字爲教，宋人義理之學是以道爲教，唐人文章之學則以文爲敎。訓詁之學重在說明，義理之學重在解悟，而文章之學則重在體會，所以可以因文以及道，所以可以爲漢宋學術過渡之樞紐。由這樣講，所以他的以文爲教自有他時代的重要的價值，而當然易於奉擔陷躐消之功了。這又是第二個重要的原因。

由第一點言，所以他的論文主張，抱定隨波逐流者不傳，特立獨行者傳；與世浮沈者不傳，能自樹立者傳。我們看他答劉正夫書所言：

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韓昌黎集十八）

『能自樹立不因循』即是他的文學批評所以欲一反當時風尚者，不外欲不循常而已，欲不循常而其道無由，於是取法於古。取法於古則不隨俗矣。不隨俗則能自樹立矣。能自樹立而猶不因循，不甘暴棄，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所以這樣的取法於古，是革新而不是返舊，而這樣的爲當時所怪也是特出流俗而不是背道而馳。惟「異」纔可以進於「能」；亦惟「能」纔可以成其「異」。其作品之能成功者在是，其批評之有價值者也在是。

由第二點言，所以他的論文主張雖重在宗經則古，而同時也兼主明道。其進學解云：

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細大不捐。焚膏油以繼晷，恒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觝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張皇幽渺。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旣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爲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渾渾無涯。周誥殷盤，佶屈聱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宏其中而肆其外矣。（韓昌黎集十二）

這段自述，至爲重要。可爲韓愈用力於文之證，亦可謂韓門設教之方。他是這樣傳道授業，二者並重的，所以他的教人，雖重在文，而不離於道。他以爲爲什麼要學文？就因爲道。如云：

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答李秀才書）

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後）

他又以爲爲什麼要作文？也因爲道。如云：

讀書以爲學，纘言以爲文，非以誇多而鬬靡也。蓋學所以爲道，文所以爲理也。苟行事得其宜，出言得其要，雖不吾面，吾將信其富於文學也。（送陳秀才彤序）

這樣爲道而學文，爲道而作文，所以有類於道學家的主張了。

第一點是文的外形的問題，第二點是文的內質的問題。由外形言則重在異；這是韓門皇甫湜一派的主張。由內質言，則重在道；這是韓門李翺一派的主張。偏於外形者，以『古聖賢人爲法』，猶不脫古文家的面目；偏於內質者，以『志乎古道』爲旨，有時非成爲道學家不止。而韓愈之爲文與論文，於此二點，正能不偏不畸同時兼顧者。

蓋韓愈對於文與道的態度與道學家不同。韓愈是因文而及道，道學家是求道而忽文。一個是體會有得，一個則得魚忘筌。韓愈答劉正夫書云：

> 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唯其是爾。」

這正是他因文及道的一種說明。在當初，不過爲文師古聖賢人而已，其後始進到師其意不師其辭。能師其意則能辨其是非，而於道也自然有所得了。這種態度，在道學家看來是倒學，因爲所謂「師其意」云者正不必爲了「爲文」的緣故。

這猶是說「爲文」所下的工夫。待到既有所得，發而爲文，則「爲文」的作用，在道學家看來是載道，在古文家說來是明道。載道則文是道的工具，明道則文是道所流露。這是作文而歸於道的工夫。所謂『卒澤於仁義道德，炳如也。』韓愈答尉遲生書云：

>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愼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

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韓昌黎集十五）

一方面因文而及道，一方面作文而歸於道，這是他的文道合一說。

明白他的文道合一說，然後可以進窺他的論文之精義。其送高閑上人序云：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丸，秋之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韓昌黎集二十一）

這一節話頗爲重要。姚鼐古文辭類纂謂『韓公此言本自狀所得於文事者。』曾國藩求闕齋日記更爲闡發之云：『機應於心，熟極之候也，莊子養生主之說也。不挫於物，自慊之候也，孟子養氣章之說也。不挫於物者，體也，道也，本也；機應於心者，用也，技也，末也。韓公之於文，技也進乎道矣。』這些話都極恰當。確可用以自狀其所得於文事者，確也可看出他論文主張之融合莊孟二家而冶於一爐。因爲這正是所謂『能自樹立不因循』的注解。不挫於物則能自樹立矣；機應于心則又正從不因循得來。一以見信道之堅，一以見學文之功，所以此文雖是指書法而言，而其理却可通於文藝。如其不信，請再看他的答李翊書一文。他說：

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

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汩汩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

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韓昌黎集十六）

這一節很重要。韓愈文學批評之精義，悉萃於是；不過因其行文反覆曲折，所以昔人雖知其重要，而罕見有能闡發之者。實則若以此文與送高閑上人序參互比證，便可互相映發。此文中最重要的兩句，即是『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十字，其餘諸論多不過爲此二語之註脚耳。所謂『無望其速成』者，即不因循之意；即『游之乎詩書之源』，而無絕其源之謂也。韓愈自謂學之二十餘年，即不望速成之例證。能如是，便到神的境界，所謂『汩汩然來矣。』此則機應於心之說也。究其意，實本於莊子。所謂『無誘於勢利』者，即『能自樹立』之意；即『行之乎仁義之途，』

而無迷其途之謂也。韓愈自謂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云者，又即不迷其途之例證。能如是，自能『識古書之眞僞，昭昭然白黑分矣。』一積極方面能不迷其途，斯消極方面無人之見存不至隨人笑譽以爲喜憂；此則不挫於物之說也。無人之見存而能不挫於物，則神完守固便到浩氣流行的境界，所謂『浩乎其沛然矣；』又所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也。而所以致此氣盛言宜之故，即在積極方面的無迷其途，所以謂『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這又不是孟子所謂『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之意嗎？杜甫論詩，很能融會莊子論神，孟子論氣之說而爲一；韓愈則言之更明，蓋亦自然之機迹然歟！

第四目　柳宗元

唐代文家，首推韓柳。自韓柳出而提倡古文，於是始一革舊時雕章繪句之弊。其摧陷廓清之功，在文學史或文學批評史上誠有相當的價值。不過韓柳雖是齊稱，而因個性之不同，其成就亦微有差異。韓猶有得於道，柳則僅工於文。所以在文學史上，則柳宗元的筆致雋潔，其成就不遜於韓；而在文學批評史上，則韓愈以勇於自信，大聲疾呼，其摧陷廓清之功實遠勝於柳。

以前講過韓愈在文學批評史上，所以能奏摧陷廓清之功者，在好爲人師，以文設教。現在且看柳宗元則何如呢？柳便沒有韓愈這般膽氣了。他說：

> 言道講古窮文辭以爲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故又不爲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

韓責我。（答嚴厚輿論師道書）

僕避師名久矣。……其所不樂爲者，非以師爲非，弟子爲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爲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非，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他並不是不願爲師，實在是不敢爲師，而且也不能爲師。他沒有韓愈特立獨行的個性，所以不敢爲師。他又不能如韓愈之有見於道而勇於自信，所以也不能爲師。他雖能文，但是他以爲是無所師法的。其復杜溫夫書云：

吾雖少爲文，不能自雕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意盡便止，亦何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柳河東集三十四）

這話誠不錯，文藝之精微，本是『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者。自己之能文，既何所師法，則又將何以詔示於人呢？所以他當然覺得『自視以爲不足爲』了。他以爲所可傳授者只是一些粗迹，所以他又說：

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惟以此奉告。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

「焉」「也」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與吾言類且異，愼思之則一益也。

他覺得所可告人者，僅此而已！僅此則又何足以爲師。這不敢爲師與不足爲師，眞是他所謂『有兩事故不能』者。

然而柳宗元在文學批評史上的影響和地位，雖不如韓愈之大，而就其論文見解言，却並不在韓愈之下。即其作風也能超然於韓愈之外，不爲韓門二派所牢籠。這個原因是什麼？則以柳兼工詩而韓門諸人則工詩者僅僅工詩，工文者僅僅工文，故其論文見解，不過得韓一端而不能自外於韓愈。又以韓偏擅散體，柳則兼工駢儷；韓文出自經，柳文出自史，故韓較偏於雜文學方面，而柳則近於純文學。所以柳氏之論文見解，不僅不同於韓門二派，抑且能自外於韓愈。

這個關係，即可於其對於「文」的含義見之。韓愈所謂文，大率指「古文」而言，柳宗元所謂文，則有時可兼指韻文而言，有時可兼指駢儷而言。如其楊評事文集後序云：

文有二道：辭令褒貶，本乎著述者也；導揚諷諭，本乎比興者也。著述者流，蓋出於書之謨訓，易之象繫，春秋之筆削，其要在於高壯廣厚，詞正而理備，謂宜藏於簡册也。比興者流，蓋出於虞夏之詠歌，殷周之風雅，其要在於麗則清越，言暢而意美，謂宜流於謠誦也。茲二者，考其旨義，乖離不合，故秉筆之士，恒偏勝獨得，而罕有兼者焉。厥有能而專美，命之曰藝成，雖古文雅之盛世，不能並肩而生。唐興以來，稱是選而不作者，梓潼陳拾遺。其後燕文貞以著述之餘，攻比興而莫能極，張曲江以比興之隙，窮著述而不克備。其餘各探一隅，相與背馳

於道者，其去彌遠。文之難兼，斯益甚矣。（柳河東集二十一）

又其西漢文類序云：

> 以文觀之，則賦頌詩歌書奏詔策辯論之辭畢具；以語觀之，則右史紀言尚書戰國策成敗興壞之說大備，無不苞也。噫！是可以為學者之端耶？（柳河東集二十一）

則知其所謂「文」固兼韻體散體而言之了。所以就韓柳二氏對於「文」的含義而言，已可看出這一點的不同。

這個關係，又可於其對於道的態度言之。韓愈所言道是專就儒家而言，而柳宗元所言則可兼指釋家之道。韓主排佛而柳卻好佛。柳氏雖謂文須宗經而其歸在不出孔子，但他於送僧浩初序明言韓愈闢佛為忽其外而遺其中，知石而不知韞玉。且謂『吾之所取者與易論語合，雖聖人復生，不可得而斥也。』這竟為宋人陽儒陰釋的道學樹之先聲了。所以就韓柳二氏對於道的態度而言，又須注意這一點的差異。

明此關係，則知柳氏文論儘與韓愈相類而畢竟不同。其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云：

> 秀才時見咨，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大都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原之辭，稍采取之；穀梁子太史公甚峻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秀才志於道，慎勿怪，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勃然爾，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然則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

在，爲秀才計，未必過此。（柳河東集三十四）

又報崔黯秀才書云：

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者，必由於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要之之道而已矣。道之及，及乎物而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粉澤以爲工，遒密以爲能，不亦外乎？吾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於道也外，而望於予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棄朽廢者之意，故復云爾也。（柳河東集三十四）

這些話都同於韓愈的主張，然而不足以見柳氏文論之特點。韓愈論文在答李翊一書，柳宗元論文，在答韋中立論師道一書。這些都是他們體會有得之談，所以應在這兩篇中看出他們的不同。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云：

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

……

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

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淸，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之爲文也。（柳河東集三十四）

這一節話申文以明道之旨，似乎也與韓愈相同。然而韓的態度是沈潛乎道，而柳的態度，只在「羽翼夫道」。沈潛乎道，所以要『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而『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的羽翼夫道，所以只須勿以輕心掉之，怠心易之，昏氣出之，矜氣作之足矣。蓋韓愈所言，是孟子所謂養氣之旨；所以重在道。柳宗元所言，是劉勰所謂養氣之旨，所以又重在文。這些分別，必須看出，纔能明柳氏論文之旨。所以我以爲柳氏答韋中立論師道書一篇更須與他的與楊京兆憑書一篇參互比觀，纔能明其義。他說：

凡爲文以神志爲主。自遭責逐，繼以大故，荒亂耗竭，又常積憂恐，神志少矣。所讀書隨又遺忘。一二年來，痞氣尤甚，加以衆疾，動作不常，眊眊然騷擾內生，霾霧填擁慘沮，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矣。（柳河東集三十）

『爲文以神志爲主，』這即是柳氏論文的主旨。所謂羽翼夫道者，正是從神志方面下手。文心雕龍養氣篇云：『率

志委和則理融而情暢；鑽礪過分則神疲而氣衰，』正是說明此意。所以柳氏所謂羽翼夫道者，依舊是文的工夫。

明得此意，然後知柳氏所謂取道之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云云者，雖重在道的方面，重在文的內容的方面，而實則書詩禮春秋與易之風格體製也均包括在內。蓋重在論道，則宜合言之，重在論文則宜分言之。韓愈原道云：『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朋友，』何曾對於五經之道各別道來！劉勰文心雕龍宗經篇云：『易惟談天，書實記言，詩主言志，禮以立體，春秋辨理，』又如何能把五經之文綜合言之。所以柳氏對於取道之原，而於五經中求其質，求其恆，求其宜，求其斷，求其動，已不全是道的問題而兼有文的問題了。

明得此意，然後更知柳氏所謂旁推交通而以之為文者，正是他「有意窮文章」的地方。他『有意窮文章而病奪其志，』所以他的所志，不在道而在文。不過他於文的方面不做『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之文而已。不做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之文，而仍有意窮文章，此則所謂『羽翼夫道』也。這是他底文的神志說。

所以他的論文，不會偏於道。韓愈以為行事得其宜，出言得其要，也是富於文學（見送陳秀才彤序）而柳則不如是者。其楊評事文集後序云：

文之用，辭令褒貶導揚諷諭而已，雖其言鄙野，足以備於用，然而闕其文彩，固不足以竦動時聽，夸示後學，立

盡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

又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云：

> 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特博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閑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柳河東集三十一）

於此數節中可以見其尙文之旨，所以他不會同於韓門李翺一派的主張。然而同時也不因尙文而偏主於奇。韓愈以爲『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答劉正夫書）而柳則也非如是者。他以國語之『文勝而言尨好詭以反倫，……輒乃黜其不臧，究世之謬，凡爲六十七篇，命之曰非國語』（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故其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云：

> 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怪，張之以闊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顚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

這也顯與韓愈異趣，所以也不會同於韓門皇甫湜一派的主張。不偏於闡道而忽文，同時也不因尙文而主奇，這正是所謂『羽翼夫道』了。這『羽翼夫道』的態度，當然足以超出於韓愈及韓門二派而不與相同了。

第五目　韓門二派

韓愈死後，時人之論韓者有三篇文字極爲重要。一篇是李翺的祭吏部韓侍郎文，一篇是皇甫湜的韓文公墓誌銘，一篇是李漢的昌黎先生集序。李翺文云：

嗚呼！孔子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辨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剽剝不讓，儷花鬭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闔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越嬴，並武同殷，六經之學，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李文公集十六）

皇甫湜文云：

先生之作，無圓無方，至是歸工；抉經之心，執聖之權，尙友作者，跂（全唐文作跋）邪觝異，以扶孔氏，存皇之極。知與罪，非我計。茹古涵今，無有端涯，渾渾灝灝，不可窺校。及其酣放，毫曲快字，凌紙怪發，鯨鏗春麗，驚耀天下。然而栗密窈眇，章妥句適，精能之至，入神出天。（皇甫持正文集六）

李漢文云：

汗瀾卓踔，奫泫澄深，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玉潔，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

這三篇都足以爲韓文之定評。然而似乎各有着眼之點。李翺則重在道的方面，皇甫湜則重在文的方面。論韓愈復道之功，以李翺所言爲當；狀韓愈行文之能，又以皇甫湜所言爲精。至李漢所論則混文與道而言之，又正足爲他貫

道之說的說明。李漢之文，傳世不多，今無可論。至李翱與皇甫湜則正足以代表韓門之二派。由作風言，韓愈確是具有二種不同的作風，其一是鯨鏗春麗足以驚耀天下者；其又一是章妥句適以栗密窈眇見長者。由文學批評言，韓愈確亦兼具有二種不同的主張；其一是重在外形之奇特，其又一是重在內質之合於道。至於韓門諸子便不能二者兼顧適得其中。李翱作風主於平易，其論文主旨亦偏於道。皇甫湜作風偏於奇特，而論文主旨亦如之。所以他們二人對於韓愈之認識也不免有所偏了。

李翱答朱（一作王一作梁）載言書，自述其作古文之旨云：

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李文公集六）

此書說明他學古文之旨全與韓愈相同。李翱此書為其論文主旨所在，與韓之答李翊書，柳之答韋中立書，同樣重要。茲節錄其文於後：

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

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

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

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墍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菀彼桑柔，其下侯旬，捋采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閒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鶡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幷，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

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輾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李文公集六）

此書專論創意造言二者。創意是道的關係，造言是文的工夫。其論創意，歸到「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似亦兼顧到文的方面；其論造言，而推到「文章之所主」而以爲「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似乎又兼顧到道的問題。據此以言，則是李翱論文，猶不甚偏重在道。

然而李翱於道確是有所得者。即就其復性書而論，亦遠勝於韓愈之原道。宋儒理學，可謂很受此書之影響。所以他的論文主張，就創意言，斷合於「六經之旨」，當然較偏於道。其雜說上云：

日月星辰經乎天，天之文也。山川草木羅乎地，地之文也。志氣言語發乎人，人之文也。志氣不能塞天地，言語不能根教化，是人之文紕繆也。山崩川涸，草木枯死，是地之文裂絕也。日月薄蝕，星辰錯行，是天之文乖盭也。天文乖盭，無久覆乎上；地文裂絕，無久載乎下；人文紕繆，無久立乎天地之間。故文不可以不慎也。（李文公集五）

他必以志氣塞天地，言語根教化，爲人之文，已很帶道的色彩了。至其寄從弟正辭書云：

汝勿信人號文章爲一藝。夫所謂一藝者，乃時世所好之文，或有盛名於近代者是也。其能到古人者，則仁義之辭也，惡得以一藝而名之哉？

仲尼孟軻殁千餘年矣！吾不及見其人，吾能知其聖且賢者，以吾讀其辭而得之者也。後來者不可期，安知其讀吾辭也而不知吾心之所存乎？亦未可誣也。

夫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有文而能到者，吾未見其不力於仁義也。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猶誠明之必相依爾。

貴與富，在乎外者也，吾不能知其有無也；非吾求而能至者也，吾何愛而屑屑於其間哉！仁義與文章，生乎內者也，吾知其有也，而能求而充之者也；吾何懼而不爲哉！（李文公集八）

他不以文章爲一藝，所以偏重在道的方面。他謂『性於仁義者未見其無文也。』這正是上承孔子『有德者必有言』之意，下啟宋儒『道至則文自工』之說。宋人譏韓愈爲「倒學，」實則李翺此文，即已逗露此意。『由仁義而後文者性也，』這是宋人論文的見解。『由文而後仁義者習也。』這是唐人論文的見解，而宋人所譏爲倒學者。所以李翺論文，已開宋人之先聲。至其答皇甫湜書『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公非以爲本，』又答開元寺僧書畏後世聖人之責，不敢爲釋氏作鐘銘，都可見其衞道的熱烈。

即就「造言」而言，也漸合於「六經之詞。」所以對於詞之對與否，難與否，以爲根本不成問題，因爲這不是文章之所主。即就於尚異與好理二者，也要調劑折衷，文質相濟。所以他決不如皇甫湜這樣偏主於奇的，雖則他也曾申述韓愈陳言務去之旨，而偏重於新辭的創造。

至皇甫湜之論文，便偏主於奇。其答李生第一書云：

來書所謂今之工文，或先於奇怪者，顧其文工於否耳！夫意新則異於常，異於常則怪矣。詞高則出衆，出衆則奇矣。虎豹之文，不得不炳於犬羊；鸞鳳之音，不得不鏘於鳥鵲；金玉之光，不得不炫於瓦石；非有意先之也，適自然也。必崔嵬然後爲岳，必滔天然後爲海。明堂之棟必撓雲霓，驪龍之珠必涸深泉。足下以少年氣盛，固當以出拔爲意。學文之初，且未自盡其才，何遽稱力不能哉！（皇甫持正文集四）

這種尚奇的主張，完全是尚文的傾向。其答李生第二書復申述之云：

夫謂之奇，則非正矣，然亦無傷於正也。謂之奇，卽非常矣。非常者謂不如常者，謂不如常乃出常也。無傷於正而出於常，雖尚之亦可也。此統論奇之體耳。未以文言之失也。夫文者非他，言之華者也。其用在通理而已，固不務奇，然亦無傷於奇也。使文奇而理正，是尤難也。生意便其易者乎？

夫言亦可以通理矣，而以文爲貴者，非他，文則遠，無文卽不遠也。以非常之文，通至正之理，是所以不朽也。生何嫉之深耶？

夫繪事後素，旣謂之文，豈苟簡而已哉！聖人之文，其難及也！作春秋，游夏之徒不能措一辭，吾何敢擬議之哉！秦漢已來至今文學之盛，莫如屈原宋玉李斯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其文皆奇，其傳皆遠。生書文亦善矣，比之數子，似猶未勝，何必心之高乎？……

書之文不奇，易之文可謂奇矣。豈礙理傷聖乎？如龍戰於野，其血玄黃，見豕負塗，載鬼一車，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此何等語也！（皇甫持正文集四）

此節謂奇而無傷於正，正而無傷於奇，以文奇理正爲標的，固似較前書爲修正一些，但以尙奇之故，總不免偏於修辭方面。其後孫樵論文，亦偏主於奇，蓋正是皇甫湜一派之支流。

第六目　韓柳以外之文論

至在韓柳以外，其論旨不盡相同，而與當時復古的傾向，也不相背者，則有裴度李德裕二人。裴度寄李翺書云：

恩謂三五之代，上垂拱而無爲，下不知其帝力，其道漸被於天地萬物，不可得而傳也。夏殷之際，聖賢相遇，其文在於盛德大業，又鮮可得而傳也。厥後周公遭變，仲尼不當世，其文遺於冊府，故可得而傳也。於是作周孔之文。荀孟之文，左右周孔之文也。理身理家理國理天下，一日失之，敗亂至矣。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財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極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不足爲弟道焉。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意隨文而可見，事隨意而可行。此所謂文可文，非常文也。其可文而文之，何常之有！（全唐文五三八）

他因這樣主張自然，所以不要可文而文之駢文家之尚對偶，聲韵，固是可文而文之，古文家的礫裂章句也未嘗不是可文而文之。這正是宋人稱韓愈爲有意爲文的論調。所以他並且反對古文。他又說：

> 觀弟近日制作，大旨常以時世之文多偶對麗句，屬綴風雲，羈束聲韵，爲文之病甚矣。故以雄詞遠致，一以矯之，則是以文字爲意也。
>
> 且文者，聖人假之以達其心，心達則已，理窮則已，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也。愚欲去彼取此，則安步而不可及，平居而不可踰，又何必遠關經術，然後騁其材力哉！
>
> 昔人有見小人之違道者，恥與之同形貌，共衣服，遂思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以異也。不知其倒之反之之非也。雖非於小人，亦異於君子矣。故文之異，在氣格之高下，思致之深淺，不在礫裂章句，隳廢聲韵也。人之異，在風神之淸濁，心志之通塞，不在於倒置眉目反易冠帶也。（全唐文五三八）

他謂『非故高之下之詳之略之』，則古文家之所謂義法便失其根據。古文家之所謂義法正有一部分是討論到高之下之詳之略之的問題的。我嘗謂駢文家的講聲色與古文家之講義法同樣的以文字爲意，同樣的違反自然。

至於李德裕則比較地站在純文藝的立場，其窮愁志文章論之論及文章云：

> 世有非文章者曰，辭不出於風雅，思不越於離騷，模寫古人，何足貴也？余曰：譬諸日月，雖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此所以爲靈物也。

曰『終古常見而光景常新，』這在中國文學批評論中要算是十分漂亮的言論了。這一種的復古主張，便絲毫不拖泥帶水牽涉道義而言之。所以他的文竅，即本文藝的立場以創爲自然論者。其言云：

文之爲物，自然靈氣，恍惚而來，不思而至。杼軸得之，淡而無味，琢刻藻繪，彌不足貴。如彼璞玉，磨礱成器，奢者爲之，錯以金翠，美質既雕，良寶斯棄。（見其文章論中）

本此見解，故其文章論中提出兩項主張：（1）以氣救藻飾之蔽。（2）以自然的音調易人工的音律。

以前說過，駢文家以人工的音律救行文之吃，古文家以語調的氣勢救行文之吃。此意即可在李德裕文章論中見之。他說：

魏文與論稱『文以氣爲主，氣之清濁有體，』斯言盡之矣。然氣不可以不貫，不貫則雖有英辭麗藻，如編珠綴玉，不得爲全璞之寶矣。鼓氣以勢壯爲美，勢不可以不息，不息則流宕而忘返，亦猶絲竹繁奏，必有希聲窈眇，聽之者悅聞；如川流迅激，必有洄洑逶迤，觀之者不厭。（李文饒外集三）

氣而能貫，即臻自然的境界，於是英辭麗藻不足爲行文之累，不會成文家之吃。他的論氣總專就語勢而言，不牽涉到先天原有的氣禀，也不牽涉到後天可以變化的氣質。因此，所以他更反對人工的音律。他又說：

沈休文獨以音韻爲切，重輕爲難，語雖甚工，旨則未遠矣。夫荊璧不能無瑕，隋珠不能無纇，文旨既妙，豈以音韻爲病哉！此可以言規矩之內，未可以言文外意也。較其師友，則魏文與王陳應劉討論之矣。江南唯於五言

為妙，故休文長於音韻，而謂『靈均以來，此祕未覩』，不亦誣人甚矣。古人辭高者蓋以言妙而工，適情不取於音韻；意盡而止，成篇不拘於隻耦。故篇無足曲，辭寡累句。譬諸音樂，古辭如金石琴瑟，尚於至音；今文如絲竹鞞鼓，迫於促節。則知聲律之為弊也甚矣。

此種論調雖亦有復古的傾向，但決不會有韓柳這般的流弊。本此論調以創作，只成為雖模寫古人而光景常新的靈物，決不會沾染古典的精神與形式的。

第三節　批評風氣之流行

第一目　標榜的批評

當時批評風氣之盛，除因復古思潮而有所主張以外，亦有重在審美的批評，論文不主道，論詩不主雅，而較偏於純藝術的立場者，則為(1)標榜的批評，(2)象徵的批評。

唐代吟業既盛，當然易開標榜風氣。胡震亨唐詩談叢四謂『唐人一時齊名者如「富吳」「蘇李」「燕許」「蕭李」「韓柳」「四傑」「四友」「三俊」皆兼以文筆為稱。其專以詩稱，有「沈宋」「錢郎」又「錢郎劉李」「鮑謝」「元白」「劉白」「溫李」「賈喻」「皮陸」「吳中四士」「廬山四友」「三舍人」「大曆十才子」「咸通十哲」等目。』即此一端已可看出當時標榜的風氣之盛。此種風氣之影響到批評方面者，即時人贈答稱頌之詩，即所謂『平生不解藏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也。如李白之頌張十一『張翰黃花句，風流五

百年。誰人今繼作？夫子世稱賢。』（金陵送張十一再遊東吳）高適之頌陳十六『永懷掩風騷，千載常矻矻。新理亦雖巍，佳句懸日月。』（同觀陳十六史興碑）均是推許其詩。此在杜甫詩中，爲例更多。如解悶十二首之評薛據，孟雲卿，孟浩然，王維，王縉諸人之詩，八哀詩之評李邕張九齡蘇源明諸人之詩，他如稱李白則謂其飛揚跋扈，（見贈李白詩）謂其飄然不羣，（見春日憶李白詩）謂其佳句似陰鏗，（見同尋范十隱居詩）謂其『筆落驚風雨，』（寄李十二白二十韻）稱高適則謂其『方駕曹劉不啻過』（奉寄）謂其『文章曹植波瀾闊。』（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至如稱元結之『詞氣浩縱橫，』（同元使君舂陵行）稱賈至之『雄筆映千古，』（送唐誡因寄禮部賈侍郎）稱鄭審李之芳則云『律比崑崙竹，音知燥濕絃，』（秋日夔府奉寄一百韻）稱高適岑參則云『意愜關飛動，篇終接混茫，』（寄彭州高使君虢州岑長史三十韻）均是覃覓獨造，迥不猶人，殊與泛泛稱頌者不同。

其後惟韓愈造語亦能擺落陳言，獨創新詞。如醉贈張祕書詩『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東野動驚俗，天葩吐奇芬。張籍學古淡，軒鶴避雞羣。』又『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至寶不雕琢，神工謝鋤耘』諸語，與薦士詩『有窮者孟郊，受材實雄驁。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橫空盤硬語，妥貼力排奡。敷柔肆紆餘，奮猛卷海潦，榮華肖天秀，捷病逾響報』諸語，均能殺縛事實，銖兩悉稱，曲盡形似之妙。即其彙論詩法者，如

無本於爲文，身大不及膽。吾嘗示之難，勇往無不敢。蛟龍弄角牙，造次欲手攬。衆鬼囚大幽，下覷襲元窟。天陽

蹤四海，注視首不頷。鯨鵬相摩窣，兩擧快一噉。夫豈能必然，固已謝黯黮。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姦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澹。（送無本師歸范陽）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後，擧頸遙相望。夜夢多見之，晝思反微茫。徒觀斧鑿痕，不矚治水航。想見施手時，巨刃磨天揚。垠崖劃崩豁，乾坤擺雷硠。（調張籍）

亦能掐擢胃腎，不落凡境。當時元白爲之，則鋪敍更煩。元詩，如：

喜聞韓古調，兼愛近詩篇。玉磬聲聲徹，金鈴箇箇圓。高疎明月下，細膩早春前。花態繁於綺，閨情軟似綿。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欲得人人伏，能敎面面全。延之（一作淸）苦拘檢，摩詰好因緣。七字排居敬，千詞敵樂天。（自注：『侍御八兄能爲七言絕句，贊善白君，好作百韻律詩。』）殷勤閑太祝（張籍）好去老通川。（自謂）莫漫裁章句，須饒紫禁仙。（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因有戲贈）

白詩，如：

張君何爲者，業文三十春。尤工樂府詩，擧代少其倫。爲詩意如何，六義互鋪陳。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讀君學仙詩，可諷放佚君。讀君董公詩，可誨貪暴臣。讀君商女詩，可感悍婦仁。讀君勤齊詩，可勸薄夫敦（一作淳）。上可裨教化，舒之濟萬民。下可理情性，養之善一身。始從青衿歲，迨此白髮新。日夜秉筆吟，心苦力亦勤。時無采詩官，委棄如泥塵。恐君百歲後，滅沒人不聞。願藏中祕書，百代不湮淪。願播內樂府，時得聞至尊。言者志之苗，

行者文之根。所以讀君詩，亦知君爲人。如何欲五十，官小身賤貧。病眼街西住，無人行到門。（讀張籍古樂府）這些都是意在標榜，詞尚形似。至其相互酬唱者，如白居易江樓夜吟元九律詩成三十韻，與元稹酬樂天江樓夜吟稹詩因成三十韻，更爲刻意煊染，盡量贊歎之作。一方面近司空圖詩品之體，一方面亦開宋人論詩之風。

第二目　象徵的批評

因其重在標榜，遂多形似之語，標榜的批評與象徵的批評本有相互的關係。然有意在標榜而不用象徵的方法，或雖用象徵的方法而並非標榜者，所以亦各有異點。大抵象徵的比喻，多本於六朝之品評書法而踵爲之者。湯惠休謂謝靈運詩如出水芙蓉，顏延年詩似鏤金錯彩，卽已用此方法，不過偶以舉例，其體未廣。至如張說與徐堅之論近代文士，謂『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謨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濃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畏也；若施於廊廟，則駭矣。閻朝隱之文，如麗服靚粧，燕歌趙舞，觀者忘疲，若類之風雅，則罪人矣。』又論後進詞人之優劣云：『韓休之文如太羹旨酒，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如豐肌膩理，雖穠華可愛，而微少風骨。張九齡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微窘邊幅。王翰如瓊杯玉斝，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見舊唐書楊炯傳）此則全是比況之辭。後來皇甫湜諭業一文，亦師其意而踵爲之，其言云：

夫比文之流，其來尙矣！自六經子史，至於近代之作，無不備詳。當朝之作，則燕公悉以評之。自燕公已降，試爲子論之：

燕公之文如楩木枏枝，締構大廈，上棟下宇，孕育氣象，可以變陰陽，閱寒暑，坐天子而朝羣后。

許公之文如應鐘鼙鼓，笙簧錞磬，崇牙樹羽，設以宮懸，可以奉神明，享宗廟。

李北海之文如赤羽玄甲，延亙平野，如雲如風，有貙有虎，闐然鼓之，吁可畏也！

賈常侍之文如高冠華簪，曳裾鳴玉，立於廊廟，非法不言，可以望爲羽儀，資以道義。

李員外之文則如金輿玉輦，雕龍綵鳳，外雖丹青可掬，內亦體骨不飢。

獨孤尙書之文如危峰絕壁，穿倚霄漢，長松怪石，顚倒谿壑，然而略無和暢，雅德者避之。

楊崖州之文如長橋新構，鐵騎夜渡，雄震威厲，動心駭目；然而鼓作多容，君子所愼。

權文公之文如朱門大第，而氣勢宏敞，廊廡廩廐，戶牖悉周；然而不能有新規勝概，令人竦觀。

韓吏部之文如長江大注，千里一道，衝飆激浪，汙流不滯；然而施於灌溉，或爽於用。

李襄陽之文如燕市夜鴻，華亭曉鶴，嘹唳亦足驚聽；然而才力偕鮮，悠然高遠。

故友沈諮議之文則隼擊鷹揚，滅沒空碧，崇蘭繁榮，曜英揚蕤，雖迅舉秀擢，而能沛艾絕景。

其它握珠璣，奮組繡者，不可一二而紀矣。若數公者，或傳符於玄宰，或受命於神工，或鳳翥詞林，或虎踞文苑，

或抗鬱荀孟，攘袂班揚，皆一時之豪彥，筆硯之麟鳳。（皇甫持正文集一）

此種風氣，一至宋代則更爲流行，蔡絛敖陶孫輩無不爲之，遂成爲文學批評的一種方法了。此種方法，雖近游戲之

作，且多模糊影響之談要亦不失爲鑑賞的批評之一種。

第二章　復古運動的銷沉時期

第一節　批評風氣之轉移

第一目　論格論例之著

時至晚唐五代，復古潮流成爲過去，而駢儷餘波復有廻旋振盪之勢；律賦四六均於此時完成其體製，詩詞亦趨於穠豔綺麗之習。因此，此期的文學批評，不重在原理的討論，而重在方法的講求。這個關係，也即由於承風氣而不是變風氣的緣故。茲將當時有關批評的著作約而舉之，不外三類：

其一，爲論格論例之著。論詩文而議其格與例，固不始於此期，然此類書籍終以此期爲特盛。有許多書籍托之於盛唐中唐時人所爲者，大率爲此期的產品。惟以此類書籍，多爲時文應用而作，取便初學，沒有永久的價值，故最多散佚。今分別述之於次：

其全佚者有：

制朴（一稱白氏制朴）三卷。（宋志作一卷，國史經籍志作二卷）唐白居易撰。佚。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

應求類　二卷。（通志藝文略作三卷）唐劉遵編。佚。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通志藝文略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文史類。案是書宋以後已佚，焦竑國史經籍志詩文評類雖亦著錄，不足信。又案是書唐志稱「編」，通志稱「集」，竊疑當是類輯應舉之文以供採擷者。

文格　二卷。（宋志作三卷）五代吳越孫郃撰。（宋志「郃」誤作「郤」）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案國史經籍志亦著錄，不足信。考同治徐州府志經籍考總集類有孫郃文格三卷，宋李淑著，並云據豐縣志，豈是書非出孫郃所撰，乃李淑據孫氏文而類聚區分以定其格耶？或豐縣志以通志列李淑制朴於孫郃文格之後，遂誤合爲一，而同治志又沿其誤耶？

修文要訣　一卷。（宋志作二卷，宋四庫闕書目兩見此書，先作一卷，其後重見作二卷）五代蜀馮鑑撰。佚。宋四庫闕書目，尤袤遂初堂書目，通志藝文略，通考經籍考，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郡齋讀書志著錄文說類。案郡齋讀書志云：『雜論爲文體式，評其謬誤，以訓初學。』則亦啓蒙之書，其散佚固宜。焦竑國史經籍志詩文評類雖著錄，不足信。

文旨　一卷。□王瑜撰。（瑜時代待考。宋四庫闕書目及宋志均作王瑜卿）佚。崇文目，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案是書不見新舊唐志著錄，而崇文目已有之，疑瑜亦五代時人。國史經籍志詩文評類著錄其書，亦不足信。

右論文之屬。考通志藝文略分文史詩評二目，右列諸書均列文史類，當與純粹論詩者有別。

賦要　一卷。唐白行簡撰。佚。宋志文史類著錄。案行簡居易弟，新舊唐書均附居易傳。

賦門（國史經籍志作賦門，誤。）　一卷。唐浩虛舟撰。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案虛舟隰州刺史聿之子，中宏詞科。全唐文六百二十四，有賦八篇表一篇。

賦樞　三卷。（宋四庫闕書目及宋志均作一卷）唐張仲素撰。（通志「素」作「表」，誤。）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宋四庫闕書目均著錄文史類。案國史經籍志亦著錄，不足信。仲素字繪之，河間人，官中書舍人。全唐文六百八十四錄其賦及雜文。

賦格　一卷。唐紇干俞撰。（崇文目「紇」作「紀」，誤。）佚。崇文目，通志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案俞元和中進士，官渭南尉，見通志注。全唐文七百二十三錄其賦七首。

賦訣　一卷。唐范傳正撰。佚。新唐志，崇文目，通志，宋志均著錄文史類。案國史經籍志亦著錄，不足信。

賦格　一卷。五代周和凝撰。宋志文史類著錄。

右論賦之屬。考唐代律賦之盛，至大歷貞元之際，風氣始開，故論賦之著較多中唐人作。

詩品　一卷。唐李嗣眞撰。佚。新唐志文史類，通志詩評類著錄。案嗣眞新唐書（九十一）有傳，舊唐書（一百九十一）入方技傳。其書早佚，焦竑國史經籍志著錄，不足信。

筆九花梁　二卷。唐上官儀撰。佚。宋四庫闕書目文史類著錄。案李淑詩苑類格引上官儀說謂詩有六對，詩有八對云云，當即出此，疑亦詩格詩例之屬。

詩格　一卷。唐王維撰。佚。宋志文史類著錄。案此疑出依托。

詩格　一卷。唐元兢撰。新唐志宋志著錄文史類，通志入詩評類。案新唐志及通志均稱元兢宋約詩格一卷，不知此書是否出元兢宋約二人合撰，抑或「宋」字為「沈」字之誤，而為元氏所定沈約詩格歟？是書早佚，不傳。焦竑國史經籍志著錄詩文評類，不足信。考文鏡祕府論卷三論對，卷五論病，均引元氏說，當出此書。又卷三論對於「平對」「奇對」「同對」「字對」「聲對」「側對」六種，謂出元兢髓腦，則詩格與髓腦或即一書異名歟？

詩例　一卷。唐姚合撰。佚。新唐書，崇文目，及宋志著錄文史類，通志入詩評類。案是書早佚，焦竑國史經籍志著錄詩文評類，不足信。

大中新行詩格（國史經籍志作大中詩格）　一卷。唐王起撰。佚。新唐書崇文目均著錄文史類，通志著錄詩評類。案起，宰相播弟；新舊唐書均附播傳。大中元年檢校司空，當為此時之作。考宋志文史類有王杞詩格一卷，注云「杞一作超」，竊疑「超」當作「起」。

文章龜鑑　一卷。唐倪宥集。佚。新唐志，崇文目及宋志著錄文史類，通志入詩評類。案通志藝文略詩評類有文章

龜鑑一卷注云，「唐倪宥集前人律詩，」則當亦詩格詩例之類。宋四庫闕書目文史類有倪宥金體律詩例一卷，當卽此書。葉德輝謂「宋志作詩體，」似以金體律詩例與詩體爲一書異名，恐未必然。宋志文史類有文章龜鑑及詩體一卷，崇文目文史類有文章龜鑑及詩圖，通志詩評類同，則是詩體詩圖爲一書異名，蓋均句圖之屬，而金體律詩例則當卽文章龜鑑，蓋爲詩格詩例之屬。

文章玄妙　一卷。唐任藩撰。佚。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著錄。案陳振孫云：『言作詩聲病對偶之類。』

國風正訣　一卷。唐鄭谷撰。佚。宋志文史類著錄。案顧櫰三補五代史藝文志總集類（原無文史類）有詩格一卷，鄭谷僧齊己黃損同輯。考顧氏所據原出緗素雜記。今考齊己有風騷旨格，多論詩格詩例，疑鄭谷國風正訣亦屬此類。

玄機分明要覽　一卷。唐釋齊己撰。佚。宋志文史類著錄。案此當亦流類手鑑之屬。

右論詩之屬。其在此期以前者，無論爲依託與否，亦附及之。

其至今猶存者，或雖不全存而斷章零句猶有可考者，除文鏡祕府論爲日本僧遍照金剛所著以外，有：

文筆式　不知撰人與卷數。諸家均未著錄。案文鏡祕府論卷五引其語云：『製作之道，唯筆與文。文者詩賦銘頌箴讚弔誄等是也；筆者，詔策移檄章奏書啓等也。卽而言之，韻者爲文，非韻者爲筆。文以兩句而會，筆以四句(而)成。文繫於韻，取於諧合也。筆不取韻，四句而成，任於變通，故筆之四句，比（原作此）文之二句，驗之文筆

率皆如此也。』是亦足定文筆區分之義。疑是卷中所論文筆體式聲病各節，當均出此書。

筆札　不知撰人與卷數。諸家均未著錄。案文鏡祕府論卷三論屬對，及七種言志例諸條，均引筆札語。

此二種爲論文之書，餘均論詩格者。今考當時詩格詩例之著，不外二病：其一則取便初學無當大雅，故依托之著爲特多。其又一則過涉瑣碎，轉病拘泥。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云『凡世所傳詩格大率相似，余嘗書其末云，論詩而若此，豈復有詩矣。唐末詩格汙下，其一時名人著論傳後乃爾，欲求高尚豈可得哉。』斯言誠中唐人論詩之病。茲就可考知者略舉其目於後，惟此類書籍名家所不屑爲，故又時多依托之作耳。

詩格　二卷。舊題唐王昌齡撰。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未見。案新唐志及崇文目均作二卷，自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分詩格一卷，詩中密旨一卷，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及國史經籍志等均仍之。今傳世諸本，亦別詩格與密旨爲二。疑是書雖分二卷，本非別爲二書，其後始別出密旨一卷，於是詩格與密旨始各爲一卷耳。今案詩格所論誠不免巧立名目。其勢對例五，有「勢對」「疎對」「意對」「句對」「偏對」諸稱，考文鏡祕府論彙輯諸家論對之例，無「勢對」「疎對」之目，卽其他名稱相同者，而舉例與解釋亦不相同，疑在祕府論後。

詩中密旨　一卷。見前。案密旨所言諸病諸例，多與祕府論同。又案馮班鈍吟雜錄云：『宋人不解小學，如關關雎雎和也。關關二字只取其聲不取其義。朱子云「雎雄相應以關字立義」陋甚也。又檢俗傳王昌齡詩話亦此

解，此僞書也，出於朱子之後。檢宋史經籍志無此書，可知文字鄙陋，非王作也。」考今傳王昌齡詩中密旨雖引關關雎鳩二句而不解其義，僅謂此爲兩句見意之例，馮氏所見當別爲一書。馮氏又謂檢宋志無此書，今考宋史藝文志有王昌齡詩格一卷詩中密旨一卷而無詩話，其別爲一書更無可疑。

評詩格（澹生堂藏書目作李巨山詩格評）　一卷。舊題唐李嶠撰。有詩學指南本，僅二則，疑不全。又有格致叢書本，未見。案顧龍振詩學指南本僅錄其九對十體二則，今考其文悉與文鏡祕府論所引崔氏新定詩體相同，其出後人掇拾依托無疑。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嶠在王昌齡之前而引昌齡詩格八病，亦未然也」今王昌齡詩格有犯病八格一條，陳氏所指當卽謂此。

金針詩格（百川書志作金針集）　三卷。舊題唐白居易撰。有詩學指南本，一卷，題白樂天撰，梅聖俞續。又有格致叢書本，未見。案是書分合各異，分而爲三，則文苑詩格一卷，金針詩格一卷，梅聖俞續詩評一卷，合而爲一則爲三卷，或如宋史藝文志總稱白氏金針詩格，或如國史經籍志稱白樂天文苑詩評，要之皆一書也。又案漁隱叢話前集（八）引詩眼云：『世俗所謂樂天金針集殊鄙淺，然其中有可取者，「鍊句不如鍊意，」非老於文學不能道此。又云，「鍊字不如鍊句，」則未安也，好句要須好字。』今顧龍振詩學指南中錄是書而不見此語，疑非足本。

文苑詩格　一卷。舊題唐白居易撰。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未見。案是書非白氏所撰，直齋書錄解題已

辨之。書中所言，大都論修辭法，殊淺陋；惟其論詩謂：『爲詩之道，義在裨益，言意皆有所爲，』及『爲詩不裨益，即須諷諫』諸語，則雖出依托，要亦不違白氏論詩之旨。

二南密旨（唐志崇文目通志均作詩格，宋志作詩格密旨）一卷。舊題唐賈島撰。有學海類編本，遜敏堂叢書本，詩學指南本。又有藝圃搜奇本，格致叢書本，未見。案是書直齋書錄解題疑其依托，四庫全書存目稱爲僞本之重僅，今考其論詩殆亦受白居易影響。如論六義，論風之所以，論風騷之所由，論二雅大小正旨，論變大小雅，論立格淵奧，論古今道理一貫，諸條皆申六義之旨，如論題目所由，論篇目正理用，論引古證用物象，論總例物象，論總顯大意諸條，又皆闡諷諭之說。

炙轂子詩格　一卷。唐王叡撰。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詩法統宗本，均未見。案宋四庫闕書目入集類別集門，不入文史類，或以其書原附刻炙轂子後，故亦附列別集歟？今案其所言，如一篇血脈條貫體，背律體，叶調體，雙關體，模寫景象含蓄體，句病體，句內叠韵體諸則，蓋亦雜論詩格者。

雅道機要（宋四庫闕書目作雅道機要論）一卷。（爾懷三補五代史藝文志作八卷，誤。）唐徐寅撰。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詩法統宗本，均未見。案直齋書錄解題作二卷，陳振孫云：「前卷不知何人，後卷稱徐寅撰，」則徐氏所撰原祇一卷，寅乾寧元年進士，授秘書省正字，後依王審知以終。是書中如明門戶差別，明聯句深淺，明勢含升降，明體裁變通，諸條均附錄齊己風騷旨格中語，知成書在齊己以後。是書所論雖仍未脫詩

格詩例習氣，然其謂『夫詩者儒中之禪也，一言契道，萬古咸知，』則爲以禪喻詩之始。他如『凡爲詩須搜覓未得句，先須令意在象前，象生意後，斯爲上手矣，』及『爲詩者須先識體格，』云云，並爲滄浪論詩之先聲。

風騷旨格（宋志作詩格）　一卷。唐釋齊己撰。有吟窗雜錄本，說郛本，津逮秘書本，學津討原本，詩學指南本，談藝珠叢本，又有格致叢書本，藝圃搜奇本，詩法統宗本，均未見。案津逮本有毛晉跋語，謂與吟窗雜錄本不同。今傳世諸本大率自津逮本出。其論十勢均爲形容風格之例，蓋與司空圖詩品同旨，惟方法不同耳。

流類手鑑（宋四庫闕書目別集類作詩物象疏類手鑑，文史類重出作疏類手鏡。直齋書錄解題作流類手鑑）一卷。唐釋虛中撰。（湖南通志藝文志作釋齊己撰，誤。）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詩法統宗本，均未見。案其書分物象流類，舉詩類例二目。其流象流類中如以日午春日比聖明，殘陽落日比亂國，晝比明時，夜比暗時，諸則，皆本美人香草之例而益加附會。其舉詩類例中如某者爲隱題，某者爲遠譏之句，某者爲陰陽造化之句，某者爲感動天地之句，以及其他比物諷刺之理，則皆利用上述比興之理以解詩者。其序云：『夫詩道幽遠，理入玄微，凡俗罔知，以爲淺近。善詩之人心含造化，言含萬象。且天地日月，草木煙雲，皆隨我用，合我晦明，此則詩人之言應於物象，豈可易哉！』

緣情手鑑詩格　一卷。唐（？）李洪宣撰。詩學指南本。案直齋書錄解題云：『題樵人李弘宣撰，未詳何人，當在五代前。』「洪宣」「弘宣」未知孰是。又詩學指南本所載僅束散法，審對法，及自然對格三條，當不全。考瀛生

堂書目詩文評類詩法統宗本有緣情手鑑一卷，題釋虛中撰，當誤。

此外有未經著錄者一種：文鏡祕府論卷二卷三卷五，均引崔氏新定詩體，顧不見諸家著錄，蓋其佚已久。案其所言，均與僞李嶠評詩格同，不知是否相襲。又祕府論卷三論側對卷五論病諸條，均引崔氏語，疑即出此書。又有書名難考者一種：文鏡祕府論卷五論病多引劉滔語，而不載其書名，亦不知其是否成書。

第二目　論詩本事之著

其二爲論詩本事之著。其內容與體例每近於小說。

本事詩　一卷。唐孟棨撰。有文房四十家小說本，古今逸史本，津逮祕書本，龍威祕書本，唐宋叢書本，再續百川本，稗史集傳本，藝苑捃華本，歷代詩話續編本。其單行者有明刊本，中國書店校印本。案是書有光啓二年自序，謂『詩者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其間觸事興詠，尤所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因采爲本事詩凡七題』云云，蓋前承詩序而體類小說，後啓詩話而旨在論事者。

續本事詩　二卷。五代吳處常子撰。佚。郡齋讀書志，通志藝文略及宋志均著錄總集類。案處常子不知何許人。考唐末吳越有僧處默與貫休修睦爲詩友，不知即是其人否？郡齋讀書志錄其自序云：『比覽孟初中本事詩，輒搜篋中所有，依前題七章類而編之，然皆唐人詩也。』則其編例蓋仍孟氏舊者。

此外，如唐范攄雲溪友議三卷，諸家著錄均入小說類，惟馬俊良龍威祕書輯入古今詩話集雋中，蓋亦論詩本事之

著。又唐盧瓌抒情集二卷，阮閱詩話總龜胡仔漁隱叢話均引之，新唐志及宋志以入總集類，遂初堂書目以入小說類，疑亦本事詩之屬。

第三目　摘句品選之著

其三，爲摘句品選之著，其內容與體例又多類總集。

古今詩人秀句（崇文目作詩文秀句，誤。）二卷。唐元兢撰。佚。據新唐志，崇文目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通志藝文略入詩話類。

集賈島句圖（崇文目作賈島詩句圖，直齋書錄解題作句圖）一卷。唐李洞撰。佚。新唐志崇文目通考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通志入詩評類。

文場秀句　一卷。唐王起撰。佚。通志藝文略著錄詩評類，新唐志入總集類。

詩圖（宋志作詩體）　唐倪宥撰。佚。崇文目及宋志著錄文史類。

續古今詩人秀句（崇文目脫「今」字）　二卷。（?）僧元鑒撰。佚。崇文目及宋志均著錄文史類。案元鑒時代待考，疑亦五代時人。

右皆句圖之屬，是爲摘句成書之始。宋人論詩，此風尤盛。其源蓋出於鍾嶸詩品。詩品云：「思君如流水，既是即目；高臺多悲風，亦惟所見；淸晨登隴首，羌無故實；明月照積雪，詎出經史。」其論古今勝語，已開摘句之風。

河岳英靈集 三卷。（新唐志作二卷，通志作一卷，誤。）唐殷璠編。案是書通志入詩評類，新唐志入總集類，蓋其性質本可兩屬者。四庫總目雖列入總集類，而提要謂：『是集錄常建至閻防二十四人，詩二百三十四首，姓名之下各著品題，仿鍾嶸詩品之體，雖不顯分次第，然篇數無多而釐爲上中下卷，其人又不甚敍時代，毋亦隱寓鍾嶸三品之意乎？』則通志列入詩評類，亦不爲無見。

詩人主客圖（宋四庫闕書目，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志均作唐詩主客圖） 一卷。（宋志作二卷，通志及焦竑國史經籍志均作三卷）不全。唐張爲撰。本是書而著者，有濟南李懷民中晚唐詩人主客圖。案是書久佚，今所存者如函海本及張氏榕園叢書本，蓋出紀昀重編者。

泉山秀句集（朱彝尊全唐詩未備書目作閩山秀句集） 唐黃滔編。佚。通志藝文略著錄詩評類，新唐志入總集類注云『編閩人詩，自武德盡天祐末。』

右皆近於選集。主客圖雖多摘句，亦有錄全首者，至李懷民重訂主客圖則更類於總集。蓋選集之與批評，其性質本極相近。梁簡文帝與湘東王書云『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此正是評家與選家共有之宗旨。殷璠所編本鍾嶸區分三品之意，張爲所撰又同詩品溯出某某之說，則通志於右列諸書，均入詩評一類，並非無故了。

這三類的著作，實際上都與文學批評不盡有關。第一類則偏於修辭，第二類則同於小說，第三類又近於總集，待到後來這三類統併入詩話中間，於是再得逐漸走上文學批評的道路。

第二節　古文運動之尾聲

第一目　皮日休

在此復古運動的銷沉時代中，而欲求一些關於文學批評之論著，能在文學批評史上有些關係，有些意義者，則文的方面惟皮日休與孫樵，詩的方面惟司空圖，而五代惟劉昫猶差有足以論述者。

然而皮日休與孫樵之論文，也只成爲古文運動之尾聲。蓋皮日休恰代表了李翺一派的文論，而孫樵又代表了皇甫湜一派的文論。所以皮日休的論文思想，與其說他在文學批評史上地位的重要，還不如說他在哲學史上的影響之大。因爲他的思想實開宋學之先聲。

韓愈原道，隱以傳道自任，已啓宋儒道統之說。而皮氏請韓文公配饗書亦云：『仲尼之道否於周秦而昏於漢魏，息於晉宋而鬱於陳隋，……夫孟子荀卿翼傳孔道以至於文中子，……文中之道曠百祀而得室授者，唯昌黎韓公之文，蹴楊墨於不毛之地，蹂釋老於無人之境，故得孔道巍然而自正。』此則正是本於韓愈之意而成爲道統之論。又韓愈讀荀子謂：『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楊大醇而小疵。』此亦宋儒揚孟抑荀之習。而皮氏請立孟子爲學科書亦云：『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眞聖人之微旨也。……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則又已爲宋儒所定四子書樹之先聲了。所以皮日休的思想，實上承韓愈以文明道之旨而益以闡發，遂不自覺地開宋學之風氣者。

皮氏原化一文云：「天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則存乎言，其教則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教者則戾矣。」又其移成均博士書且勸之效法西域氏之教，欲在太學中講習聖人之文，使「日誦其屬，月勵其徒，年持六籍，日決百氏，俾諸生於聖典，洞知大曉。」以大發於儒風。這竟是開宋儒講學的風氣了。所以這種極端廣義的文學觀，覺得在思想方面的影響爲尤大。

其文藪自序云：

文貴窮理，理貴原情。

又其鹿門隱書有云：

文學之於人也，譬如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爲害。

由前窮理之說言之，文所以求知；由後服藥之說言之，文又所以求用。故其九諷悼賈序云：

嗚呼！聖賢之文與道也，求知與用。

文學上的復古主張其結果有如此者？明白皮氏之論文，再去看宋代道學家的文學觀，然後知其一再演進，非推而至於極端不可。這是歷史上演化的趨勢若此，固不得不以之怪宋儒，然而文學觀念卻成爲逆流的進行了。

第二目　孫樵

孫樵與友人論文書云：「嘗得爲文之道於來公無擇，來公無擇得之皇甫公持正，皇甫持正得之韓先生退之。」

（亦見其與王霖秀才書）則其淵源所自，正從皇甫湜一派得來。所以不重論道而重論文，而其論文亦不偷平而尙奇。其與王霖秀才書云：

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攡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淸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手捕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孫樵集二）

又與友人論文書云：

古今所謂文者，辭必高然後爲奇，意必深然後爲工，煥然如日月之經天也，炳然如虎豹之異犬羊也。是故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孫樵集二）

這些話都是申皇甫湜尙奇之旨。至其與賈希逸書謂：

樵者樵耳足下，聲價足下曾於時何晚。及目足下五通五十篇，則足下困十上亦宜矣。物之精華，天地所秘惜。故蒙金以砂，錮玉以璞；珊瑚之叢，必茂重溟；夜光之珠，必含驪龍。抉而不已，積而不知止，不窮則禍，天地讐也。文章亦然，所取者廉，其得必多，所取者深，其身必窮。六經作，孔子削迹不粒矣。孟子述，子思居坎𡒄齊魯矣。馬遷

以史記禍；班固以西漢禍；揚雄以法言太玄窮；元結以浯溪碣窮；陳拾遺以感遇窮；王勃以宣尼廟碑窮；玉川子以月蝕詩窮；杜甫李白王江甯皆相望於窮者也。天地其無意乎？今足下立言必奇，摭意必深，抉精剔華，期到聖人；以此賈於時，釣榮邀富，猶欲疾其驅而方其輪。若曰爵祿不動於心，窮達於時上下，成一家書，自期不朽，則非樵所敢知也。嗚呼！孤進患心不苦，及其苦知者何人？古人抱玉而泣，樵捧足下文，能不潸睫！儻足下自待也淺，且疑其道不在，敢因歸五通，不得無言。（孫樵集二）

則且謂甘於處窮而文却不能不奇了。文欲其奇而不欲平，所以論史法亦不主俚語。其與高錫望書云：

然足下所傳史法，與樵所聞者異耶？古史有直事俚言者，有文飾者，乃特紀前人一時語，以立實錄，非爲俚言奇健，能爲史筆精魄。故其立言序事，及出沒得失，皆字字典要，何嘗以俚言汨其間哉？今世俚言文章，謂得史法，因牽韓吏部曰，如此如此。樵不知韓吏部以此欺後學耶？韓吏部亦未知史法耶？（孫樵集二）

於此問題，並且疑到韓吏部也，眞可謂皇甫湜一派極端的主張了。

第三節　司空圖之詩品

在當時，文論只成爲古文運動之尾聲，無所發明，而司空圖之論詩却能別闢生面，迥殊以前復古之論。則以（1）詩至中晚以後，一般人又只視詩是「爲藝術的」而不是「爲人生的。」賈島詩：『格與功俱造，何人意不降。』（寄柳舍人宗元）又『二句三年得，一吟雙淚流。』（題詩後）劉威詩：『都由苦思無休日，已證前賢不到心。』

（歐陽示新詩因貽四韻）李頻詩：『只將五字句，用破一生心。』（北夢瑣言引）杜荀鶴詩：『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苦吟）又『乍可百年無稱意，難教一日不吟詩。』（秋日閑居寄先達）僧歸仁詩：『日日爲詩苦，誰論春與秋，一聯如得意，萬事總忘憂。』（自遣）盧延讓詩：『吟安一箇字，撚斷數莖鬚，險覓天應悶，狂搜海亦枯。』（苦吟）這些句都是吟詩成癖，狂搜險覓之意，所以只有在詩中體會其韻味，不會再有什麼復古的主張。（2）因爲只在詩中體會其韻味，故其主張也與李杜不同。我嘗以爲清代王士禛譏王維於李白詩仙杜甫詩聖之稱而擬之爲詩佛，此論最爲公允，亦最重要。蓋司空圖之講味外之旨，正足以代表詩佛之詩論。李白論詩謂『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眞。』（古風首章）謂『一曲斐然子，雕蟲喪天眞。』（古風三十五章）旨在標榜清眞，這正是詩仙之詩論。杜甫論詩謂『轉益多師是汝師。』（戲爲六絕句）謂『後賢兼舊制，歷代各清規。』（偶題）意欲集其大成，則又是詩聖之詩論。惟有推爲詩佛之王維，獨不見其有論詩之主張，所以也有待於後人之闡發。司空圖之論詩蓋卽能代表這一方面的主張者。所以能別開生面，所以能不同以前復古之論了。

司空圖有詩品一卷論詩之流品。各種叢書，如說郛，續百川學海，津逮祕書，學津討原，學海類編，藝圃搜奇，談藝珠叢，龍威祕書，唐人說薈，歷代詩話，五朝小說，一瓻筆存，藝苑捃華，祕書重訂欣賞編，硯北偶鈔，拜棋山房几上書，四部備要，以及玉雞苗館叢書，明辨齋叢書，詩觸叢書，螢雪軒叢書，詩法萃編，文品彙鈔等，均皆輯錄。又有焦循刻本。清代解之者有詩品淺解及詩品注釋二種。淺解爲蓬萊楊廷芝撰；注釋不著撰人，蓋坊刻以便初學者。茲錄詩品原文

於後：

大用外腓，眞體內充。返虛入渾，積健爲雄。具備萬物，橫絕太空。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其環中。持之匪強，來之無窮。（雄渾）

素處以默，妙機其微。飲之太和，獨鶴與飛。猶之惠風，荏（一作苒）苒在衣。閱音修篁，美曰載歸。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脫有形似，握手已違。（沖淡）

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碧桃滿樹，風日水濱。柳陰路曲，流鶯比鄰。乘之愈往，識之愈眞。如將不盡，與古爲新。（纖穠）

綠林（一作杉）野屋，落日氣清。脫巾獨步，時聞鳥聲。鴻雁不來，之子遠行。所思不遠，若爲平生。海風碧雲，夜渚月明。如有佳語，大河前橫。（沈著）

畸人乘眞，手把芙蓉。汎彼浩劫，窅然空蹤。月出東斗，好風相從。太華夜碧，人聞清鐘。虛佇神素，脫然畦封。黃唐在獨，落落玄宗。（高古）

玉壺買春，賞雨茆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雲初晴，幽鳥相逐。眠琴綠陰，上有飛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書之歲華，其曰可讀。（典雅）

如（一作猶）礦出金，如鉛出銀。超心鍊冶，絕愛緇磷。空潭瀉春，古鏡照神。體素儲潔，乘月返眞。載瞻星氣，（一作辰）

載歌幽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洗煉）

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巫峽千尋，走雲連風。飲眞茹強，蓄素守中。喩彼行健，是謂存雄。天地與立，神化攸同。期之以實，御之以終。（勁健）

神存富貴，始輕黃金。濃盡必枯，淡（一作淺）者屢深。霧（一作露）餘水畔，（水畔一作山青）紅杏在林。月明華屋，畫橋碧陰。金樽酒滿，伴客彈琴。取之自足，良殫美襟。（綺麗）

俯拾卽是，不取諸鄰。俱道適往，着手成春。如逢花開，如瞻歲新。眞與（一作予）不奪，強得易貧。幽人空山，過雨（一作水）采蘋。薄言情悟，悠悠天鈞。（自然）

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語不涉難，（一作己）若（一作已）不堪憂。是有眞宰，與之沉浮。如淥滿酒，花時返秋。悠悠空塵，忽忽海漚。淺深聚散，萬取一收。（含蓄）

觀花匪禁，吞吐大荒。由道返氣，處得以狂。天風浪浪，海山蒼蒼。眞力彌滿，萬象在旁。前招三辰，後引鳳凰。曉策六鰲，濯足扶桑。（豪放）

欲返不盡，相期與來。明漪絕底，奇花初胎。青春鸚鵡，楊柳樓（一作池）臺。碧山人來，淸酒滿杯。生氣遠出，不著死灰。妙造自然，伊誰與裁。（精神）

是有眞迹，如不可知。意象欲出，（一作生）造化已奇。水流花開，（一作間）淸露未晞。要路愈遠，幽行爲遲。語不欲犯，

思不欲癡。猶春於綠，明月雪時。（縝密）

惟性所宅，眞取弗羈。拾（一作控）物自當（一作富），與率為期。築室松下，脫帽看詩。但知旦暮，不辨何時。倘然適意，豈必有為。若其天放，如是得之。（疏野）

娟娟羣松，下有漪流。晴雪滿汀（一作竹），隔溪漁舟。可人如玉，步屧尋幽。載瞻（一作行）載止，空碧悠悠。神出古異，淡不可收。如月之曙，如氣之秋。（清奇）

登彼太行，翠繞羊腸。杳靄流玉，悠悠花香。力之於時，聲之於羌。似往已迴，如幽匪藏。水理漩洑，鵬風翱翔。道不自器，與之圓方。（委曲）

取語甚直，計思匪深。忽逢幽人，如見道心。清澗（清澗一作晴礀）之曲，碧松之陰。一客荷樵，一客聽琴。情性所至，妙不自尋。遇之自天，泠然希音。（實境）

大風捲水，林木為摧。意（一作適）苦若（一作欲）死，招憩不來。百歲如流，富貴冷灰。大道日喪（一作往），若為雄才。壯士拂劍，浩然彌哀。蕭蕭落葉，漏雨蒼苔。（悲慨）

絕佇靈素，少迴清眞。如覓水影，如寫陽春。風雲變態，花草精神。海之波瀾，山之嶙峋。俱似大道，妙契同塵。離形得似，庶幾斯人。（形容）

匪神之靈，匪幾之微。如將白雲，清風與歸。遠引若（一作莫）至，臨之已非。少有道氣（一作契），終與俗違。亂山喬（一

作高）木，碧苔芳暉。誦之思之，其聲愈稀。（超詣）

落落欲往，矯矯不羣。緱山之鶴，華頂之雲。高人畫（一作惠）中，令色絪縕。御風蓬葉，汎彼無垠。如不可執，如將有聞。識者已領，期之愈分。（一作識者期之欲得愈分）（飄逸）

生者百歲，相去幾何。歡樂苦（一作若）短，憂愁實多。何如尊酒，日往（一作住）煙蘿。花覆茆簷，疏雨相過。倒酒既盡，杖藜行歌。孰不有古，南山峨峨。（曠達）

若納水輨，如轉丸珠。夫豈可道，假體如（一作遊）愚。荒荒坤軸，悠悠天樞。（一作機）載要其端，載同（一作聞）其符。超超神明，返返冥無。來往千載，是之謂乎。（流動）

他這二十四品全用韻語體貌頗能不即不離，攝其精神，許印芳詩法萃編本詩品跋稱其『比物取象，目擊道存』信然。不過許跋更謂：

然品格必成家而後定，如「雄渾」「高古」之類，其目凡十有二。至若「實境」「精神」之類，乃詩家功用，其目亦十有二。第皆會通其義，究厥終始，詩興所發，不外哀樂兩端，或抽悲慨之幽思，或騁曠達之遠懷，佇興而言，無容作僞。其作用有八，先從「實境」下手，次加「洗鍊」工夫，敘事要「精神」，寫情要「形容」，意要「委曲」，法要「縝密」，而總歸於氣機「流動」，出語「自然」。其深造之境有二。溫厚微婉，則有「含蓄」之美，刻摯切至，則有「沈著」之美。所造既深，始成家數。分門別戶，加以品題，「雄渾」第一，「高古」

次之，「豪放」第三，「勁健」第四，「超詣」五，「飄逸」六，「清奇」七，「沖淡」八，「疎野」九，「典雅」十，「綺麗」十一，「纖穠」十二，末二品外貌多，內功少，要貫體而樹骨，濃而澤古，方可成家。故其疏麗在濃淡之間，疏濃在與古為新也。試以此說讀此書，詩域之鎖鑰可得，奧竅必開矣。

他就詩品理出頭緒來，雖似言之成理，然就司空圖二十四品內容而言，實不必有什麼品格功用之分，強加疏解，轉近於鑿。又如楊廷芝二十四詩品小序亦謂：

詩不可以無品，無品不可以為詩，此詩品所以作也。予總觀統論，默會深思，竊以為兼體用該內外，故以雄渾先之。有不可以迹象求者，則曰「沖淡」。亦有可以色相見者，則曰「纖穠」，不「沈著」，不「高古」，則雖沖淡纖穠，猶非妙品。出之「典雅」，加以「洗鍊」，「勁健」不過乎質，「綺麗」不過乎文，無往不歸於一「自然」。「含蓄」不盡，則茹古而涵今；「豪放」無邊，則空天而廓宇。品亦妙矣，品妙而斯為極品。夫品固出於性情，而妙尤發於「精神」，「縝密」則宜重宜嚴，「疎野」則亦鬆亦活，「清奇」而不至於凝滯，「委曲」而不容以徑直；要之無非「實境」也。或值天下之變，不妨極於「悲慨」；境處天下之臨，亦有以擬諸「形容」。「超」則軼乎其前，「詣」則縱乎其後。「飄」則高下何定，「逸」則閒散自如。「曠」觀天地之寬，「達」識古今之變。無美不臻，而復以「流動」終焉。品斯妙極，品斯神化矣。廿四品備而後可與天地無終極。品之倫次定，品之節序全，則有品而可以定其格，亦於言而可以知其志。詩之不可以無品也如是夫！

此雖全就品格而言，並無功用之目，然就司空圖二十四品次第而言，似也不必如此整齊。這種解釋覺得都是八股家本領。大抵司空圖只受時人好用象徵批評以論作家之影響，於是應用此法，以論詩之流品，故能比物取象，目擊道存，亦覺其有味外之旨而已。用象徵方法以分論作家則瑣屑而易爲；以總論流品，則廣漠而難精，所以這種批評，雖是文學的，而在文學批評史上也未嘗不有一些價值。

本此味外之旨的標準以讀詩品，然後纔知他雖是泛論各種風格，而亦未嘗不逗露其主旨。如論雄渾謂『超以象外，得其環中，』論沖淡謂『遇之匪深，即之愈稀，』論纖穠謂『乘之愈往，識之愈眞，』論沉著謂『所思不遠，若爲平生，』論高古謂『虛佇神素，脫然畦封，』論典雅謂『落花無言，人淡如菊，』論自然謂『俯拾卽是，不取諸鄰，』論含蓄謂『不著一字，盡得風流，』論精神謂『妙造自然，伊誰與裁，』論縝密謂『是有眞迹，如不可知，』論清奇謂『神出古異，澹不可收，』論委曲謂『似往已迴，如幽匪藏，』論實境謂『遇之自天，冷然希音，』論形容謂『俱似大道，妙契同塵，』論超詣謂『遠引若至，臨之已非，』論流動謂『超超神明，返返冥無，』則於其所謂味外之旨亦可思過半矣。四庫總目提要以詩品所列，諸體畢備，不主一格，因謂王士禛之但取『采采流水，蓬蓬遠春，』及『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數語以爲詩家之極則，爲非圖原意，殆亦非眞知司空氏論詩宗旨者。尤侗艮齋續說（卷八）說得好：

司空圖在唐末不以詩名，而其詩品二十四則深得詩家三昧。如雄渾云，『荒荒油雲，寥寥長風。超以象外，得

其環中。』纖穠云，『采采流水，蓬蓬遠春。窈窕深谷，時見美人。』典雅云，『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洗鍊云，『流水今日，明月前身。』勁健云，『行神如空，行氣如虹。』含蓄云，『不着一字，盡得風流。』精神云，『生氣遠出，不着死灰。』豪放云，『眞力彌滿，萬象在旁』等語。皆沉潛斯道而後得之。

這一條正可爲我說作證。蓋在當時，以詩爲藝術的風氣之下，固宜其沉潛體會，有所領悟而論詩超詣如此也。林昌彝海天琴思錄（卷七）之議詩品以爲『詩之品何止二十四，況二十四品中相似者甚多，試以古人之詩定之，每首中前後有數品者，每聯中兩句有濃淡者。』而楊廷芝詩品淺解又以無極太極之說解詩品之分目以爲『二十四品固以精神爲關鍵，以沖淡纖穠縝密等項爲對待，以自然實境爲流行，渾分兩宜，至詳至盡，其殆有增之不得，減之不得者歟。』一則議其品目之失當，一則議其品目之無可增減，二說不同，實則均失之泥。讀詩品而不着眼於其超詣之點，似覺終無是處。

現在且再看他的與李生論詩書。其言云：

文之難而詩之難尤難。古今之喻多矣，而愚以爲辨於味，而後可以言詩也。江嶺之南，凡足資於適口者，若醯非不酸也，止於酸而已；若鹾非不鹹也，止於鹹而已。中華之人所以充飢而遽輟者，知其鹹酸之外醇美者有所乏耳。彼江嶺之人習之而不辨也，宜哉！

詩貫六義，則諷諭抑揚，渟蓄淵雅，皆在其間矣。然直致所得以格自奇，前輩諸集，亦不專工於此，矧其下者邪？

王右丞韋蘇州澄澹精緻，格在其中，豈妨其遒舉哉？（遒舉一作道舉）賈閬仙誠有警句，然視其全篇意思殊餒，大抵務於蹇澀，方可致才，亦爲體之不備也，矧其下者哉！噫，近而不浮，遠而不盡，然後可以言韻外之致耳。

又云：

蓋絕句之作本於詣極，此外千變萬狀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豈容易哉！今足下之詩，時輩固有難色，儻復以全美爲工，即知味外之旨矣。

據是可知其論詩全以神味爲主，欲求其美於酸鹹之外，即所以求味外之旨。論詩而重在「韻外之致，」「味外之旨」似乎說得太抽象了。然此正是神韻派的方法。許印芳詩法萃編中亦錄此書，並加以跋語云：

表聖論詩味在酸鹹之外，因舉右丞蘇州以示準的，此是詩家高格，不善學之，易落空套。唐人中王孟韋柳四家詩格相近，其詩皆從苦吟而得。人但見其澄澹精緻，而不知其幾經陶洗而後得澄澹，幾經鎔鍊而後得精緻，學者於一切陳腐之言，浮淺之思，芟除淨盡，而後可入門徑。若從澄澹精緻外貌求之，必至摹其腔調，襲其字句，未有不落空套者，所謂優孟衣冠也。然欲陶洗鎔鍊，而不知審端致力之方，或覺探之茫茫，索之渺渺，雖極雕肝鏤腎，亦終惝恍而無憑。蓋詩文所以足貴者，貴其善寫情狀。天地人物各有情狀，以天時言，一時有一時之情狀，以地方言，一方有一方之情狀，以人事言，一事有一事之情狀，以物類言，一類有一類之情狀。詩文

題目所在，四者湊合，情狀不同，移步換形，中有異意。文人筆端有口，能就現前眞景，抒寫成篇，即是絕妙好詞，所患詞不達意耳。此際宜用淘洗鎔鍊工夫。凡我見聞所及，有與古今人雷同者，人有佳語即當擱筆，或另構思，切忌拾人牙慧。人無佳語，我當運以精心，出以果力，眼光所注之處，叱糟粕而吸菁華，略形貌而取神骨。此淘洗之功也。興酣落筆，如黃白合冶，大氣鼓鑄，成篇之後，細檢瑕疵，平者易之以拗峭，板者易之以靈活，繁者易之以簡約，疎者易之以縝密。啞者易之以鏗鏘，露者易之以渾融。此鎔鍊之功也。功候深時，精義內含，淡語亦濃；寶光外溢，樸語亦華。既臻斯境，韻外之致，可得而言。而其妙處皆自現前實境得來。表聖所云：『直致所得，以格自奇』也。其自舉所得亦多警句，如『松凉夏健人』『樹密鳥衝人』『碁聲花院閉』『落葉穿破屋』『得劍乍如添健僕』『小欄花韻午晴初』等句，皆現前實境，而落筆時若無淘洗鎔鍊工夫，必不能著此等語。由此而推，王韋諸家詩能出奇之故，可默會矣。自表聖首揭味外之旨，逮宋滄浪嚴氏，專主其說衍爲詩話，傳教後進，初學之士，無高情遠識，往往以皮毛之見窺測古人，沿襲摹擬，盡落窠臼，詩道之衰，常坐此病。愚思發其聾聵，而振救之，因抄表聖書，詳論如此。

此說只是性靈派的主張，不是神韻派的主張。神韻之詩雖亦須經淘汰鎔鍊之功，然其論調總主興會總涉抽象，所以許氏所言，似與司空圖原意不同，然性靈說之足以補救神韻之說者亦正在是。又其與王觀評詩書云：

國初上好文章，雅風特盛，沈宋始興之後，傑出於江寧，宏思於李杜，極矣。右丞蘇州，趣味澄夐，若淸風之出岫。

大曆十數公，抑又其次。元白力勍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劉公夢得楊公巨源，亦各有勝會。浪仙東野，（一作無可）劉德仁輩，時得佳致，亦足滌煩。厥後所聞，逾褊淺矣。河汾蟠鬱之氣，宜繼有人。今王生者寓居其間，沈漬益久，五言所得長於思與境偕，乃詩家之所尙者。

其推尊王韋，正可看出此派作風與其主張。至所謂「思與境偕，」卽指興會而言。許印芳跋謂：『詩家題目各有實境，詩人構思必按切實境，始能掃除陳言，獨抒妙義。』此亦只是袁枚餘唾，異於司空圖之見。又與極浦談詩書云：

『戴容州云詩家之景，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之前也。象外之象，景外之景，豈容易可談哉？然題紀之作，目擊可圖，體勢自別，不可廢也。』

『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二語最爲王士禛論詩所稱。而許印芳跋乃謂：『可見古人作詩以眞切爲貴，初學之士宜先講明此理，從眞切處用功，門路不差，自有升堂入室之日，愼勿視爲老生常談』云云，則又適成其爲性靈派的主張。吾嘗謂袁枚性靈之說卽從王士禛神韻之說一轉變而來者。（見小說月報十九卷一號中國文學批評史上之神氣說）許氏此種解釋正可看出這種關係。若謂此卽所以致「韻外之致」與「味外之旨」的方法，則司空圖所言固不若是之泥也。

淸代翁方綱石洲詩話，稱其『論詩入超詣，而其所自作全無高韻，與其評詩之語竟不相似，此誠不可解。』（卷二）潘德輿養一齋詩話亦謂『表聖善論詩而自作不逮，』（卷五）以是爲司空圖病。(注)亦緣不知司空圖之

論詩正代表詩佛一派；而詩佛之詩論，本是見到是一件事，做到是另一件事者。蓋詩佛之詩，羚羊挂角，無迹可求，非有妙悟難以領略，既不能舉以示人，也不用別標新義以爲其作風之擁護的主張。而且本於詩仙之詩論，可以做到渾眞自然的境界，本於詩聖之詩論，也可以做到集大成的境界，獨有詩佛之詩論，則既不用自己去標榜，而後人之能代爲闡說者，儘管說得深中肯綮，妙契玄微，却又未必便能做到此境地。李東陽懷麓堂詩話致疑於『滄浪所論超塵絕俗，眞若有所自得，……顧其所自爲作，徒得唐人體面，而亦少超拔警策之處，』其故正亦坐是。此所以持論愈高者，所作往往愈不能逮，其做得到者既不和盤托出，而見得到者又徒然風光浪藉。我們看詩佛一派之詩論，正當明瞭這些關係。

【注】惟尤侗艮齋續說稱：『其自作詩，曾能超詣爲工，未可以晚唐貶之。』

第四節　劉昫

時至五季，除新創的詞體以外，文格既卑，詩音亦靡，所以此時的文學批評，於新者則體未完成，無可論述，於舊者則以日就衰陋之故，不加注意。而批評界遂歸於沈寂無已！惟劉昫的舊唐書中，猶有一些足以論述者。

劉昫論文之足述者，（1）明白文學之性質，（2）明白文學之進化。

其論文學之性質，很能打破傳統的觀念。（1）不使文混於行，使不與善相混。其蘇味道李嶠諸人傳論云：

才出於智，行出於性，故文章之巧拙，由智之深淺也。行義詭實，由性之善惡也。然則智性稟之於氣，不可使之

彊也。蘇味道李嶠等俱爲輔相，各處穹崇，觀其章疏之能，非無奧贍，驗以弼諧之道，罔有貞純。

其贊亦稱『蘇李文學一代之雄。』他這種不以人廢文的態度，較之昔人不以人廢言爲更進一步。蓋在教訓的批評流行之後，而能有此見解，亦是值得注意的。(2)不使文混於學，使不與「眞」相混。其馬懷素褚无量諸人傳贊云：

學者如市，博通甚難；文士措翰，與麗維艱。

此以學者與文士分言之。又其文苑傳序云：

如燕許之潤色王言，吳陸之鋪揚鴻業，元稹劉蕡之對策，王維杜甫之雕蟲，並非肄業使然，自是天機秀絕，若隨珠色澤，無假淬磨，孔璣翠羽，自成華彩。

此亦以文重在才，故與學異。

至其論文學之進化，也能破除流俗的見解。(1)打破批評界的是古非今說。其文苑傳序云：

前代秉筆論文者多矣！莫不憲章謨誥，祖述詩騷，遠宗毛鄭之訓論，近鄙班揚之述作。謂采采芣苢，獨高比興之源，湛湛江楓，長擅詠歌之體。殊不知世代有文質，風俗有淳醨，學識有淺深，才性有工拙。昔仲尼演三代之易，刪諸國之詩，非求勝於昔賢，要取名於今代。實以淳朴之時傷質，民俗之語不經，故飾以文言，考之絃歌，然後致遠不泥，永代作程，卽知是古非今，未爲通論。

他處於唐代批評界復古說高唱之後，而竟能不爲所囿，謂是古非今未爲通論，眞也是値得佩服的。（2）打破文學界的則古說。他在批評方面既不欲是古非今，則於作品之重在新變不重法古，亦固其宜。其元稹白居易傳論云：

舉才選士之法尙矣！自漢策賢良，隋加詩賦，罷中正之法，委銓舉之司，由是爭務雕蟲，罕趨函丈，矯首皆希於屈宋，駕肩並擬於風騷。或侔箴闕之篇，或斆補亡之句，咸欲鎔鑄採葛，糠粃懷沙，較麗藻於碧雞，鬥新奇於白鳳。暨編之簡牘，播在管絃，未逃季緒之詆訶，孰望子虛之稱賞？迨今千載不乏辭人，統論六藝之源，較其三變之體，如一班者蓋寡，類七子者幾何！至潘陸情致之文，鮑謝清便之作，迨於徐庾，踵麗增華，纂組成而耀以珠璣，瑤臺構而間之金碧。國初開文館，高宗禮茂才，虞許擅價於前，蘇李馳聲於後，或位昇台鼎，學際天人，潤色之文，咸布編集。然而向古者傷於太僻，徇華者或至不經，齷齪者局於宮商，放縱者流於鄭衞，若品調律度，揚搉古今，賢不肖皆賞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於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於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

此文不崇學古之作而尙新變之體。故其贊云：

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留蒸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凡是作家，總無有不知新變的。他這樣不主尊古，不主法古，似乎與唐代一般的批評家異其旨趣。他何以能於此銷聲時代而抱此見解呢？這當然因爲他是史家。他本於歷史的觀念以批評文學，當然能知文學的進化，而不爲批評

界的復古潮流所動搖了。我們試看劉子玄的論文，便可知史家的文學觀本應如此的。他不過為唐代文史家的文評之結束耳！正如司空圖之論詩，雖似別有闡發，實則自有淵源，昧者之不察耳。

第六篇　北宋

第一章　北宋之文論

第一節　宋初之文與道的運動

第一目　統的觀念

宋初之文與道的運動，可以視作韓愈之再生。一切論調主張與態度無一不是韓愈精神之復現。這所謂韓愈精神之復現，最明顯的，即是「統」的觀念。因有這「統」的觀念，所以有信仰，所以能奮鬬，必須勇於自信，能有以斯文斯道自任的魄力，然後纔能奏摧陷廓清的功績。韓愈之成功在是，宋初之參加文與道的運動者，其主因也完全在是。論到「統」的觀念之創始，固不起於韓愈。孟子盡心篇謂由堯舜至於湯，由湯至於文王，由文王至於孔子，由孔子而來至於今云云，這已是道統說之濫觴。論衡超奇篇云：『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仲舒既死，豈在長生（周）之徒歟？』這又是文統說之濫觴。但宋人文統道統之說，其淵源似不出此，其關鍵蓋全在韓愈。韓愈原道篇云：『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這固是道統說之所本，而也是文統說之所出。蓋韓公一生學道好文，二者兼營，所以斯

文斯道一脈之傳，在宋初一般人看來，便全集在韓愈身上。柳開應責一文云：

> 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河東集一）

他心目中的韓愈，即是能以斯文斯道之重自任者；而他之所自期也即在繼韓愈之道與文。所以吾說這是韓愈精神之復現。這在孫復石介所言，更可以看出此關係。孫復信道堂記云：

> 吾之所謂道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之道也。吾學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揚雄王通韓愈三十年，處乎今之世，故不知進之所以爲進也，退之所以爲退也，喜之所以爲喜也，譽之所以爲譽也。（孫明復小集二）

石介尊韓一文云：

> 道始於伏羲氏，而成終於孔子。道已成終矣，不生聖人可也。故自孔子來二千餘年矣，不生聖人。若孟軻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祖述孔子而師尊之，其智足以爲賢。孔子後，道屢塞，闢於孟子，而大明於吏部。道已大明矣，不生賢人可也。故自吏部來三百有餘年矣，不生賢人。若柳仲塗，孫漢公，張晦之，賈公疎，祖述吏部而師尊之，其志實降。噫！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者，十有四聖人，孔子爲聖人之至。噫！孟軻氏，荀況氏，揚雄氏，王通氏，韓愈氏，五賢人，吏部爲賢人之至。（一作卓）不知更幾千萬億年復有孔子，不知更幾千百數年復有吏部。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來未有也；吏部原道原人

原毀行難禹問佛骨表諍臣論，自諸子以來未有也。嗚呼，至矣。

他們這樣推尊韓愈，以韓愈繼承道統，自是宋初人的見解。所以石介在這個運動中便只希望韓愈之復生。其與裴員外書云：

噫！文之弊已久。自柳河東王黃州孫漢公翟相隨而亡，世無文公儒師，天下不知所準的，猶學夫樂者不知六律之有統，五音之有會，而淫哇之聲百千萬變，徒嘵嘵慆人心，噪噪聒人耳，終莫能適夫節奏而和於人神。文之本日壞，枝葉競出，道源益分，波派彌多，天下悠悠，其誰與歸。輕薄之流，得斯自騁，故組巧纂組之辭，徧滿九州，而世不禁也；妖怪詭誕之說，肆行天地間，而人不禦也。今天下大道榛塞，人無所由趨而之於堯舜周公孔子之聖人，唯詰屈一徑而已。吾常思得韓孟大賢人出，爲芟去其荊棘，逐去其狐狸，道大闢而無荒穢，人由之直至於聖，不由曲徑小道，而依大路而行，憧憧往來，舟楫通焉，適中夏之四海，東西南北，坦然廓如，勤無有阻礙。往年官在汝上，始得士熙道；今春來南都，又逢孫明復，韓孟茲遂生矣！斯文之弊，吾不復爲憂；斯道之塞，吾不復以爲懼也。（正誼堂本石徂徠集上）

又上趙先生書云：

傳曰『五百年一賢人生。』孔子至孟子，孟子至揚子，揚子至文中子，文中子至吏部，吏部至先生，其驗歟？孔子孟子揚子文中子吏部，皆不虛生也。存厥道於億萬世，迄於今，而道益明也，名不朽也。今淫文害雅，世教墮

壞，扶顛持危，當在有道。先生豈得不危（一作爲）乎？仲尼有云，『吾欲託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也。』先生如果欲有爲，則請先生爲吏部；介願率士建中之徒，爲李翶李觀。先生唱於上，介等和於下；先生擊其左，介等攻其右；先生犄之，介等角之；又豈知不能勝茲萬百千人之衆，革茲百數千年之弊，使有宋之文，赫然爲盛，與大漢相視，鉅唐同風哉？語曰，『當仁不讓於師。』孔子不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孟子不曰，『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拒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揚子不曰，『後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文中子不曰，『千載之下有紹仲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吏部不曰，『釋老之害過於楊墨，吾欲全之於已壞之後，使其道由愈而麤傳，』蓋知其道在己，不得而讓也。今者道實在於先生，豈得讓乎？（石徂徠集上）

時而以爲韓愈已生，時而復以韓愈期人，這種精神，這種態度，實與韓愈相同。人家雖未必成爲韓愈再生，而石介自己，却已成爲韓愈精神之復現了。故其上張兵部書又云：

介嘗讀易至序卦曰，『剝者剝也，物不可以終盡，故受之以復。』……今斯文也，剝已極矣，而不復，天豈遂喪斯文哉！斯文喪則堯舜禹湯周公孔子之道，不可見矣。嗟夫！小子不肖，然每至於斯，未嘗不流涕橫席，終夜不寢也。顧己無孟軻荀卿揚雄文中子吏部之力，不能亟復斯文，其心亦不敢須臾忘。（石徂徠集上）

則又以斯文斯道自任了。所以我以爲後來文統道統之說，實以受宋初諸人之影響爲多。

自韓愈倡文道並重之說，於是後來的古文家往往論文主道，而斬義理詞章之合而爲一。所以宋初柳開穆修諸人之古文運動，實在也即是道學運動。易言之，宋初一般人之論文，不僅爲此後古文家論文主張之所本，且爲道學家政治家論文主張之所出。表面上是古文運動，骨子裏早開道學的風氣。我們試看柳開初名肩愈字紹先，（一作紹元）即知其以韓柳爲宗而以斯文自任。後來易名爲開，字仲塗，其意以爲『將開古聖賢之道於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爲其塗矣，使古今由於吾也。……吾欲達於孔子者也。』（見河東集卷二補亡先生傳）則知其又以斯道自任。所以我以爲宋初的文論，是文與道共同的運動。

柳開是這個運動中最早也最有力的一個人。他的重要即在提出積極的主張，即在竭力提倡文與道的運動。石介與君貺學士書云：『唐去今百餘年，獨崇儀克嗣吏部聲烈；張景僅傳崇儀模象。』又云：『道至重也，孔子下千有餘年，能舉之者，孟軻氏，荀卿氏，揚雄氏，文中子吏部崇儀而已。』他竟以柳開嗣韓愈，亦可知柳開在這個運動中的重要了。其應責一文說明其爲古文的理由完全由於道。其言云：

子責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謂爲古文？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無過矣。吾若從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欲行古人之道，反類今人之文，譬乎游於海者乘之以驥，可乎哉！苟不可，則吾從于古文。……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

軻，揚雄，韓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責於我。責於我也即可矣？責於吾之文與道也，即子爲我罪人乎？（河東集一）

文章爲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獲斯失矣。女惡容之厚於德，不惡德之厚於容也。文惡辭之華於理，不惡理之華於辭也。（河東集五）

其上王學士第三書說得更偏。如云：

這竟以道爲本，以文爲末，以道爲目的，以文爲手段；儼然是後來道學家文以載道的口吻了。當時趙湘也有這樣主張。其本文論云：

靈乎物者文也，固乎文者本也。本在道而通乎神明，隨發以變，萬物之情盡矣。……若伏羲之卦，堯舜之典，大禹之謨，湯之誓命，文武之誥，公旦公奭之詩，孔子之禮樂，丘明之襃貶，垂燭萬祀，赫莫能滅。非固其本，則湮乎一息焉。一息之湮，本且搖矣，而況枝葉能爲後世之蔭乎？而況能盡萬物之情乎？周禮之後，孟軻揚雄頗爲本者，是故其文靈且久。太史公亦漢之尤者也。揚雄呼其文爲實錄，道之所推耳。又曰『若孔門之用賦者，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奈孔門之不用乎。』然則揚子之言非不用也，本有所不因爾。傳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大哉，夫子之言皆文也，所謂不可得而聞者本乎道而已矣。後世之謂文者，求本於飾，故爲閱玩之具。競本而不疑，去道而不恥，淫巫蕩假，磨滅聲教，將欲盡萬物之情性，發仁

義禮樂之根蔕，是郤克爲長萬之行，吾不見其易也。

或曰：『古之文章所以固本者，皆聖與賢。今非聖賢，若之何能之？』對曰：『聖與賢不必在古而在今也。彼之狀亦人爾。其聖賢者心也。其心仁焉，義焉，禮焉，智焉，信焉，孝悌焉，則聖賢矣。以其心之道發爲文章，教人于萬世，萬世不泯，則固本也。

今學古之文章而不求古之仁義之道，反自謂非聖賢不能爲之，是果中道而廢者，果賊於儒術者，爲蠹教之物者。

古之人將教天下，必定其家，〔將定其家〕（紹廣棨武英殿本南陽集無此四字，疑是脫誤，今補。）必正其身，將正其身，必治其心，將治其心，必固其道。道且固矣，然後發辭以爲文，無淩替之懼，本末斯盛。雖曰未教，吾必謂之教矣。如不能是，不若盲瞶之夫也。盲瞶者不學聖人之道，閔然無所知識，雖無所知，猶不爲儒術之殘賊，不爲聖教之罪人矣。吁嗟〔本〕（原無本字疑脫，今補。）如是之不固也，其幸未淪於禽獸爾。而況能教人耶？而況能道於萬世耶？

或曰今之言文本者，或異於子，如何？對曰，韓退之柳子厚既歿，其言者宜與余言異也。（南陽集六）

當時孫何文箴亦云：『堯制舜度，縣今亘古；周作孔述，炳星煥日，是曰六經，爲世權衡。』又曰：『當塗之後，文失其官。家攘往跡，戶掠陳言。陵夷怠惰，至於江左。輕淺淫靡，迭相唱和。聖心經體，盡墜於地。千詞一語，萬指一意。纏煙綴雲，圖

山膏水。駢枝儷葉，顛首倒尾。』又云『語思其工，意思其深。勿雕淫哇，喪其雅音。勿視彰飾，亡其正色。力樹古風，坐鑠皇極。無俾唐文，獨稱往昔。』因此，可知宋初一般人論文，大率傾向於道的方面的。

第三目 石介與孫復

由於明道，於是連帶的再言致用。這又開政治家的論文主張了。柳開上王學士第四書云：

> 文籍之生於今久也矣。天下有道則用而為常法，無道則存而為具物，與時偕者也。夫所以觀其德也，亦所以觀其政也。隨其代而有焉，非止於古而絕於今矣。（河東集五）

此言實合唐代韓愈柳冕二家而為一。「觀德」「觀政」實開道學政治兩派的主張。蓋時人之所謂道，本多重在應用。觀孫復答張泂（一作洞）書可知：

> 詩書禮樂大易春秋皆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也。以其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左右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發列聖之微旨，或則名諸子之異端，或則發千古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揚賢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憤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危，必皆臨事摭實，有感而作，為論為議，為書疏歌詩贊頌箴銘解說之類，雖其目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孫明復小集二）

此亦文以明道之旨，而所謂道頗有「用」的意義。所以說：『文者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這兩句即是文以致

用的主張。所以又說：「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於言。得之於心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者故可以張其教。」這種論調當然偏於教化了。

這種意思，至石介而益顯。石介在這個運動中間，較為重要，因為他有極大的破壞的力量，他有摧陷廓清的功績。他有幾篇怪說，其怪說上攻擊釋老，怪說中攻擊楊劉。攻釋老，所以為道的運動；攻楊劉，又所以為文的運動，而同時也兼有道的運動在內。其言云：

昔楊翰林欲以文章為宗於天下，憂天下未盡信己之道，於是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韓吏部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韓吏部之道，俟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天下惟見己之道，惟聞己之道，莫知其他。今天下有楊億之道四十年矣！今人欲反盲天下人目，聾天下人耳，使天下人目盲，不見有楊億之道；使天下人耳聾，不聞有楊億之道。俟楊億道滅，乃發其盲，開其聾，使目惟見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耳惟聞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

周公孔子孟軻揚雄文中子吏部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道也，「三才」「九疇」「五常」之道也。反厥常，則為怪矣。夫書則有堯舜典皋陶益稷謨禹貢箕子之洪範；詩則有大小雅，周頌，商頌，魯頌；春秋則有聖人之經；易則有文王之繇，周公之爻，夫子之十翼。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刓鎪聖人

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使天下不爲書之典謨，禹貢，洪範，詩之雅頌，春秋之經，易之繇爻十翼，而爲楊億之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其爲怪大矣！（石徂徠集下）

又其與君貺學士書云：『自翰林楊公唱淫詞哇聲，變天下正音四十年，眩迷盲惑，天下瞶瞶晦晦，不聞有雅聲。嘗謂流俗益弊，斯文遂喪。』這些都是攻擊楊劉二氏之論，蓋他反對『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麗，浮華纂組』的文章，所以要重在道。他所說明文與道的關係，也與孫復相類。其送龔鼎臣序云：

山陽龔輔之學爲古文，問文之旨。魯人石介對曰：夫與天地生者，性也；與性生者，誠也；與誠生者，識也。性厚則誠明矣；誠明則識粹矣；識粹則其文典以正矣。然則文本諸識矣。聖人不思而得；識之至也。賢人思之而至；識之幾也。詩易書禮春秋，言而爲中，動而爲法，不思而得也。孟荀揚文中子吏部，勉而爲中，制而爲法，思之而至也。至者，至於中也，至於法也。至於中，至於法，則至於孔子也。至於孔子而爲極焉，其不至焉者，識雜之也。甚者爲楊墨，爲老莊，爲申韓，爲鬼佛，識雜之爲害也如此。（石徂徠集下）

又與張秀才書云：

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爲文之道也。由是道則聖人之徒（一作中國之人）矣。離是道，不楊則墨矣，不佛則老矣，不莊則韓矣。足下爲文始宗於聖人，終要於聖人，如日行有道，月行有次，星行有躔，水出有源，亦歸於海，盡爲文之道矣。（石徂徠集上）

這些話不過是孫復『文者道之用』一語的注脚。至其所謂道，則亦偏在教化方面。其上趙先生書云：

介近得姚鉉唐文粹及昌黎集，觀其述作，……必本於教化仁義，根於禮樂刑政，而後爲之辭。大者驅引帝皇王之道施於國家，敷於人民，以佐神靈，以浸蟲魚；次者正百度，敍百官，和陰陽，平四時，以舒暢元化，緝安四方。今之爲文，其主者不過句讀妍巧，對偶的當而已；極美者不過事實繁多，聲律調諧而已。雕鏤篆刻傷其本，浮華緣飾喪其眞，於教化仁義禮樂刑政，則缺然無髣髴者。

又上蔡副樞書云：

今之時弊在文矣夫！有天地故有文。『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陳，貴賤位矣；動靜有常，剛柔斷矣；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文之所由生也。『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文之所由見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之所由用也。三皇之書，言大道也，謂之三墳；五帝之書，言常道也，謂之五典；文之所由迹也。四始六義存乎詩，典謨誥誓存乎書，安上治民存乎禮，移風易俗存乎樂，窮理盡性存乎易，懲惡勸善存乎春秋，文之所由著也。文之時義大矣哉！故春秋傳曰『經緯天地曰文。』易曰文明剛健，語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三王之政曰救質莫若文。堯之德曰『煥乎其有文章。』舜則曰『濬哲文明。』禹則曰『文命敷於四海。』周則曰『郁郁乎文哉。』漢則曰『與三代同風。』故兩儀，文之體也；三綱，文之象也；五常，文之質也；九疇，文之數也；道德，文之本也；禮樂，文

之飾也；孝悌，文之美也；功業，文之容也；教化，文之明也；刑政，文之綱也；號令，文之聲也。聖人，職文者也，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具兩儀之體，布三綱之象，全五常之質，敘九疇之數；道德以本之，禮樂以飾之，孝悌以美之，功業以容之，教化以明之，刑政以綱之，號令以聲之；燦然其君臣之道也，昭然其父子之義也，和然其夫婦之順也；尊卑有法，上下有紀，貴賤不亂，內外不瀆，風俗歸厚，人倫既正，而王道成矣。今夫文者，以風雲爲之體，花木爲之象，辭華爲之質，韻句爲之數，聲律爲之本，雕鎪爲之飾，組繡爲之美，浮淺爲之容，華丹爲之明，對偶爲之綱，鄭衛爲之聲，浮薄相扇，風流忘返，遺兩儀三綱五常九疇而爲之文也。棄禮樂孝悌功業教化刑政號令而爲之文也。聖人職之，君子章之，庶人由之，君臣何由明，父子何由親，夫婦何由順，尊卑何由紀，貴賤何由敘，內外何由別，而化日以薄，風日以淫，俗日以僻，此其爲今之時弊也。（石徂徠集上）

此則又以文化爲文，所以又是孫復「道者教之本」一語的注脚。若使柳開所言爲道學家文論之先聲；則石介所言亦政治家文論之先聲。其後熙寧間，劉彝述其師胡瑗之學云：「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其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斯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爲本而尚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以明體達用之學授諸生。」他所謂明體是道學家之所務，達用是政治家之所主。故知明體達用以成其文，正是宋初共同的風氣。

柳開與趙湘，在文的運動之外兼有道的運動；石介與孫復在文與道的運動之外兼有教的運動。都不是純粹文的運動。其比較純粹屬於文的運動者，在北宋之初當推王禹偁穆修與宋祁。王宋並宗韓愈，而王得其易，宋得其奇，穆修則兼宗韓柳。就文論文，惟此三家有足述者。王禹偁送孫何序云：

天之文，日月五星；地之文，百穀草木；人之文，六籍五常。捨是而稱文者，吾未知其可也。咸通以來，斯文不競，革弊復古，宜其有聞。國家乘五代之末，接千歲之統，創業守文，垂三十載，聖人之化成矣，君子之儒興矣，然而服勤古道，鑽仰經旨，造次顛沛，不違仁義，拳拳然以立言爲己任，蓋亦鮮矣。（小畜集十九）

又其五哀詩之一，哀高錫詩有云：

文自咸通後，流散不復雅。因仍歷五代，秉筆多豔冶。高公在紫微，濫觴誘學者。自此遂彬彬，不蕩亦不野。（小畜集四）

則是他對於當時詩文亦頗致不滿，亦頗有意於復古。但是他的復古，並不如宋祁這樣偏於尚奇。他與宋祁同樣的推尊韓愈，他亦說過：『近世爲古文之主者韓吏部而已。』（答張扶書）但是他所取於吏部者，並不在其難，並不尚其奇險。所以他又說：

吾觀吏部之文，未始句之難道也，未始義之難曉也。其間稱樊宗師之文，必出于己，不襲蹈前人一言一句，又稱薛逢爲文以不同俗爲主。然樊薛之文不行于世，吏部之文與六籍共盡。此蓋吏部誨人不倦，進二子以勸

學者。故吏部曰『吾不師今，不師古，不師難，不師易，不師多，不師少，惟師是爾。』（答張扶書）

大抵當時自有一輩人對於所謂「古文」不免有些誤解，不是以爲必須『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便是以爲必須磔裂章句，隳廢聲韻，破偶而用奇。這在他的意思，認爲都不必如此。所以他再說：

夫傳道而明心也，古聖人不得已而爲之也。且人能一乎心至乎道，修身則無咎，事君則有立。及其無位也，懼乎心之所有不得明乎外，道之所畜不得傳乎後，于是乎有言焉；又懼乎言之易泯也，于是乎有文焉。信哉，不得已而爲之也。既不得已而爲之，又欲乎句之難道邪？又欲乎義之難曉邪？必不然矣。

請以六經明之，詩三百篇皆儷其句，諧其音，可以播管絃，薦宗廟，子之所熟也。書者，上古之書，二帝三王之世之文也，言古文無出于此，則曰『惠迪吉，從逆凶。』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在禮儒行者，夫子之文也，則曰『衣冠中，動作慎，大讓如慢，小讓如僞。』云云者，在樂則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五色不得不彰。』在春秋則全以屬辭比事爲教，不可備引焉。在易則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紹虞案此與易文次序不同）夫豈句之難道邪？夫豈義之難曉邪？今爲文而捨六經，又何法焉？若第取其書之所謂『弔由靈』，易之所謂『朋合簪』者，模其語而謂之古，亦文之弊也。（答張扶書）

由道的方面言，不需要辭澀言苦的古文；由文的方面言，也並不以屬辭比事爲可恥，無須乎章句之磔裂。至其再答

張扶書則言之更明。

僕之前書，欲生之文何易道，義易曉，遂引六經韓文以爲證。生繼爲書諭，謂揚雄以文比天地而下云云者，甚乎哉子之篤于道而好于古者也。僕爲子條辨之，庶知僕之用心也。

子之所謂揚雄以文比天地，不當使人易度易測者，僕以爲雄自大之辭也，非格言也，不可取而爲法矣。夫天地，易簡者也；測天者，知剛健不息而行四時；測地者，知含弘光大而生萬物，天地畢矣，何難測度哉？若較其尋尺廣袤而后謂之盡，則天地一器也，安得言其廣大乎？且雄之太玄，準易也。易之道，聖人演之，賢人注之，列于六經，懸爲學科，其義甚明而可曉也。雄之太玄，既不用于當時，又不行于後代，謂雄死已來世無文王周孔，則信然矣，謂雄之文過于伏羲，吾不信也。僕謂雄之太玄，乃空文爾。今子欲舉進士，而以文比太玄，僕未之聞也。

子又謂六經之文，語艱而義奧者十一二三，易道而易曉者十七八，其艱奧者非故爲之，語當然矣。今子之文則不然，凡三十篇，語皆迂而艱也，義皆昧而奧也，豈子之文也，過于六籍邪？若猶未也，子其擇焉。

子謂韓吏部曰：僕之爲文，意中以爲好者，人必以爲惡焉，或時應事作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人即以爲好者，此蓋唐初之文，有六朝淫風，有四子豔格，至貞元元和間，吏部首唱古道，人未之從，故吏部意中自是而人能是之者百不一二，下筆自慙而人是之者十有八九。故吏部有是歎也。今吏部自是者著之于集矣，自慙者棄之無遺矣。僕獨意祭裴少卿文在焉。其略云：儋石之儲，不供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賓筵。此必吏部自慙而

當時人好之者也。今之世亦然也。子壽齊立言，師吏部之集可矣，應事作俗，取祭妻文可矣。夫何惑焉！又謂漢朝人莫不能文，獨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爲之最。是謂功用深其文名遠者，數子之文，班固取之，列于漢書。若相如上林賦喻蜀封禪文劉向諫山陵揚雄議邊事，皆子之所見也。曷嘗語艱而義奧乎？謂功用深者，取其理之當爾，非語迂義暗而謂之功用也。生其志之！

此篇文字至爲重要，他把一般人對於韓愈文論的誤解，均能站在平易的立場，而細爲說明。韓愈說過：『及覩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又說：『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均見答劉正夫書）這便是韓門尚奇一派的根據，他並不反對韓愈這種主張，而他却能闡說此意以成爲自己的主張，這便是他的成功。

第五目　穆修

因宋初論文的風氣偏主於道，而論到道又最易有「統」的觀念，所以即就文的方面而論，亦不能無所宗主。蓋當時之爲古文非有極堅固的信心，亦不易獨排流俗，爲於舉世不爲之時。穆修答喬適書云：

古道息絕不行，於時已久。今世士子習尚淺近，非章句聲偶之辭，不置耳目，浮軌濡轍，相跡而奔，靡有異途焉！其間獨敢以古文語者，則與語怪者同也。衆又排詬之，罪毀之，不目以爲迂，則指以爲惑，謂之背時遠名，闊於富貴；先進則莫有譽之者，同儕則莫有附之者，其人苟無自知之名，守之不以固，持之不以堅，則莫不懼而疑，悔而思，忽焉且復去此而即彼矣。噫！仁義中正之士，豈獨多出於古而鮮出於今哉！亦由時風衆勢，驅遷溺染

之不得從乎道也。（河南集卷二）

所以即像穆修這樣比較地不很沾染道的色彩者，而在這一點亦不得不牽涉到道的問題。他再說：

> 夫學乎古者所以爲道，學乎今者所以爲名。道者仁義之謂也，名者爵祿之謂也。然則行道者所以兼乎名，守名者無以兼乎道。……有其道而無其名，則窮不失爲君子；有其名而無其道，則達不失爲小人。與其爲名達之小人，孰若爲道窮之君子。……學之正僞有分，則文之指用自得。

即就這一點不合時宜的精神，已非守道之君子不能爲了。穆修一生潦倒窮途，而宋初古文之振起實與有力，則由於這種精神的關係。論到道的方面，他受學於陳摶，似乎沒有柳開有介之純，然而論到宋初之古文運動，則穆修與柳開實是同樣的重要。（注）不過柳與穆雖同是宋初古文運動之中心，而柳重在道，穆重在文，亦各有所偏重。在道則尊韓，重在文，則兼崇柳。所以柳開雖也曾以「紹先」爲字，兼崇柳宗元之文，然後來易名以後，實偏重於道而所尊惟韓了。穆修則不然。他是韓柳並重的。邵伯溫辨惑稱其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親者，得金募工鏤板印數百部自鬻於相國寺，即此故事亦可知其推崇韓柳之處。其唐柳先生文集後序云：

> 唐之文章，初未去周隋五代之氣，中間稱得李杜，其才始用爲勝，而號專雄歌詩，道未極其渾備。至韓柳氏起，然後能大吐古人之文，其言與仁義相華實而不雜。如韓元和聖德柳平淮西雅章之類，皆辭嚴義偉，製述如經，能卒然聳唐德於盛漢之表蔑愧讓者，非二先生之文則誰與！（河南集二）

又云：

嗚呼！天厚予嗇多矣！始而壓我以韓，旣而飫我以柳，謂天不吾厚，豈不誣也哉！世之學者如不志於古則已；苟志於古，然求踐立言之域，捨二先生而不由，雖曰能之，非予所敢知也。

這儼然是韓柳的信徒了。據於這種論調，可以看出宋代的古文運動與唐代不同。四庫總目提要有言：『唐時爲古文者主於矯俗體，故成家者蔚爲鉅製，不成家者則流於僻澀。宋時爲古文者主於宗先正，故歐曾王蘇而後沿及於元，成家者不能盡闢門戶，不成家者亦具有典型。』此說極是。宋人正因統的觀念，故必宗先正。實則唐人之爲古文，亦何嘗不宗先正，不過因古文之體未定，所以纔得能闢門戶；而宋人之爲古文則已有典型在前，所以也難成鉅製而已。

〔註〕邵氏聞見錄『本朝古文柳開仲塗，穆脩伯長首爲之倡。』朱子言行錄『韓柳之文因伯長而後行；國初知者有柳開。』

第六目　宋祁

宋代的古文運動，本以韓愈爲依歸。柳開穆脩石介諸人莫不推尊韓愈。但是時有未至，才有未逮，所以古文運動不會成功，醞釀之久，至宋祁歐陽修而始大。宋祁嚴於用字，其源出於韓門樊紹述皇甫湜一派；歐陽修矜於造句，其源出於韓門李翺一派。不過因〔一〕宋祁之作未臻完成，其筆記中自言『年過五十，被詔作唐書，精思十餘年，盡見前世諸著，乃悟文章之難也。雖悟於心，又求之古人，始得其崖略，因取視五十以前所爲文，赧然汗下，知未嘗得

作者蕃籬。』又云：『余於爲文，似蹇蹇年五十，知四十九年非；余年六十，始知五十九年非；其庶幾至於道乎！』又云：『每見舊所作文章，憎之必欲燒棄。』則知其於文，直至晚年，始有悟入，所作自不逮歐文流傳之廣。（2）宋人論文本有偏於道的傾向，若復嚴於用字，豈非與淫巧侈麗浮華纂組之文同一機軸！所以歐派文章主於自然。蘇軾謝歐陽內翰書云：『自昔五代之餘，文教衰落，風俗靡靡，日以塗地。聖上慨然太息，思有以澄其源，疏其流，明詔天下，曉諭厥旨；於是招來雄俊魁傑敦厚朴直之士，罷去浮巧輕媚叢錯采繡之文，將以追兩漢之餘，而漸復三代之故。士大夫不深明天子之心，用意過當，求深者或至於迂，務奇者怪僻而不可讀，餘風未殄，新弊復作。』張耒答李推官書云：『足下之文可謂奇矣。捐去文字常體，力爲瑰奇險怪，務欲使人讀之，如見數千歲前科斗鳥跡所記弦匏之歌，鍾鼎之文也。足下之所嗜者如此，固無不善者。抑耒之所聞所謂能文者，豈謂其能奇哉！能文者固不專以能奇爲主也。……自唐以來至今，文人好奇者不一，甚者或有缺句斷章，使脈理不屬，又取古人訓詁，希於見聞，衣被而說合之，或得其字不得其句，或得其句不知其章，反覆咀嚼卒亦無有此最文之陋也。』（張右史文集五十八）這些都是對於宋派攻擊的論調。宋祁晚年於文自謂有所悟入，或即在此。（3）因此之故，宋祁一派不合時尚，繼起無人，不若歐門有三蘇曾鞏爲之羽翼，而蘇門亦有張晁秦黃之流傳其薪火。所以不久宋派式微，而所謂古文運動之成熟，亦惟歐陽一派足以當之。

然而宋祁論文，也有特別的長處。那在就文論文，絲毫不牽涉到道的問題，而亦不陷於文格文例之層。這正是

皇甫湜一派的態度。王得臣麈史（中）稱：『里人稱：宋景文未第時，爲學於永陽僧舍。連處士因問曰，君好讀何書？答曰予最好大誥。故景文率多謹嚴至修唐書，其言艱，其思苦，蓋亦有所自歟？』則知他所以近於皇甫湜一派的作風，本亦由於性之所近。其筆記（上）云：

柳州爲文或取前人陳語用之；不及韓吏部卓然不丐於古而一出諸己。

又筆記（中）云：

柳子厚云：『嬉笑之怒甚於裂眥；長歌之音，過於慟哭，』劉夢得云：『駭機一發，浮謗如川，』信文之險語。韓退之云：『婦順夫旨，子嚴父詔。』又云：『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又云：『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不得休。』此等皆新語也。

這些都是受韓愈尙奇特之影響；同時，也即是他自己作文所持的態度。

第二節　文與道之偏勝與三派之分歧

正因「統」的觀念之深入於人心，同時，又正因文與道畢竟是兩個事物，所以古文家自有其文統的觀念，而道學家也自有其道統的觀念。人皆知道學家好言道統，而不知古文家也建立其文統。孫樵答王霖秀才書云：『樵得爲文眞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此已儼然有一祖三宗，衣缽傳授之意了。宋人文統之說，亦正從此種風氣得來。宋初一般人之「統」的觀念，大概猶混文與道而言之。到後來，道學

家建立他們的道統，古文家建立他們的文統，便各不相謀了。歐陽修蘇氏文集序云：『自古治時少而亂時多；幸時治矣，文章或不能純粹，或遲久而不能及，何其難之若是歟！豈非難得其人歟！』（歐陽文忠公全集四十一）曾鞏與王介甫第二書云：『是道也，過千載以來，至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爾。』（元豐類稿十六）這些話都有文壇寂寞之感，皆希望有人主盟文壇，而隱隱又有以斯文自任之意。此意在蘇氏父子說得更明顯。蘇洵上歐陽內翰第二書云：

自孔子沒百有餘年，而孟子生；孟子之後數十年而至荀卿子。荀卿子後乃稍闊遠，二百餘年而揚雄稱於世，揚雄之死不得其繼，千有餘年而後屬之韓愈氏。韓愈氏沒三百年矣，不知天下之將誰與也。

下文再有『洵一窮布衣，於四子者之文章，誠不敢冀其萬一。』云云，則可知其所言是專指文統言者。李廌師友談記有一則記東坡醉話云：

東坡嘗言文章之任，亦在名世之士相與主盟，則其道不墜。方今太平之盛，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

此又述當時之傳授，儼然有『吾道南矣』的口吻。在此節中所謂『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云云，或不免李廌偽託東坡之言以自重，但所謂『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則歐陽修固早已說過，『當放此人出一頭地，』又曾說過『更數十年後，世無有誦吾文者，』則知北宋古文家文統的觀念，固不僅在繼往而也重在開來，正與道學

家的道統說同一面目了。道統文統既已建立，固宜其壁壘森嚴，相互角勝而各不相下了。

古文家與道學家何以必須各立其統系以相角勝呢？則以古文家與道學家雖同說明文與道的關係，而自有其性質上的分別與程度上的差異。我曾說過：『唐人主文以貫道，宋人主文以載道，貫道是道必藉文而顯，載道是文須因道而成，輕重之間區別顯然。』（東方雜誌二十五卷一號文學觀念與含義之變遷）這即是所謂程度上的差異。後來貫道說成爲古文家的文論，而載道說則成爲道學家的文論，所以這不僅是唐人和宋人文學觀之不同，實也是古文家與道學家論點之互異。蓋所謂貫道與載道云者，由一方面言，由貫與載的分量上言，固似乎只是程度上輕重的分別；但在另一方面言，道何以能貫，道又何以能載，貫應有可貫之點，載也應有能載之理，則知所貫者與所載者其意義不盡相同，而更有性質上的分別了。朱子說得好：『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文是文，道是道，文只如喫飯時下飯耳。若以文貫道，却是把本爲末。以末爲本，可乎？』這段話便說明貫道與載道的分別。不過他所說的只能說吾人明瞭貫道說與載道說之異，却不能使吾人信仰他的話，因爲他猶不足以折服貫道說的主張。蓋朱子所言，是先戴上了載道的眼鏡，所以說以文貫道是把本爲末；若使吾人以貫道說爲立脚點而言，則正未見其有先後本末之分。吾人須知文學批評中之道的觀念，其大部分俱是受儒家思想之影響；實則道的含義至不一致，有儒家所言之道，也有釋老所言之道，各人道其所道，故昔人之文學觀，其於道的問題，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而也未嘗不受釋老言道之影響。此則所謂性質上的分別。蓋在韓愈以前，其闡明文與道的關係者有

兩種主張其一則偏主於道者，如荀卿揚雄便是。荀之言曰：『凡言不合先王，不順禮義，謂之姦言。』（非相篇）揚之言曰：『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法言吾子篇）這些話都是偏重在道的方面，而所謂道又是只局於儒家之說者。其又一，則較偏於文，如劉勰便是。文心雕龍原道篇云：『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者何哉？夫玄黃色雜，方圓體分，日月疊璧，以垂麗天之象，山川煥綺，以鋪理地之形，此蓋道之文也。』又云『故知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旁通而無滯，日用而不匱。易曰，「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辭之所以能鼓天下者，迺道之文也。』這些話又較重在文的方面，而所謂道又似不囿於儒家之見者。論文而局於儒家之道，只為非此不可作，所以可以云「載」。論文而不囿於儒家之道，則所謂道者，『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聖人得之以成文章。』（並韓非子解老篇語）此所以文與天地並生，而亦可以云「貫」。朱子局於儒家所言之道，所以說『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實則假使以所傳之道為萬物之情，則知所謂貫道云者，正即劉勰所言『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是故言文以明道，則可以包括貫道載道二者；言載道，則只成為道學家的文論；言貫道，也只成為古文家的文論。只可惜貫道之說雖始於唐人，而唐人之論道，總是泥於儒家之說，所以覺得模糊影響，似乎只以道為幌子，而不能與文打成一橛。至於蘇軾，則在道學家看來，本以異端視之者，故其於文與道的觀念，轉很受莊與釋的影響，於是文與道遂相得益彰，不復是離之則雙美了。此所以載道說固始於北宋，而貫道說亦完成於北宋。載道說與貫道說同時建立而完成，此又所以壁壘森嚴而各不相下也。

因文統道統各有其中心主張，所以北宋的文論以古文家與道學家的主張，最足以代表其兩極端，至界其間者，則又有政治家的論調。古文家所重在文，道學家所重在道，政治家則以用爲目標而不廢道與文。這正是劉彝所謂『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的三方面。

這三派的區分自有其時代的背景，亦自有其思想的淵源。大抵宋人風氣好立門戶以爲黨爭。於是關於文論之紛歧，亦儼有黨爭的色彩。當時有洛蜀二黨，洛黨以程頤爲之首，蜀黨奉蘇軾爲其魁。而洛黨正可爲道學家的代表，蜀黨亦正可爲古文家的代表。至於政治家方面則又有新舊二黨，而實折衷於二者之間。舊黨的領袖是司馬光，故較偏於道；新黨的領袖是王安石，故較偏於文。要之均主於用，而不廢道與文。這是此三派所由區分之時代的背景。

又這三派的主張，本亦近於昔人所謂三不朽的意思。歐陽修送徐無黨南歸序云：

> 其所以爲聖賢者，修之於身，施之於事，見之於言，是三者所以能不朽而存也。修於身者，無所不獲；施於事者，有得有不得焉；其見於言者則又有能有不能也。施於事矣，不見於言可也。自詩書史記所傳，其人豈必皆能言之士哉！修於身矣，而不施於事，不見於言，亦可也。孔子弟子，有能政事者矣，有能言語者矣。若顏回者，在陋巷曲肱飢臥而已！其羣居則默然終日如愚人，然自當時羣弟子皆推尊之，以爲不敢望而及，而後世更千百歲亦未有能及之者。其不朽而存者，固不待施於事，況於言乎！（歐陽文忠公全集四十三）

此文所言，雖重在德而不在言，實則其見於言者固須重在立言，而修於身施於事者亦不得不附於言以傳。因此道學家雖偏於立德，政治家雖主於立功，而也與古文家一樣，並有其論文的見解。蓋主修於身而復以所明之道以見於言者，道學家之論文主張也。欲施於事而以言濟其用者，政治家之論文主張也。欲見於言而藉道德事功爲之幹者，則又古文家之論文主張也。這實是此三派論文主張較遠一些的淵源。

第三節 古文家之文論

第一目 歐陽修

宋初之古文運動，其積極的主張有二：一是明道，一是宗唐。這種宗唐，至歐陽修猶沒有變更。其記舊本韓文後云：

> 予爲兒童時……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於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閱之，則喟然歎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於世，至於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六一題跋十一）

在道篇文中可以看出他學文的宗旨與經歷。他於韓集亦只覺「其言深厚而雄博」耳，他的嚮望亦只是「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就文論文，似亦並不帶什麼道的意味。但他在讀李翱文一篇中云：

> 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况迺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無時爾。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六一題跋十一）

則似乎不止於學文，又不僅以韓愈爲止境了。韓愈雖亦「有道而能文」，但其所得於道者，且不如李翱，更何論宋人。歐陽修能闖破這點，所以欲使文與道並重，其於文則取諸韓而近於李，其於道則取諸李而進於韓。此所以古文家之文論又頗多與道學家相近之處，且開道學的風氣也。後來桐城派欲合韓歐程朱而爲一，實則歐陽修的立身祈向，即欲合韓李而爲一者。

因此，其論文主張頗與道學家相近。其答吳充秀才書云：

> 夫學者未始不爲道，而至者鮮，非道之於人遠也，學者有所溺焉爾。蓋文之爲言，難工而可喜，易悅而自足。世之學者往往溺之；一有工焉，則曰「吾學足矣」。甚者至棄百事不關於心，曰「吾文士也，職於文而已」。此其所以至之鮮也。昔孔子老而歸魯，六經之作，數年之頃爾。然讀易者如無春秋，讀書者如無詩（一作「讀春秋者如無詩書」），何其用功少而能極其至也。聖人之文，雖不可及，然大抵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也。故孟子

皇皇不暇著書，荀卿蓋亦晚而有作。若子雲仲淹，方勉焉以模言語，此道未足而強言者也。後之惑者，徒見前世之文傳，以爲學者文而已，故用力愈勤而愈不至。此足下所謂終日不出於軒序，不能縱橫高下皆如意者，道未足也。若道之充焉，雖行乎天地，入乎淵泉，無不之也。（歐陽文忠公全集四十七）

又送徐無黨南歸序云：

予讀班固藝文志，唐四庫書目，見其所列，自三代秦漢以來，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其人不可勝數，而散亡磨滅，百不一二存焉。予竊悲其人文章麗矣，言語工矣，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也。方其用心與力之勞，亦何異衆人之汲汲營營，而忽焉以死者！雖有遲有速，而卒與三者同歸於泯滅。夫言之不可恃也蓋如此！今之學者，莫不慕古聖賢之不朽，而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

寄吳一書，言溺於文則遠於道，謂『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此與道學家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之旨相同。送徐一序，又言重在修於身次則施於事，而不重在見於言；以爲凡『勤一世以盡心於文字間者皆可悲也。』這又與道學家所謂『玩物喪志』之說爲近。所以這些儼然都是道學家的口吻。我們如果欲說明歐陽修所言文與道的關係與道學家不同之處，至多只能說道學家於道是視爲終身的學問，古文家於道只作爲一時的工夫。視爲終身的學問，故重道而輕文；作爲一時的工夫，故充道以爲文。蓋前者是道學家之修養，而後者只是文人之修養。易言之，即是道學家以文爲工具，而古文家以道爲手段而已。歐陽修與樂秀才第一書云：

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爲，而由其質性堅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爲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爲華，張其言以爲大。夫強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爲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爲，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

（歐陽文忠公全集六十九）

其答祖擇之書亦云：

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

（歐陽文忠公全集六十八）

則知彼所謂充實云者不過謂文人的修養，必須下這種基本工夫而已。能下這種基本工夫，則一方面言之有物，一方面識見高卓，能不隨時俗之所好。古文家之所取於道者蓋如此。他的意思，只欲藉道以爲重，並不是重道而廢文，他蓋以爲僅僅盡心於文字間，或巧其言以爲華，或張其言以爲大，則誠不免散亡磨滅，無異草木榮華之飄風，鳥獸好音之過耳耳。觀其唐書藝文志序云：『六經之道簡嚴易直而天人備，故其愈久而益明。其餘作者衆矣，質之聖人或離或合，然其精深閎博，各盡其術，而怪奇偉麗，往往震發於其間。此所以使好奇愛博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滅亦

不可勝數，豈其華文少實，不足以行遠歟！」此正可爲吾說作證。歐陽氏更有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於此意說得更暢。

傳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諷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煒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歐陽文忠公全集六十七）

下文再說『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彰。』則可知古文家之所藉於道德或事功者，不過爲易於流傳計耳。爲流傳計，所以僅藉道德事功以爲重，當然不能廢文的工夫了。道學家以文爲工具，古文家以道爲手段，這是他們的異點。以文爲工具，故「文」不必求飾；以道爲手段，故「道」必須講求。此所以道學家的文論異於古文家，而古文家的文論卻近於道學家。

抑古文家與道學家文論之區別，猶不僅道的問題已也。古文家以並不廢文，而且更重視文，所以猶有討論文事的地方。這在歐公所論碑誌文字，最易看出。他曾爲范文正公神道碑及尹師魯墓誌，均不滿於其子孫，不免增損

其文，故其撰杜祁公墓誌有與杜訢書二通說明其意。其第一書云：

> 修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紀錄則可耳……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歐陽文忠公全集六十九）

其第二書云：

> 所紀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於公爲可略者，皆不暇書。然又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若見信甚幸。（歐陽文忠公全集六十九）

至其論尹師魯墓誌一文，則言之更透澈：

>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再述於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修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便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議論，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自興兵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徧舉，故舉其要

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愧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然後爲師魯稱冤也。故於其銘文，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不辯師魯以非罪，蓋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愧古人，則必不犯法；况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於理，未必爲非，故不是此而非彼也。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不必同，亦互見之也。誌云：『師魯喜論兵，』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非嬉戲之戲，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修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六一

題跋十一）

這種論調，根據史家褒貶之法，以爲文人銘裁之準，已啓後人義法之說。當時王安石答錢公輔學士書，蘇洵與楊節推書，亦皆類此。可知這是古文家極重視的一個問題。

第二目　曾鞏與劉弇

所謂古文家之文論，只有歐陽一派足以當之，固也。然即在歐陽一派中，其主張也微有差異。三蘇用力於文者多，曾鞏致力於道者深。這種分別，在劉壎隱居通議中早已言之。其合周程歐蘇之裂條云：

永嘉有言『洛學起而文字壞。』此語當有爲而發。聞之雲臥吳先生曰：『近時水心一家欲合周程歐蘇之裂。』又言『先儒謂歐文粹如金玉，又以爲有造化在其胸中，而未有以道視之者。然答吳充秀才一書則其知道可見矣。南豐說理則精於其師，如曰及其心有所得而下二三百言，非所諳之至，何以發明透徹！東坡雄偉固所不逮，伊洛微言，或有未過也。』予詳此言，似謂歐曾可以周程，而蘇自成一家，未知然否？（卷二）

又南豐先生學問條云：

濂洛諸儒未出之先，楊劉崑體固不足道，歐蘇一變文始趨古，其論君道國政民情兵略無不造妙，然以理學或未之及也。當是時獨南豐先生曾文定公議論文章根據性理。論治道則必本於正心誠意，論禮樂則必本於性情，論學則必主於務內，論制度則必本之先王之法。其初見歐陽公之書有曰：『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

上，明聖人之心於百世之下。」又曰：「雖理不外乎榮辱利害，」其卓然絕識，超軼時賢。先儒言歐公之文，紆餘曲折，說盡事情，南豐繼之加以謹嚴，字字有法度。此朱文公評文專以南豐爲法者，蓋以其於周程之先，首明理學也。（卷十四）

所以由文學批評而言，曾與歐近，而與三蘇實遠。曾氏論文，殆無不可以看作歐陽文論之發揮者。歐陽修論文以爲充於中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於是曾鞏本之拈出「氣」字。其讀賈誼傳一文謂：

余讀三代兩漢之書，至於奇辭奧旨，光輝淵澄，洞達心腑，如登高山以望長江之活流，而恍然駭其氣之壯也。故詭辭誘之而不能動，淫辭迫之而不能顧，考是與非若別白黑而不能惑，浩浩洋洋，波徹際涯，雖千萬世之遠，而若會於吾心，蓋自喜其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也。既而遇事輒發，足以自壯其氣，覺其辭源源來而不雜，剔吾粗以迎其真，植吾本以質其華，其高足以凌青雲，抗太虛而不入詭誕，其下足以盡山川草木之理，形狀變化之情，而不入於卑汙。及其事多而憂深慮遠之激托，有觸於吾心，而干於吾氣，故其言多而出於無聊，讀之有憂愁不忍之態，然其氣要爲無傷也。

「資之者深而得之者多」，則自然足以「自壯其氣」，自然「其辭源源來而不雜」，此即歐陽所謂「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的意思。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以爲「文者氣之所形，」亦本此意言者。

歐陽修於史傳碑誌之文，又曾提出義法的問題。這在曾鞏南齊書目錄序中亦頗說明此意。

將以是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爲法戒，則必得其所言，而後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有殊功韙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鬱而不發，而檮杌嵬瑣姦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然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明，以爲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體至備，以爲治天下之具。而爲二典者，推而明之，所記者獨其迹耶！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說者，如出乎其時，求其指者，如卽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是之時，豈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爲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絕殘脫之經，以及傳紀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己意，以爲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顚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後，爲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不謂雋偉拔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何哉？蓋聖賢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達其情而見之於後者，以故不得而與之也。（元豐類稿十一）

這樣講道，使不致如道學家之拘泥迂腐。必聖人之徒，纔足以明聖賢之高致，而達其情，纔足使小大精粗本末先後，無不盡且白，而并傳其深微之意。此則古文家之所以重在明道，而所謂義法之法，又必根據乎義也。法近於文，義近於道，故本此意以推到碑銘，於是他又謂：

夫墓誌之著於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材行志義之美者，懼後世之不知，則必銘而見之，或納於廟，或存於墓，一也。苟其人之惡，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以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嚴。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愧而懼。至於通材達識，義烈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勒銘以誇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託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來公卿大夫，至於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歟，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之，於衆人則能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意奸而外淑，有善惡相懸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侈於實，猶之用人，非畜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惑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兼勝焉。故曰非畜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寄歐陽舍人書）

「畜道德能文章」是古文家歐曾一派論文的中心主張。當時歐陽修爲人撰誌銘，即本此主張，曾鞏不過深明此意，故得代爲說出耳。必畜道德者始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而析理能通，設辭能善者，自足以發難顯之情。此雖不言貫道，而實是貫道了。

當時爲曾氏之學者，有劉弇。弇字偉明，安福人，與曾鞏同鄉。所著有龍雲先生文集，中多與曾氏論文之書，其主張亦最與曾氏爲近。曾氏論文，拈出「氣」一字，重在壯其氣，而不欲傷其氣，劉氏上運判王司封書亦云：

匹夫無故殺人於道有折之者必屈，不善用氣也。竇子立秦，孟賁懼焉，氣足故也。弱趙之璧抵强秦之府，垂入者數矣，相如一睨柱之頃，而趙則反璧，而秦則不敢售欺。曹沫三喪地於齊，劍鋒未揣其咽，而向所負者按籍不失錙銖。氣之不可不恃也如此！然又有甚乎此者，其文章歟！其氣完者其辭渾，其氣削者局以卑。是故拼而躍之，非怒張也；緩而留之，非懼脊也；道縱捉發，非客而驕也；紆餘不肆，非懦而萎也；時出冷汰以示其淸，別爲渾以示其厚，如將不得已以示其平，無適而不在於理以示其專，破觚摒軌以示其斂鼓而不竭也。丹雘繪以示其朔徹而更新也。有毅然不可犯，如汲直之面折者。有時女守柔，如回車以避廉頗者。有省語徑說，如曾子之守約者。有灑落佚辨，無敢枝對，如季布之呵曹武陽者。故曰文章以氣爲主，豈虛言哉。孔子之氣，周天地，該萬變，故六經無餘辭焉。而其小者猶足以叱夾谷之强齊。孟子芥視萬鍾，小晏嬰管仲，而其自養則有所謂浩然者，故其書卒貽後世。語賦者莫如相如，相如似不從人間來者，以其甚閒也。語史者莫如子長，瑰瑋豪

爽，視古無上者，以其上會稽，探禹穴，闚九嶷，浮沅湘，以作其氣也。唐之文子，固無出退之者，其入王庭漢軍也，視若軒渠乳兒，則足以知其氣矣。若夫持正偏中，禹錫浮躁，元稹緣宦人取寵，呂溫茹使僻規進，而宗元戚蹉於放廢之湘南，皆其氣之不完者。故其文章終餒於理，亦其勢然也。（龍雲先生文集十八）

此文闡說尙氣之旨，以及氣與理之關係，均與曾氏讀賈誼傳一文相同。卽其論道，亦與曾氏南齊書目錄序相似。如上知府曾內翰書云：

蓋嘗以謂使眞理不言而喻，妙道無迹而行，則世復何賴於言，而言亦無以應世矣。惟其形容之不能寫，精微之不能盡，中有以類萬物之情，外有以貫萬物之變，旁有以發其耳目之聰明，而截然自造於性命道德之際。此言之所以不可已，而文章所爲作也。（龍雲先生文集二十一）

這不卽是曾氏所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之意嗎？若由地域而言，則歐曾與劉弇的文論，正可稱之爲江西文派的文論，周必大作龍雲集序，稱其足繼歐陽修之後，而上接韓文，雖未免推許逾量，然就江西文人言之，弇實足繼歐曾之後也。

第三目　三蘇

三蘇論文便與歐曾迥異。其所由不同之故，卽在其對文學之態度。蘇洵上歐陽內翰書自述其學文經歷，謂：

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旣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

著，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既久，胸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嘉祐集十一）

此便與道學家及柳穆歐曾諸人所持之態度不同。蓋道學家及柳穆歐曾諸人，其所以學古人之文者，乃所以求其道，即使於道無所得，表面上總不敢像蘇洵這樣大膽地宣言爲文而學文。蓋自韓愈說過『愈之所志於文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所以後來古文家之自言有志於文者，總不敢直捷明白地說只是好其辭。但在蘇洵則所取於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者，不過重其文而已，不過好其辭而已。他只是學其文而不是學其道，所以孔孟荀揚韓諸人在道學家以之建立道統者，在他却以之建立文統。又此文中，更有評論昔人和時人的文章之處，謂：

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魚黿蛟龍，萬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

文也。惟李翺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

此亦就文論文，與道學家及歐曾諸人不同。他只是論文的風格，不復論及文的內容。他從作風品格衡量文的價值，而不復拖泥帶水牽及道的問題。這便是三蘇文論重要的地方。

明此，纔可知三蘇論文，本不重在道。即偶有言及道者，其所謂道，也是道其所道，非惟不是道學家之所謂道，抑且不是柳穆歐曾諸人之所謂道。一道的觀念，在道學家說來覺得極嚴者，在古文家說來便化爲神奇

朱子語類中雖有一節攻擊蘇氏所論文與道的關係，謂：

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今東坡之言曰，吾所謂文必與道俱，則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時，旋去討箇道來入放裏面，此是他大病處。只是他每常文字華妙包籠將去，到此不覺漏逗說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處，緣他都是因作文卻漸漸說上道理來，不是先理會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

實則此語絲毫不曾道着蘇氏癢處。蓋這一節的爭論，仍是關於貫道說與載道說的一重公案。朱子所謂『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皆道也』，仍即是上文所引朱子語『這文皆是從道中流出，豈有文反能貫道之理』的意思。這些話語，正是『文所以載道也』一語之絕妙注脚。至於東坡所謂『文必與道俱』云者，則又是『文者貫道

之器也』一語的轉變。朱子處處在載道一方面說話，東坡處處在貫道一方面說話。所以東坡之所謂道，與道學家之所謂道，本不是指同一的對象。東坡之所謂「道」，其性質蓋通於藝，較之道學家之所謂道，實更爲通脫透達而微妙。其日喻贈吳彥律云：

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然則道卒不可求歟？蘇子曰：道可致而不可求。何謂致？孫武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孔子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莫之求而自至，斯以爲致也歟。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而能浮，十五而能沒矣。夫沒者豈苟然哉！必將有得於水之道者。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識水，則雖壯見舟而畏之。故北方之勇者，問於沒人，而求其所以沒，以其言試之河，未有不溺者也。故凡不學而務求道，皆北方之學沒者也。（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五十七）

東坡之所謂道者如此，所以可以因文以求道，所以可以『文必與道俱。』彼之於道，實是『莫之求而自至』的，實是由於『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這正與老泉所謂：『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是同樣意思。彼亦何嘗臨文時纔去討個道來人放裏面呢？彼不過與世之言道者，——或卽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者，其方法不同而已。其卽其所見而名之者，論道每泥於迹象，其莫之見而意之者，論道又入於虛玄。這纔與捫燭扣槃無異。所以他主張學。學文可以得文中之道，學文又可以得行文之道。得文中之道，猶是昔人的糟粕，不可以言求道；得行文之道，纔

可以達其所明之道，這纔是所謂致道。但此豈生不識水的北方勇者所能明其故哉！固宜朱子之譏爲大本都差矣。

我們且再看東坡答謝民師書。他謂：

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夫言止於達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繫風捕影，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了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經進東坡文集事畧四十六）

東坡屢言爲文主於辭達，其答王庠書亦謂：『孔子曰「辭達而已矣。」辭至於達，止矣，不可以有加矣。』（經進東坡文集事畧四十六）但是他的所謂辭達，決不是道學家政治家之所謂辭達。蓋他是欲使了然於心者，再能得了然於口與手，所以他之所謂辭達，也是「莫之求而自至」的辭達。道學家因主辭達而無須於文，政治家因主辭達，而所須於文者只求其適於功利的用。故其所謂達，均不過是質言之的達而不是文言之的達。質言之的達，只能達其表面，達其糟粕而不能達其精微。至古文家則異於此者。必須先能體物之妙，了然於心，攫住其要點，捉到其靈魂，然後隨筆抒寫，自然姿態橫生，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所不可不止，而道也亦自然莫之求而自至的以寓於其間。這纔盡文家之能事，這纔是文言之的達。是又豈泥於格物致知者所能達其髣髴識！要能得這樣達了以後，纔能使了然於一己者更以之了然於人人。這纔是所謂明道，這纔盡文辭之用。所以說：『辭至於能達，則文不可勝用矣。』但此所謂不可勝用者，又是無用之用，是自然的用，而不是功利的用，有目的的用。

這種意思，當時釋德洪庶幾知之矣！石門題跋中有跋東坡悅池錄云：

歐陽文忠公以文章宗一世，讀其書，其病在理不通。以理不通，故心多不能平，以是後世之卓絕穎脫而出者皆目笑之。東坡蓋五祖戒禪師之後身，以其理通，故其文渙然如水之質，漫衍浩蕩，則其波亦自然而成文，蓋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其文自孟軻左丘明太史公而來一人而已。（注）

【註】亦見石門文字禪卷二十七。

這種意思後來李繒亦庶幾知之。程洵尊德性齋小集鍾山先生行狀中述李氏語云：

嘗曰：文者所以載道，言之不文，行之不遠，而世儒或以文為不足學，非也。顧其言於道何如耳！每為學者誦眉山之言曰，物固有是理，患不能知之，知之患不能達之於口與手。辭者達是理而已矣。以為此最論文之妙。

辭所以達是理，何嘗「文自文而道自道」！不過古文家之文說理而不為理障，道學家之文說理而障於理窟。高下精粗區別顯然。此所以道學家只知求道而不明致道；而於論文，只知推崇歐曾，而不能了解三蘇也。張耒答李推官書云：「夫文何為而設也？知理者不能言。世之能言者多矣，而文者獨傳。豈獨傳哉！因其能文也而言益工，因其言工而理益明。」（張右史文集五十八）玩味此語，則蘇門論文之旨昭然矣。

說理而障於理窟，所以道學家以為有德者必有言，而歐陽修亦以為「道勝則文自至」。（答吳秀才書）以為「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為文者輝光」。（答祖擇之書）說理而不為理障，所以必須胸中之言目當

字。不能自制始出而書之。（見蘇洵上歐陽內翰書）此雖同樣謂充於中以發於外，但其意義亦微有不同。觀蘇軾南行唱和集叙，即可知其異點所在。蘇氏謂：

夫昔之爲文者非能爲之爲工，乃不能不爲之爲工也。山川之有雲霧，草木之有華實，充滿勃鬱，而見於外。夫雖欲無有，其可得耶？自聞家君之論文，以爲古之聖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軾與弟轍爲文至多，而未嘗敢有作文之意。（經進東坡文集事畧五十六）

這亦是所謂充滿勃鬱而見於外，也即是體會得深而不可遏抑的狀態，與所謂不能遏制的狀態。未嘗不由於道，也未嘗不由於學，而道與學均有賴於積之既久之時。至一時臨文之頃，仍不得不有待於興到而神來。此意人識，使非道學家之所能窺見了。而其意亦仍出於蘇洵。蘇洵仲兄字文甫說云：

且兄嘗見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渟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行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蹙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徊，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縠，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滂薄洶湧，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乎無垠，橫流逆折，濆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燧，奔者如焰，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此亦天下之至文也。然而此二物者，豈

有求乎文哉？無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是其為文也，非風之文也，非水之文也。二物者非能為文，而不能不為文也。物之相使而文出於其間也。故曰天下之至文也。今夫玉，非不溫然美矣，而不得以為文；刻鏤組繡，非不文矣，而不可以論乎自然。故夫天下之無營而文生之者，惟水與風而已。昔者君子之處於世，不求其功，不得已而功成，天下以為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著，天下以為口實。嗚呼！此不可與他人道之，唯吾兄可也。（嘉祐集十四）

平常所了然於心者，是水；一時所動盪激發不得不使之了然於口與手者，是風。「是水也，而風實起之；」「是風也，而水實行之。」這樣風水相遭，以備風水之極觀者，這纔成為天下之至文。而此天下之至文，却正是所謂不能自已而作者。

這種意思，其二子軾轍本之以作文，本之以論文，各有所得亦各有所成。東坡題跋中書子由超然臺賦後云：「子由之文詞理精確有不及吾，而體氣高妙吾所不及，雖各欲以此自勉，而天資所短，終莫能脫。」此言評得頗有分寸。詞理精確與體氣高妙云云，確能道着各人長處，並未溢美，也並非標榜。蓋子瞻長於理，故論文妙處近於神；子由長於氣，故論文精處重在氣。

子瞻之文詞理精確，而能不墮理窟，實以得於莊與釋者為多。錢謙益讀蘇長公文云：

吾讀子瞻司馬溫公行狀，富鄭公神道碑之類，平鋪直序，如萬斛水銀，隨地涌出，以為古今未有此體，茫然莫

得其涯涘也。晚讀華嚴經，稱性而談，浩如烟海，無有不有，無所不盡。乃喟然而歎曰，子瞻之文，其有得於此乎？文而有得於華嚴，則事理法界，開遮涌現，無門庭，無墻壁，無差擇，無擬議，世諦文字，固已蕩無纖塵，又何自而窺其淺深，議其工拙乎？……蘇黃門言少年習制舉，與先兄相後先，自黃州已後，乃步步趕不上，其爲子瞻行狀曰，公讀莊子，喟然歎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未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後讀釋氏書，深悟實相，參之孔老，博辯無礙。然則子瞻之文，黃州已前得之於莊，黃州已後得之於釋，吾所謂有得於華嚴者信也。（初學集八十三）

此言亦是。惟其所得於莊與釋者，並非如一般耽心禪悅者流，說得迷離恍惚，不可捉摸。他所得於莊與釋者，不過能於道的觀念，不局於儒家之見，看作萬物自然之理而已。莊子言道在螻蟻，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而佛家亦言佛法在行住坐臥處，着衣吃飯處，屙屎撒溺處，沒理沒會處，死活不得處。這般說法，卽東坡所謂：『物固有是理，患不能知之者。』道學家所言格物，本也是在格萬物之理，但是後來只局於儒家的經籍中間，於是所謂道者便不是『萬物之所然』了。物固有是理而能知之，卽所謂體物之妙，而使之了然於心。『日與水居則十五而得其道』，則所謂行文之妙而復使之了然於口與手。了然於心，所謂『深悟實相』；了然於口與手，又所謂『博辯無礙』也。能如是，橫說豎說，雖是文的功夫，而莫非道也，而莫非理也。此之謂辭達！能得這樣辭達，卽所謂神化的境界。子瞻有文說一篇，卽自評其文，謂：

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雖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於所當行，常止於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雖吾亦不能知也。（經進東坡文集事畧五十七）

此即狀神化妙境，所謂隨物賦形云者，也即是風與水相遭而成爲天下之至文。子瞻琴詩云：『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蘇文忠公詩集二十一）妙語解頤。若以理言，則陳繼儒所謂一卷楞嚴經也；（見其所著偃曝談餘）若就論文見解言，則又即風水相遭之說也。

子由不能如子瞻之妙悟，所以只能在氣字上致力。老泉論孟子之文謂其語約意盡而鋒不可犯，論韓子之文謂渾浩流轉而掩抑蔽掩，歐陽子之文紆餘委備而條達疏暢，並自爲一家之文。於是子由本之遂以拈出氣字。

論氣，亦未嘗不關於理。張耒答李推官書云：『理解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爲粉澤而隙間百出。此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八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乎？』這即是理直氣壯之說。理直氣壯，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所以下文云：『江淮河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奇而奇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奇，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語句讀爲奇之文也。』此文雖不言「氣，」──但頗能說明理與氣的關係。子由既不能像子瞻這樣天生妙悟，所以不能得之於理，只能求之於氣。求之於理，重在體物，而更須有了然於口與手的本領；求之於氣，重在修養，而比較的易使言之短

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所以子由上樞密韓太尉書云：『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欒城集二十二）一般人只曉得文可以學而能，至於氣則『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語）者，而他却偏說『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則又何也？蓋子瞻子由並用力於文字，而同時又均不敢有作文之意。其用力於文字，即老泉所謂『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之意；其不敢有作文之意又即老泉所謂：『不求有言不得已而言著』之意。蓋此本蘇門家學，並得之於父教者。子瞻才高，能由文以致道，更能因道以成文。用力於文字，則所了然於心者得以了然於口與手矣；不敢有作文之意，則所了然於口與手者又莫非了然於心之流露矣。由理言，則不是語言文字而都是理；由文言，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隨物賦形而不可知。這是妙悟神化的境界，子由所不能到者。子由上不能如子瞻之入化境，而下又不敢有作文之意，不欲求工於言語句讀以爲奇，此所以謂『文不可以學而能』也。但神化妙境雖不可學，言語句讀雖不屑學，而『生好爲文』癖性所嗜，未能忘情，於是不得不求之於氣。蓋理直則氣壯，氣盛則言宜，氣是理與言中間的關鍵，於是想由氣以進乎言宜之域，言宜則庶幾亦可以合乎理而近乎神。此又所以謂文是氣之所形，而養氣則文自工也。（注）

【注】蘇籀欒城遺言謂：『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籀曰五百年無此作矣。』可知他着眼所在。

養氣之法，他更舉二例云：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弘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小大。太史公行天下，周覽

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上樞密韓太尉書）

在此二例中，差不多有兩個意思。孟子一例，指修養言；太史公一例，指閱歷言。指修養言者，其功夫從內證入，不易爲着手之地；從閱歷言者，其工夫從外做起，便有所依據之途。所以他於此二者中間，畢竟還重在後一方面。他又說：

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上樞密韓太尉書）

原來他的所謂養氣功夫，是有待於外方之激發者。所以必須高山大野纔可登覽以自廣，所以必須求天下之奇聞壯觀纔足以激發其志氣。蓋道學家之論氣，重在修養；古文家之養氣，重在閱歷。所謂文章得江山之助，即是古文家的養氣方法。

第四節　道學家之文論

第一目　道學家文論之衡價

文學觀至道學家遂復返於復古。所謂傳統的文學觀，亦至宋代的道學家始有其權威。所以近人以反對文以載道之說，對於道學家之文論往往一筆抹煞，以爲不足論述。實則他們的主張，無論如何趨於極端，或不合現代潮

流，而在文學批評史上總有他相當的地位與價值。我們正應着眼在客觀的敘述而加以公平的論斷。

所以第一點先須說明道學家的文學觀念，自是時代背景所造成，自是學術演進自然趨勢的結果。蓋這個復古潮流，正是沿襲唐人的風氣，而益以演進者。唐人已說過：『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焉爾。』（韓愈答李秀才書）則宋人只好其道而遺其辭，固亦承唐人之遺緒而已。承唐人之遺緒而益趨極端，所以宋初柳開欲『開古聖賢之道於時，』而當時趙湘亦言『今學古之文章而不求古仁義之道，反自謂非聖賢不能爲之，是果中道而廢者。』（本文篇）則知道學家之所以成功，不過循斯塗以進行不會中道而廢耳。

第二點更須明瞭道學家之文論無論如何趨於極端，但在文學批評史上依舊有他相當的價值與影響。蓋以（1）道學家都有他思想上的根據，故其文論多重在原理上的討論，而不是方法上的考究。昔人之論四六論詩詞者，往往泥於粗迹，偏於修辭的方面。道在古文家猶不免如此，而道學家則不尙修辭，獨能免於這種瑣屑的論述。（2）道學家即不重在道的問題——文的內容的問題，而就文論文，也能有精微透徹的見解，並不全屬迂腐。蓋宋儒最善體認聖賢之眞氣象。近思錄至特設聖賢氣象一門。故其觀文亦能別有會心。此即程頤所謂『六經之言在涵蓄中默識心通』者也。這實是論文而通於道，論道而通於文的地方。所以是宋儒讀書解經的特色，同時亦是其論文的特色。至或因此種極端重道的主張成爲問題以後，或加闡發，或起反對，則對於文學批評史上更有相當的影響了。

第二目　周敦頤

道學風氣，開自周敦頤；即文以載道之說，亦始於周氏。周氏云：

>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致之，是爲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辭第二十八）

德」雖語固然頗有重道輕文之意，但細繹語氣，尙不甚偏。即如通書第三十四節所云：『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亦不過謂學聖人者當求之道德，不可徒溺於文辭而已。他只說溺於文辭則不足以明道，尙不致說欲闡發聖人之道可無藉於文辭也。通書文辭一節謂：

>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爲能者，藝焉而已。

其意亦顯，他只是說不可偏重於文辭，並不是說只欲務道德而不欲務文辭。語氣中間正說反說倒說順說，意義自別，都不容輕忽讀過。所以他的所謂文以載道云者，雖有重道輕文之意，猶無重質廢飾之說。所謂『篤其實而藝者書之。』所謂『美則愛，愛則傳。』都是並不廢藝，並不輕美之意。蓋他雖以文爲工具而仍不欲廢此工具之修飾。爲車者飾其輪轅，爲文者善其詞說，皆所以使人愛而用之。他不主張廢飾；他只反對徒飾而已。朱子解釋此章云：

> 蓋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爲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而

歐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我以爲此節「正謂此也」以上，所釋猶是周子意思，至「然」字一轉則全是朱子意思。周子此章本是一別以文辭爲一事。」或疑云云，則拘泥於二程之說乃始有此疑耳。周程二氏對於文學之見解本不盡同，朱子必欲曲爲講通之，但亦近於多事。

第三目　二程

二程論文，本濂溪之說以推衍，遂益趨極端。於是有所謂「倒學」之說。

退之晚年爲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

（二程遺書卷十八）

二程以前，吳處厚有「古人好道而及文，韓退之學文而及道」之語（見苕溪漁隱叢話引），劉敞亦言「道者文之本也。循本以求末易，循末以求本難，」（公是先生弟子記）但均爲程說所本。

頤更進一步，因謂文章與異端同科。二程遺書卷十八云：

今之學者有三弊：一溺於文章，二牽於訓詁，三惑於異端。苟無此三者，則將安歸？必趨於道矣。

又卷六云：『今之學者歧而爲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泥爲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卷十八云：『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此雖不與異端並論，但已屏文章於道學之外，欲趨於道者，便不必求其能文了。

於是，更進一步有作文害道之說。程頤顏子所好何學論謂：

> 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伊川文集四）

其答朱長文書（或云此明道之文）又謂：

> 向之云無多爲文與詩者，非止爲傷心氣也，直以不當輕作爾。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人之言雖欲已得乎？……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伊川文集五）

至其語錄中說得更透澈，程頤云：

> 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教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

> 學者先學文，鮮有能至道。至如博觀泛濫，亦自爲害。

程頤云：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翫物喪志，』爲文亦翫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二程遺書卷十八）

孔子曰『有德者必有言，』何也？曰和順積於中，英華發於外也。故言則成文，動則成章。（二程遺書卷二十五）

以爲文爲翫物喪志，這纔是道學家的偏見。濂溪論文，猶不廢飾，二程論文，始以爲有德者必有言無事於文。一方面既文與道爲二，而以爲學文則害道；一方面又合文與道爲一，而以爲明道則能文。於是纔主張文不可學，亦不必學。但是對於張載的西銘，未嘗不見到此意，而却無其筆力以達之，則知學文固未嘗不有裨於道，而明道的結果亦未必一定能文了。

第四目　程門弟子

文學觀至二程已偏到極點，所以程門弟子之文論，也不用再說；即使再說，這種陳陳相因的話頭，我們也可不

必重事稱引。但在程門弟子中論文之語也有一些重要的地方，即是(1)頗能說明文所以要重道的理由，(2)頗能說明道所能影響於文的地方。

關於第一點，由道學方面言，由儒學方面言，都是一種進步。蓋他們以爲在道未明以前，則貴體會，貴求之於言意之表，所以不能限於文辭；在道已明以後，則貴力行，貴驗之於行動之間，所以又用不到文辭。這樣，完全以道爲中心，所以對於文的態度於古人之作則不求諸外而體之於內，於自己之作，則不重在飾而致力於實。無論在讀或作兩方面都有重道輕文的需要。

楊時送吳子正序云：

> 六經先聖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治之成法也。其文自堯舜歷夏商周之季，興衰治亂成敗之迹，捄敝通變因時損益之理，皆煥然可致。網羅天地之大，文理象器幽明之故，死生終始之變，莫不詳諭曲譬，較然如數一二，宜乎後世高明超卓之士一撫卷而盡得之也。予竊怪唐虞之世，六籍未具，士於斯時，非有誦記操筆綴文，然後爲學也而其蘊道懷德優入聖賢之域者，何其多耶？其達而位乎上，則昌言嘉謨，足以亮天工而成大業；雖困窮在下，而潛德隱行，猶足以經世勵俗。其芳猷美績，又何其章章也！自秦焚詩書，坑術士，六藝殘缺。漢儒收拾補綴，至建元元狩之間，文辭粲如也。若賈誼董仲舒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繼武而出，雄文大筆，馳騁古今，沛然如決江漢，浩無津涯，後雖有作者，未有能涉其波流也。然賈誼明申韓，仲舒陳災異，馬遷之多愛，相如之

浮侈，皆未足與議；惟揚雄爲庶幾於道，然尚恨其有未盡者。積至於唐，文籍之備，蓋十百前古。元和之間，韓柳輩出，咸以古文名天下，然其論著不詭於聖人蓋寡矣。自漢迄唐千餘載，而士之名能文者，無過是數人，及考其所至，卒未有能倡明道學，窺聖人閫奧，如古人者。然則古之時六藝未具，不害其善學；後世文籍雖多，無益於得也。孔子曰予非多學而識之，予一以貫之，豈不信矣哉！（楊龜山先生集二十五）

其與陳傳道序又云：

予嘗謂學者視聖人，其猶射之於正鵠乎？雖巧力所及有中否遠近之不同，然未有不志乎正鵠而可以言射者也。士之去聖人，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所造固不同，然未有不志乎聖人而可以言學者也。自孔子沒，更戰國至秦，逢焚書阬儒，士之六經中絕。漢興，雖稍稍復出，然聖學之失其傳尚矣。由漢至唐，千餘歲，士之博聞強識者，世豈無其人耶？而卒未有能窺聖學之堂奧者，豈當時之士卒無志於聖人耶？而卓然自立者何其少也？若唐之韓愈，蓋嘗謂世無仲尼，不當在弟子之列，則亦不可謂無其志也。及觀其所學，則不過乎欲雕章鏤句取名譽而止耳。然則士固不患不知有志乎聖人，而特患乎不知聖人之所以學也。且古之聖人固宜莫如舜也。舜之在側微，與木石居鹿豕游，固無異於深山之野人也。是豈以文采過人耶？伏羲畫八卦，書斷自堯典，當是時，六經蓋未有也，而舜之所以聖者果何自哉？夫舜，聖人也，生而知之，無事乎學可也；自聖人而下則未有可以不學者也。舜之臣二十有二人，相與共成帝業者，是果皆生知耶！不然，其何以學也？由是觀之，六經雖聖人微

言，而道之所存蓋有言不能傳者，則經雖具猶不能諭人之弗達也。然則聖之所以爲聖，賢之所以爲賢，其必有在矣。雖然，士之去聖遠矣！舍六經亦何以求聖人哉！要當精思之，力行之，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則庶乎有得矣！若夫過其藩籬，望其門牆，足未踰閾而輒妄意其室中之藏，則幸而中也難哉！嗚呼！今之士未嘗以此學也，類皆分文析字屑屑於章句之末。甚者廣記問，工言辭，欲誇多鬭靡而已！是烏用學爲哉！（楊龜山先生集二十五）

此外如答呂居仁書及語錄中所言大率此意。這是言道未明以前的工夫。道未明以前，宜知學聖人，更宜知所以學聖人。知所以學聖人矣，更須反之於約，更須求其一貫，更須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而有所得。易言之即重在窺聖人之閫奧，纔稱爲善學。所以不重在分文析字，不重在操筆綴文了。

尹焞，是伊川門下躬行實踐之人，故不重在文而重在行。其進論語狀云：

學貴於力行，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也。（和靖集四）

其語錄中亦謂『某在經筵進論語解，別無可取，只一篇序却是某意。曰學貴力行不貴空言，若欲意義新奇，文辭華贍，則非臣所知，此是某意。』（和靖集六）可知他的主張尙行而不尙言。

重體會則不局於文辭，尙實行則無須於文辭，所以程門論文，不必祇爲玩物喪志，而重道輕文之意，實更爲顯露。但在另一方面，却又頗能說出道所及於文的影響，尹和靖集中所載語錄有下述一則：

先生嘗與時敏言，賢欲學文，須熟看韓文公六月念六日白李生足下一書，檢之乃答李翊。中云：「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俟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先生之意在此。（和靖集七）

程門未嘗以文爲事，但此節竟有取於韓愈寄李翊一書者，良以此數語在昌黎以之學文，在和靖以之學道。道之與文雖有形上形下之分，而其間本是息息相通，所以論文至精微處每近於道，而論道到透澈處亦可通於文。和靖集中再有一節云：

> 馮忠恕曰：先生學聖人之學者也。聖人所言，吾當言也；聖人所爲，吾當爲也。詞章云乎哉！其要有三：一曰玩味，諷詠言辭，研索歸趣，以求聖賢用心之精微。二曰涵養，涵泳自得，蘊蓄不撓，存養氣質，成就充實，至於剛大，然後爲得也。三曰踐履，不徒謂其空言，要須見之行事，躬行之實，施於日用，形於動靜語默開物成務之際，不離此道。所謂修學，如此而已；所謂讀書，如此而已！（和靖集八）

他雖則說「詞章云乎哉，」但所舉出的三端正可以見他們論文的見解。第一項玩味，重在體會；第三項踐履，重在實行，這即是我上文所謂他們所以重道輕文的緣故。第二項涵養，則作爲學道者之修養可，作爲學文者之修養亦可。此所以韓愈論文之語可以通於學道，而此節學道之要也可通於論文。泥於文以載道之說，固足使文爲道的附庸，若能得活看，作爲文人之修養，夫又奚不可者！此三項中，自以涵養一項最與論文有關，實則玩味一項亦極重要。蓋玩味固適於學道，也適於學文。所謂超然默會於言意之表者固可指學道之有所悟入處，而學文固也未嘗不有

悟入處也。故此三端中只有踐履一項纔與論文無關。

此意，卻可以楊時之說證明之。龜山集中語錄云：

爲文要有溫柔敦厚之氣，對人主語言及章疏文字，溫柔敦厚尤不可無。如子瞻詩多於譏玩，殊無惻怛愛君之意。荊公在朝論事多不循理，惟是爭氣而已。何以事君？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楊龜山先生集十）

此卽所以說明學道者之涵養，然亦正有補於學文者之涵養。此與古文家之論氣不盡同。古文家重在氣勢之浩瀚，所以有待於激發；道學家重在氣息之深醇，所以須資於涵養。激發有待於外界，是由外以壯其內；涵養只體於身心，是充內以發乎外。所謂有德者必有言，如此而已！

楊氏又云：

狼跋之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周公之遇謗，何其安閑而不迫也！學詩者不在語言文字，當想其氣味，則詩之意得矣。（楊龜山先生集十）

此又所以說明學道者之玩味，然亦正有補於學文者之玩味。這樣論文，何等透脫！而一般人定欲一筆抹煞，輕視道學家之論文，抑又何也！

明得程門弟子之論文一方面重道輕文，而一方面卻又能論道而通於文，纔可知後來朱子論文，有太偏執處，

也有頗通達處。蓋程與朱之論文主張，其所由轉變之故，此實為其中間之橋紐也。

第五節　政治家之文論

北宋政治家之文論可以司馬光王安石和李覯三人為代表。在當時政治舞臺上有新舊兩派之爭，舊派以司馬光為魁，新派以王安石為首，二派互為水火，相爭不已，而且此二派首領，性情學術，各不相同，司馬光與道學家為近，王安石與古文家為近，但其論文主張則無甚差異，蓋並以政治家的眼光以論文也。李覯未曾大顯，不足見其事功，雖不能算是政治家，即也算是政治學家，故並論之，以下相同。

政治家之論文，與古文家道學家所同反對者為雕鎪無用的文辭。李覯上宋舍人書云：「近年以來，新進之士，……不求經術而撫小說以為新，不思理道而專雕鎪以為麗，句千言萬，莫辨首尾，覽之若游於都市，但見其晨而合，夜而散，紛紛藉藉，不知其何氏也。……聖人之門將復榛蕪矣。」（直講李先生文集二十七）此與道學家之譏玩物喪志，古文家之不敢有作文之意正復相同，所以政治家文論之積極主張也是欲言之有物，也是欲有為而言。司馬光文害篇云：「君子有文以明道，小人有文以發身，夫變白以為黑，轉南以為北，非小人有文者孰能之？」（傳家集七十四迂書）又趙朝議文藁序云：「在心為志，發口為言，言之美者為文，文之美者為詩。如鼓鐘者聲必聞於外，灼龜者兆必見於表，玉蘊石而山木茂，珠居淵而岸草榮，皆物理自然，雖欲揜之，不可得已。」（傳家集六十九）王安石上人書云：「孟子曰：『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諸左右逢其原。』孟子

之云爾，非直施於文而已。然亦可託以爲作文之本意。』（臨川集七十七）其答王景山書又云：『讀其文章，庶幾得其志之所存。其文是也，則又欲求其質。』（同上）這些話又與程頤所謂『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之意，歐陽修所謂『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之說，並無分別。范仲淹上時相議制舉書云：『夫善國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勸學，勸學之道莫尙宗經。宗經則道大，道大則才大，才大則功大。蓋聖人法度之言存乎書，安危之幾存乎易，得失之鑒存乎詩，是非之辨存乎春秋，天下之制存乎禮，萬物之情存乎樂。故俊哲之人入乎六經，則能服法度之言，察安危之幾，陳得失之鑒，析是非之辨，明天下之制，盡萬物之情，使斯人之徒，輔成王道，復何求哉。』（范文正公集九）這也是政治家的文論。其主張也不外宗經明道之說，不過立場不同，旨趣亦微有區別耳。

所以政治家之文論由大體言本與古文家道學家相近。不過以政治家之學，即昔人所謂經濟之學。故其文論，就道言則更主於用，就文言則所長在識。

因其主於用，故其論文，以禮教治政爲文。司馬光答孔文仲司戶書云：

> 光昔也聞諸師友曰，學者貴於行之而不貴於知之，貴於有用而不貴於無用。故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子夏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此德行之所以爲四科首者也。孔子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夫國有諸侯之事，而能端委束帶，與賓客言，以排難解紛，猶國家之急，或務

農訓兵以扞城其民，是亦學之有益於時者也。故言語政事次之。若夫習其容而未能盡其義，誦其數而未能行其道，雖敏而傳，君子所不愛，此文學之所以爲末者也。然則古之所謂文者，乃所謂禮樂之文，升降進退之容，絃歌雅頌之聲，非今之所謂文也。（傳家集六十）

李覯上宋舍人書亦云：

賢人之業，莫先乎文。文者豈徒筆札章句而已，誠治物之器焉。其大則核禮之序，宣樂之和，緒政典，飾刑書；上之爲史則怙亂者懼；下之爲詩則失德者戒。發而爲詔誥，則國體明，而官守備；列而爲奏議，則闕政修，而民隱露。周還委曲，非文曷濟！禹益稷皐陶之謨，虺之誥，伊尹之訓，周公之制作，咸曰與國家，靖生民矣。自周道消，孔子無位而死，而秦嬴以烈火刼之，漢由武定，晚知儒術，至今越千載，其間文教一盛一衰。大抵天下治則文教盛，而賢人達；天下亂則文教衰，而賢人窮。欲觀國者，觀文可矣。（直講李先生文集二十七）

王安石與祖擇之書亦云：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悖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悖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

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臨川集七十七）

這些都是政治家的文學觀，其論旨頗與道學家相近，而畢竟不同。蓋政治家之所謂道，是要見之於事功，不重在體之於身心；是要驗之於當今，不重在修之於一己。司馬光答陳充秘校書云：

孔子自稱述而不作，然則孔子之道，非取諸己也，蓋述三王五帝之道也。三王五帝亦非取諸己也，鉤探天地之道以教人也。故學者苟志於道，則莫若本之於天地，考之於先王，質之於孔子，驗之於當今，四者皆冥合無間，然後勉而進之，則其智之所及，力之所勝，雖或近或遠，或大或小，要為不失其正焉。舍是而求之，有害無益矣。（傳家集五十九）

其論道欲本之於天地，驗之於當今，便與道學家之專主折衷於孔子者不同。此與王安石所謂「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為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正是同樣意思。蓋政治家以主用，故於道必驗之於當今，必作而為治教政令，而所謂文者不過「道其然而已矣」；能「書之策」者同時必能「引而被之天下之民」。此所以論文遂偏重於用。李覯上宋舍人書云：

竊謂文之於化人也深矣。雖古樂八音，或雅或鄭，紛諸聽聞，動盪人心，亦不是過也。嘗試從事於簡策間，其讀虛無之書，則心頹然而厭於世；覽軍陣之法，則心奮起而輕其生；味縱橫之說，則思詭譎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寡恩刻而泥賦斂；誦隱遁之說，則意先馳於水石；詠宮闈之辭，則志不出於閨閫；文見於外，心動乎內，百

變而百從之矣。諒非淳氣素其通識旁照，則為其所敗壞如覆手耳。韓子有言曰，『儒以文亂德，』豈謂是乎。然則聖君賢輔，將以使民遷善而遠罪，得不謹於文哉！（直講李先生文集二十七）

此亦同於王安石所謂：『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之意。不過一從正面說，一從反面說耳。

顧主於用，故又不主修辭，遂與古文家異趣。司馬光答孔文仲司戶書云：

今之所謂文者，古之辭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明其足以通意，斯止矣，無事於華藻宏辯也。必也，以華藻宏辯為賢，則屈宋唐景莊列楊墨蘇張范蔡皆不在七十子之後也。顏子不違如愚，仲弓仁而不佞，夫豈尚辭哉！足下所謂『學積於內，則文發於外，積於內也深博，則發於外也淳奧。則夫文者雖不學焉，而亦可以兼得之。學不充於中，而徒外事其文，則文盛於外，而實困於內。亦將兼棄其所學。』斯言得之矣。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足下允蹈其言，為之無倦，將與淵騫並驅爭先，又況游夏，尚奚足羨！（傳家集六十）

其解辭達，謂足以通意斯止，便與蘇軾之言不同，王安石上人書云：

嘗謂文者，禮教治政云爾。其書諸策而傳之人，大體歸然而已。而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云者，徒謂辭之不可以已也，非聖人作文之本意也。且所謂文者，務為有補於世而已矣。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誠使巧且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而已。不適用，非所以為

器也。不爲之容，其亦若是乎否也。然亦未可已也，勿先之其可也。（臨川集七十七）

其解「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又謂「尙辭非作文之本意，」也與蘇軾之言不同。蓋他以爲韓柳雖嘗語人以文，只是語人以辭，並不曾論作文之本意。古文家之論文，本只須語人以辭，足矣。道學家與政治家，則更要論作文之本意。語人以辭，則其所詣各異；論作文之本意，則其歸趣悉同。蘇軾答張文潛書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其源實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鹵之地，彌望皆黃茅白葦，此則王氏之同也。』（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四十五）這是古文家攻擊政治家論文的論調。蓋政治家之論文，既以禮教治政爲文，則當然重在教化，而不得求其道同風一了。

又因其長在議，故又不致如古文家之拘於義法。李覯答黃著作書云：

漢傑非我不如李習之，不爲僧作鐘銘。習之之論信美矣！然使唐來文士皆效習之所爲，則金園寶剎碑版若林，果誰作也！……聖賢之言翕張取與，無有定體。其初殊途，歸則一焉。猶李漢所謂『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何須開口便隨古人！漢傑使我效李習之，膠柱矣！今之學者誰不爲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昌黎。若爲文之道，止此而已！則但誦得古文十數篇，拆南補北，染舊作新，盡可爲名士矣！何工拙之辨哉！覯之施爲，異於是矣。（直講李先生文集二十八）

此又政治家攻擊古文家的論調。這種見解，實較古文家爲通達。歐陽修與黃校書論文章書謂：『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歐陽文忠全集六十七）蓋才識兼通深中時弊，本古文家之所難而政治家之所長。

而且，即就道言，亦較道學家爲通達。李覯有原文一篇謂：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爲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爲不可言！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矣。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無乃賊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喜儒以此。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其書數稱湯武將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豈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踰矩，』非無欲也。於詩則道男女之時，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見一國之風，其順人也至矣。學者大抵雷同，古之所是則謂之是，古之所非則謂之非，詰其所以是非之狀，或不能知。古人之言豈一端而已矣。夫子於管仲，三歸具官則小之，合諸侯正天下則仁之，不以過掩功也。韓愈有取於墨翟莊周，而學者乃疑。噫！夫二子皆妄言耶？今之所謂賢士大夫，其超然異於二子者耶？抑有同於二子而不自知者邪？何訾彼之甚也！（直講李先生文集二十九）

此等見解，豈道學家所能有，亦豈道學家所敢說！所以云政治家之所長在識。

第六節　釋子之文論

當時文論除古文家道學家政治家之外，更有異軍突起別成一支者，則爲釋子之文論。釋子固不重在討論文

事，然而也有足述者，則契嵩之鐔津文集與德洪之石門文字禪可以爲其代表。契嵩字仲靈自號潛子，藤州鐔津人，與歐陽修等同時，故其論文主張，非特可以代表釋家一派，抑且可以影響到後來的古文家與道學家各方面。

契嵩的論文主張具見於紀復古及文說二文。其紀復古云：

章君表民，以官來鐔唐。居未幾，出歐陽永叔蔡君謨尹師魯文，示予學者，且曰今四方之士，以古文進於京師，嶄然出頭角，爭與三君子相高下者，不可勝數。視其文，仁義之言炳如也。予前相與表民賀曰，本朝用文已來，孰有如今日之盛者也！此聖君之德，而天下之幸也。退且思之：原古文之作也，所以發仁義而辨政敎也。堯舜文武，其仁義至，其政敎正。孔子以其文奮而揚之，後世得其法焉；故爲君臣者有禮，爲國家者不亂。方周道衰，諸侯強暴相欺，上下失理，孔子無位於時，不得行事，故以之用褒貶，正賞罰，故後世雖有姦臣賊子，懼而不敢輒作。及戰國時，合從連衡之說，以傾天下，獨孟軻荀況，以文持仁義，而辨政敎，當時雖不甚振，而學者仰而知有所趨。漢與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輩，以其文倡之，而天下和者響應。故漢德所以大，而其世所以久也。隋世王通，亦以其文繼孔子之作。唐與太宗取其徒，發而試之。故唐有天下大治，而韓愈、柳宗元復以其文從而廣之，故聖人之道益尊。今諸儒爭以其文奮，則我宋祖宗之盛德鴻業益揚，天子之仁義益著，朝廷之政敎益辨。（鐔津文集七）

其文說云：

津袁民始至自京師，謁京師士人，高歐陽永叔之文，翕然皆慕而爲之，坐客悅聽。客有一生進曰，文興，則天下治也。潛子謂客曰，歐陽氏之文，言文耳，天下治，在乎人文之興。人文資言文發揮，而言文藉人文爲其根本。仁義禮智信人文也，章句文字，言文也。文章得本，則其所出自正，猶孟子曰，『取之左右逢其原。』歐陽氏之文，大率在仁信禮義之本也，諸子當慕永叔之根本可也。胡屑屑徒模擬詞章體勢而已矣。周末列國，嬴秦時，孰不工文，而聖人之道廢，人文不足觀也。蓋其文不較本乃爾。孔子無位，其道不行，病此不得已，徒以六經春秋之文，載之以遺後世。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聖人豈特事其空文乎？君臣、父子、師徒、朋友，其文詞有本，仁義禮信藹然，天下不治，未之有也。易曰，觀乎人文，則天下化成，豈不然哉？坐客聞吾說，皆愕然不辯。（鐔津文集七）

這些論調，很同情於當時的古文運動；而且不僅如此，更欲進而爲道的運動，與政教的運動。所以他以爲『原古文之作也，所以發仁義而辨政教也。』爲要「發仁義」，所以以爲文章自有根本，不能徒事空文。爲要「辨政教」，所以又以爲天下之治在乎人文而不在言文。其論仁義與文之關係云：

吾聞君子之學欲深探其道；深探欲其自得之也。於道苟自得之，則其所發無不至也。所謂道者，仁義之謂也，仁義出乎性者也。人生紛然莫不有性，其所不至於仁義者，不學故也。學之而不自得者，其學淺而習不正故也。夫聖與賢，其推稱雖殊，而其所以爲聖賢者豈異乎哉！其聖者得之於誠明，而賢者得之於明誠。誠也者生

而知之也明也者學而知之也及其至於仁義一也。表民其學切深，於道有所自得，故其文詞之發也懋焉。韓子所謂『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與章表民秘書書）

這些話我覺得比道學家更透澈。又其論人文云：

曰何謂人文乎？曰文武王之道也。文武相濟以貫人道，故曰人文也。文者，德也；武者，刑也。德以致大業，刑以扶盛德。德其至也，刑其次也。會文武者，所以以文總之，故曰人文也。（鐔津文集六）

又云：

人文至焉，言文次焉。以言文而驗其人，人其度哉？以人文而驗其世，世其度哉？故人文者，天下之道之所存焉；言文者，聖賢之志之所寓也。先天下而後聖賢者，聖賢發已矣。天下至公也，故公者至而已者次也。孰曰言文，其無用乎？（鐔津文集六）

這些話，我亦覺得比政治家更切實。所謂傳統的文學觀，不謂竟於釋子的文集見之。我覺得契嵩在當時學術上的地位，在當時比歐陽修諸人實更重要，在鐔津文集中很可看出陽儒陰釋的道學之淵源所自；固不僅其論文主張兼有古文家道學家政治家諸種之長已也。

其後德洪（一名惠洪）論文，便頗近禪家機鋒，成為純粹釋子之文論了。其臨庵銘云：

心非言傳，則無方便；以言傳之，又成瑕玷。（石門文字禪二十）

這種態度便是禪家的態度。又其昭默禪師序云：

李北海以字畫之工而世多法其書。北海笑曰，學我者拙，似我者死。當時之人不知其言有味，余滋愛之。蓋學者所貴，貴其知意而已！至於蹤蹟繩墨，非善學者也。（石門文字禪二十三）

這種方法，也是禪家所持的方法。故其自述作詩文之態度云：

予非有意於工詩文，夙習洗濯不去，臨高望遠，未能忘情，時時戲為語言，隨作隨毀，不知好事者皆能錄之。（題自詩）

予於文字未嘗有意，遇事而作，多適然耳。譬如枯株，無故蒸出菌芝。（題珠上人所蓄詩卷）

這種態度也與三蘇之不敢有作文之意相同。所以他也最稱頌東坡之文，以為『非語言文字也，皆理故也。自非從般若中來，其何以臻此！』宋祁雲門錄序云：『忘言之言未始有言也，可道之道未始有道也。』（宋景文集四十五）他論釋子之文，猶且持此種態度，有這種論調，何況這本是釋子之文論呢！

第二章　北宋之詩論

第一節　詩壇批評之風氣

第一目　論詩風氣之流行

宋人詩論，較唐爲盛。後人每謂唐人不論詩而詩盛，宋人論詩而詩亡。(註)這話固有相當的理由，然亦須知道正由當時詩壇風氣所致。蓋唐人重在「作」，宋人重在「評」，時代風氣各不相同。大抵一般人方從事於創作之時，每顧不到批評；待到其體旣定，其製旣盛，則論者自多。此亦與後世詞話曲話必行於詞曲旣盛之後，正是同一道理。所以就詩論，在一般嚴於唐宋流派者固然尊唐抑宋，即就詩論而言，亦未必有遠勝唐人之處。然若就論詩著作之量的方面而言，則宋人所著實遠勝於唐人。即此，可知宋代詩壇風氣正是重在「評」的方面。

【註】李東陽懷麓堂詩話『唐人不言詩法詩法多出宋而宋人於詩無所得。』吳喬圍爐詩話（五）『唐人工於詩而詩話少，宋人不工詩而詩話多，所說常在字句間。』袁枚隨園詩話（八）『宋人之詩可存，宋人之話可廢。』

因詩壇風氣之偏重在「評」，所以宋代詩人之詩論，雖涉瑣碎，而亦關重要。蓋詩人之詩論，是由一生畢力於詩，對於詩中甘苦深切體會，對於昔人佳句，亦時常諷誦，幾乎看作詩外無事，所以論詩著作也自以繁滋了。然此猶不過求詩於詩內耳！求詩於詩內，則縱有精義，大率是修辭上的問題，而不是批評上的問題。宋人詩論，量雖多而質不優者，此實爲其重大的原因。

所以在當時更有求詩於詩外者，則道學家是。道學家之詩論雖不免囿於傳統的文學觀，然而却能求詩於詩外。求詩於詩外所以能不重在作法，不泥於體製，而重在原理的根本的探索；較之一般詩人之論詩轉能有些獨到之見。一則以詩人自限，一則不能以詩人目之。這個關係，也足以促當時論詩風氣之流行而普遍。何況當時詩人也

宋詩不受其影響而求詩於詩外究。

第二目　詩話

論詩風氣何以會如是流行呢？其最大原因，由於詩話之筆記化。唐人論詩，偏重在格，雖無系統可言，然全書總有中心，自與筆記不同。即其專論詩的本事者，體固近於小說，然加以分類，也與筆記之冗雜者有別。待到宋人開詩話之體，於是論詩開一方便法門。此眞章學誠所謂『以不能名家之學，入趨風好名之習，挾人盡可能之筆，著惟意所欲之言』者，（文史通義詩話）固宜其量之多了。

宋人詩話之最早者，爲歐陽修之六一詩話。

六一詩話　一卷。（江西通志藝文略誤作六卷）歐陽修撰。有全集本，百川學海本，說郛本，津逮秘書本，歷代詩話本，螢雪軒叢書本。又據千頃堂書目有古今叢說本，本未見。案是書原稱「詩話」，故司馬光所撰亦只云「續詩話」。其稱「六一詩話」，或「歐公詩話」，「永叔詩話」云云者，皆出後人所加，取便稱引而已。

歐陽修自題其詩話云：

居士退居汝陰，而集以資閑談也。

曰「以資閑談」，則知其撰述宗旨初非嚴正。是以論辭則雜舉雋語，論事則泛述聞見，於詩論方面無多闡發，只成爲小說家言而已。後世詩話之濫，不能不說歐氏爲之濫觴。其後司馬光繼之有續詩話一卷。

溫公續詩話　一卷。司馬光撰，有百川學海本，津逮秘書本，歷代詩話本，螢雪軒叢書本。又說郛本，不全。案今世所傳各本皆從百川本出。漁隱叢話前集十三引迂叟詩話一則云：『唐曲江，開元天寶中旁有殿宇，安史亂後，其地盡廢。文宗覽杜甫詩云：「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因建紫雲樓、落霞亭，歲時賜宴，又詔百司於兩岸建亭館。太宗於西郊鑿金明池，池中有臺榭以閱水戲，而士人游觀無存泊之所，若兩岸如唐制設亭館，即踵曲江之盛也。』此一則，爲今傳各本所無。

其卷首自題語亦云：

歐陽公文章名聲雖不可及，然記事一也，故敢續書之。

則其撰述宗旨，原非嚴正，亦可知詩話之起，本同筆記。故余論詩話絕句有云：『醉翁曾著歸田錄，迂叟亦記涑水聞，偶出緒餘撰詩話，論辭論事兩難分。』

宋人詩話之與說部既難以犂別，所以宋史藝文志之著錄詩話有入集部文史類者，有入子部小說類者。這不能全怪宋志之進退失據，體例不純；也是宋人詩話之內容性質本可兩屬之故。其足考當時詩人之遺聞軼事者，體固近於小說；即足資昔人詩句之辨證考訂者，亦何嘗不可闌入子部呢？所以詩話而筆記化則可以資閒談，涉諧讔，可以考故實，講出處，可以黨同伐異，標榜攻擊，也可以穿鑿傳會，牽強索解；可雜以神怪夢幻，也可專講格律句法；鉅細精粗，無所不包，以這樣繁猥之作，當然繼起效顰者大有人在，而論詩風氣盛極一時了。

今考北宋詩話一類之書，除歐陽修六一詩話司馬光續詩話外，其至今猶獲流傳者，有下述數種：

中山詩話　一卷。（郡齋讀書志及通考作三卷案錢曾述古堂書目有三卷本，宋四庫闕書目作二卷）劉攽撰。有百川本，說郛本，津逮本歷代詩話本，螢雪軒本。考李心傳舊聞證誤有一則引貢父詩話云：『乾德三年春平蜀，蜀宮人有入掖庭者，太祖覽其鏡背云：「乾德四年鑄，」上大驚，以問陶竇二內相。二人曰：「蜀少主嘗有此號，鏡必蜀中所鑄。」上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自是大重儒臣。』是亦宋人著作，而所引爲今中山詩話所無，竊疑今一卷本或亦非足本。

臨漢隱居詩話（或稱隱居詩話）　一卷。魏泰撰。其足本有知不足齋，龍威秘書，七子詩話，湖北先正遺書，古今說部叢書，螢雪軒叢書及筆記小說大觀諸種。其不足者有說郛本，學海本，歷代詩話本，奇晉齋叢書本。

石林詩話　三卷。（津逮本，唐宋叢書本作一卷）葉夢得撰。（詩學指南本誤作高似孫撰）有掃花盦本，葉石林遺書本，百川本，說郛本，津逮本，歷代詩話本，螢雪軒本。又詩學指南本，不全。案葉氏雖至南宋猶存，而掃花盦本翁逢春序謂是書當作于靖康以前，則亦北宋之書。又掃花盦本有葉廷琯所輯之石林詩話拾遺，與石林詩話附錄。拾遺足補今傳各本之遺；附錄則彙輯後人指正之語，足資辯證。葉德輝重刊石林遺書本，除轉錄上述二種外，復輯有石林詩話拾遺補與石林詩話附錄補遺二種。

優古堂詩話（澹生堂目作復古堂詩話當是傳寫之誤）　一卷。吳幵撰。有讀畫齋叢書本，歷代詩話續編本。又

有舊鈔本，見鐵琴銅劍樓目。案吳幵字正仲，滁州人，而鐵琴銅劍樓所藏舊鈔本，題毛幵平仲。考毛幵，三衢人，毛友子，雖與吳幵同時而非一人，或以名同致誤。又案是書與漁隱叢話所引復齋漫錄、高齋詩話諸書，頗多相同。讀書齋本徐駿跋稱其雜見他書，良然。

紫薇詩話（百川本作東萊呂紫微詩話，各書稱引亦有作東萊詩話者）　一卷。呂本中撰。有百川本，螢雪軒本，（均足本）津逮本，歷代詩話本（以上二種僅脫一條），又有說郛本，則刪節殊多。案螢雪軒本從百川本出，故有下列一條——「從叔大有少時詩云，「范睢才拊穰侯背，蔡澤聞之又入秦」，不減王荆公得意詩也。」——此條爲其餘各本所無。

藏海詩話　一卷。（趙魏竹崦盦傳鈔書目作二卷）吳可撰。有函海本，知不足齋本，昌平叢書本，歷代詩話續編本，螢雪軒本。又有詩法萃編本，不全。

其雖流傳而疑出依托者，有：

後山詩話（或作陳無已詩話）　一卷。（適園叢書後山集本作二卷，蓋分合之異）舊題陳師道撰。此書除全集各本外，有百川本，稗海本，津逮本，歷代詩話本，學海本，螢雪軒本及說郛本。案是書諸家稱引著錄，或作陳無已詩話，或作後山居士詩話，又卷數則或稱二卷，或作一卷。如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均作二卷，而宋史藝文志子部小說家則云一卷，知是書非出陳氏手定，故多歧異。考後山集二十卷，爲其門人彭城魏衍所編。衍記

詩話談叢各自爲集，而今本皆入集中，則非魏氏手錄之舊可知。四庫總目提要據陸游老學菴筆記定爲出於依托，所見亦是然魏衍既言詩話談叢各自成集，則後出之有是二書自無可疑，今本所傳，亦未必全出好事者以意補之。或後出原有此著，未及成書，後人編次遂不免有所增益耳。

其近於輯佚以成書者，則有：

蔡寬夫詩話　三卷。蔡啓撰。有舊鈔本，未見。案是書不見宋以來諸家著錄，似當時已不甚流傳。朱緒曾開有益齋讀書志謂於吳山書肆得舊鈔本，不知其所自出。竊疑是書或出書賈據漁隱叢話所引鈔集以牟利者，故勞季言遂有當日全部收入之語。考漁隱叢話之於石林詩話採至八十餘條，較之單刻諸本，僅少六條，則其於蔡氏詩話全部收入固未可知。然蔡氏書既爲當時所重，不應別無單刻本流傳，今是書既不見宋明以來著錄，而與叢話所載又是勘驗悉合，則其出後人鈔集斷無可疑。豈其書以經叢話收入而單行者轉不爲人注意歟？抑以與蔡寬夫詩史名稱相混而致誤歟？

其雖流傳而非足本者，則有下述諸種：

潛溪詩眼　范溫撰。有說郛本一卷。案是書惟見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及文獻通考，而不見宋以後諸家著錄，疑其佚已久。今傳世者惟有說郛本（古今詩話本即出此）僅三則，已非其全，且有誤錄他書之語。

潘子眞詩話　潘淳撰。有說郛本一卷。案說郛本（古今詩話本即出此）共四則。案光緒江西通志藝文略詩文

評類著錄是書稱「詩話補遺」，不云潘子眞詩話，蓋以其祖興嗣有詩話一卷，而是書爲補其遺也。嚴有翼藝苑雌黃引作詩話補闕，知當時原有此稱。

陳輔之詩話　陳輔撰。有說郛本，一卷。案是書不見宋以來諸家著錄，尤袤遂初堂目亦無之。說郛所錄凡十二則，不知其所據，意元時當猶有全書。

西淸詩話　三卷（澹生堂目五卷萬卷堂目一卷）蔡絛撰。今有說郛本，一卷。三卷本未見。

漢皐詩話　不題撰人。今有說郛本一卷，凡十一則。所論多偏於考據，尤以校正杜詩者爲多。朱鶴齡注多與此同，當即據此書者。是書除遂初堂書目著錄外，不見他家著錄，知其佚已久。考吳曾能改齋漫錄有『漢皐張君詩話』云云，則當爲張某撰。

漫叟詩話　不知撰人。今有說郛本，螢雪軒本，均一卷。案是書不見諸家著錄，惟說郛中有之，僅十二則。此外諸本皆同，蓋即自說郛本出。考郡齋讀書志小說類有漫叟見聞錄一卷，云『不知何人，建炎中所撰也。』考詩話云『謝舉廉字民師，余建中靖國中與同寓興國寺。』又云『予崇寧間往興國軍』云云。考其時代，正與相近。竊疑此書或即自漫叟見聞錄中摘錄出者。然阮閱詩話總龜及胡仔漁隱叢話亦均引此書，則似早有單行之本，非輯錄也。撫州府志藝文志著錄是書作謝逸撰，不知其所據。考謝逸無「漫叟」之號，而漁隱叢話前集（五十二）引漫叟詩話云『謝無逸學古高潔，文詞煆煉』云云，則其非出謝氏所撰，又至明顯。

桐江詩話　不知撰人。今有說郛本，一卷。案是書亦不見諸家著錄，惟胡仔漁隱叢話及黃𦳝山谷年譜均引之。詩話中有「程進道紹興初帥蜀中」之語，知其人已入南宋。考今說郛本凡五則，而見於漁隱叢話者凡三條，尙有「感事」「煎茶」二則，未見稱引，則其書在元季或有傳本，但不見諸家著錄何也？

此外散佚而未獲流傳者更不知有多少種。今就所知別爲數類，條舉於後。其經諸家著錄，且經他書稱引而有佚文可以採輯者，爲第一類，如：

歸叟詩話（諸家稱引多作王直方詩話或王立之詩話又方深道諸家老杜詩評所引作歸叟詩文發源）六卷，王直方撰。案是書郡齋讀書志，遂初堂書目及通考經籍考均著錄，惟不見明以來諸家著錄，疑散佚已久。千頃堂書目類書類司馬泰廣說郛中有王直方詩話一種，竊疑明人校刻叢書風氣，於原本多加删節，恐亦未必爲足本。

洪駒父詩話　一卷，洪芻撰。案是書早佚。除通志藝文略及遂初堂書目著錄外，明以來諸家著錄，惟見千頃堂書目與澹生堂書目及焦竑國史經籍志而已。千頃目中有古今說本，未見。澹生目云有百川本，考百川學海有洪芻香譜而無詩話，恐誤。至焦竑國史經籍志所載則頗多佚書，亦不足爲明以來流傳之證。

李錞詩話（他書稱引均作李希聲詩話）　一卷。李錞撰。宋史藝文志著錄文史類。漁隱叢話前集，及詩人玉屑均引其語。

唐宋詩話　不知撰人與卷數。遂初堂書目文史類著錄。方深道諸家老杜詩評卷二頗多稱引。又考宋史藝文志文史類有唐宋名賢詩話二十卷，不著撰人，不知即此書否？

其僅見著錄而未見稱引者，爲第二類。此雖無佚文可輯，然原有其書則無可疑。

詩話　一卷。潘興嗣撰。案是書惟見光緒重修江西通志藝文略詩文評類，此外不見諸家著錄，當早散佚。

潛堂詩話　無卷數，李公彥撰。案是書見光緒重修江西通志藝文略詩文評類，而未見藏書家著錄，當早散佚。撫州府志藝文志作李成德撰，成德疑彥德之誤。

王禹玉詩話　一卷。王珪撰。見通志藝文略詩話類。

大隱居士詩話　一卷。朱肱撰。案是書宋史藝文志入子部小說類。宋志於詩話每多分入文史小說二類。此當亦爲論詩之著。宋志不著撰者姓名。據湖州府志人物傳知爲朱肱所撰。又案宋時號大隱居士者，有田關，南康人；又有鄧深，湘陰人，有大隱居士集。亦未能定其竟爲誰作也。

其僅見稱引而未見著錄者，爲第三類。此則雖有佚文可輯，而不能考其是否成書者。

三蓮詩話　不知卷數。楊逃禪撰，韋居安梅磵詩話引其語。

高齋詩話　不知卷數。曾慥撰。案是書不見諸家著錄。福建通志（七十三）經籍志載曾氏著作亦祇有高齋漫錄一卷，不言有詩話。惟漁隱叢話前後集，詩話總龜後集，以及韻語陽秋野客叢書諸書時多稱引。今以墨海金壺

所據四庫本高齋漫錄校之，絕無相同之語，知詩話一書其佚已久。諸家稱引，每不冠以作者姓氏，惟葛立方韻語陽秋(十六) 稱曾端伯高齋詩話，始知爲曾慥所撰。或詩話原爲漫錄中之一部分，故諸家多不別爲著錄；又以其早經散佚，故永樂大典所引漫錄遂亦無詩話中語歟。

洛陽詩話 不知卷數及撰人。詩話總龜前集(五) 引之云：「呂申公鎭河陽府，府尉投詩曰，『渭川重得呂，嵩嶽再生申，』由是獲知。」清伍涵芬說詩樂趣採用書目中有司馬光洛陽詩話，不知其所據。

古今詩話 不知卷數及撰人。案是書不見諸家著錄，惟宋史藝文志有李頎古今詩話錄七十卷，列蔡絛西清詩話後，不知即此書否？苕溪漁隱叢話優古堂詩話及竹坡詩話諸書，均稱引之。知在北宋末南宋初當亦流行一時也。

閑居詩話 不知卷數與撰人。案是書不見諸家著錄，疑其佚已久。詩話總龜前集引之較多，考核其文多見溫公續詩話及中山詩話，蓋出時人竄竊爲之者。伍涵芬說詩樂趣所引略與相同，惟有二則論貫休惠崇詩，爲總龜所未引者，不知伍氏何所依據，豈獨獲見其原本耶？

其未成或未刊行，故未見著錄且無佚文可輯者，爲第四類：

劉咸臨詩話 僅數十篇，蓋未成之作。劉咸臨亦不知何許人，惟詩話總龜前集(八) 引王直方歸叟詩話有一則云：「劉咸臨醉中嘗作詩話數十篇，既醒，書四句於後曰，『坐井而觀天，遜亦作天論。客問天方圓，低頭慙客問。』

蓋悔其率爾也。』

根據上文所述，則知宋時詩話產量之多雖至今頗多散佚，而以此類著作之衆，猶可見一時論詩風氣之盛。

第三目 筆記與語錄

在當時，詩話既筆記化而體成繁猥，筆記亦詩話化而轉近專門，所以也有許多詩話是從筆記中輯出以成者。由筆記之輯爲詩話，大抵不外二種性質；一是分類選輯，如阮閱詩話總龜，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之類，不得不旁採博取，於筆記中蒐羅材料。一則輯成專著，如曹溶學海類編中所收玉壺詩話即就宋釋文瑩玉壺野史中論詩之語摘錄以成者。前一種不變原書體例，後一種則由後人爲之別立名稱，所以四庫總目提要於玉壺詩話之輯，卽譏其『杜撰無稽非古人所有』。其實筆記既通於詩話，則由筆記中以輯出詩話，事至尋常，毫不足怪。即如南宋洪邁的容齋詩話亦從容齋五筆中輯出以成者。此在宋元以來，已有此編，不可謂出後人之杜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之論東坡詩話，謂『蘇軾號東坡居士，雜書有及詩者，好事者因集之成二卷』。此亦由筆記雜著中輯出詩話之證。

大抵就時人著述中論詩之語以輯成詩話者，不外二例。其不易原稱者，如：

藝苑雌黃 一卷。嚴有翼撰。有說郛本及蟄雪軒本。案是書據宋志著錄，原有二十卷，兼論子史名數地理動植諸事，非盡論詩。說郛本所錄雖僅八則，實皆輯其論詩之語，異於刪節之本。四庫存目所著錄者僅十卷，蓋出好事者摭拾成書，非其舊也。

其另定新名者，如：

玉壺詩話　一卷。舊題釋文瑩撰。學海類編本。

東坡詩話　一卷。舊題蘇軾撰。有說郛本，學海本，螢雪軒本。日人近藤元粹跋云：「是條說郛所收，而案其體例非東坡自著，蓋後人編輯其關係於詩者也。」螢雪軒本又有補遺一卷，即近藤元粹所輯。

沈存中詩話　無卷數，未見。案是書未見諸家著錄，惟浙江通志經籍志文史類與杭州府志藝文志詩文評類均著錄之，並云據續文獻通考，疑此即就沈括夢溪筆談中所輯出者。

侯鯖詩話　一卷，趙令畤撰。日人近藤元粹輯。螢雪軒叢書本。此自侯鯖錄輯出者。

此外更有隨意易稱，改題詩話者，如：

桂堂詩話　詩話總龜前集引書目有桂堂閑談，而卷三所引眞宗末年嘗遊禁中一條，注云桂堂詩話，疑即桂堂閑談之易稱。伍涵芬說詩樂趣卷七引此條亦沿其誤。

玉堂詩話　詩話總龜前集引書目有玉堂閑話，而卷十一所引諸則，注云玉堂詩話，疑即玉堂閑話之易稱。伍涵芬說詩樂趣卷四，卷十二，卷十三，卷十六諸卷所引，亦稱玉堂詩話，細核其文，大率與總龜所引相同。惟卷十二仕宦門所引錢惟熙詩，科第門所引賀陳蕃詩，均總龜所無，豈伍氏見其原書歟？顧不見其採用書目中，抑又何也？

朱定國詩話　詩話總龜前集引書目有朱定國續歸田錄而卷三十九所引鄭毅夫榜一條，作朱定國詩話，疑即續歸田錄之易稱。伍涵芬說詩樂趣亦沿用其稱。

大抵宋人筆記，如釋德洪冷齋夜話之屬，本與詩話相通。故時人稱引遂多隨意易稱之例。

此外有與筆記性質相類而亦足助論詩風氣之流行者，一爲題跋，一爲語錄，文人之論詩多在題跋，道學家之論詩多在語錄。此種文體之流行，亦至宋時而始盛。

題跋之輯成詩話者，除東坡詩話外尚無他種。至語錄之體本與詩話相類，故胡仔苕溪漁隱叢話所引已有元城先生語錄三山老人語錄鍾山語錄龜山語錄諸書，大抵此類著述其例有二：其一，出弟子所記者，如：

陵陽先生室中語　一卷，范季隨錄韓駒語，有說郛本。案說郛本僅九則，當不全。詩人玉屑引之頗多，可據以補輯。又吳可藏海詩話亦頗多韓氏論詩之語，或可與語錄參證。考陸游渭南文集（三十二）跋韓子蒼語錄云：「此故人范季隨周士所記也。周士歿後數年得之於其子，然余舊聞周士道韓公語極多，尚恐所記不止於此，當更訪之。」則知范氏所記，陸游且疑其未盡，況說郛所錄僅及九則耶？

唐子西詩話　一卷。强行父錄唐庚語。有古今彙說本，未見。案强氏所錄原稱唐子西文錄，諸書稱引或作唐子西話錄。（如詩紀別集卷九）此作詩話疑即就文錄中引詩之語別行輯出者。考季滄葦書目延令宋版書目中有詩話四種，即爲唐庚竹坡許彥周呂紫微四家。豈唐庚詩話宋時已有別出者歟？抑即唐子西文錄而易

其稱賦？千頃堂書目卷十五類書類稱司馬泰古今說本卷二十五有唐庚文錄，卷四十七有唐子西詩話，則是論文論詩分爲二種。故明林世勤注騈語雕龍，其稱引書目，有唐庚詩話，又案絳雲樓也是園述古堂諸書目均稱唐子西文錄有二卷，亦與今通行本卷數不同。

其二，出自撰者，有：

童蒙詩訓　一卷。呂本中撰。案是書原名童蒙訓，蓋家塾訓課之本。本中論學，惟與王氏立異，而不復嚴洛蜀之辨。故是書於理學則折衷二程，於詩文則取法蘇黃。觀今世所傳童蒙訓三卷，則近語錄者全存，近詩話者全汰。四庫總目提要以爲或由「洛蜀之黨既分，傳是書者輕詞學而重道學，不欲以眉山緒論錯雜其間，遂刊除其論文之語」。其說良然。故知刪汰之故，由於洛蜀之見，而刪節之本，則在朱學盛行以後也。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四）有童蒙詩訓一册，又楊士奇等所編之文淵閣書目（十）亦有之，注云「闕」。均以列入宋人詩話中間，當即由童蒙訓中論詩之語輯錄以成者。豈宋人已有此分編之本歟？抑童蒙訓之刪節本既行，而後人以呂氏以詩名家，遂復掇其論詩之語而彙編之歟？

第四目　詩話之叢書類書與輯本

論詩之著既多，則詩話之叢書類書與輯本自應時而起。其彙爲叢書者，有：

吟窗雜錄　三十卷。蔡傳撰。未見。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均著錄文史類。案書錄解題云：「莆田蔡傳撰，君謨

之孫也。取諸家詩格詩評之類集成之。又爲吟譜，凡魏晉而下能詩之人皆略具其本末，總爲此書。麻沙嘗有刻本，節略不全。』據是則蔡氏所編歷代吟譜似亦在此書之中。今吟譜既別有傳本，而此書則經後人重編，即托於狀元陳應行者。是此書雖不傳，而其所輯內容要仍在陳編五十卷中也。又案毛晉跋齊己風騷旨格云：『莆田蔡氏著吟窗雜咏（當作錄）載諸家詩評詩格類三十餘種，大略真贋相半，又脫落不堪讀。』則其書明末猶有之，或今尚在人間也。

其輯爲類書者，又可別爲數目，如詩苑類格諸書，均以詩體詩法分者。

詩苑類格（玉海五十四作寶元詩苑類格他書稱引每簡稱詩苑或詩格）　三卷。李淑撰。佚。郡齋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案晁公武云：『寶元二年，豫王出閣，淑爲王子傅，因纂成此書上之，逸古賢作詩體格總九十目。』玉海云：『翰林學士李淑承詔編爲三卷，上卷首以真宗御製八篇，惟解聲律爲常格，別二篇爲變格，又以沈約而下二十八人評詩者次之。中卷叙古詩雜體三十門，下卷叙古人體製別有六十七門。』據是所言，則其內容猶可窺知，蓋兼有自著及類書叢書三種性質者。

詩法　一卷。孫載輯。載，嘉定人。是書不見諸家著錄，惟江南通志藝文志（一九二）及嘉定縣志藝文志均有之。嘉定縣志且稱爲孫氏所輯，當亦類書之屬。

吟體類例　一卷。不著撰人。佚。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並著錄。案是書焦竑國史經籍志雖亦著錄，然不足據，

明以前當早佚矣。

如詩總則又以內容性質分者。

詩總　十卷。阮閱撰。（諸本作阮一閱襖）佚。今有後人重編本。案閱字閎休，舒城人，宣和中知郴州，建炎初知袁州。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三十六）引阮氏詩總自序稱，『得一千四百餘事，共二百四十餘詩，分四十六門而類之，其播揚人之隱慝，暴白事之曖昧，猥陋太甚，雌黃無實者，皆略而不取。……但類而總之以便觀閱，故名曰詩總。』今傳世諸本均無序。（注一）且易稱爲詩話總龜，蓋非其舊矣。考郡齋讀書附志別集類（三）有阮閱總龜先生松菊集五卷，豈總龜亦爲阮氏自號耶？又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一云『閎中近時又刊詩話總龜，此集即阮閎所編詩總也。阮閎詩總十卷，分門編集，今乃爲人易其舊序，去其姓名，略加以蘇黃門詩說，更號曰詩話總龜，以欺世盜名耳。』則知詩總原僅十卷分四十六門，今月窗道人本前集卷數與之異而分門與之同，豈即宋時閩中刊本之舊耶？考邵懿辰四庫簡明目錄云：『舊聞與中順繼岳家有一本，竹垞見之，詫爲祕錄，今已不可復見。』則似宋時閩中刊本猶在人間。顧近時諸家藏書目均不言之，何也？今世所傳重編之本有二：一，明鈔本，百卷本，前後集各五十卷。二，明月窗道人重刊本，前集四十八卷，（注二）後集五十卷。今四部叢刊有影印本。則較宋時閩中刊本似更增益。阮氏固云：『世間書固未盡於此，後有得之者當續焉。』則詩總不載元祐諸公詩話，自有難言之隱，而有人爲續補之，固亦阮氏所願，第不應去其自序，沒其原編宗旨耳。

【註一】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所引序稱紹興十三年十一月朔，且有「不願行於時也」之語。今所傳鈔本雖有序，題紹興辛巳長至日，其文亦嫌
行辭過異，疑出後人增易。

【註二】通較鈔本少詩話中下二卷。

至歷代吟譜則以人以時爲綱，又與前二種體例不同。

歷代吟譜　五卷，蔡傳撰，未見。案四庫存目提要云：『此編始前漢以迄唐宋凡能詩之人皆紀其姓字，末載厲鶚跋云：「此書舊有兩淮鈔本，舛誤不少，其敘次當以漢迄唐爲第一卷，宋爲第二卷，名僧爲第三卷，閨秀爲第四卷，武人爲第五卷。」今本序次悉與跋同，蓋近人因鶚跋更定也。』則是此乃清人重編之本。其宋代重編之本托名陳應行者，猶有傳本，蓋以時爲綱，其體例與苕溪漁隱叢話爲近。

其彙有叢書類書之性質而兼詩話之體者，則成爲詩話之輯本，如方深道醇道之集諸家老杜詩評是。

集諸家老杜詩評　五卷，方深道撰，有抄本。深道，莆田人，宣和六年進士，次彭子。（福建通志附父次彭良吏傳）或作方道深，當誤。

集諸家老杜詩評　一卷，方醇道撰。福建通志經籍志著錄。案陳振孫書錄解題云：『諸家老杜詩評，五卷，續一卷，莆田方深道撰，』則似爲一人所著，又宋史藝文志云：「方道醇集諸家老杜詩評五卷，」則又似方深道與方道醇（當即醇道之誤）實係一人，非二人也。考福建通志經籍志云：『醇道字溫叟，有諸峯集五卷，類集杜

補詩史二十卷，集諸家老杜詩評一卷。」與方深道並附父次彭良吏傳，則知醇道，深道乃兄弟行，正集續集乃出二人分編，陳氏合爲一人，非也。

第五目　其他論詩之著

因宋代論詩風氣之盛，於是不僅詩話一類風起雲湧，即其他各種論詩之著亦同時並盛。此種著述，雖不始於宋代，然其所以能特盛之故，亦未嘗不與詩話之發達有連帶的關係。茲分數部分言之：

其沿襲唐人風氣，專論詩格詩式者，今略述數種。

詩要格律（直齋書錄解題作詩格要律）　一卷。王夢簡撰。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詩法統宗本，未見。書中舉例多引晚唐五代人作，又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著錄之云「進士王夢簡撰」，通考經籍考同，進士上不冠以朝代名，當爲宋人所著。

天廚禁臠　三卷。（通志藝文略國史經籍志孝慈堂書目均作二卷）釋德洪撰。有明刊本，案論詩主格，且復強立名稱，妄生穿鑿，自是唐代僧人論詩習氣，禁臠所論諸格，往往類是。

詩評　一卷。桂林僧□淳撰，有詩學指南本。案直齋書錄解題文史類，「詩評一卷，桂林僧□淳撰。」淳字上原闕一字，考宋詩紀事八十二景淳下云「元豐初桂林僧」，不知即此人否？詩學指南本題桂林淳大師撰，又似單名爲淳，與景淳或別一人。

詩格　一卷。僧文彧撰。（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宋史藝文志均作神彧）有詩學指南本；又有格致叢書本，詩法統宗本，均未見。案宋詩紀事卷九十一「文彧號文寶大師，有詩格。」顧直齋書錄解題諸書均作神彧，當卽一人。

（右流傳之作）

續金針詩格　一卷，舊題梅堯臣撰。有格致叢書本，詩法統宗本，均未見。又詩學指南本一卷，題白樂天撰，梅聖俞續。案是書非出梅堯臣所撰，昔人早已言之。考通志藝文略詩話類作三卷，不著撰人。意此書本有二本，其三卷本則不著撰人，一卷本則僞托梅氏歟？（註）澹生堂書目又有宰公詩法二册，五卷。其細目，爲金鍼集，木天禁語，詩家一指，詩學禁臠四種，而分爲五卷，當以金鍼集有托於白居易梅堯臣二種而別爲二卷者。

【註】可參閱第三章一節金針詩格條。

梅氏詩評　一卷，舊題梅堯臣撰。有格致叢書本，詩法統宗本，均未見。今所見惟詩學指南本。案其所言，亦詩格之類。

（右依托之作）

律詩格　不知卷數，張商英撰。案是書未見著錄，且亦罕見他書稱引。惟苕溪漁隱叢話引其語，與梅聖俞續金針詩格洪覺範禁臠並論，頗病其拘泥。乃清代王晚堂匡山叢話卷五謂此三書「各有妙處，隨人取用。」嗜好獨

殊，爲不可解。或王氏亦未見其書，姑妄言之云耳。

風騷格　五卷，閻東叟撰。通志藝文略詩話類，及焦竑國史經籍志詩文評類均著錄。案閻東叟不知何許人，其書姑見通志著錄，當爲北宋人著。其書早佚，故亦罕見稱引。國史經籍志雖亦著錄，然不足信。焦竑此書只就舊有目錄彙合雜抄，並非明代猶有傳書也。

詩點化祕術（宋四庫闕書目「詩」作「新」）　一卷，任博撰。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及國史經籍志均著錄。任博不知何許人，疑此亦北宋人著。

律詩洪範　一卷，徐三極撰。（宋四庫闕書目「徐」誤作「律」）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及國史經籍志均著錄。徐三極仕履待考，當亦北宋人。

分別六義訣　一卷，齊陸機撰。是書僅見宋四庫闕書目著錄，齊氏時代難考，當亦北宋時人。

騷雅式　一卷，不知撰人。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及國史經籍志均著錄，當爲北宋人著。

今體詩格　一卷，不知撰人。是書僅見宋四庫闕書目文史類著錄，當亦北宋人著。

（右散佚之作）

其沿襲唐人本事詩之道，專述本事者則有下述數種：

烏臺詩案（直齋書錄解題作烏臺詩話，學海本作詩讞）　一卷，舊題朋九萬撰。考此書凡有數本，詳略互異，體例

亦殊，知未必全出朋氏所錄。大抵此書原有二種：一，直錄當時供詞以詩語聯綴其間者，其體裁近於史；一，先列蘇詩而以獄詞附注於後者，其體裁近於集。前者各本雖有詳略，蓋由刪節而非出剪裁；後者諸本則均經點竄，蓋與詩林廣記諸書體例爲近，故得稱爲詩話。朋九萬所編當屬於後一種，今世所傳前一種諸本，則蓋由原案錄出，而托於朋氏者。考陳振孫書錄解題謂烏臺詩話十三卷，中附諫官後表章書啓詩詞等，則朋氏所編頗具匠心，與直錄原案者異，故卷數爲獨多也。至直錄當時所供詩案者，其來源有二：一出於東坡親錄，如周必大二老堂詩話所言者；一出於御史臺錄案，如胡仔漁隱叢話所言者。此則專異編撰本，可不必分卷，故大率爲一卷也。今存者有說郛本，函海本，擷華館叢書本，藝海珠塵本，學海類編本，詩藏本，又漁隱叢話前集四十二至四十五諸卷亦引之。清張鑑有眉山詩案廣證。

蔡寬夫詩史　二卷，蔡居厚撰，佚。宋史藝文志著錄文史類。案宋志以後，惟千頃堂書目類書類載司馬泰文獻彙編中有詩史之目，不著撰人。今文獻彙考亦散佚，莫由考其是否此著矣。光緒江西通志藝文略詩文評類，撫州府志藝文志詩話類均有蔡寬夫詩史二卷，注云：「蔡居厚撰，見宋史藝文志。」則知是書並無傳本，不過據宋志著錄之耳。厲鶚宋詩紀事云：「蔡居厚字寬夫，熙寧御史延熙子，第進士。大觀初拜右正言，累官徽猷閣待制，有詩話。」其論蔡氏仕履甚詳，惟謂其有詩話，則有誤。考詩史中所舉人名，無在熙寧後者，其爲蔡居厚撰無疑。今案明月窗道人校刊阮閱詩話總龜，其前集引用書目有蔡寬夫詩史，後集引用書目有蔡寬夫詩話，疑詩話

詩史本爲二書，詩史較多論事，詩話較多論辭，大抵阮閱總龜所引有詩史而無詩話，胡仔漁隱叢話所引又有詩話而無詩史，各不相同，未可混爲一書也。

唐詩史　無卷數。范師道撰。師道字貫之，長洲人，仲淹姪。是書不見他家著錄，惟蘇州府志藝文志有之。疑未成或未刊之作，故僅方志著錄之。是書內容當亦唐詩紀事全唐詩話之類。

紀詩　不知卷數及撰人。詩話總龜前集及說詩樂趣均稱引，案是書見總龜稱引者凡三則：（1）子瞻見辯才事（2）王平甫夢至靈芝宮詩（3）出處與樂天相似。見說詩樂趣（十八）所引者凡一則——聰僧惟賢琴詩考此多東坡詩，疑爲後人雜纂之書。

其沿襲唐時摘句之風而選爲句圖者有下述數種：

惠崇句圖　一卷。僧惠崇撰。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均著錄。惠崇淮南人，一作建陽人，宋初九僧之一。宋四庫闕書目別集類有惠崇唐律詩句圖一卷，葉德輝考證云：『按陳錄作惠崇句圖，』似合二書爲一，恐非是。考此乃惠崇自撰句圖，即與處厚青箱雜記所錄惠崇警句，非選唐人詩也。詩話總龜前集（十二）與宋詩紀事（九十二）均據以轉錄，而字句互異，有足相互校正者。

御選句圖（通考作御製句圖）　一卷。宋太宗真宗選。佚。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均著錄文史類。書錄解題云：『太宗皇帝所選楊徽之詩十聯，眞宗皇帝所選淀劉綜詩八聯。』

楊氏筆苑句圖　一卷。黃鑑撰。佚。通志藝文略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均著錄。鑑字唐卿，浦城人。大中祥符八年進士，累遷太常博士，爲國史院編修官，出倅蘇州，有楊文公談苑，楊公筆苑句圖。書錄解題論是書云：『蓋楊億大年之所嘗舉者，皆時賢佳句。』則是書亦楊氏所述，而黃鑑錄之者。

續楊氏筆苑句圖　一卷，不知撰人。佚。通志通考及書錄解題均著錄。福建通志經籍志卽以附隸黃鑑著述下。

風雅拾翠圖（宋四庫闕書目作雅十翠圖）一卷。（宋四庫闕書目作二卷）僧惟鳳撰。佚。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均著錄。惟鳳青城人，號持正，亦九僧之一。

九僧選句圖　一卷。不知撰人。佚。通志藝文略國史經籍志均著錄。案宋初有九僧詩集，歐陽修六一詩話謂今不復傳。溫公續詩話謂「元豐元年秋遊萬安山玉泉寺，于進士閔交如舍得之。」始知所謂九詩僧者劍南希晝，金華保暹，南越文兆，天台行肇，沃州簡長，青（歷代詩話本青誤作貴）城惟鳳，淮南惠崇，江南宇昭，峨眉懷古也。今其詩見宋詩紀事九十一卷，大率纖巧秀麗，故有儁句可摘。

林和靖摘句圖　一卷（宋志作三卷）不知撰人。佚。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此摘錄林逋詩句，亦不知選者爲誰。

孔中丞句圖　一卷。不知撰人。佚。直齋書錄解題及通考均著錄。書錄解題云：『中丞者或是孔道輔耶？』案道輔字原魯，宣聖四十五世孫，舉進士，天聖間爲右正言，累官御史中丞，出知鄆州。陳氏所云或亦不謬。第不知選摘

其詩者爲誰氏耳。

唐杜荀鶴警句圖　一卷。張行父撰。宋史藝文志著錄文史類。

寡和圖　三卷。僧定雅撰。佚。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

搜賢集　一卷。僧奉牟撰。佚。宋四庫闕書目文史類著錄。

詩林句範　五卷。不知撰人。佚。宋四庫闕書目通志藝文略均著錄。

此外更有重在品評或指陳優劣或巧爲譬況，亦與一般詩話體例不同。如：

詩病五事　一卷，蘇轍撰，附刻欒城集，別有說郛本，螢雪軒本。案蘇轍詩病五事僅五則，在欒城三集卷八中，乃隨筆記錄之文，非能別出成書。苕溪漁隱叢話引其文祇稱「蘇子由云」，知宋時猶不以爲書名。自陶宗儀輯入說郛，於是四川通志經籍志詩文評類且著錄之，不復以是爲篇名矣。

臨溪集　十卷。（國史經籍志作一卷）佚。郭思撰。通志藝文略及宋史藝文志均著錄。苕溪漁隱叢話前集時多稱引。案其內容似多偏於品評，與普通詩話不同。通志不著撰人，據宋志知爲郭思所撰。思字得之，熙子。元豐五年進士。

詩評　一卷。夏侯籍撰。佚。宋四庫闕書目著錄文史類。考直齋書錄解題通考經籍考均有詩評一卷，不著撰人，疑即此書。

胡氏評詩　不知卷數。胡氏亦不知何許人。詩話總龜前集(五)引之，凡二則：一論黃魯直詩，一論王介甫與張文潛詩。顧詩話總龜卷首所錄采用書目作胡氏詩話，不知何故？

至其單篇不成著作者，如張舜民芸叟詩評，蔡絛百衲詩評，均見胡仔漁隱叢話(三十三)及劉壎隱居通議。(六)此皆巧爲形似之語，實啟陶孫臞翁詩評之所本。又趙與旹賓退錄(二)亦引芸叟詩評，其次第與漁隱叢話不同。

第六目　論詩詩

章學誠文史通義詩話篇云：

詩話之源本於鍾嶸詩品。然考之經傳，如云：「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遠之有，」此論詩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論詩而及辭也。

我們根據此節而謂論詩詩之性質亦通於詩話。章氏所舉論詩及事之例，以散文爲之，其體爲後世詩話之所始；其論詩及辭之例，以韻語爲之，其體又後世論詩詩之所出。(見小說月報二十卷一號詩話叢話一)而其詩經中如「作此好歌以極反側，」(何人斯)「家父作誦以究王訩，」(節南山)「君子作歌維以告哀，」(四月)「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巷伯)諸語，亦正是論詩及事之例，所以論詩詩與詩話，體製雖殊，而性質實同。

因此，當時論詩風氣之流行，更可於論詩詩見之。論詩詩之流行於宋代亦自有故。蓋因(1)宋詩風格近於賦而遠於比興，長於議論而短於韵致，故極適合於文學的批評；有時可以闡說詩學的原理，有時可以敘述學詩的

經歷，有時更可以上下古今，衡量前代的著作。（2）宋詩風氣，又偏於唱酬贈答，往返次韵，累疊不休，於是或題詠詩集，或標榜近作，或議論斷斷，或唱和霏霏，或誌一時之勝事，或溯往日之遊踪，有此二因則論詩詩之較多於前代固亦不足爲奇了。

在宋初，若說歐陽修開了詩話的風氣；則梅聖俞的宛陵集可謂是開了論詩詩的風氣。宋人詩集中之論詩詩，與唐人文集中關於論文的序及書實有同樣的重要。

第二節　詩人之詩論

第一目　歐陽修與梅堯臣

宋人中間最先開論詩之風氣者，當推歐陽修。歐陽修在詩壇上批評的重要，不在有什麼明顯的主張，而在（1）始創詩話的體裁，（2）對於論詩詩的嘗試。前一項是歐公之所獨具，後一項則與梅堯臣之所同。

歐陽修酬學詩僧惟晤詩云：

> 詩三百五篇，作者非一人。羈臣與棄（一作逐）妾，桑濮乃淫奔。其言苟（一作或）可取，龐雜不全純。子雖（一作之）爲佛徒，未易廢其言。其言在合理，但憚學不臻。子佛（一作之）與吾儒，異轍難同輪。（一作共論）子何獨吾慕？自忘夷其身。苟能知所歸，固有路自新。誘進或可至，拒之誠不仁。維詩於文章，太山一浮塵。又如古衣裳，組織（一作纖）爛成文。拾其裁剪餘，未識袞服尊。嗟子學雖（一作已）勞，徒自苦骸筋。（一作自遠涉江津）勤勤袖卷軸，一歲三及

門。惟(一作何)求一言榮歸以耀(一作輝)其倫與夫榮其膚，不若啓(一作當著習)其源。韓子亦嘗謂，收斂加(一作畏)冠巾。(歐陽文忠集卷五)

此詩衞道氣分至爲濃厚；輕詩重文之意亦極顯著。然其論詩尙能闡發詩理之精微。於梅聖俞詩集序中闡說詩窮而後工之說，最爲後人所稱引。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於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歎，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歐陽文忠公全集四十二)

卽其書梅聖俞詩藳後闡說詩與樂通之理，可以意會，難以言傳，亦遠勝於宋儒之見解。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呂，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鐘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淸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脈，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足鼓舞之所然，問其何

> 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尙能歌之爲詩。古者登歌清廟，太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
>
> 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寫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稿而寫之。然夫前所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稿，猶伯牙之琴絃乎？

至其論詩詩中如水谷夜行寄子美聖俞一首，狀蘇梅二人之詩，亦善用形似之語，頗能攝其精神。

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霶霈。(一作譬)如千里馬，(一作思)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柬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一作後猶輩)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一作難)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一作淡)咀嚼苦難嘬。初如食橄欖，眞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一作轢)舉世徒(一作皆)驚駭；梅窮獨我知，(一作我獨奇)古貨今難賣。(一作物今誰買)

歐公一生於同時詩人所尊推梅，固宜其論及梅詩者獨多精義也。

梅堯臣之論詩主張亦多與歐公相類。其答韓三子華韓五持國韓六玉汝見贈述詩云：

聖人於詩言，曾不專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謂國風。雅章及頌篇，刺美亦道同。不獨識鳥獸，而為文字工。屈原作離騷，自哀其志窮。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蟲。邇來道頗喪，有作皆言空。煙雲寫形象，葩卉詠靑紅。人事極諛諂，引古稱辯雄。經營唯切偶，榮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藝充。以巧比戲奕，以聲喻鳥桐。嗟嗟一何陋，甘用無言終。然古有登歌，緣辭合徵宮。辭由士大夫，不出於瞽矇。予言與時輩，難用獨籠聾。雖唱誰能聽，所遇輒瘖聾。(宛陵集二十七)

又還吳長文舍人詩卷云：

詩教始二南，皆著賢聖迹。後世競剪裁，破碎隨刀尺。我輩強追倣，畫龍成蜥蜴。(宛陵集五十一)

均顯見其改革詩風的勇氣。其於當時詩壇摧陷廓清之功似亦不在歐公之下。元貢奎詩稱梅堯臣云『詩還二百

年來作，身死三千里外官。知己若論歐永叔，退之猶自愧郊寒。』洵爲篤論。至其對於詩的作風，則如其所作，亦主平淡，其依韻和晏相公詩云：

因吟適情性，稍欲到平淡。（宛陵集二十八）

又讀邵不疑學士詩卷云：

作詩無古今，惟造平淡難。（宛陵集四十六）

即在當時歐陽修再和聖俞見答詩云『嗟哉我豈敢知子，論詩賴子初指迷。子言古淡有真味，大羹豈須調以虀。』（歐陽文忠公集五）亦頗能說明梅氏論詩宗旨。蓋他既抗志希古，不欲『烟雲寫形象，葩卉詠青紅，』則旨趣所歸，當然要重在『古淡有真味』了。

不過他的古淡之境，正是從艱搜力索中得來。他也是『險詞鬬尖奇，凍地抽箏響』的。（依韻和永叔子履冬夕小齋聯句見寄）其答裴送序意詩云『我於詩言豈徒爾，因事激風成小篇，辭雖淺陋頗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區區物象磨窮年。』（宛陵集二十五）則知其雖力復古雅，偏主平淡，而結果當然不會如道學家之成爲率易之作了。其詩癖一首有云：『但將苦意摩層宙，莫計終窮涉暮津。』（宛陵集二十）亦可見其搜索肝脾之苦。歐陽修稱其『近詩猶古硬，咀嚼苦難嘬，』形容其作風亦殊的當。歐梅諸人力矯西崑而卒使宋詩衍成西江一派者，或亦可於此中得其消息也。

第二目　蘇軾

歐陽修之論同時詩人，稱蘇舜欽詩為『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稱梅堯臣詩為『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這幾句話若形容其後的詩人——蘇軾與黃庭堅，亦頗有幾分相似之處。蘇軾之詩如其文，也有『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的情形，與黃庭堅的作風不盡相近，故其論詩主張亦不全同。黃氏論詩好講句法，講詩律，而他則尚圓熟，尚自然，所以謂『新詩如彈丸，』（答王鞏）所以謂『好詩衝口誰能擇。』（重寄孫侔）又黃氏論詩重鈎深，重奇險，而他則尚邁往，尚豪健，所以不足於孟郊之詩，又以為『要當鬬僧清未足當韓豪』了。（讀孟郊詩二首）

不過蘇詩雖萬斛泉源，一瀉無餘，而機趣橫生，却從天生妙悟得來。黃庭堅稱其：『於般若橫說豎說，了無剩語。』（釋惠洪冷齋夜話七引）劉熙載亦謂『東坡詩善於空諸所有，又善於無中生有，機括實自禪悟中得來』（藝概二）故其詩的作風雖近於議論，而論詩主旨轉與嚴羽之尚禪悟者相近。以辯才三昧而為韻言，故能筆端有口，故能舌底瀾翻，於韻語中而吐不傳之妙，故又重在『高風絕塵，』重在『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澹泊，』（均見書黃子思詩集後）宋人詩話中之說東坡詩，而能窺到這一點者，只有吳可的藏海詩話為能發其妙。吳氏云『東坡豪，山谷奇，二者有餘，而於淵明則為不足，所以皆慕之。』明此，則知東坡論詩主張所以與其作風背馳之故了。我舊作詩話叢話（小說月報二十卷二號）中有一節云：

以禪喩詩，人皆知始於嚴羽滄浪詩話，實則由詩話言，固似此義發自嚴羽，由論詩韻語言，則司空圖二十四詩品已發其義，至東坡詩中則益暢厥旨。如云：『若言琴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於君指上聽？』（琴詩）妙語解頤，已近禪悟。又云：『衝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軌。人言非妙處，妙處在於是。』（詩頌）亦已逗露此意。至如送參寥師詩云：『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羣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臥雲嶺。鹹酸雜衆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當更請。』跋李端叔詩卷云：『暫借好詩銷永夜，每逢佳處輒參禪。』則更和盤托出，無餘蘊矣。所以東坡『賦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之語，即滄浪『不必太着題』之說也。東坡『新詩如彈丸』及『中有清圓句，銅丸飛柘彈』之語，即滄浪『造語貴圓』之說也。東坡『讀破萬卷詩愈美』，即滄浪『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之說也。東坡讀孟郊詩『何苦將兩耳，聽此寒蟲號。』即滄浪所謂『孟郊之詩刻苦，讀之使人不歡』之義也。人皆知滄浪論詩，反對蘇黃之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而孰知其論詩主旨正出東坡也哉！蓋蘇詩作風與其論詩宗旨正相反背。東坡詩云：『樂天長短三千首，却愛韋郎五字詩。』論坡詩者，亦嘗作如是觀，坡詩豪邁，其所以不脫子路未事夫子時氣象者，蓋皆由其才氣累之。至其生平篤嗜，固別有歸。其答王定民詩云：『五言今復擬蘇州。』次韻葉致遠見贈云：『一伎文章何足道，要言（一作知）摩詰是文殊。』微旨所在，蓋亦可以窺見矣。明得斯義，則知東坡論詩所以亦拈出司空圖『味在酸鹹之外』之語（見書黃子思詩集後）而渡海以後復有和陶之作了。

滄浪論詩，所以不滿東坡者，以其『於一唱三歎之音有所歉焉。』實則此就坡詩言耳。東坡論詩，固已說過：

『大木百圍生遠籟，朱絃三歎有遺音。』（答仲屯田次韻）

此節自謂差能側說蘇氏論詩之旨，讀者或不致以傳會病之。大抵東坡之學以得於莊子者爲多。故論調亦最近於禪。這不僅其論詩如此，卽論其他藝事亦莫不如是。如書蒲永昇畫後云：

古今畫水多作平遠細流，其善者不過能爲波頭起伏，使人以手捫之，謂有窪隆。其品格，特與印板水紙爭工拙於毫釐間耳。唐廣明中處士孫位，始出新意，畫奔湍巨浪，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盡水之變，號稱神逸。其後蜀人黃筌孫知微，皆得其筆法。始知微欲於大慈寺壽寧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蒼黃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輸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知微死五十餘年，成都蒲永昇嗜酒放浪，性與畫會，始作活水，得二孫本意。王公貴人或以勢力使人，輒嘻笑捨去。遇其欲畫，不擇貴賤，頃刻而成。嘗與予臨壽寧院水作二十四幅，每夏日挂之高堂素壁，卽陰風襲人，毛髮自立。永昇今老矣，其畫難得。世之識真者亦少。如往時董羽，近日常州戚氏，畫水世或傳寶之。如此之流，可謂死水，未可與永昇同年而語也。（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六十）

又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云：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於劍拔十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

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胸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欲畫者，急起從之，振衣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兔起鶻落，稍縱即逝矣。（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四十九）

這兩段都與莊子論藝之旨相同。故其書晁補之所藏與可畫竹詩云：『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惟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莊周世無有，誰知此疑神。』（蘇文忠公詩集二十九）

第三目　黃庭堅

山谷論詩，消極方面重在識「病」，所謂『更能識詩家病，方是我眼中人』也。（次韻奉酬荊南簽判向和卿六言）積極方面重在「法」，重在「律」，故又重在「眼」。如云『無人知句法，秋月自澄江。』（奉答謝公定與榮子邕論狄元規孫少述詩長韻）如云『秋來入詩律，陶謝不枝梧。』（送顧子敦赴河東）如云『拾遺句中有眼。』（贈高子勉）均重在作法的討論。所以曾季貍艇齋詩話云：『山谷詩妙天下，然自謂得句法於謝師厚，得用事於韓持國，此取諸人以為長也。』所以釋德洪冷齋夜話（五）荊公東坡句中眼條亦引山谷語云：『學者不知此妙，語韵終不勝。』

他既這樣重在句法詩律，所以以詩為事而工夫亦盡於詩內。其贈高子勉四首之一云：

妙在和光同塵，事須鈎深入神。聽它下虎口著，我不為牛後人。

其戛戛獨造，逈不猶人之意可見。其避暑李氏園詩云：『題詩未有驚人句，會喚謫仙蘇二來。』求其驚人，是他「下

虎口著」的本領。其次韵答高子勉詩云『寒爐餘幾火，灰裏撥陰何。』任淵註『言作詩當深思苦求，方與古人相見也。』（山谷詩集註十六）又次韵奉酬荆南簽判向和卿六言有云『覆卻萬方無準，安排一字有神。』任淵註『言不爲物役詩思乃凝於神也。』（同上）這又是所謂『鈎深入神』的註脚。至其再作答徐天隱詩所謂『破的千古下乃可泣曹劉，』則又是「不爲牛後人」的態度。張耒讀黃魯直詩云『不踐前人舊行迹，獨驚斯世擅風流。』極得山谷眞相。曾季貍艇齋詩話云：『山谷詩云「十度欲言九度休，萬人叢中一人曉」，曾吉父云，「此正山谷詩法也，」其說盡之。』此言亦極中肯。許彥周詩話引黃氏甥郭功父語謂『公做詩費許多氣力做甚。』實則黃氏做詩，也是費過氣力者。正因他這般費氣力，所以纔肯不憚煩地講什麼詩法和句律。

然而他雖下虎口著，雖要驚人要破的，而猶不致過偏於奇險，此則所謂『妙在和光同塵』也。其和[illegible]五丈「之」字詩韵所謂：

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

任淵註云『詩意謂唱酬之作聊且遺興，不必甚工，至其自得之妙，蓋未易與俗人言也。』（山谷詩集註十九）則又是由艱深以歸於自然。朱弁風月堂詩話謂『黃庭堅用崑體工夫而造老杜渾成之地，』可謂窺見深際。

他何以能用鈎深入神的工夫而造和光同塵的妙境呢？則以其論詩主張本是如此的。他以爲有的工夫在詩內，這是他所謂詩法，冷齋夜話（一）曾述山谷詩法云：

山谷言詩意無窮而人才有限，以有限之才追無窮之意，雖淵明少陵不得工也。不易其意而造其語，謂之「換骨法」；規摹其意形容之，謂之「奪胎法」。

這種方法即是化朽腐爲神奇的方法。所以雖得之於深思苦求，而依舊能渾成自然。觀其再次韵楊明叔詩小序所云：

蓋以俗爲雅，以故爲新，百戰百勝，如孫吳之兵；棘端可以破鏃，如甘蠅飛衛之射，此詩人之奇也。（山谷詩集註十二）

這卽是奪胎換骨法的原理之說明。這樣，所以雖新而實故，雖奇險而實平正，雖生硬而實妥貼。昔人謂：『山谷晚年詩皆是悟門』（見樓鑰攻媿集七十書張式子詩集後）於此也未嘗不有一些關係。我們須知『以俗爲雅以故爲新』諸語，雖爲東坡所言，卻正是山谷的詩法。

他又以爲有的工夫更爲詩外。漁隱叢話前集（卷十七）引山谷說云：

山谷云：詩詞高勝要從學問中來。後來學詩者雖時有妙句，譬如合眼摸象，隨所觸體得一處，非不卽是，要且不似，若開眼全體見之，合古人處不待取證也。

又云：詩文不可鑿空強作，待境而生，便自工耳。每作一篇，先立大意，長篇須曲折三致意，乃可成章。

則又是超於詩法句律的見解。所以他的論詩只推崇杜甫陶潛二人。其贈高子勉詩所謂：

> 拾遺句中有眼，彭澤意在無絃。顧我今六十老，付公以二百年。

實已逗露此意。於杜則學其法，於陶則又漸得其超於法者。得於法而後工，超於法而後妙。他指出此二人卽所以示其學詩宗主，此則所謂『付公以二百年』也。任淵註謂『老杜之詩眼在句中，如彭澤之琴意在絃外，』（山谷詩集註十六）恐非是山谷原意。

山谷論詩雖陶杜並重，而晚年漸向似乎更偏於陶。津逮本山谷題跋卷七論詩條云：

> 謝康樂庾義城之於詩，鑪錘之功，不遺力也。然陶彭澤之牆數仞，謝庾未能窺者何哉？蓋二子有意於俗人贊毀其工拙，淵明直寄焉爾。

又山谷宿舊彭澤懷陶令詩云：

> 空餘詩語工，落筆九天上。向來非無人，此友獨可尙。

此友可尙，亦可知其漸向之所在了。這個關係正可看出後來江西詩人之論詩所以由「法」而轉到「悟」的緣故。

第四目　魏泰與葉夢得

宋詩自歐陽蘇黃以後最鮮韵味。滄浪詩話所謂：『以文字爲詩，以才學爲詩，以議論爲詩』云云，正是針對此種作風而言。當時詩壇與此種作風不甚相近者有王安石。故凡論詩不主蘇黃作風者，往往偏主韵味，而與歐陽蘇

黃異趣。這可以王安石一派爲例。王安石臨川集中雖無什麼論詩主張，然稱美魏泰葉濤得諸人實可爲此派代表。

魏泰爲曾布婦弟，故與蘇黃不合；其所撰臨漢隱居詩話亦黨熙寧而抑元祐。四庫總目提要譏其『堅執門戶之私，甘與公議相左，』要亦不爲無見。但平心論之，魏氏所言亦頗爲中肯。宋詩流弊，確是如此，即使魏氏誠持門戶之見，要亦足爲當時針砭，成其一家之言。如云：

詩者述事以寄情，事貴詳，情貴隱。及乎感會於心，則情見乎詞，此所以入人深也。如將盛氣直述，更無餘味，則感人也淺，烏能使其不知手舞足蹈？又況厚人倫，美教化，動天地，感鬼神乎？『桑之落矣，其黃而隕。』『瞻烏爰止于誰之屋！』其言止於鳥與桑爾，及緣事以審情，則不知涕之無從也。『采薜荔兮江中，搴芙蓉兮木末，』『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我所思兮在桂林，欲往從之湘水深』之類，皆得詩人之意。至於魏晉南北朝樂府，雖未極淳，而亦能隱約意思，有足吟味之者。唐人亦多爲樂府，若張籍王建元稹白居易以此得名，其述情叙怨，委曲周詳，言盡意盡，更無餘味。及其末也，或是詼諧，便使人發笑，此曾不足以宣諷愬之情，況欲使聞者感動而自戒乎？甚者或譎怪，或俚俗，所謂惡詩也，亦何足道哉！

凡爲詩當使挹之而源不窮，咀之而味愈長。至如永叔之詩，才力敏邁，句亦清健，但恨其少餘味爾。

詩主優柔感諷，不在逞豪放而致怒張也。老杜最善評詩，觀其愛李白深矣，至稱白則曰：『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又曰：『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信斯言也，而觀陰鏗鮑照之詩，則知予所謂主優柔而不在豪

放者，爲不虛矣。

此處所謂「味」，蓋取古詩溫柔敦厚，一唱三歎之義，猶與後世詩禪之說不盡相同。其與滄浪詩話同一論旨者，只在反對歐陽蘇黃之敏邁豪放而已。

其與魏泰相同不滿蘇黃之詩，而進一步再以論詩者則爲葉夢得。葉氏所撰石林詩話，其論詩宗旨，與魏氏合，而意旨所歸，却最與滄浪爲近。四庫提要以其推重王安石者不一而足，遂謂『夢得出蔡京之門，而其壻章冲則章惇之孫，本爲紹述餘黨，故於公論大明之後尙陰抑元祐諸人。』實則此亦由於蘇王二氏詩的作風本是互異，故其論詩主張也不會相同，正不必牽涉黨爭門戶的方面。石林詩話云：

歐陽文忠公詩始矯崑體，專以氣格爲主，故其言多平易疏暢。律詩意所到處，雖語有不倫，亦不復問。而學之者往往遂失眞，傾囷倒廩，無復餘地。

長篇最難，晉魏以前詩無過十韻者，蓋常使人以意逆志，初不以敍事傾盡爲工。

此即魏泰不主豪放之旨，也即滄浪所譏以才學爲詩之意。又云：

七言難於氣象雄渾，句中有力，而紆徐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與『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後，嘗恨無復繼者。韓退之筆力最爲傑出，然每苦意與語俱盡。和裴晉公破蔡州回詩所謂：『將軍舊壓三司貴，相國新兼五等崇，』非不壯也，然意亦盡於此矣。不若

劉禹錫賀晉公留守東都云：「天子旌旗分一半，八方風雨會中州，」一語遠而體大也。

此節亦近魏泰之旨；但與滄浪所謂「坡谷諸公之詩如米元章之字，雖筆力勁健，終有子路未事夫子時氣象，盛唐諸公之詩，如顏魯公書，既筆力雄壯，又氣象渾厚」云云爲更相類似。明得此意，則知石林論詩所以推重安石而譏議歐蘇者亦自有因，固不僅門戶之見了。

且石林之於安石亦非一味推重者。如云：「王荊公少以意氣自許，故詩語惟其所向，不復更爲涵蓄……後從宋次道盡假唐人詩集，博觀而約取，晚年始盡深婉不迫之趣。」則知其所以推重安石者，正在其深婉不迫之趣，與其論詩宗旨有合耳。至如所謂：

「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世多不解此語爲工，蓋欲以奇求之耳。此語之工正在無所用意，猝然與景相遇，借以成章，不假繩削，故非常情所能到。詩家妙處當須以此爲根本，而思苦言難者往往不悟。……自唐以後，既變以律體，固不能無拘窘，然苟大手筆亦自不妨削鐻於神志之間，斲輪於甘苦之外也。

古今論詩者多矣，吾獨愛湯惠休稱謝靈運爲「初日芙蕖，」沈約稱王筠爲「彈丸脫手，」兩語最當人意。初日芙蕖，非人力所能爲，而精彩華妙之意自然見於造化之妙，靈運諸詩可以當此者亦無幾。彈丸脫手，雖是輸寫便利，動無留礙，然其精圓快速，發之在手，筠亦未能盡也。然作詩審到此地，豈復更有餘事。韓退之贈張籍云：「君詩多態度，藹藹春空雲。」司空圖記戴叔倫語云：「詩人之詞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亦是形

似之微妙者，但學者不能味其言耳。

是則且較饒者更進一步而與滄浪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詮』及『透徹玲瓏不可湊泊』者實爲同一主旨了。

至如下文所引一節：

禪宗論雲間有三種語：其一爲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爲截斷衆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爲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爲序。余嘗戲爲學子言：老杜詩亦有此三種語，但先後不同，『波漂菰米沈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爲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爲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迴，五月江深草閣寒』爲截斷衆流句。若有解此，當與渠同參。

則更爲滄浪以禪喻詩之所本了。

第五目　韓駒與吳可

韓駒詩，蘇軾兄弟均比之儲光羲。其學原出蘇氏，故呂本中以列江西派中，駒殊不樂。（見後村詩話）吳可少亦以詩爲蘇軾劉安世諸人鑒賞，故亦爲蘇學。吳可所著藏海詩話中，頗多與韓駒論詩之語，故二人論詩宗旨亦最相近似。

吳可藏海詩話頗多申述東坡詩論之處，如白鷗沒浩蕩一條即出蘇軾志林；『凡文章先華麗而後平淡』諸語，即東坡『絢爛之後歸於平淡』之說；『以意爲主，輔之以華麗，則中邊皆甜』諸語，亦出東坡論陶詩中邊皆甜

之說。又案李之儀姑溪題跋有跋吳思道詩云：「東坡嘗謂余曰，凡造語貴成就，成就則方能自名一家，如蠶作繭不留蝕隙。吳子華韓致光所以獨高於唐末也。吳君詩咄咄逼近時人，未易長武，余雖未識其面，呻吟所傳，感歎不已。」此與滄海詩話所云：「唐末人詩雖格不高而有衰陋之氣，然造語成就，今人詩多造語不成」者，正相映發。所以韓駒吳可之論詩，又可作爲蘇軾一派的主張。

蘇軾論詩已近禪悟，韓駒、吳可言之更明。吳駒贈趙伯魚詩有云：

學詩當如初學禪，未悟且遍參諸方。一朝悟罷正法眼，信手拈出皆成章。（陵陽先生詩二）

此與吳可學詩詩正同一論調。吳詩云：

學詩渾似學參禪，竹榻蒲團不計年。直待自家都了得，等閒拈出便超然。

學詩渾似學參禪，頭上安頭不足傳。跳出少陵窠臼外，丈夫志氣本衝天。

學詩渾似學參禪，自古圓成有幾聯。春草池塘一句子，驚天動地至今傳。

此詩見詩人玉屑卷一所引，不載吳氏藏海居士集中。當時龔相亦有學詩詩，蓋和吳氏之作。詩人玉屑亦引之云：

學詩渾似學參禪，悟了方知歲是年。點鐵成金猶是妄，高山流水自依然。

學詩渾似學參禪，語可安排意莫傳。會意即超聲律界，不須鍊石補青天。

學詩渾似學參禪，幾許搜腸覓句聯。欲識少陵奇絕處，初無言句與人傳。

是均以禪喻詩，開滄浪詩話之先聲。陵陽室中語述韓氏語云：

詩道如佛法，當分大乘小乘邪魔外道，惟知者可以語此。（詩人玉屑卷五引）

此則說得更爲明顯，知滄浪所論全是拾此牙慧。又吳可藏海詩話亦云：

凡作詩如參禪，須有悟門。

則知其論詩宗旨與方法本是如此。四庫總目提要乃稱其『每作不了了語，似乎禪家機鋒，頗不免於習氣，』似亦非吳氏知己也。

第六目　江西詩人

江西詩人之詩論又是山谷一派之緒餘，另成一個系統。曾季貍艇齋詩話有一節云：

後山（陳師道）論詩說換骨，東湖（徐俯）論詩說中的，東萊（呂本中）論詩說活法，子蒼（韓駒）論詩說飽參，入處雖不同，其實皆一關捩，要知非悟不可。

這正是說明江西詩社中人的論詩主張。所以諸人均同一論調，同一關捩。蓋自山谷作答謝公定詩有云『自往見謝公，論詩得濠梁，』已重在『有所悟入，』（見任淵注）則知傳江西衣鉢者，其論詩當然也重在『悟』了。

茲先就陳師道言之。昔人稱陳氏作詩重在苦吟，每偕及門登臨得句，即急歸臥一榻，以被蒙首，甚至其家嬰兒稚子亦抱寄鄰家，其精思苦吟如此。所以黃庭堅有『閉門覓句陳無己』之譏；（病起荊江亭即事）又其贈陳師

道詩亦有「陳侯學詩如學道，又似秋蟲噫寒草，日晏腸鳴不俛眉，得意古人便忘老」諸語。當然的，陳氏的自咏絕句，更兼有「此生精力盡於詩，末歲心存力且疲」之歎了。

以能這樣苦吟，故其所謂「換骨」云者，實即是火候到時的境界。其答秦少章詩云：

> 學詩如學仙，時至骨自換。

工夫深時，自然能換骨的。這樣以學仙為喻；但亦未嘗不是禪宗的方法。所以說關捩全在一「悟」字。

今世所傳後山詩話，固不足信，然亦未嘗不可於其中節取數語以窺其論詩宗旨。如所謂「寧拙毋巧，寧樸毋華，寧麤毋弱，寧僻毋俗」云云，正是江西派論詩主張。與其詩所謂「近世無高學，舉俗愛許渾」者（次韻蘇公西湖觀月聽琴）正是同一意思。所以我疑此書本是後山未曾寫定之本，以出後人編次，遂不免增益竄亂耳。

於次，再一言徐俯。徐氏論詩，艇齋詩話稱其「論詩說中的，」今以未見東湖集，不知其說若何？但曾敏行獨醒雜志有一節云：

> 汪彥章為豫章幕官；一日會徐師川於南樓，問師川曰：「作詩法門當如何入？」師川答曰：「卽此席間杯柈果蔬使令，以至目力所及，皆詩也。君但以意翦裁之，馳驟約束，觸類而長，皆當如人意，切不可閉門合目作鐫空妄實之想也。」彥章頷之。逾月復見師川曰：「自受教後，准此程度，一字亦道不成。」師川喜謂之曰：「君此後當能詩矣。」故彥章每謂人曰：「某作詩句法得之師川。」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四十九引呂氏童蒙訓亦述徐氏語云：『詩豈論多少，只要道盡眼前景致耳。』正是此意。眼前景致本可入詩，不過他說得迷離惝怳，有如懷麓堂詩話所謂『宋人論詩高者如捕風捉影』之類，則不免墮於禪門習氣而已。

又艇齋詩話有一節云：

> 東湖嘗與予言，近世人學詩，止於蘇黃，又其上則有及老杜者，至六朝詩人皆無人窺見。若學詩而不知有選詩，是大車無輗，小車無軏。

此意亦嚴羽所謂『取法乎上』的意思。時人論詩，本是各有自得之處，所以艇齋詩話又云：『山谷論詩多取楚詞，東湖論詩多取選詩。』各人之所嗜雖不相同，要之都是陳師道之所謂「高學」，決不偏徇流俗之見的。因知滄浪詩話所謂『學者須從最上乘，具正法眼，悟第一義』云云，也從江西餘睡得來。

因其如此，所以江西詩人也都有一些自立的氣概。即如徐氏雖為山谷之甥，並且也是江西派的詩，但他磊落不羣之氣，終不肯屈居人下。所以晚年有人稱其源自山谷者，他不以為然，答以小啓云：『涪翁之妙天下，君其問之水濱；斯道之大城中，我獨知之濠上。』（見趙鉞鸛林子卷一）其於山谷猶且如此，何況餘子！所以呂氏童蒙訓又云：『徐師川言作詩自立意，不可蹈襲前人。』（漁隱叢話前集三十七引）這是江西詩人所共持的態度。黃山谷云：『聽它下虎口著，我不為牛後人。』江西詩人持奉這種信條，安得不愈變而愈離其宗。我所以謂滄浪詩話雖似

針對江西詩派而發，實際上也未嘗不深受江西詩人的影響。

最後，再一言呂本中之所謂「活法」。呂氏關於論詩之著凡有三種：一爲江西詩社宗派圖，以選集而兼論評，這是江西詩人的總集。一爲紫薇詩話，則論詩而及事者爲多，又爲江西詩人的小傳或遺聞軼事的記載。其又一則爲呂氏童蒙訓，其論詩主張，大率在是，是又可作爲江西詩人之詩論觀。

不過因此書本爲家塾訓課之本，故一方面論爲詩文之法，一方面又論爲人之法。而且本中本是北宋故家，及見元祐遺老師友傳授，具有淵源，故言理學則折衷二程，論詩文則取法蘇黃。他在政和宣和之間只與于氏之學立異，而於元祐程蘇之學則不復分別。所以是書雖多論詩主張而不全是論詩。而且今傳各本童蒙訓，均無論詩文之語，蓋又是朱學盛行以後，欲嚴洛蜀之辨而加以汰除者。明葉盛菉竹堂書目卷四，有童蒙詩訓一册，又楊士奇等所編之文淵閣書目卷十亦有之，註云闕。均以列入宋人詩話中間，當即爲童蒙訓中之論詩者。不知此果宋人分編之本，抑爲後人掇拾之本，已不可考。現在只就苕溪漁隱叢話所引者考之，以見其一斑。

呂氏論詩重在悟入。童蒙訓云：

作文必要悟入處，悟入必自工夫中來，非僥倖可得也。如老蘇之於文，魯直之於詩，蓋盡此理也。

所以紫薇詩話自述答晁叔用語云：『只熟便是精妙處。』熟，即活法，即工夫，即悟。又其與曾吉甫論詩第一帖云：

楚詞杜黃，固法度所在，然不若徧考精取，悉爲吾用，則忿態橫生，不窘一律矣。如東坡太白詩，雖規摹廣大，學

者雖依然讀之使人敢道澡雪滯思，無窮苦艱難之狀，亦一助也。要之此事須令有所悟入，則自然越度諸子。悟入之理，正在工夫勤惰間耳。如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劍，頓悟筆法。如張者專意此事，未嘗少忘胸中，故能遇事有得，遂造神妙；使他人觀舞劍，有何干涉！

又其序詩社宗派圖亦謂『詩有活法，若靈均自得，忽然有入，然後惟意所出，萬變不窮。』都近禪門話頭。蓋江西派論詩雖好論詩法，而能不泥於法。呂氏與曾吉甫論詩第二帖云：

欲波瀾之闊，先須於規摹令大，涵養吾氣而後可。規摹既大，波瀾自闊；少加治擇，功已倍於古矣。試取東坡黃州已後詩，如種松醫眼之類，及杜子美歌行及長韻近體詩看，便可見。若未如此而事治擇，恐易就而難遠也。退之云：『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則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長短與聲之高下皆宜。』如此則知所以爲文矣。曾子建七哀詩之類，宏大深遠，非復作詩者所能及，此蓋未始有意於言語之間也。近世江西之學者，雖左規右矩，不遺餘力，而往往不知出此，故百尺竿頭不能更進一步，亦失山谷之旨也。

百尺竿頭再進一步，便能有所悟入之法，或自工夫中來，此卽陳師道所謂「時至骨自換」之說，或自徧考中來，則韓駒所謂『未悟且遍參諸方』之意。如童蒙訓云：

前人文章各自一種句法：如老杜『今君起柁春江流，予亦沙邊具小舟，』『同心不減骨肉親，每語見許文章伯，』如此之類，老杜句法也。東坡『秋水今幾竿』之類，自是東坡句法。魯直『夏扇日在搖，行樂亦云聊，』

此皆直句法也。學者若能遍考前作，自然度越流輩。（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八引）（註）

〔註〕按陳鵠西塘集耆舊續聞二稱呂居仁云：「學詩當熟看老杜蘇黃，亦先見體式，然後遍考他詩，自然工夫度越過人。」蓋卽此節而易其辭。

此卽遍參之意。大抵江西一派是由人巧之極以臻天然者，故由奪胎換骨之說可以一變而爲悟入之論，由遍參之法可以歸到自得之境。後來楊萬里陸游之詩，從江西派入而不從江西派出，後來嚴羽滄浪詩話反對蘇黃而論詩之語轉多拾江西餘唾，蓋均由此。我們只看漁隱叢話前集十五所引潘淳詩話云：

浩然詩『掛席幾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潯陽郭，始見香爐峯。』但詳看此等語，自然高遠。

這不就是後來神韻派的論調嗎？范溫潛溪詩眼云：『山谷言學者若不見古人用意處，但得其皮毛，所以去之更遠。學者先以識爲主，禪家所謂正法眼，直須具此眼目，方可入道。』（苕溪漁隱叢話前集五引）則知滄浪論詩主識，正從江西詩人「遍參」一語得來。

第三節　道學家之詩論

第一目　張載

我們論到道學家之詩論，先須注意到幾個特殊之點：（1）不重在作詩而重在知詩或論詩。（2）其於作詩亦不重雕琢而重在自然。（3）其於知詩論詩又不重在作法，不泥於體製而重在原理的根本的探索。這三點是道學家對於詩的態度，所以有時推到極端，也不作詩，也不論詩，而重在用詩。

北宋時，張載邵雍與二程恰恰可以代表這三方面。張載重在知詩，二程主於用詩，而邵雍則不廢吟詠，所以又頗論及作詩的態度。

知詩之說，大抵出於孟子論詩之緒餘，固然不是當時道學家的特見。然而道學家亦頗能發揮，頗能補充。孟子說：『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謂得之。』這種說法，經漢人一用，便成爲穿鑿附會。他們以爲惟委曲解詩，才爲以意逆志。這不能不說是漢儒的錯誤。宋人解詩與漢儒異，但其所用的方法，也仍是孟子以意逆志的方法。用同樣的方法而有不同的結果，這又是什麼原因呢？這在張載經學理窟一詩書條中說得好：

> 古之能知詩者，惟孟子爲以意逆志也。夫詩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

原來漢宋儒者的解詩，同樣用以意逆志的方法，不過一則艱險求之，一則平易求之而已。漢人以艱險求詩，所以多穿鑿；宋儒以平易求詩，所以又一反漢人的見解。說是鑿空，同樣的是鑿空。後來清儒只知揚漢抑宋，於漢人所說則闡揚之不遺餘力，而巧爲圓說；於宋人所言則排斥之不遺餘力，而詆爲臆說，眞不免是知其一未知其二了。眞不能驚詫於泥古之見之入人之深了。

孟子又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尙友也。』這些話經漢人一用，於是有詩譜。詩譜說明詩的時地關係，本沒有什麼壞處，可是詩譜的根據，是在於詩序，詩序所言既未能盡信，則詩譜所說，雖欲求知

源流淸濁之所處與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恐亦不免錯悞了。宋人解詩雖也用同樣的方法，便不是這般拘泥求之。他說得很通達。他只言其大概而不鑿指事實，所以較鮮流弊。張載經學理窟二禮樂條中有云：

> 鄭衛之音自古以爲邪淫之樂，何也？蓋鄭衛之地濱大河，沙地土不厚，其間人自然氣輕浮；其地土苦不費耕穫，物亦能生，故其人偸脫怠惰弛慢頹靡。其人情如此，其聲音同之。故聞其樂能使人如此懈慢。其地平下，其間人自然意氣柔弱怠墮，其土足以生。古所謂息土之民不才者也。

他從一般人的稟賦方面說，他從一般人的氣質方面說。以環境論詩，以氣質論世，當然不會有漢儒穿鑿之弊了。

第二目　邵雍

道學家大率不甚爲詩，其能爲詩者惟有邵雍。邵氏所著有伊川擊壤集。其自序云：

> 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唯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

這正說明他作詩的態度。所以他論詩的標準也是如此。他繼續言之云：

> 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

此數語中關說「詩」與「音」的區分，及「志」與「詩」或「情」與「音」的關係，都是值得注意的。由於他

說明「志」與「詩」的關係，故其論詩重在寫其自我；由其說明「情」與「物」的關係，故其論詩又重在寫其自得。

他的論詩大旨，不外於詩大序一篇所言。其論詩吟云：『何故謂之詩？詩者言其志。既用言成章，遂道心中事。』讀詩吟云『詩者人之志，非詩志莫傳。』詩畫吟云『詩者人之志，言者心之聲。志因言以發，聲因律而成。』這與詩序所謂「志之所之」云云沒有多大分別。但是他的重要，卻正在於此。他能夠根據詩序而加以組織的系統的說明。他能夠化朽腐為神奇，把陳陳相因的老生常談，一變而為他自己的詩論，為他當時新起的道學家的詩論。這便是值得注意的了。他以為

時—感其時—志—發其志—言—言成章—詩

物—感其物—情—發其聲—聲—聲成文—音

他分別兩項說明其關係，這已與詩大序所言不盡相同了。因為他分為兩項說明，所以他也提出了兩個重要的觀點：第一點，是說明了「志」與「詩」的關係。『詩言志』這是一句老話，盡人知之亦盡人能言之。但是所謂「志」是什麼？則又人異其說，正同人異其志一樣。袁枚標榜性靈之說，亦以『詩言志』一語為宗旨，可知言志之旨雖同，而內容意趣卻可隨各人解釋的觀點而不同。道學家之闡說『詩言志』一語，當然不會同於袁枚一流之詩人的見解。至其所由不同之故，則邵氏自序中說得很明斷。詩大序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這即是「言志」一語之

絕妙解釋，而亦是道學家與詩人所其守的信條。但是如何可使情動於中呢？他以爲其要有二，卽是『身也時也。謂身則一己之休慼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慼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所以本於一身之休慼而爲言者，祇不過發抒個人的牢騷，或寫其浪漫愉佚的生活，其情均未能盡軌于正。卽有論到一時之否泰者，亦不過是一己愛惜之私而不足以爲天下是非之公。所以他說『懷其時則謂之志，』重在時的方面，便可較鮮這些流弊了。所以他又說：『近世詩人窮慼則職於怨憝，榮達則專於淫佚。身之休慼發於喜怒，時之否泰出於愛惡，殊不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於情好也。』這纔可見出詩人和道學家之不同。僅以身的關係發其志而爲言者，是發乎情而止乎情。以天下大義而爲言者則情出於時而終歸于正，此則所謂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也。這纔是詩大序『發乎情止乎禮義』一語絕妙的注脚，絕妙的闡說。

第二點是說明了「情」與「物」的關係，他再追究到何以一般詩人要溺於情好呢？情好是不是應當捐棄或避之如蛇蝎呢？他則以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爲喻，而以爲：

『噫情之溺人也甚於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邪？二者之間必有處焉。就如人能踏水，非水能踏人也。然而有稱善踏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踏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利內而踏水，利而壞之患立至於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性害命一也。』

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從之矣。心者，性之郛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從而可知之矣。

他提出了『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的方法，則兩不相傷，情累都忘，更何溺於情好之足慮！這總是道學家修養之極詣，而同時也是詩人所需的修養之極詣。尤其道學家的詩人所應持的態度。

由第一點言，故其論詩重在寫其自我；由第二點言，故其論詩又重在寫其自得。其無苦吟一首中云：『行筆因調性，成詩爲寫心。詩揚心造化，筆發性園林。』（伊川擊壤集十七）於抒寫自我中有自得之趣。其閑吟詩又云：『忽忽閑拈筆，時時樂性靈。何嘗無對景，未始便忘情。句會飄然得，詩因偶爾成。天機難狀處，一點自分明。』（伊川擊壤集四）於抒寫自得中也自有自我存在。故其作詩的態度是：

>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自得時。風露清時收翠潤，山川秀處摘新奇。揄揚物性多存體，拂掠人情薄用辭。遣味正宜涵泳處，堯夫非是愛吟詩。（首尾吟）

蓋詩人以詩累情，而他則以詩適情；道學家重道廢詩，而他則重道而不廢詩。以詩累情，所以只惟聲律詞藻之是求，而性靈與趣便索然了。重道廢詩，所以以詩爲閑言語，而道妙既無由闡寫，道體亦無從形容了，所以他說：

所未忘者獨有詩在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實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所作異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鐘之應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靜照物，因時起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詠情性，曾何累於情哉！

鐘鼓樂也，玉帛禮也，與其嗜鐘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廢鐘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爲言者也。（擊壤集自序）

因此，他的態度是『亦不多吟亦不少吟，亦不不吟亦不必吟』（答傅欽之）的。其言默吟一首說得更爲明白。他說：

當默用言言是垢，當言任默默爲塵。當言當默都無任，塵垢何由得到身。

道學家不吟，其病在當言任默；詩人必吟，其病在當默用言。所以他是詩人中的道學家，道學家中的詩人。我嘗謂宋代的古文家，雖論文主道而未嘗不通於言志；宋代的道學家雖論詩言志而也未嘗不偏於載道。蘇軾是前一種最適當的例，而邵雍便是後一種最適當的例。

邵氏首尾吟中又有云：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樂物時。天地精英都已得，鬼神情狀又能知。陶真意向辭中見，借論言從物外移。始信詩能通造化，堯夫非是愛吟詩。

堯夫非是愛吟詩詩是堯夫可愛時。已着意時仍着意，未加辭處與加辭。物皆有理我何者，天且不言人代之。代了天工無限說，堯夫非是愛吟詩。

詩能通造化，詩能代天工，這是向來詩人所不敢如此大言的。其詩酒吟云：『鬼神情狀將詩寫，造化功夫用酒傳。傳寫不干詩酒事，君無詩酒又難言。』

第三目　二程及其門人

道學家之論詩，至二程可謂偏於極端了。他們是主張不欲作詩的。程頤云：

某素不作詩，亦非是禁止不作，但不欲為此閑言語。且如今言能詩無如杜甫，如云『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如此閑言語道出做甚！某所以不常作詩。（二程遺書十八）

至其所以不欲作詩之故，亦與其不欲用力於文章一樣。他說：

學詩須是用功，方合詩人格。既用功甚妨事。古人詩云『吟成五個字，用破一生心』；又謂『可惜一生心，用在五字上。』此言甚當。

則知其對於作詩作文，均以玩物喪志視之。邵雍是為詩而不守詩人的格，二程是因為要守詩人的格而不為詩。

不過，他們雖不作詩而頗能認識詩的性質。正因他們對於詩的性質認識清楚，所以纔能善於用詩。伊川經說卷三有云：

詩者言之述也，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咏歌之所由興也。其發於誠感之深，至於不知手之舞足之蹈，故其入於人也亦深，至可以動天地感鬼神。

這雖即是詩大序中的老話，但對於詩的性質和功能，卻說得正着。蓋道學家儘管不作詩，而於詩卻體會有得。程氏外書（十二）引上蔡語錄云：

伯淳常談詩，並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卻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

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

以這種玩味的讀法，當然能別有會心了。昔人只是泥於詞句，故其讀詩與用詩，至多亦不過是斷章取義。但在道學家則是用「興於詩」的方法以讀詩者，所以能取欣賞的態度，體會有得了。

不過道學家之讀詩與一般人之純取欣賞的態度者猶有一些分別。這個關係即因道學家的態度始終不離實用的觀念之故。近思錄（三）載程頤語云：

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書。『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

他處處要得到「興」的結果，而且要得到「興」的良好的結果，故其論詩亦始終離不開一個「善」字。程頤云：

學之興起莫先於詩，詩有美刺，歌誦之以知善惡治亂興廢。（二程遺書十一）

程頤云：

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

游酢論語雜解之解「興於詩」章云：

興於詩，言學詩者可以感發於善心也。如觀天保之詩，則君臣之義修矣。觀棠棣之詩，則兄弟之愛篤矣。觀伐木之詩，則朋友之交親矣。觀關雎鵲巢之風，則夫婦之經正矣。昔王裒有至性，而弟子至於廢蓼莪，則詩之興發善心，於此可見矣。而以考其言之文爲興於詩，則所求於詩者外矣；非所謂可以興也。然則『不學詩無以言』何也？蓋詩之情出於溫柔敦厚，而其言如之。言者心聲也，不得其心，斯不得于言矣。仲尼之敎伯魚，固將使之興于詩而得詩人之志也。得其心斯得其所以言而出言有章矣。豈徒考其文而已哉！

均是着眼在「善」的方面。所以最後歸宿，是要人的詩化。程頤云：

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氣象。（程氏外書三）

程顥云：

學者不可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近思錄三）

這纔盡「興」的能事。這纔到善於用詩的最高點。

道學家之詩論所以常為後人——尤其在近世——所詬病者，大概是在這一點。然而道學家所取的玩味欣賞的態度，儘管偏於用主於善，畢竟也有相當的成功。

其一，在解義。伊川經說（三）詩解云：

古人之學由詩而興，後世老師宿儒尚不知詩義，後學豈能興起乎？世之能誦三百篇者多矣！果能達政專對乎？是後之人未嘗知詩也。

詩義不明則不能使人興起，於是纔感到解義之必要。而一方面體會有得，也自覺別有新義，不得不舉以示人。於是一般道學家遂紛紛別撰詩說，而宋儒說詩遂與漢儒異趣了。此後至朱子之詩集傳而集其大成，成為解詩之別一派，不可謂不是這種主張有以促成之。

其又一，在合樂。近思錄（十一）載二程語云：

明道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伊川曰，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

> 其義，怎生教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

他們都有詩樂離析之憾。本來由於音樂的變遷，在後世實在沒法使古詩復有歌唱的可能。但因注意到這一點，自然能使(1)詩之通俗化；——對於古詩則解其義，對於當時的詩則使成淺近易曉的歌曲。(2)詩之歌化；——採用古詩應用的方法，使之歌詠以養其性情。這均是用詩的極妙方法，後來明朝人的論戲，看作有關教化的事務，即是從這種見解來的。